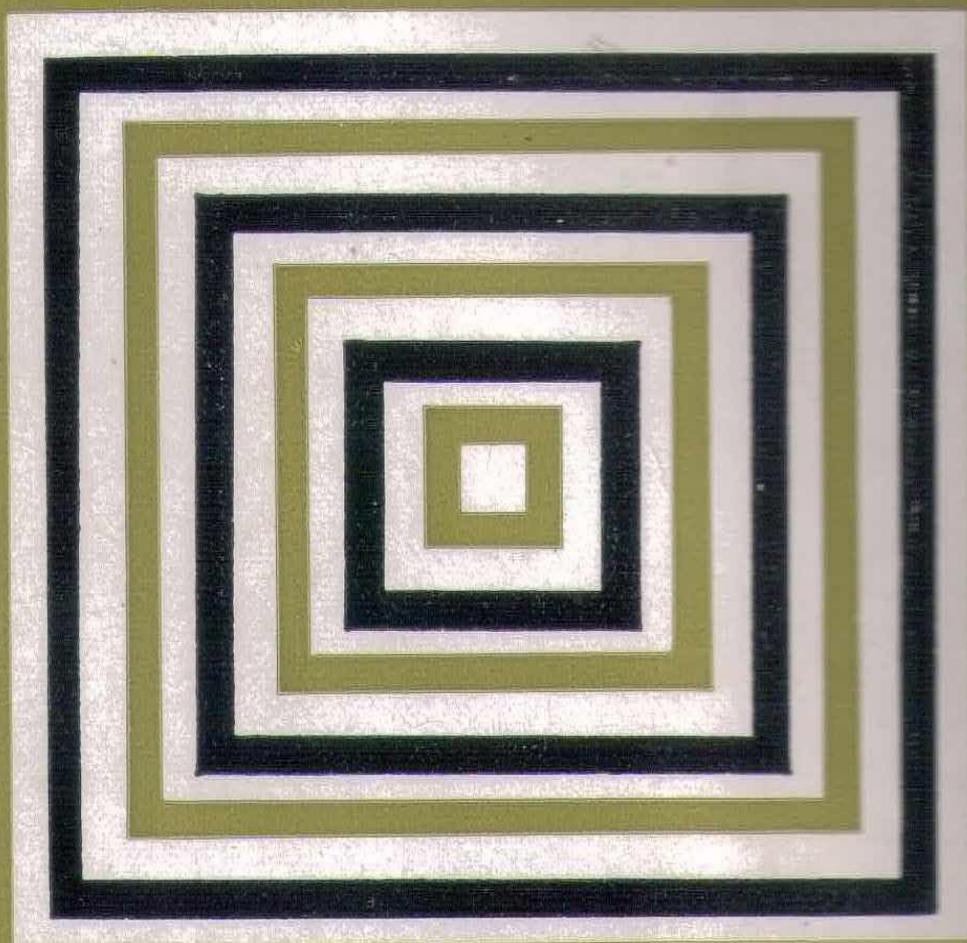


蕭同茲傳



馮志翔著

傳記文學叢書之六〇

目錄

1. 封面
2. 目錄
3. 版權頁
4. 再版贅言
5. 永遠不會忘記他（代序）
6. 一、「中央社先生」
7. 二、他怎樣領導中央社？
8. 三、藍江童子、甲工學生
9. 四、北軍禍湘鍛鍊革命青年
10. 五、蕭同茲與湖南勞工會
11. 六、長沙、衡陽、上海
12. 七、上海三年
13. 八、中宣部秘書與啣命出關
14. 九、中央社發展的時代背景
15. 十、壽康里時代
16. 十一、邁向現代化的規模發展
17. 十二、烈火裏生長的鳳凰
18. 十三、金色年代與褪色年代

19. 十四、活到八十歲
20. 十五、大家都說蕭三爺
21. 圖輯
22. 作者介紹

蕭同茲傳

傳記文學叢書之六十

印刷版編製／傳記文學雜誌社

著作者：馮志翔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一三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印刷者：坤記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雅江街七十九巷十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一日再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

為保護原著作者權益，如有任何著作權相關問題，請主動與本會

聯繫。

數位版編製／潑墨書房

網址：puomo.tw

地址：1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號3樓之1

電話：02-2365-7755

服務信箱：info@puomo.com

Facebook：[潑墨書房 | Puomo Digital Publishing](#)

二〇一五年四月 數位初版

再版贅言

馮志翔

前應臺北記者公會之請，撰寫「蕭同茲傳」，於六十三年十一月出版，列為「新聞叢書第二十九冊」。行世以後，獲多方反應，或謬加溢美，囑為擴大發行；或指正錯誤，囑為詳加訂正。關於前者，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督促最力，故即匆匆再版，收入「傳記文化叢書」。同茲先生對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之貢獻，海內外所共欽，其一生行誼，足以傳世，殆屬定論，拙筆未能狀其百一。猶冀士林碩彥、新聞學者，續作進一步的研討，發幽探微，丕成鉅製，則今日之拋磚篁引，洵為不虛。其有關疵誤之處，謹製勘誤附於再版之後^①，併祈垂教。

①數位版編註：此勘誤表中所載別字皆已於數位版重製過程中修正。

永遠不會忘記他（代序）

黃少谷

同茲先生曾擔任中央社社長十八年，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十四年，先後在社服務三十二年之久，可以說，把他一生中極重要的時間（壯年、中年）和心力，都貢獻了給中央社。他與中央社已結成不可分的關係。今天為他立像紀念，就是表示中央社永遠不會忘記他。

在這個令人感動的時刻，我有千言萬語要說，却又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現在祇簡單報告對於同茲先生的一點了解：

第一、同茲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創業家——中央通訊社最初是本黨中央黨部發布新聞的單位，當時員工同志祇有二十多人。及至民國二十一年，同茲先生奉命主持，他標揚三大方針，就是「工作專業化」、「業務社會化」、「經營企業化」，將中央社改成獨立機構，延攬人才，添增設備，逐漸布建國內外分支機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央社業務已有突飛猛晉的發展，通訊網遍布世界各地，所發布的新聞，受到全世界的重視，被稱為世界五大通訊社之一。今天，中央社更成為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個國際性通訊社，確已做到「工

作專業化」、「業務社會化」和「經營企業化」的地步。回憶同茲先生創業之功，應該是中央社歷史上最重要的一頁，也是中國新聞事業歷史上很重要的一頁。

第二、同茲先生是一位令人心悅誠服的領導者——同茲先生的領導作風，最為中央社同仁所樂於稱道的，我覺得也許可以用「以誠相與」、「知人善任」、「提綱挈領」十二個字來形容。

一是「以誠相與」：同茲先生待人非常誠懇，沒有一點虛偽。他幫助同仁解除困難，幫助同仁發展長處。因為他待人誠懇，所以中央社能羅致很多人才，而且都對他懷有知遇之感，都願與他共患難、同甘苦，即使待遇菲薄，大家仍願留在中央社工作，不因他處有高薪而見異思遷。

二是「知人善任」：同茲先生對於用人，確能做到知人善任、推心置腹的地步。他總是鼓勵大家多做事，即使發生錯誤，也以慰勉代替指責。尤其難得的是，他肯替同仁承擔責任，各方面如有責難，他決不將責任往下面推諉。因此，中央社同仁也就有膽量做事，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識而無所瞻顧。

三是「提綱挈領」：同茲先生氣度恢宏，故其治事，提綱挈領，能見其大。他祇管大事，不問小事。對於同仁的工作，祇交代大的政策，大的原則；至於在細節上，在技術上，應如何去做，則由同仁自己斟酌實際情況與工作條件來決定，他從來不加干涉。他向同仁所要

的是成果與功效。因為他祇掌握政策和原則，不涉瑣細，所以同仁便好放手做事。

關於同茲先生的領導作風，中央社的同仁曾經形容他：「是一個『鼓勵』人的人」，是一個『容忍』人的人，是一個『信任』人的領導者」，是「任何新聞從業員所夢寐以求的最佳老闆」。

膾炙人口的「念茲集」與今天出版的「在茲集」，對於同茲先生恰到好處的領導作風描述得很多，讀後真令人嚮往不已。

第三、同茲先生是我們的畏友與益友——大家都了解，同茲先生磊落豁達，瀟灑倜儻，拿得起，放得下。毀譽名利，無所縈懷。他對朋友誠信直諒，肝膽相照，以真性情與人相處，從不矯揉做作，尤其當知友歡聚之際，大家逸興遄飛，杯酒高歌，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情趣，同茲先生每每顧而樂之；但是，同茲先生立身處世的謹嚴方正，並不為其平易近人、謙和洒脫的風度所掩。

同茲先生明辨善惡是非，善則好之，惡則惡之，是則是之，非則非之，堅持原則，不稍假借，與眾議爭。他發言不多，但言必有中，言必有物，充分顯示其強烈的正義感。而且他儘管篤於友情，但絕不蔽放私情，即使是多年交往的人，如果言偽而辯，他會面指其非，甚至在杯酒聯歡之際，亦每見他有辭色凜然之時。他常說，一個革命黨人決不可做鄉愿，革命要從明辨真偽、善惡、是非、功過做起，所以凡是他的朋友，無論是同志、同事、後輩，大家都喜歡他，同時又都

敬畏他。

今天我們在這裏看到同茲先生栩栩如生的銅像，對於這位畢生忠黨愛國、盡瘁於新聞事業的鬪士，一定都興起無限的懷念之情；不過，同茲先生雖已離我們而去，他的心血灌溉過的中央社，相繼在曾虛白先生、馬星野先生及魏景蒙先生接棒領導，以及各位同仁精誠合作、共同努力之下，正使其業務不斷充實改進，隨時代而益加發展。中央社的事業將成為不朽的事業，同茲先生的精神與風範，亦將隨著中央社不朽的事業而永遠為人所懷念。

(本文為黃少谷先生於六十三年四月一日主持蕭同茲先生銅像揭幕禮時的講詞)

一、「中央社先生」

「假如外國人要給蕭同茲先生起一個外號的話，他們會稱他為『中央社先生』，正如前美國參議員塔虎脫被稱為『共和黨先生』一樣，蕭三爺就是中央社。」^①

這是現任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兼香港時報社長曾恩波在念茲集的一篇文章中關頭的一段話。給與蕭這樣一個稱謂毫無誇大之意，凡是認識中央社或是認識蕭的人都會同意這個稱謂。

「提到中央社，我們即不能不歸功於蕭同茲先生。中央社的生長壯大，都是蕭先生的功勞力量。」^②

「三十年的中央社歷史，也可以說是蕭同茲的成功史。」^③

「中央社今日的成就，就是同茲兄一生事業的成就。」^④

蕭同茲不是學新聞的，參加中央社，已屆三十八歲，以參禪為喻，正是「半途出家」。但其半生精力，都奉獻給中央社。沒有蕭，不會有成績輝煌的中央社；沒有中央社，不會使蕭在新聞界享此盛名。蕭與中央社，如此的不可分，提到中央社，立刻會聯想到蕭同茲；提到蕭，亦不能不聯想到中央社。這樣的混同揉合固不乏先例。例如提到南開大學，立刻會想到張伯苓；提到北大，立刻想到蔡元培

與胡適；提到大公報，立刻想到張季鸞與胡政之。蕭與中央社正與此相類似。

以簡單的文字敘述蕭與中央社的混同揉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名人字典^⑤ 似已可窺其端倪。雖然作者對於蕭早年經歷記載有些疵誤，但從外國人的觀點狀敘一位中國新聞界名流的事迹大體還算是忠實的。這部字典蒐羅中國名人六百人，一半在自由中國，一半在大陸匪區。關於蕭的部份，茲全文譯述如下：

「蕭同茲，一八九四年生。（據中華民國英文年鑑一九七三年版刊載，蕭出生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從一九三二年以迄一九五〇年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

「蕭的出生地是湖南省常寧縣。關於他的早年生活知者甚少。一九一七年畢業於長沙湖南工業專科學校。他第一次為人所知的社會活動是與一九二〇年冬季的湖南勞工運動有關，他和黃愛、龐人銓兩人密切合作，黃、龐於一九二一年一月（筆者按實際為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因涉及長沙華實紗廠的罷工風潮致遭槍決（筆者按實際為砍頭，容後詳述）。蕭不是勞工組織者，他的活動似僅局限於宣傳工作，諸如準備標語與散發傳單之類。雖然如此，蕭仍於一九二一年（？）被迫離開長沙。

「蕭離湘後即往廣州參加國民黨。據說他曾參與北伐的宣傳工作（筆者按彼時蕭在上海並未赴粵）。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在南

京成立，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

「一九三二年，蕭同茲被任命為中央通訊社社長。該社一九二四年成立於廣州，僅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一個附屬機構。在蕭出任社長以前，關於通訊社的任務未曾訂下長期計劃，只不過含糊規定國民黨的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須向中央黨部機構提供新聞。其時，民營大公報的國聞通訊社以及上海申時電訊社是國內新聞的主要來源。至於國際消息，則全由在華的外國通訊社支配其傳播。

「蕭擴張並發展中央社業務使其成為卓越的通訊社。他了解要發揮通訊社效能，首先必須使其成為一個獨立機構。蕭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將中央社遷出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雖仍繼續接受黨的指導，但獲得授權可以自由採訪與發佈新聞。蕭在中國各重要城市設立分社，組織通訊網並自裝電訊設備，且與設在中國的外國通訊社交換新聞。

「迨一九三七年，中央社擁有十個分社與二十一名特派員。中文報紙共有一百五十九家訂用中央社社稿，每日收集新聞電訊一萬五千字，發出兩萬字。由於中央社的成就，迫使國聞通訊社關門。一九三六年，中日關係進入嚴重關頭，蕭延聘了名記者且為日本問題專家的陳博生創立東京分社，是為中央社在國外建立分社之始。同年，派遣總社採訪主任馮有真赴柏林採訪世界運動會消息。

「中日戰爭爆發，中央社被迫關閉其在日軍佔領區內各地分社。

蕭將總社遷至重慶。儘管戰時工作困難，蕭仍維持國內十八個分社和一羣戰地特派員。新設立了攝影部，供給戰時新聞照片。當日軍飛機狂炸重慶時，中央社的幹部就深入地下在防空洞內繼續工作。在此期間，主要的外國通訊社如路透社、合眾社等，都與中央社簽訂合約，將他們的新聞交由中央社以聯銜方式發表。這項發展促使中央社英文部的成長，為國外新聞界服務。一九四〇年，中央社華盛頓分社成立，這是在遠東地區以外建立的第一個分社；在此後五年之內，相繼在紐約、倫敦、莫斯科、新德里、加爾各答、巴黎成立分社。在太平洋戰區，中央社派遣隨軍記者分駐於各個重要司令部。

「在重慶，蕭當選為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蕭與董顯光密切合作，董當時負責與外國新聞機構聯繫，並發佈官方新聞。一九三八年以後，陳博生出任中央社總編輯，負責處理這個企業大部份的技術性工作。

「蕭任中央社社長以迄一九五〇年始由曾虛白繼任，蕭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五四年，蕭出任蔣總統的國策顧問。蕭從來不被認為是黨務工作的活躍份子，可是自一九三四年起，他一直是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蕭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接長中央社，至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交卸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歷時共為三十二年七個月又二十天，而實際擔任社長職務為十八年半。這

段期間他是怎樣經營中央社的？公認中央社這個事業是成功的，成功的關鍵又在那裏？首先須將中央社發展過程描述一個大體輪廓，包括國家處境、社會形勢、新聞界狀況與中央社的關係；其次再去探討在這發展過程中他用什麼方法推動這個事業。

從民國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抗戰發生，國家經過一段承平時期的，邁步向建設途程猛進。中央社也在這段時期由南京壽康里的弄堂房子裏二三十位工作人員起家，成長茁壯，壯大到在國內各重要城市遍設分社，並在東京成立在國外的第一個分社。國內偏僻地區的報紙由於獲得中央社充分的新聞供給，新聞版面所刊載的消息與平、津、滬、漢各大報同天的內容並無遜色，普遍滿足了人民「知」的權利。中央社在性質上成為一個百分之百的新聞服務社，幾年時間，使全國報紙對它發生依存關係，使中國新聞界擺脫外國通訊社操縱新聞的局面。

八年抗戰期間，誠如曾虛白所說，「中央社是烈火裏生長的鳳凰」，「希臘神話中鳳凰給火燒得越厲害，它的活力越充沛，它的精神越奮發。」^⑥ 它由一個全國性的通訊社發展為在國際間亦享盛名的大通訊社。戰時的人力、物力、財力都面臨嚴重的困難，中央社不但沒有萎縮，反而得到蓬勃發展。更多的優秀新聞從業人員加入到中央社的行列，更多的通訊器材充實了中央社的電訊設備。最足以使中央社自豪的是無論敵機如何狂炸，它的電訊沒有一分鐘停歇過，由各個戰區發回的電訊有時比軍方還要迅速。

抗戰勝利，給中央社帶來殊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盟軍在東京灣內密蘇里軍艦接受日軍投降時，中央社有四個人參加這一歷史性的典禮。美軍公共關係主管宣布「世界五大通訊社」有優先發送新聞電的權利；並宣布這五大通訊社就是美聯社、合眾社、國際社、路透社和中央社。^⑦ 勝利復員，作為中央社領導人的蕭同茲却是還都較遲的一位，他在重慶沉思、構想、及描繪出中央社戰後發展的另一幅藍圖，如果能按照他的計劃實施，將如蕭本人所說：「中央社不僅成為世界第一流通訊社，抑且為世界報導機構開闢一新園地。」^⑧ 戰後倘非共匪倡亂，中央社在南京的新聞大樓建設完成了，裝置最新最完美的通訊設備，闢出很多辦公室供給全國及其他各國新聞機構使用，使之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在中國首都的新聞交換中心。中央社亦將改組為全中國大眾傳播事業共有的通訊機構，就和美聯社一樣，在全國以至全球各地遍布分支機構，從世界各地採訪新聞，亦將新聞供應各地大眾傳播事業。可惜，這一理想隨時局的變化而趨於破滅，只留下中央社未完成的新廈，蕭率領他的工作同仁離開了南京。

大陸撤退，使很多人張皇失措，但中央社却做到了有計劃的撤退。中央社的重要幹部沒有一個是留在大陸的，重要器材都已早期拆遷或轉運到臺北。擁有兩千六七百人的大家庭從而拆散，撤離的撤離，資遣的資遣，各地分社於工作最後一分鐘時，先後向總社發出「永別了，再見！」的電報，然後含淚棄離工作崗位。總社組成一個戰時行動小組追隨政府由廣州而重慶而成都，亦掙扎至最後一分鐘始

奉命撤退。當這個小組從成都附近的新津機場附乘空軍專機飛至海南島海口機場上空時不幸墜燬，使三人當時殉難，多人受傷，成為中央社大撤退中最後一幕悲劇。

中央社撤退到臺北後，範圍是縮小了，但和前次撤退到重慶一樣，工作沒有停止過，國外分支機構照常發回新聞電訊，總社亦照常發稿，關於國內的重要新聞亦仍照常向世界傳送。中華民國政府屹立在這裏，中央社也屹立在這裏。但當紅禍淹沒了整個大陸，全世界的人並不明真相，對我們有太多的誤解。忍辱負重，只有我們自己清楚，同時正非常需要國際友人的了解，知道我們現在做些什麼，將來還要做些什麼。蕭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即以他的名義邀請美國新聞界重要人士組團前來臺北訪問。這些美國朋友確是道義之交，訪問之後，向全世界報導中華民國的真實存在，雖敗不餒。做完這件事，對蕭來說，有「風雨故人來」的感受，心裏有幾許欣慰。這也是蕭在中央社社長任內最後一個衝刺，過了五個月，他就將這付重擔卸下了。

前面說過，蕭是學工程的，對於新聞事業這一領域是半途出家，且已年近四十，却能一手創造一個大規模的現代化的大通訊社，有人稱為「奇蹟」。其實，只有在神的世界裏才有奇蹟，在人的世界裏沒有。又有人稱他為「英雄」，也不是。英雄是以自我作中心，而蕭的一生很少談到「我」，在意識裏既然沒有一個「我」在，他只是芸芸眾生之一，視一切世象皆為平凡，所作一切努力，只不過是「平凡的實踐」而已。

蕭的前半生經歷與他後半生的事功應該有深切關係。由於是學工程的，養成他治事的方法，必須有條理，有步驟，先繪藍圖，然後按圖施工，定出進度，照進度進行。再由於他早起參加勞工運動，對於他的人格與性格的鼓鑄有深刻影響。從事勞工運動為的是芸芸眾生，不是為的「我」，形成蕭的雍容大度，汪洋浩瀚，可以容人亦可以容物。蕭和黃愛、龐人銓等人發起湖南勞工會只有二十八個銅元^⑨起家，一雙赤手可以打天下，何事不可為？參加革命工作是最危險的事業，隨時準備將生命賠進去，更何事不可為？

新聞事業是大眾傳播工具，也為的是芸芸眾生，為黨作宣傳工作又是革命事業，正符合蕭的志趣和性格。但却經過深思熟慮才承受這個任務。他認為接辦中央社應像接辦工廠一樣必須當作事業經營。辦工廠，須要求出品精良，中央社的出品是稿件，必須使中央社的稿件為報社所樂於採用。辦工廠，需要優良機具，通訊社的機具是電訊設備，因此必須擁有獨自的電訊交通，迅速將出品送達報社。中央社的服務對象應為全國各地區的報紙，尤其是偏僻地區的報紙要雪裏送炭，而不是僅為大都市的報紙錦上添花，才有益於輿論的統一形成，鞏固國家的團結。中央社須首創新聞電訊的全國廣播，並須在各地普設分社。

蕭同茲懷著這樣的構想，於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⑩晉謁蔣委員長，提出三項要求：

一、獨立經營，成為社會文化機構，中央社社址須遷出中央黨部。

二、以新聞為本位，自設無線電新聞專業電臺，發稿有自由裁決之權，不受干預。

三、用人行政，社長有自由決定之權，不受干預。

這是相當大膽的要求，蔣委員長卻完全接受了。

蕭接事以後，本著這三個原則開展社務，一切照他的理想進行，不但未受到任何干擾，而且黨、政、軍各方面的負責人都一致支持中央社事業的發展，新聞界又予以充分合作，成為中央社有力的支撐，使三項原則得以逐漸實施。

蕭於就任社長十二年之後，中央社在重慶舉行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會席上發表演說仍重提這三項原則。他說：「在受命之初，曾提三項要求，今天我特重新提出：①

「第一、要使本社成為一個社會事業，必須機構獨立，對外不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的帽子。總裁也認為是正確的。我們現在對於這一點，已經做到。總裁去年還命令我們研究如何使本社事業化，我們也正在研究之中。」

「第二、當時本社的電訊僅賴交通部的有線電報，消息的傳遞太

不靈活，所以要求自設無線電臺，建立大都市通訊網。十二年來，本社電訊網的佈置已逐漸加強，但在戰後本社一定不能靠這少數的電臺，所以要求中央積極協助加速使它現代化。」

「第三、在不違背國法和黨紀的原則下，能有處理新聞的自由。過去我們已經獲得這樣的自由，到抗戰開始，若干消息的發佈受有限制，這是戰時的現象，我們自然無話可說。今天我們僅要求戰後能恢復像過去的自由，因為約束太多便難有進步，希望當局不斷指導，並對本社工作能予信任。二十年來，本社幸未發生大的錯誤，現在有了二十年的經驗，相信將來或許不致和國策距離太遠。」

燕大新聞系主任蔣蔭恩教授於中央社二十週年之日在成都中央日報撰文說^⑫：「蕭社長接辦中央社時的『三個要求』是將通訊社辦好的最低條件；而蕭社長接著的『三個計劃』，更為中央社未來發展奠下了鞏固的基礎。我們祇要從這兩點上觀察，就可體會到領導中央社向著新的方向邁進的人是具有如何的眼光與抱負！」

蔣蔭恩以新聞學者的眼光綜述蕭同茲主持中央社以後的貢獻歸納為下列六點：

一、我國之有通訊社，大概在民國初年，然而規模不具，設備簡陋，沒有甚麼作用。迨國聞通訊社成立，始具備正式通訊社條件。中央社自民國二十一年改組後，努力經營，成績猛進，以現代化之組織與設備，為我國通訊社奠定基礎。這一事實，在我國新聞事業史上佔

著極重要的一頁，這可以說是中央社的第一貢獻。

二、中央社在民國二十一年改組後，即有「十年擴展計劃」的擬定，準備於十年內完成全國電訊網，是年首先樹立「全國七大都市電訊網計畫」，自設電臺，直接通報，在消息傳遞上構成迅速的條件。這一個劃時代的改革，對於我國新聞事業的貢獻，直不可以估量。抗戰以來，總社雖一再播遷，迭遭損失，然而大後方電訊網的布置仍積極進行，遠至邊疆省份，莫不有該社據點。隨時宣揚國策，溝通消息，對國家團結實具有莫大影響。這可以說是中央社的第二個貢獻。

三、中央社改組後的「三個計劃」：第一是完成國內通訊網，第二是與外國通訊社成立合作關係，第三是在世界政治經濟中心設置通訊網。這裏的第二與第三，實際是一個目標，不過所採方式，一為消極，一為積極。現在消極方面大至漸趨完成，由民國二十年與路透社簽訂合同，取得其在我國發佈中文電訊之權起，接著哈瓦斯、海通、合眾、國際等外國通訊社也都與該社成立合約關係，這時我國新聞「自給」與「獨立」，可以說已做了初步的工作。其次該社對於積極方面的計劃也正逐步完成。除戰前的東京外，目前華盛頓、紐約、倫敦、新德里、加爾各答等國際都市都有該社分社或特派員專任採訪工作。我國新聞事業機構有特派員駐在國外直接採訪消息者，尚以中央社為嚆矢。現在我們在報紙上不但能看到全國各地，甚至敵後消息，並且能讀到我們自己訪員由海外發來的電報與通信，是令人最感愉快的一件事。這可以說是中央社的第三個貢獻。

四、中央社雖為政府設立的新聞機關，它却以「新聞真理」為第一義。所發消息都能顧到「正確」、「迅速」、「客觀」的條件，而不含有絲毫不正確或無意義的宣傳。其次中央社對於新聞的選擇標準素嚴，而於新聞寫作方式亦能採用歐美所長，所以近年中央社對於提高我國新聞標準一點貢獻殊大。這可以說是中央社的第四個貢獻。

五、中央社近年對於新聞記者人才的訓練頗具成績，而於新聞記者水準的提高亦甚為重視。該社工作人員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及專門訓練，不獨工作效率較高，而且對於本身職務亦能有深刻認識。例如該社派駐國外人員，其學識經驗與技術水準均不亞於歐美各國記者，故能勝任愉快，圓滿達成任務。這種新聞記者人才的吸收與訓練，該社實開風氣之先。這可以說是中央社的第五個貢獻。

六、抗戰以來中央社對於戰地新聞報導即盡最大的努力，中央社不但在各戰場有隨軍記者組，隨時將前方情報報告後方，即在國外各主要戰場，中央社亦派有專員採訪消息，供給國內各報刊登。後方人民能明瞭前方情形，並且關切前方，使前後方打成一片，中央社在這方面的功績最大。這可以說是中央社的第六個貢獻。

蔣蔭恩所述中央社的六大貢獻，包括：為我國通訊事業奠定基礎，鞏固國家團結，完成新聞自給與獨立，維護新聞真理，銳意於新聞人才的訓練及善盡戰時新聞報導責任各端，相當客觀而平實，每一項都有具體事例印證，決非空洞抽象的揄揚。誠如蔣文所說，凡是知

道中央社的人，都可以同意他的意見。

在中央社的發展過程中，正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最多變化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的人和事，相互關連與相互影響的錯綜複雜關係實在是千頭萬緒，一個事業，一個人，其成就與挫折，受到主觀與客觀條件的交替影響，風雲際會，有一定的規律，看似偶然而決非偶然。中央社的成就，如果沒有蔣總統對蕭的充分支持與信任，決不可能在短期之內成為現代化的通訊社。如果沒有社會各方面的協力，決不能使事業推展如此順利。倘若不是新聞同業對中央社的發展有迫切的需求而予以完美的合作，中央社業務推進決不能如此迅速。倘若沒有一羣優秀青年，不顧危險，罔計名利，踴躍投身到中央社，把青春、智慧，甚至最寶貴的生命也獻給它，中央社的成長決不會如此充實。中央社的成就是發揮集體智慧與整體力量的一種成果。

獲致這樣的成果，蕭同茲辛苦耕耘之功自難磨滅。但如只從表面觀察，以一個「外行」而成為一個成功的新聞事業家則是難以理解的。況且，中國之有現代新聞事業，這道門是由西方傳教士敲開的，在以後的發展中，新聞事業一直沒有擺脫「文人論政」與「文章報國」的窠臼，新聞事業是操縱在「耍筆桿子」的人手中。蕭既不是「搞洋務」的，亦非「耍筆桿子」的，却能以大手筆推動中國新聞事業的現代化，更是難以理解。可是認識蕭同茲的人却一點不感到奇怪。他是謀定而動的人，有認識，有遠見，知道有所為與有所不為。對人、對事、對當時環境必求透徹的了解，於新聞事業與國家需要，

在出長中央社以前已是百分之百的「內行」。他是調和鼎鼐的能手，君子和而不同，兼容並蓄，具有為他人所不及的領導才能。主持社務，把握原則，心無旁騖，鏗而不舍，古人說：「為者常成，行者常至」，蕭的成就豈是偶然！

①曾恩波：「中央社先生」 念茲集第八八面。

②陳博生：蕭同茲先生與中央社 中央社業務通訊卅週年社慶特輯第一八面。以後引用簡稱「三十週年社慶特輯」。

③陳博生：同上

④陳博生：蕭同茲先生與中央社 中央社業務通訊卅週年社慶特輯第一八面。以後引用簡稱「三十週年社慶特輯」。

⑤Howard L.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ume one pp. 94-95

⑥曾虛白：烈火裏生長的鳳凰 三十週年社慶特輯第五面。

⑦曾恩波：「中央社先生」 念茲集第八九面。

⑧蕭同茲：要完成現代化通訊社我們需要更大的努力 中央社編輯通訊第九十五期上輯中央通訊社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刊第六面。以後引用簡稱「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⑨記者：我們的賬 黃龐三週年紀念刊第一三面 原文說：「我們原是痛心已極，湖南勞工會僅僅有二十八個銅板的財產，黃、龐常常餓著肚皮做工會的事，而中國共產黨却假借湖南勞工會的招牌騙取俄羅斯的錢投入自己的袋子裏去住洋房、討姨太、吃西餐。世間雖有這樣希奇的事，世間雖有這樣不平的事，然而我們又有什麼法子呢？」

⑩蕭同茲：中央社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會講詞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下輯——紀念講詞第五面。

⑪同⑩。

⑫蔣蔭恩：對於中央社的希望 三十三年四月三日成都中央日報第二版。

二、他怎樣領導中央社？

蕭之領導中央社，像天馬行空，永無止境。人員擴充，全盛時期超過最初期的一百倍；事業擴張，指向那裏，就推展到那裏，得心應手，又似了無罣礙。他是運用一套什麼操作程式？

發展事業，需要經濟支援，錢從那裏來？

中央社的待遇並不好，他却到處羅致人才，且都樂於為中央社效命，不但安於其位，並亦久於其位。這樣龐大的機構，有形形色色的人才，亦有形形色色的性格，却不曾鬧過人事糾紛。終蕭之任，下條子開除什麼人只有少而又少的例外。人與人相處，沒有政治派系，沒有學校畛域，沒有階級意識，沒有同鄉觀念，融融洩洩，生活於一個大家庭中。蕭就是慈祥的家長，不威而畏，大家都敬重他，離開了中央社，仍然懷念他。主持一個機構，特別是公家機構，其權力來源來自他的職務。當其在職時，部屬服從他的領導，殆為理所當然，一旦離職，這個機構和這個機構裏的人就與他完全脫離了關係，只留下一段歷史。蕭與中央社以及中央社的人却是一個不尋常的例外。從三十九年十月他交卸社長職務到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他逝世之日為止，蕭和中央社在職與離職的人仍然保持經常密切的往來，身在海外難得回到臺北的「中央社人」回來第一件事就是要看蕭先生。蕭之如此得

人心，究竟具備一些什麼因素？

這些事，原應從中央社的檔案中去發掘材料，尋覓答案。可惜中央社迭經變亂，幾度播遷，且經歷數十年，不可能保存完整的檔案。例如要蒐集中央社歷年的職員錄，要蒐集中央社歷年的預算與決算數字，都無從得到結果。蕭本人既未曾寫回憶錄，亦未保存完整的日記或書翰資料。蕭的性格，一向是抱渾然忘我的襟懷，當其安享退隱生活，對於他過去的作為總認為無足輕重，只當作「小事一件」，絕不與朋友嘖嘖談往事。到今天才來動手發掘材料誠然十分困難。惟蛛絲馬跡，仍深嵌在蕭氏朋輩的記憶裏。只是記憶是片斷的，事迹也顯得零亂，很多事實接不上軌。經過多方查證，多方訪問，才理出一個頭緒，從這當中窺探出大致的脈絡。

比較容易了解的是蕭的一套找錢的本領、花錢的氣魄和處理財務的原則。有一個人，對這些事知道最清楚，就是在中央社工作了四十年，一直擔任會計而以總稽核的地位退休的丁則怡，對此歷歷如數家珍。^①

丁說，中央社從中央黨部搬出來後，當然也有預算數字，那只是維持最低限度的人事費和事業費，由中央黨部撥款。但蕭先生在一年之內就完成了七大都市的通訊網，這點經常費決不能敷應開支，所謂預算，僅是徒具形式。發展事業，靠蕭先生去找錢。蕭先生找錢的方法是兜售「計劃」，計劃一經核准，經費也跟到有了著落。蕭先生人

緣好，計劃也都很確實，兜售總是成功。支援計劃的經費來源並不固定來自一個地方，有時是中央黨部，有時是教育部，有時是財政部，有時又是委員長行營。特別計劃，向例是由 委員長親批核撥。真是急切需要錢而又一時籌不到財源，這種情形也不是沒有。例如二十五年為籌設重慶準備電臺，苦於沒有經費，蕭先生就面謁 委員長陳述這個計劃，深獲 委員長嘉許，關於經費，又請求准許他在歷年無線電器材折舊費項下動支五萬元支應， 委員長亦表同意，並催他快辦。丁則怡說：「在那段發展期間，我們只感到蕭先生調度財務簡直有『呼風喚雨』之能。」

丁說：蕭先生會找錢，也肯花錢，這種事例太多了。譬如二十二年要籌設英文組，北上去延聘任玲遜，他就願意付出比社長薪水還高的待遇。二十三年，孫殿英與馬鴻逵在寧夏作戰，都說擁護中央，但真象難明。他就派遣一個旅行記者到西北採訪，一去就是半年，陸續將西北情況向京滬讀者介紹。二十五年在柏林舉行世運會，派遣採訪主任馮有真隨中國代表團前往，逐日用長途電話報告大會消息，往返旅費及電話費用非常可觀，在那個時候，其他新聞機構都沒有這個氣魄。戰時派遣各戰區的隨軍組，在國外派遣特派員，經費都相當龐大。至於擴充電訊器材、建築需用房舍，再多的錢他都肯投下去。

蕭先生花錢有時也很「小氣」。丁則怡說，蕭決不願社裏的行政機構龐大。最初的社長室只有一個書記，後來才延聘秘書，襄助社長處理社務。日常行政事務只有一個事務組，二十五年改為部，總攬總

務、會計、財務各項工作，却是人數最少的一個單位。遷至重慶，二十八年才成立會計室，三十年成立人事室，但這方面人數也沒有擴充多少。

中央社的經費每月向中央監察委員會檢據報銷。總分社各項開支不論經費來源如何都須粘附單據按月呈報中央監察委員會，中監會亦不時推選監察委員率同重要職員蒞社查帳。丁記得很清楚，張繼，張委員來社查帳的次數最多，對於我們的辛苦總是作一番鼓勵。

丁說，蕭先生將發展業務置於第一位，行政經費相當緊縮，每每不敷開支，社裏時常鬧窮。而況中央社的待遇不好，社裏同仁的生活情況也不見佳，所幸大家都以工作為重，有刻苦精神，沒有人埋怨。丁則怡說：「中央社在外面的聲譽一天天增高，我們是靠精打細算過苦日子掙過來的。這段艱苦日子直到抗戰勝利還都到南京以後，情況才有所改善。」

丁感覺跟蕭先生做事有一個好處，只要你做事照規矩來，他從來不找你囉嗦。他最講公私分明，決不以他私人的事要社裏麻煩。這些年來，蕭先生不曾向社裏借支過。社長有筆特支費，大部份都用來接濟有特殊需要的同仁。至於他家裏大小事情更沒有跟社裏打過交道，這個原則他把持得很穩。丁則怡舉個例說：「蕭先生於三十九年改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後即不再在中央社支薪，僅由社內供應座車一部，司機一名。這部一九四七年型的道奇車原係中華煤油公司董事長

（蕭兼任該公司的董事長）的座車，因撤退時與中央社財物一併運來，蕭先生即關照列入中央社的財產。這部車一直使用了十幾年沒有換過。蕭先生後來交卸主任委員，車也交還給中央社。」

丁則怡說：「蕭先生移交社長職務時，交出黃金六百兩，外匯美金二十餘萬元，這筆錢係籌建南京大樓尚未完成部份的剩餘經費，蕭先生囑妥為保管，指定作國外各單位應變經費。」丁則怡在念茲集中撰文^② 提到這件事說：「三十八年八月，電召德臣兄（紐約分社主任湯德臣）來廣州，商談緊急應變：一、裁併一部份單位。二、現職人員減發薪津（自九折至七折不等）。三、蕭公慮及萬一人事上有不測的變故，授權德臣兄肩起海外單位的領導工作，慎重處理銀行的珍貴存款（支票由其單獨簽字），務使中央社海外工作得以撐持恆久。」

問到蕭先生個人用途，何以從來不發生支絀？丁則怡說：「蕭先生個人與家庭用費，據說最高當局按月給他一些錢。抗戰以前，吳鐵老任上海市長，以蕭先生與鐵老的關係，鐵老當然也不會讓蕭先生匱乏。抗戰時期，大家受苦，蕭先生的經濟情況大不如前。勝利以後，蕭先生兼任中華煤油公司董事長還兼華威銀行董事，情況就大為改善。遷移到臺北，蕭先生跟大家吃苦，交卸中央社以後，出任幾家企業公司的董事長，在安享餘年的一段時間裏，生活還算是舒適的。」

丁則怡認為蕭會花錢是花得適當，錢！常常用來濟人之急。譬如在大陸，有很多報社或通訊社偶因週轉不靈，找蕭先生想辦法，蕭先

生總是設法張羅，幸而大家都能守信，借的錢沒有不還清的。

蕭的長公子孟能非常同意丁則怡評述他父親處理財務一絲不苟的精神。^③ 孟能清楚記得當蕭移交中央社社長職務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關照他作清點工作，清點家裏有沒有中央社的財物，那怕是一本書都須立刻送還中央社。孟能說：「人家都只知道父親用錢手面很大，但他自己是很節儉的。不錯，父親愛修潔，應用物品能用好的總是用上好的，譬如習慣穿亞羅襯衫與摩理斯牌羊毛內衫褲，在重慶時也是如此。當香港沒有接濟時，穿舊穿破，打上補釘，仍不肯丟棄。我們家裏非常節儉，有時很拮据，不過在外表上看不出而已。」

蕭初到臺灣時渡過一段苦日子。三十九年七月三日他寫給蕭夫人的信，有這麼一段話：「近兩個月來，接到香港方面的親友求援的信甚多，真使我無法應付。他們誠然是旅況淒慘，又那知我也到了囊空如洗的境地。」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給蕭夫人的信也曾說到：「近月以來，我們接到的求援信件已不知有多少，我幾乎已經沒有勇氣拆信了，因為我有的同情心，而我的能力實在太薄弱了。」

三十九年六、七月間，蕭寫這些信的時候，正是他在中央社邀請美國新聞界來訪不久，而三個月後，他又已捧著那麼多黃金和美金移交給繼任的社長，而他自己却是「囊空如洗」，在家信中透露真象，的確是外間朋友看不出的。

「中興以人才為本」。自來之成大功立大業者，其成功的因素以

得人為第一。曾國藩崛起鄉里，靠少數的朋友練鄉勇以抗洪楊，卒成中興大業，主要歸功於善用人才。在這等處所，蕭同茲近乎學曾國藩。但是曾過於「案牘勞形」，而且過於愛惜羽毛，「憂讒畏譏」，蕭沒有這些顧慮。蕭的名沒有曾高，權沒有曾的重，而且他所專注的只是主持一個事業，並非操軍政大計。他不必每天案牘勞形，可以騰出時間與社會各方面廣泛接觸，靜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一則可以虛心檢討，為社務發展妥籌至計；一則廣接新聞界人才，多方羅致。他有用人之權，自由裁量，無須憂讒畏譏。例如延聘陳博生出任駐東京特派員，蕭感到那時有此需要，而陳是最理想人選。可是陳在新聞界久享盛名，所主持的北平晨報在政治觀點上並不與中國國民黨相一致。蕭以友情與國家需要去說服陳，陳即欣然接受約聘。這有點像劉備三請諸葛，在新聞界留下一段佳話。

文人相輕，自古為然。在文化事業機構中，以文人為骨幹，而文人有文人的脾氣，集合一羣來自東南西北的文人，出身不同，性向各別，欲使其一團和氣，互相尊重，而不鬧意氣，耍性格，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其次是技術人才，也大都是「性格明星」，憑其一技之長，天地至為廣濶，「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一言不和，當即拂袖而去。中央社的工作幹部除文人之外，幾乎有一半是電訊技術人員。中央社既非海關，又非銀行，却能使眾多技術人員安心工作。特別在戰時派出許多隨軍組，特派記者還有機會為發出精彩的電訊而獲得精神上的愉快與滿足，電訊人員無法分享，却同樣在戰地出生入死。他

們不為什麼，好似有股無形的力量給他吸引住，這股無形力量無以名狀，只能叫它「中央社精神」。精神之為物原本很抽象，但在中央社却真實的存在。創造、維繫，並代表這個精神的，大家會不約而同的指向蕭社長。否則不會在他交卸任社長職務後二十多年的時間裏還有這許多「中央社人」圍繞在他左右，維繫一團祥和之氣。

蕭之用人，認為中央社用得著才用，用不著決不用。他的常寧縣小同鄉很多不遠千里而來請他安插一席之地，他如認為不合適即婉言推却，會坦白告訴來人，中央社的工作對你並不適合，我可以為你另外介紹工作。由於這樣，使許多同鄉對蕭不諒解。但蕭也並不因為籍貫是常寧而故意矯情，予以摒棄。舊金山特派員李緘三是個很好例證。^④抗戰時，李在昆明西南聯大唸政治系。某天，從報界友人處獲悉中央社社長蕭先生到了昆明，一時心血來潮，不揣冒昧到旅社求見，蕭毫不遲疑的接見這位素昧平生的青年，李自述來意，想在昆明分社謀一臨時職務，半工半讀。蕭告訴李，寧可在生活上再刻苦一點，應該以先完成學業為第一，等畢業以後，如仍有意進中央社，到那時再說。翌年夏天，李畢業了，到了重慶。因為學的政治，就到政府機關謀職，有一兩處接洽得已有眉目。想到與蕭在昆明有前約，於是又逕自赴中央社拜訪。蕭對於李信守前言，完成學業就來見他，顯然表示欣慰。不過，他說，當時有幾位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在社內實習，要等他們決定去留之後才能考慮李的問題。果然在兩個星期後，李接到蕭的來信約往晤談，告知李，編輯部有個助理編輯的職務可由李擔任。

也告訴他，中央社待遇微薄，要他鄭重考慮再作決定。還有什麼好考慮的，就這樣一言為定進了中央社。中央社已數易社長，李緘三仍在舊金山工作。

蕭之用人，信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則。他用你了，決不懷疑你有貳心，你也不用懷疑他在「演戲」。蕭與人接觸，沒有虛偽的客套，却有虛心傾聽陳述的耐性。他時常說，每個人都有長處，也有短處，如能儘量使其發揮長處而寬容短處，必能安心工作，對事業有貢獻。他喜歡青年有衝勁，不怕你做錯事，就怕你不做事。有好些回在新聞處理上發生不大不小的錯誤，他把事情扛住了，沒有責怪誰來。

蕭自從離開學校就參加革命，從事十年的勞工運動，對羣眾心理與青年心理澈底摸透了。他有幾個方式對待他的同事。第一，他從來不把自己看作是長官，不喜歡人家稱他社長，頂客氣稱他蕭先生。與人通電話，拿起話筒第一句話必說：「我是同茲」，在中央社工作的人對這四個字非常熟悉。函電往來，他也不喜歡部屬稱「職」，都習慣稱「弟」；年輕一點的稱「晚」，他說不能把新聞事業機構當作衙門。第二，他很少以訓話語氣對待同仁，和他晤對，他很少談他自己，而只對你表示關切，站在你的地位替你考慮問題，然後解決問題。往往在談話中，你會忽然忘却他是社長，你是職員。第三，蕭絕對尊重青年的自尊心而不予傷害。在南京壽康里時代，由社長室出來的樓梯邊有個小小的「灶披間」，裏面只有簡單陳設。每逢同仁們做

錯了事或發生了什麼問題，就請他到灶披間來，關上門傾談。他不發脾氣，也不在許多人面前指責一個人。多少問題，在這灶披間解決；多少誤會，在這灶披間冰釋；多少情感，在這灶披間建立，交融。^⑤

當中央社事業發展到頂峯時，海內外員工二千數百人，不可能每個人都經社長遴選，社長也不可能認識每一員工，他把用人之權交給各單位主管，並予以充分信任，不加干涉，好歹歸你負責。已退休的電務部主任周紹高說：^⑥「關於人事進退，我們一簽就准。錄用新進人員，沒有所謂名額限制，也沒有什麼資格限制，只看這個人能不能做事，負擔或負擔不起這份工作。」

蕭似乎沒有特定的人事制度，也沒有固定的考試制度。蕭就任十年後始於三十一年七月成立人事室，全部只有四個人，承辦總分社職工之任免、假調、升降、獎懲等登記事項，也承辦員工福利及生活補助費登記、冊報與登記事項。而當時「國內外共有四十餘單位，全體員工約一千餘人。」^⑦ 四個人辦這些登記、表報就已經忙煞，決沒有時間再插手別的事情。關於人事，蕭掌握的原則只有八個字：「量材器使，分層負責」，他認真這樣做，並已貫徹到底。一般人都說，蕭同茲能將兵，亦能將將，具有超人一等的領導才能。其關鍵是因為他器識寬宏，知人善用，待人以誠，不說假話，不虛應故事。

①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訪丁則怡於其寓所。

②丁則怡：憶二三事 念茲集第一面。

- ③為撰蕭同茲先生傳，承蕭孟能兄充分合作，不時會晤，並允許筆者查閱蕭先生生前一切資料，包括家書在內。
- ④李緘三：身教言教迄今不忘 念茲集第二八面。
- ⑤黃肇珩：灶披間的成就 在茲集第一九一面。
- ⑥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訪周紹高於其寓所。
- ⑦人事室：人事瑣談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上輯。

三、藍江童子、甲工學生

湖南常寧縣西鄉距縣城十五華里有個小地名叫藍江。既稱為江，必然有條河流，不錯，是有那末一條小小河流，它的源頭來自四週的高山，在眾山環抱之中出現一塊小盆地，有條小河自南而北貫穿這塊盆地，就是藍江。這條江真小，在冬季水涸時只能稱之為溪，夏秋洪水季，濁流滾滾而下，倒也形成江河的氣派。由於源頭短促，加以流量不固定，雖名之為江，並無舟楫之利，江裏連一條小船都沒有。是盆地，又有水源，自然是一片肥沃的耕種之地，盆地種稻，淺丘種紅薯、花生等旱季作物。田疇遍野，炊煙處處，是典型的湘南鄉村景象。這裏有個小小市集，只有短短一條街道，叫藍江市，鄉村日用品平常日子在這裏可以買到，較大宗的交易還是沿襲古舊傳統，靠趕集的日子完成買賣。每逢趕集，藍江市果然熱鬧，挑擔的，擺攤的，擠滿了藍江市。這地方因地形好，得天獨厚，無旱無澇，農村頗為富庶，大部份人自耕自食，沒有什麼大地主富甲一方。

距離藍江市不到兩華里之處有個蕭家村，就是蕭同茲的故里。蕭家是藍江的大族，世代繁衍，務農為本，沒有出過顯赫一時的人物。前清咸同之際，藍江有位唐義渠，出身舉人，應曾國藩之召，投筆從戎，剿平洪楊有功，擢署安徽巡撫，算是春風得意，可是並不姓蕭。^①蕭同茲一家也是世代務農，但他父親蕭越民却不安於困居鄉里，從小

即出外經商，足跡遍及四川、貴州、廣東、江西各省。^② 也非做大買賣，充其量不過是個行商而已，却比較是見過世面的了。越民前後娶過三房妻室，前妻何氏生二子，長名流芳，次名向榮。續弦袁氏又生三子，同茲是頭胎，排行居三，再就是長根，居四，第五子早年夭折。越民公想得很深遠，唯恐日後子孫眾多，家庭意見不和，很早就析產分家，老夫婦倆一份，其餘四子各一份。老三同茲，老四長根也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給成了家。蕭氏一家人都很忠厚，雖然分了家，兄弟間友于之情仍極敦睦。老大是個老實人，在鄉務農，老二在藍江市做小買賣，老三同茲決心讀書上進。老四也讀書，沒有怎樣好好的唸，很早就到水口山礦山做事，民國十六年長沙掀起馬日事變（按為何鍵所部許克祥團發動反共政變），蕭長根糊里糊塗就被打死了。

同茲生於民前十七年，當為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農曆九月十八日，接近世中西日曆對照表推算，為西曆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星期日。^③ 他出生的這年，正是天下多事之秋。甲午戰敗，乙未四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五月五日，日軍攻佔臺灣。同年，康有為、梁啟超集合一班舉人在北京「公車上書」，要求清廷改革朝政。這正是中國落伍、保守、愚昧的勢力作垂死掙扎的時候，也是新興力量冉冉上升求新求變的時候。國父中山先生這年正滿三十歲，農曆正月二十四日設興中會總機關於乾亨行，農曆八月十八日在廣州設農學會，九月初九日陸皓東先烈殉國，國父經澳門赴港，偕鄭士良、陳少白亡命日本。蕭的出生僅距陸皓東先烈殉國後的第九日。革

命的浪潮縱令這時還衝激不到偏僻的藍江，蕭家村初生的嬰兒如果不甘心老死牖下，命裏注定要投身到一個大時代的劇變之中。

蕭家的這個老三從小就白皙聰慧，不像是下田做苦力的材料，沉靜溫和，倒適合於讀書求上進。越民老先生久歷商旅，對自己幾個兒子的前途自然清楚的打算。分家析產，老三有他獨自掌握的一份財產，足可供其膏火之需。因為這樣，同茲一開始就走上讀書這條路。從啟蒙到十三歲，他都是在鄉下讀私塾。那時還是清朝末年，所接受的教育方式當然也還是五經、四書那一套。湖南對於興辦新式學堂，風氣開得比較早，然而讀「洋學堂」畢竟還不能普遍被人接受。同茲對於鄉間古老的私塾教育不會太感興趣，就他的個性而言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是什麼人鼓勵他到外面去闖闖世面，離開常寧出門去進「洋學堂」却無從查證。或許就是他的父親也說不定。或許是同茲本人決意要發揮自由意志也說不定。總之，藍江關不住蕭同茲，使其在那個時候成為藍江出外上學的先驅者却是鐵的事實。

蕭十三歲離開藍江，求學時寒暑假還常常回去，做事以後，就很少有機會回藍江。儘管如此，蕭對於在故鄉的童年生活還是非常眷戀。大約是民國五十年左右，有半年之久，張隆延教授每星期六到蕭家和同茲先生等人談天。那才是道地的談天，天南地北，從老子道德經談到抽象畫，再回到西洋古典音樂的欣賞，又談及大陸的風景名勝，蕭傾聽得很入神，十分感興趣。談來談去，不知怎的，有一天忽然引起了蕭的懷鄉之情，他要求隆延挽曾紹杰為他鑄刻一方圖章，指

定要刻「藍江童子」四字。現在這方圖章仍由孟能珍藏著。「藍江童子」一方石章不止是代表蕭的思鄉情懷，也代表一個退隱的老人客居臺瀛的寂寞。一個老兵，在疆場拼鬥了幾十年，解甲之後却不能歸田，故鄉的一丘一壑，兒時的一顰一笑，午夜夢迴時盡成思憶。藍江離他很遙遠，可能終生不能再相見，可是他在那裏渡過童年，當其摸索把玩這方圖章時却會將距離拉近，對蕭如何親切，決非他人所可體會。

辛亥前後，氣象維新，蕭的雄心壯志受到鼓舞，決心離開常寧。民前四年，首次出門到衡陽就學。衡陽是衡州府的府治，也是湘南的重鎮，府屬各縣的學生大概都願意到府城上學堂。常寧在衡陽東南，相距不過百餘里，常寧人出門，都須經過衡陽。蕭的老家在藍江，到常寧縣城約十五里，由縣城至柏方陸程又約三十餘里，到柏方改乘木船，順流而下，即達衡陽。這段水程約九十里，也要走一天一夜才到達目的地。

蕭在衡陽入衡郡聯合中學，讀了四年，宣統三年十一月畢業。那時正是少年，常相往來的以常寧同鄉居多，與其中一人訂為生死之交，此君亦姓蕭，不但是同里，面貌也長得很像，但同姓不宗，不屬於一個祠堂。兩人意氣相投，形影不離。同鄉中有位老大哥叫蕭雲階，測量學校畢業，在衡屬府中任職。有一天，大家聚會在一起，雲階忽發靈感，給這兩位年輕老弟取名字。^④ 他說，你們兩人既然相交莫逆，不如一個叫蕭同，號異茲；另一位叫蕭異，號同茲。大家都拍

手贊成，這兩個年輕人更是喜不自勝，欣然接受。民國二年，兩人又同赴長沙投考甲種工業學校，蕭同與蕭異均被錄取。蕭異習機械，蕭同習紡織。蕭同畢業後赴法留學習鐵路工程，歸國後曾在石家莊路局工作。嗣先後出任湘桂鐵路與粵漢鐵路的總工程師，大陸淪陷，被關在鐵幕，從此沒有音訊。蕭異的畢業文憑還是蕭異，因為黃龐事件避禍，始改以字行，就是今天大家所尊稱的三爺蕭同茲。

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簡稱甲工）的校址在長沙戩子橋，後來遷至小吳門外甘家台，附屬實習工廠設在五十標後面的大壠地，宿舍初在小吳門內樂道古巷衡清試館，往後遷到城內文星橋。甘家台校舍原來準備籌設工業實驗所，由於沒有經費，始終未開辦，就撥充為甲工校舍。甲工的實習工廠頗具規模。蕭等畢業後，北軍張敬堯禍湘，民國八年，這位張「毒」，竟下令將工場機器併入陸軍工場，用鍋爐煎熬鴉片。^⑤

甲工的前身為湖南省立中等工業學校，創立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初只設機械、染織兩科，學生甚少。宣統三年招考第二期學生，人數較多，但兩科亦各僅十餘人。民國元年招考第三期，再度增多，亦仍各只二十餘人，合起來全校學生不過百人左右。當時學制定為三年畢業，畢業後即可就業。

民國二年，改制為甲種工業學校。修業年限，改為預科一年，本科三年。蕭就是改制後第一年招收的新生，以期別計，稱第四期。是

年暑假，第一期學生已畢業離校，但第二、三兩期學生因受改制影響，修業年限延長一年，畢業亦延後一年，第三期學生遂與第四期學生成為同班。

學校改制，亦擴充學科，除原有機械、染織兩科外，增設化學、窯業兩科。預科四班，每班六十餘人，合共二百五十餘人，連同二、三兩期舊有學生，全校學生發展至三百餘人。校長蔡湘，號劭弢，常德人，清末舉人，為蔡鍾浩的胞弟，鍾浩參加革命，與唐才常同時殉國。蔡湘因其兄殉國，恐受株連，乃逃往日本，在京都高等工藝學校畢業，回國出任甲工校長。蔡校長的國學基礎很好，為人很正直，且頗嚴肅，同學對他都很敬畏，但却都不敢太親近。甲工的校風因此亦頗為嚴肅。教職員多為留日學生，也有少數是留美的，實習工場的領班都是日本人。由於是一所工業學校，教職員大都沒有什麼政治興趣，但也有少數教員原來是民黨，鼓吹倒袁與反對北洋軍閥。

民國三年夏，預科畢業，分別升入本科。蕭異入機械科，與後來改名為黃愛的黃正品、現任國大代表鄧伯粹及前年在美逝世的陳烈等人同班，這幾個人比較接近，很談得來。後來又與三期學生但同期畢業的劉紹泉、王道源過從甚密。畢業後一起幹勞工運動的王光輝（彥夫）也是三期同學，在校時往來並不多。勞工運動領袖、與黃愛一同被趙恒惕砍頭的龐人銓與蕭同期，却不同科，也並不怎樣接近。劉紹泉，長沙人，家住在長沙城裏，有兩個妹妹，大的早已出嫁，幼妹紹賢，亦在唸中學。父親早逝，他們兄妹全賴其母教養成人，家境並不

怎樣寬裕。蕭異與紹泉交厚，家又遠在常寧，就時常在劉家走動。那時紹賢還小，蕭異在常寧的元配吳氏珍芝亦還健在。這位吳氏夫人就是孟能的生母。民國九年，吳氏夫人在原籍病故，蕭異於甲工畢業六年之後就與同班同學劉紹泉的胞妹紹賢結婚，先後生了申健、伊文兩個兒子和女兒宛君。這都是以後的事情，却是因為蕭與劉紹泉在甲工同學同班的關係才締結這段姻緣。王道源身材矮小，而聲音宏亮，甲工畢業後改了行，到日本學藝術。回國後在好幾所藝專當教授，很有些名氣，但放蕩不羈，身體發福，成為一個矮胖子，乍然一看，還真有點像日本人。

蕭在長沙就讀，跟常寧同鄉往來最密切的除在校的蕭同之外，經常來學校找他們的有蕭雲階和湯賢佐。雲階就是給他們取名字的人，賢佐係在衡陽甲種工業學校畢業，這時都在長沙測量局工作。兩人年齡都比蕭異大的多，均以兄長的身份來看顧蕭同和蕭異，這兩蕭非常敬重他們。

蕭異在甲工四年，成績平平，不好也不壞，不顯得怎樣出色。且沉默寡言，不大喜歡交際，更不願在稠人廣眾之中，顯露鋒鋷。鄧伯粹經常勸他隨和一點，不要老是板著一付嚴肅面孔，毫無笑容，使人覺得你總是滿懷心事。蕭知道這是缺點，但並不能很快改正。民國十九年初，蕭由東北回到北平，這時鄧在北平大學當教授，故友重逢，鄧還拿這個跟蕭開玩笑，蕭說他已經改正多了。鄧伯粹與蕭雖是同時考入甲工，同班上課，但在預科第一學期，兩人並未交談過。第二學

期有一天兩人在稻谷倉路上相遇才點頭打招呼。鄧說蕭那天穿的一雙花襪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並且印象很深刻，因為在那個時候穿花襪子的實在少而又少，普通鄉下人還在穿布襪，一般人穿線紗織的素色襪還稱之為「洋襪子」，蕭却穿上花襪自然顯得很突出的了。蕭在學生時代即雅好修潔，服裝總是整齊齊齊清清潔潔。一般學生都穿布鞋，他外出時却穿緞子鞋。穿東西很愛惜，也有偶然的例外。有次他穿雙新緞鞋出街，經過教育會坪大操場，學生們踢足球，一隻球兒直滾到他跟前，忽然興起，飛起一腳將球踢得好高好遠，心裏正在得意，但一看新緞鞋却裂開一條大口，又不免心疼。鄧伯粹說，沉靜的蕭異也有任性的一面。湖南人多半任性，蕭是比較有修養功夫不大顯露而已。

- ①周子方：常寧先後兩人豪 在茲集第八〇面。
- ②治喪委員會：蕭同茲先生生平事略。
- ③鄭鶴聲：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 第七六〇面國立編譯館編訂。
- ④六十三年六月五日訪蕭氏少年時舊友周仲衡律師於其寓所。
- ⑤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 第三集第三一三面。

四、北軍禍湘鍛鍊革命青年

蕭在甲工就學，態度冷寞，成績平平，原來他在校外參加國民黨秘密活動，這種政治活動只能在暗中進行，再要好的同學也不會透露。

據蕭本人於民國四十四年向中央黨部所報的「中央委員會工作人員履歷表」自填，他是民國三年在長沙入黨，黨證字號為「寧字第二二五號」，介紹人為「覃振、袁海鵬」。有了這個證據，對於蕭在學校不起勁及離校後與黃愛、龐人銓等發起勞工運動以及民八至民十三這段期間，他在湖南和無政府主義者共同參與反軍閥、反共的一切活動都可以尋出脈絡，且因此而於十三年赴滬繼續從事勞工運動並與共黨進行尖銳鬭爭，直到十六年清黨由滬至京參加中央黨部工作這一序列的經歷都找出了答案。

他省的人都叫湖南人為「湖南騾子」，有寓褒於貶的意思在內。騾子脾氣具有反抗精神，有奮身投入革命而義無反顧的堅強意志，跟湖南人搞擰了，他罵出的第一句粗話便是：「老子不信邪」，表示他有明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毅力。從曾國藩編組湘軍時起，到 國父領導革命，到 蔣總統領導北伐以及以後的抗戰、戡亂，湖南人都願作急先鋒。 總統誓師北伐時編組的八個軍，有三個軍長是湖南人，「無

湘不成軍」並不虛假，但如單純認定湖南人只能當兵打仗那又錯了，說明湖南人頗多血性男兒比較近情。

民國成立以前，湖南，特別是長沙，就已從外面飄進了足夠的新鮮空氣。光緒二十三年，湖南提學使江標、署理按察使黃遵憲等提倡新學實行新政，梁啟超亦應聘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學報等亦先後創辦，對三湘青年灌注新知識新思想，造就了許多革命黨，也培養了許多新人物。此後長沙創辦了許多新學校，如第一中學、第一師範、甲種工業學校、私立明德學校等都是很有名的學校，如陳果夫先生即遠從浙江湖州到長沙入明德學校。革命的根據地在日本東京，策動國內革命發軔的地區却側重在南方各省，湖南的革命志士自然首先著眼於湖南，如楊篤生即昌言：「吾黨欲新中國必先新湖南。」革命元勳黃興亦聯合北方同志張繼抵達長沙，以在明德學校教書為掩護，暗中策動武備學生聯絡新舊各軍及會黨健兒，各縣亦部屬同時響應，並派人至江西、四川、上海、南京、武昌等地遊說，準備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湖南起義，不幸事洩，致遭破壞。湖南的會黨也蓄志反清，與革命黨人通聲氣，可惜舉義亦未獲成功，但留給湖南青年們的影響是深遠的。黃興又曾糾合同志在東京創立「湖南編譯社」，提倡應用白話寫小說，以喚起國民精神。陳天華撰刊「猛回頭」、「獅子吼」等都是這一時期最能影響人心的作品。鼓吹革命的「遊學譯編」指陳「支那民族經營革命之事業者，必以下等社會為根據地，而以中等社會為運動場。」對於中等社會須

「結集特別團體」、「流通秘密之書報」、「組織公共之機關」與「鼓舞進取之風尚」。對於下等社會須進行教育工作：「一曰：與秘密社會為伍，轉移其舊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轉移其舊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二曰：與勞動社會為伍，改革其舊知識，而注入之以新知識；變易其舊習慣，而注入之以新習慣。三曰：與軍人社會為伍，破壞其舊勢力，而聳動之以新勢力；排斥其舊事功，而歆羨之以新事功。三者之妙用，存於兩方面：一曰：結集通俗講演秘密會場；一曰：流通通俗講演之文字。」這一革命方案在湖南是生了根，長沙在清末民初有不少的書報流通社，也有各種通俗講演場所。

蕭同茲民元以後才到長沙，沒有親自參加上述這些轟轟烈烈的革命活動，然而流通了的書報是有機會閱讀的。民二，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覃振回到湖南倡導革命，蕭直接接受革命的洗禮，覃的影響力最大，其入黨也是由覃作介紹人。他以後與黃、龐等人組織湖南勞工會，創立宗旨就是「改造物質生活，增進勞工知識。」創辦工人學校，出版勞工週刊，豈不就是「與勞動社會為伍，改革其舊知識，而注入之以新知識；變易其舊習慣，而注入之以新習慣」嗎？

直接促使蕭之成為革命黨人的原因還是當時湖南的政治環境與混亂局面。

辛亥革命，湖南響應最早。農曆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湖南於九月初一日就宣布光復，舉焦達峯為軍政府都督，焦不久被害，由譚延

闔繼任都督。民二討袁之役，亦即二次革命，湖南亦宣布獨立，參加討袁，譚延闓並派兵攻鄂。旋以贛省李烈鈞兵敗，廣東與安徽相繼取消獨立，袁世凱乘戰勝之威，遣湯薌銘率北軍入湘，從此時起，湖南人就一直在北洋軍閥鐵蹄蹂躪之下討生活，到民國九年，張敬堯被逐離湘，才結束一幕漫長的悲劇。這一段期間，正好是蕭同茲所親身經歷，一個熱血沸騰的青年參加革命從事反軍閥的鬭爭便成為很自然的事了。

對於湖南人的悲慘境遇有必要敘述一個大體經過。

湯薌銘督湘，濫肆屠殺，湘人稱之為「湯屠戶」，其殘酷可見一斑。民國四年，譚延闓曾挽其兄湯化龍勸說其弟勿濫殺湘人，薌銘那裏肯聽，而部屬驕縱成習，他也無法整飭紀綱。但是湖南人不容他，湖南的軍人仍有一部份勢力，湯為眷戀權位，竟不惜向他的長官袁世凱叛變，民國五年五月亦宣布獨立，參加討袁，並組織湖南第一軍，以陳復初、趙恒惕分任一、二兩師師長，陳、趙都是湖南人，他想這樣可以羈縻。但這時候，覃振奉 國父孫先生命以特派總司令主持湖南黨務軍事，乃率多人至上海，計劃返湘誅鋤湯薌銘。湯聞訊，乃央其兄化龍派人婉商於覃，請勿操之過激，俟有機會當迎湘人反湘主政，但以保證湯安全離湘為條件。覃以湯屠殺人太多，當時仍殺戮如故，因峻拒其條件。而覃所遣同志廖湘芸、楊王鵬在長沙因秘藏炸藥失慎，不得已，先期攻督軍署，不成，二十餘人死難。覃急自滬赴漢口，決心親往長沙指揮。湯薌銘見民氣之不可抗，遂有偽裝宣布獨立

之鬧劇，但覃謀之益急。同時護國軍陸榮廷所部入衡陽，程潛所部已抵達湘潭，湯檄調陳策前往抵抗，中途即被擊潰。七月四日，薊銘聞敗夜遁，湖南首次擺脫北洋軍閥的控制。

湯屠夫被趕走，湘人重挽譚延闓回湘主政，這時的湘軍已編為四個師：第一師陳復初，第二師趙恒惕，第三師陶忠洵，第四師程潛。其中程所率為滇軍，編入了湘軍行列。這年，湖南喪失了兩大人豪，黃興與蔡鍔於十月及十一月相繼逝世，「這不僅關係湖南的盛衰，亦深繫國家的治亂。」

湘人治湘還不到一年，北軍又長驅而入。這時，北方的軍政大權掌握在段祺瑞手裏，他企圖以武力鎮壓西南的護法勢力。民國六年，發表傅良佐督湘，（傅為湖南乾縣人，但為段祺瑞親信，原任陸軍部次長，改任湘督）任延闓為省長，譚自知不敵，即飄然離湘赴滬。傅良佐率北軍第八師王汝賢，二十師范國璋等部進駐長沙，湘軍將領以護法為號召，宣布獨立，以與傅部對抗，隔湘水相持月餘，嚴冬將至，彈藥已盡，幸劉建藩部有猛將黃岱，冒死率敢死隊百餘人迂迴至敵後擾亂，前鋒乘勝反攻，直抵長沙，傅良佐已先遁，做了最短命的北軍湖南督軍。北軍除了會欺侮老百姓之外，作戰是亂糟糟的。傅良佐逃遁，對部將知都知會一聲，可憐商震所率的一旅晉軍在不明情況之下混戰，在湘潭、寶慶間不及撤退，全部被俘，商震僅以身免。

關於傅良佐還有個插曲，很有趣。傅是湘西人，抵湘後曾擬委湘

西將領林修梅為師長。時林為陳復初部旅長，覆傅一電，只用十六個字加以婉拒，電云：「清潔清潔，渾渾自得。何時滾蛋？最遲兩月。」傅果然只做了短命督軍。

趕走傅良佐，剛剛過了年，北軍又來了。

民國七年春，北洋政府代總統馮國璋復委曹錕為兩湖宣撫使，遣吳佩孚、張懷芝、張敬堯分三路犯湘。吳率五個旅正面攻岳州，張敬堯走平江，張懷芝自江西側擊醴陵。時譚浩明率桂軍來援，湘軍分在羊樓司、平江之線禦敵，以勢分力薄，苦戰經月，終以眾寡懸殊，自岳州南撤。譚浩明坐鎮長沙，部署失宜，至張敬堯抄平江、金井捷徑，襲陷省城，城中被擄掠一空。

同年三月十七日至十八兩日，吳佩孚率五旅之眾猛攻岳州，旋即陷落。越過洞庭湖下長沙，抄湘鄉，吳親率先頭騎兵五百人，間關進佔衡陽，意在窺伺兩廣。湘軍殘部退保耒陽、永興之線，自此侷處湘南一隅，餘均在北軍掌握之中。

北軍入湘後，內部發生歧見。張敬堯是安徽人，馮國璋是循皖系之請，以張督湘。吳佩孚從任何一方面說，都自認比張強，他是直系將領，豈甘屈居張下。而張在督湘期間，倒行逆施，使胸懷大志以秀才出身的吳佩孚深感不滿。雖同隸北軍，張據長沙，吳據衡陽，兩軍相拒者竟達二年之久。後來直、皖衝突益烈，兩人的關係更成冰炭。幸好這樣，吳佩孚在衡就比較愛惜羽毛，沒有像張敬堯那樣亂來。吳

佩孚果然志氣不小，地位不過是個師長，竟然於七年八月由衡陽發出通電，堅決表示北方軍人反對進行以外力為背景的內戰，這通電發表於報章，內有警句：「國亡於外敵，固軍人之罪；國亡於內亂，亦軍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粵，實亡國之政策也。」吳佩孚從此聲名大噪，就是在衡陽發跡的。吳部在衡陽屯兵三年，至民國九年春，向廣東省政府要了六十萬元開拔費自動撤離湘境，臨走仍然舞文弄墨發出了通電，也有警句：「遠戍湘防，瓜期兩屆，三載換防，不可謂速，鬪牆煮豆，何敢言功！既經罷戰言和，南北即屬一家，並非寇仇外患，何須重兵設防？」這時的吳佩孚不以侷處湘南一隅為滿足，樂得說大話，而這個通電看在張敬堯眼裏就越發不是滋味了。

吳軍撤走，湘軍接防，馬上就跟張敬堯的腐敗部隊開火，在湘潭相遇，予以痛擊，湘潭距長沙九十華里，不旋踵又克復了長沙，其後又破之於岳州。「至此北軍留湘者盡燬，湘省護法之役乃告終結。」從民國二年到九年這一段北軍禍湘的苦痛歷史才落幕。

湯薌銘與張敬堯在湖南各別都有三年歷史，對於湖南人的兇殘迫害，有如暴君之於奴隸，這一點完全相同。湯薌銘，湖北人，海軍出身，與黎元洪交誼至厚，尤為袁世凱之死黨。民二南京黃興、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廣東胡漢民發動討袁之役，湖南是參加了的，但由於贛、寧相繼挫敗，湖南也成為袁氏必欲得之而甘心，所以才令湯於二年八月督湘。這個湯屠夫到任以後，「大興黨獄，殺人如麻」，北洋軍這時已把湖南當作他們的征服地，燒殺淫擄，無所不為，陷湖

南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旅京的湖南同鄉，經常向湖南籍的內閣總理熊希齡控訴北洋軍無法無天的暴行，要求熊以國務總理的地位，替三千萬湖南人請命，可是熊無能為力。湯在湖南殺人，係「承袁世凱之意旨，設『調查』之名，集叅市井無賴，使為線索。若輩乃假以報私仇，瀏陽門外識字嶺之刑場，伏屍枕籍，無日無之。黨人之被殺者如焦光亞等固以千百計；而無辜之民，被挾嫌拖累，經軍法處慘刑迫供屈服者不知凡幾。軍法處所用之刑，有為自古酷刑所未有者，其野蠻殘酷較俗傳『九幽十八獄』尤甚百十倍。據民國五年湘省撫卹機關之報告，湯薌銘在湘三年，實因黨案槍斃有卷可查者達五千餘人。」

「湯屠夫」如此，「張毒」又如何？

張是安徽霍邱縣人，兄弟四人，敬堯居長，依次為舜、禹、湯。張敬堯民七入湘，所率的第七師，是北軍中紀律最壞的一師，到湖南後，擴充一個旅，即派他的四弟敬湯為旅長，號稱「四帥」，駐紮在長沙。張的部下還有一個團長，原名是毛思忠，本為積匪，被張收為義子，改名張繼忠，號稱「少帥」。這兩個壞蛋在敬堯身邊，無惡不作。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敬堯四十歲生日，他們逼迫全省紳商送禮，分為福、祿、壽、喜四等級，即一千元、五百元、三百元、二百元四種。他在湖南在財稅上搜刮，計扣留鹽稅二百數十萬，附加鹽稅二十餘萬，鹽稅私加保護照費一百五十餘萬，錢糧一百餘萬，銅元餘利一百二十餘萬，釐金數十萬，拍賣公產百餘萬，合計八百餘萬；加以中央軍餉將及千萬。其以勒價收入定為每元四十餘串之錢票，而發

出定為每元十五串之錢票，利尤倍屨。

張敬堯南北之見極深，他的軍隊在湖南殺人放火，無所不為。而他認為鎮壓亂黨，理所當然。自他督湘後，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殺已成司空見慣，長沙年輕的婦女都不敢外出，或者逃到外縣躲避。他痛恨教育界，起初是削減教育經費，後來將教育經費提充軍餉。八年四月間上海和會討論撤換督軍時，張邀各校校長通電挽留他，並以發放教育經費為條件。各校校長都不願出賣人格，拒絕簽名。八年十一月十日長沙全城的教職員因無法維持生活，提出總辭職，實行罷課。湖南學生聯合會兩度被解散，可是暗中仍有活動。八年十月廿二日為湖南光復紀念，湘人抱亡省之痛，學生舉行罷課及遊行大會。各界在烈士祠舉行默哀，與會人士無不潸然淚下。譚延闓這個菩薩心腸的人，曾於九年一月廿四日發出敬電，喻湘人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還不如。

湖南人恨張「毒菌」真是恨之刺骨，所以直系的吳佩孚軍撤走之後，湘軍立即發動攻勢，不到半個月，便把他趕跑了。他的那位「四帥」逃到漢口被王占元捉住給槍斃了。^①

蕭同茲於民二至民九這段時期正在長沙。「湯屠」也罷，「張毒」也罷，諸般惡行，他是見證者。民二至民六，他在甲工當學生，畢業後第二年曾經離開湖南一年，去天津做事。民八秋冬之間可能回過故鄉常寧一次，以後在湖南兵工廠當考工員，職務是考查產品合格

標準；又當過湖南第一紗廠技士，管理電機。從這些經歷大致可以推算，湯薌銘禍湘時，他當學生，覃振領導湖南革命活動，他加入了革命黨，在校內與校外都曾參與秘密工作。也在這個時候和校外的一些青年有接觸。畢業之後，張敬堯禍湘，蕭在職業崗位上，每項工作做的時間都不長，大概是專心從事革命活動，而以職業為掩護，並靠職業維持生活。

有一問題不容易在時間上弄得十分清楚。蕭在天津法國永和機械廠當繪圖員究竟是在什麼時候？蕭在天津永和當過繪圖員不會錯，中央委員會調查表蕭自填為民六、八月至民七、八月，（剛從甲工畢業）可能記憶有誤。據鄧伯粹口述，他和蕭異民六從甲工畢業後，蕭異在長沙湖南電燈公司工作，鄧去桂陽縣從軍，兩人在長沙分手。蕭在電燈公司是做查勘電燈線路的工作。鄧離長沙的某一天去一家報社拜訪同鄉印佛痴，印在那家報社當記者，恰與蕭相遇，蕭掛著一個口袋，裏面裝的測驗電錶的工具，因為這家報社正在裝電錶。鄧在桂陽軍中做了一陣子短期的「軍文」工作，決心到日本去留學，他於民國七年三月廿五日離長沙前，曾攜同三胞弟鄧孝勤（叔耘）去找蕭異，將三弟交給他請他照拂，地點即在電燈公司宿舍。由鄧這番追憶，證明蕭於赴天津前，曾在湖南電燈公司工作過，在中央委員會調查表中漏填。赴津時間必在民七、三月以後，而非民六、八月。

蕭異赴天津的動機可能與蕭同有關，亦可能與黃愛有關。蕭同赴法留學，大概是參加勤工儉學會，由天津上船，時間在民國七年，蕭

同邀蕭異一同赴津大有可能。蕭異參加了革命活動，或不願出國而留在天津。再根據黃愛事略^②：「黃愛，原名正品，生於一八九七年，（小於同茲兩歲）湖南常德人。一九一七年，畢業於湖南第一甲種工業機械科，隨入湖南電燈公司作工，後又轉入天津直隸專門工業學校肄業。一九一九年，學潮發生（按即五四運動），即努力學生運動，曾因山東、福建問題，被舉為天津各界代表赴北京向政府請願，拘留於北京警察廳三十八天，一九二〇年轉由上海回湖南，組織湖南勞工會。」黃愛離開甲工後，其出處，其行程，與蕭異大致相同，都曾在湖南電燈公司工作，然後赴天津，所不同者是一個在天津繼續上學，一個在永和機械廠做事。依據中央委員會調查表，民九（一九二〇年）、三月至民十、六月蕭在湖南兵工廠任考工員，當是從天津回來以後就此職務，照這樣，其經歷就啣接上來了。應該是：蕭畢業後分發到湖南電燈公司，和黃愛一起，民七到天津也是一起，可是回湖南比黃愛為早，因為他在「民八秋冬之間返湘，可能又回鄉一次。」民九蕭在湖南兵工廠工作時期，與黃愛、龐人銓等組織湖南勞工會，於是又在一起。

五四運動，黃愛在天津參加，蕭這時即使仍在天津，不會參加學生運動，如果已回湖南，也只是暗中鼓動，不能直接參加學生運動。五四運動發生，湖南學生的憤怒情緒是雙重的，一方面痛恨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賣國勾當，另一方面更痛恨張敬堯的為害三湘，可是在張毒淫威之下，決不能如上海等地學生之可以自由表示反抗意

志。鄭學稼著中共興亡史敘述「五四愛國運動」經過，就指出「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的不只北京一地」，如奉天的張作霖、安徽督軍倪嗣冲、湖北督軍王占元、閩督李厚基、豫督趙倜、陝督陳樹藩、湘督張敬堯等，「都視愛國的學生運動如蛇蝎。無需說，他們的動作是奉北洋政府的密令。」^③ 可是，長沙學生還是在五月七日遊行^④，六月三日罷課。^⑤ 湘南零陵、衡陽、郴縣、桂陽各界於五月十五日通電反日。^⑥ 長沙學生於同年十月二十二日罷課遊行，係藉湖南光復八週年為名，反對的箭頭毫無疑問的是指著張敬堯，張幸而沒有把這些學生都捉住將他們殺掉。

北軍禍湘，湖南青年的反抗行動是在暗中激烈進行的，湯薌銘那樣使用屠殺手段，並不曾將湖南青年嚇住。湖南的民性倔強，不為威武所屈，青年們「不信邪」，明鬪暗鬪總要跟惡勢力鬪過明白，這是原因之一。湖南的教育相當發達，培育了很多有理想有抱負，肯用頭腦去思想問題的知識青年。長沙一地的報紙相當多，副刊的投稿人多半是這些青年，這是原因之二。如前文所述，湖南在清末民初人才輩出，黃興、蔡鍔、宋教仁、唐才常、覃振、胡元倓、龍漳等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有功於革命，為全國所景仰，湖南青年尤奉為偶像，這些老一輩的人撒下的革命種子，影響到後一輩的青年發生深鉅的影響，應為原因之三。民黨在上海所辦的報刊以及梁啟超的新民叢報等一類書刊在湖南青年中有廣大的讀者，五四前後所出的書刊所引起的論戰也在湖南青年羣中激起強烈的反應，新思潮，新文藝，同時在湖

南百花怒放。他們開書店，辦刊物，義不後人，應為原因之四。北方政局俶擾，袁世凱改制稱帝，張勳復辟，加以羣雄割據，軍閥混戰，使歷史倒退，大好河山，有被帝國主義瓜分之虞，湖南人尤親受軍閥蹂躪，民不聊生，目擊時艱，愛國青年，未有不投袂而起，為國家找出路，為思想找出路，當為原因之五，更當確定為最重要原因。

當時湖南青年由於接受四面八方而來的新潮流的激盪，思想頗為龐雜，服膺中山先生的主義者是一羣，醉心於無政府主義的是一羣，搞馬克斯主義的又是一羣，其發展次序，大概也是按照這個排列：孫中山思想排在最先，無政府主義的發軔又先於馬克斯主義。

「因無政府主義者，其主要即喚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於個人社會之相互，而以捨棄一切權利，謀共同之幸福。此實講教育也，而非談革命也。……所以無政府主義之革命，無所謂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更無所謂革命之預備，即以教育為革命而已。……真理公道，日日傾向於進步，即教育須與不可息，亦即革命無時或可止。惟教育必有效果，效果即革命。經一革命，即人類之公德心加擴。故除以真理公道所包之道德，即如共同博愛平等自由等等，以真理公道所包之知識，即如實驗科學等等，實行無政府主義之教育，此外即無教育。嗚呼，言有似道而實偽者，最足以禍世而害人，此即離教育與革命為二，而且正當革命之空言，誣之為非教育也。」上面這段話是吳稚暉先生說的。^⑦ 以當時湖南的環境，很能配合青年們的胃口，比起馬克斯那套階級鬭爭的理論自較易接受。不過，孫中山主義的信徒也罷，無政

府主義的信徒也罷，馬克斯的信徒也罷，當時都是新青年，於要求改變環境，反對軍閥這一點是一致的。這班新青年彼此有相互見面的機會，寫起文章又互相罵陣，這是很有趣的。

蕭同茲是國民黨員，但與無政府主義青年相當接近。無政府主義青年袁紹先就和蕭是好朋友。據紹先的胞弟振宇^⑧ 口述：紹先跟同茲、黃愛、龐人銓等人都常有往來。還有省立圖書館館長吳某（忘其名），四川人謝嘉陵、楊揚溢，湘潭人易子奇，湘潭人徐樹人，還有周野蓀，長沙青年會食堂老板李鳴盛，新詩人劉孟華等都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紹先那時是華洋籌賑會的會計主任，收入頗豐。這班人馬都熱中於學「世界語」，曾開設一所湖南印書館，印行無政府主義的書籍，有「互助論」、「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等等，聘陳菱曾為經理。地點在長沙府正街。那時馬克斯派也開設一家「文化書店」，地點也在府正街，主持者為李立三、徐特立、易禮容一班人，毛澤東是第一師範的主事，與郭亮、夏曦經常在一起。無政府主義者跟馬克斯派份子大致都相識，也到「文化書店」去買書看，但紹先、同茲這一羣人都反對馬克斯主義，時常罵陣。他們指責郭亮開口閉口自稱無產階級却有一根金褲帶。毛澤東愛出風頭，遭當局之忌，趙恒惕要捉拿他，逃往漢口，沒有路費，向同茲借錢，同茲把一件皮袍當了三十元給他做盤纏，才星夜出走。那知逃到漢口，即為湖北省長蕭耀南捉住。一師校長易培基曾去電保釋，蕭耀南不理，後來再挽司法總長湘人章士釗電保，才將毛開釋。大陸陷匪以後，毛澤東始終

對章士釗奉若上賓，就因為這段救命之恩。同茲對毛亦有恩，但同茲政治立場堅定，始終反共，毛想對他做統戰總做不進去。據說毛於三十四年至重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在酒會上與蕭相值，向蕭舉杯敬酒，要乾一杯，周恩來跑過來說毛先生不能喝酒，我代他乾這一杯，毛拒絕了，竟一飲而盡。毛在重慶，曾赴覃振之宴，蕭又是陪客，毛對蕭說，我們兄弟是「古城相會」，又說我還借你的錢沒還，蕭只唯唯。這是以後的事情。袁振宇說的這件故事在「在茲集」獲得證實。王繼樸引述蕭同茲的話：「我和毛澤東在長沙分手後，抗戰期間一度在重慶見面，毛澤東稱當時的重逢是『古城會』。那段舊事說明我和毛澤東的關係。但我現在許身黨國，義無反顧，即使將來被共匪抓住，上刀山，下油鍋，我也心甘情願，決不後悔。」^⑨

袁振宇說：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不飲酒、不吸煙、不結婚、不作宮吏、不入政黨、不做軍人、不信宗教，要過完全苦行僧的生活。袁紹先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南京，住在明孝陵附近幾間茅屋，與翁旭初同住，自炊自食。除讀書外，無所事事。在茅屋左近經營農場以維生活。

毛澤東他們在長沙也辦刊物。鄭學稼說：「在湖南，有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週刊。它創刊於一九一九年（民八）七月十四日，第五期還沒有發行，即被張敬堯沒收。」^⑩ 鄭又說：毛澤東在長沙出版的「湘江評論」是抄襲陳獨秀的「每周評論」。^⑪

湖南那時的青年都熱中於辦刊物。雷嘯岑說：「時筆者亦肄業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曾與龐人銓創刊『九十天雜誌』，締文字交，因龐之關係得識蕭於偶然場合中，以其沉默寡言，而所學又殊途，較少往來。黃、龐二人年序較次於蕭，然賦性狷激衝動，思想激進，蕭淵穆不露棱角，對人言談，訥訥如不能出口，唯心思縝密有策略，黃、龐遇事皆以蕭為謀主。」^⑫

北軍禍湘，為湖南人之大不幸，但也激起了湖南青年的迎接新潮流，投身於這洪流之中，亟思所以救湘，亦所以救國。蕭同茲的思想與抱負就是經過這種鍛練才成熟的。

①以上所述，係根據：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略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文直公：最近卅年中國軍事史

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

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趙恒惕九十自述

湖南文獻

香港大成雜誌等資料綜合撰述

②黃龐事略：黃龐三週年紀念刊第三面

③鄭學稼：中共興亡史 上冊第三八九面

④全上第三八一面

⑤全上第三九七面

⑥全上第三八三面

⑦張文伯：吳稚暉先生傳記 第三三面

⑧六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訪袁振宇於其寓所。他說：「家兄紹先與同茲先生都長於我十來歲，他們從事秘密活動時，因為我是讀中學一年級的小孩子，從來不避諱我，有時還叫我跑跑腿，我也很感興趣。」振宇為紹先的四弟，後來曾任中央社總社記者，福州分社主任。

⑨王繼樸：穩定軍心一番話 在茲集第二六面

⑩鄭學稼：中共興亡史（上）第四八九面

⑪全上第三七〇面

⑫雷嘯岑：卅年交遊記憶 刊載香港大成雜誌第一期，收入在茲集第二〇五面

五、蕭同茲與湖南勞工會

當北軍禍湘時期，湖南人民固然民不聊生，痛苦萬狀，但非關湖南一省的局部問題，而是整個中國大局都在俶擾之中，湖南只不過夾在南北兩大勢力之中，反映當時的一幅動亂畫面而已。

國父於民國十二年所著的「中國革命史」一文中說得非常清楚。他說：「自民國二年至於五年，國內之革命戰爭，可統名之曰討袁之役。自五年至於今，袁世凱雖死，而袁世凱所遺留之制度不隨以俱死，則民國之變亂正無已時，已為常人意料所及。果也，曾不期年，而毀棄約法、解散國會之禍再發，馴至廢帝復辟，民國不絕如縷。復辟之變，雖旬餘而定，而毀法之變，則愈演愈烈，余乃不得不以護法號召天下。」^①

護法就是維護民初的約法，在憲法未頒行以前，約法替代憲法的效力，為組織政府、推行政令的大經大法，遵守法約，才能確立制度，漸次進入民主之治。然而在軍閥眼中，約法不過是一堆印上字跡的紙張，而槍桿才是實力，掌握實力，統一天下，唯吾獨尊，我即法律。抱著一部約法去講道理，不但是迂腐之見，尤其碍手碍腳。毀法與護法就成為政爭乃至武力鬭爭的焦點。

為明瞭此中情況，大致說明經過如左：

民國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在全國聲討之下，下令自行取消「洪憲帝制」，六月六日自斃於北京，是第一個毀法軍閥悲慘的下場。

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以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段因與黎不和，引起「府院之爭」，雙方積不相能。

張勳於六年六月十四日率領所部辮子軍到了北京，上演一幕「宣統復辟」的醜劇。溥儀「登基」，黎元洪逃匿東交民巷日使館。遺老們袍笏登場，不過兩星期又給段祺瑞轟下了臺。

段入京後，不得黎元洪同意。遽自稱內閣總理。國父以段毀法，去電開導，段竟置之不理。國父知道已非唇舌之爭所能奏效，便與海軍總長程璧光、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海軍南下，作護法的倡導。

國父於六年七月中旬抵廣州。八月二十五日，國會非常會議於廣州集會，決議組織軍政府，勘平叛亂，恢復臨時約法。九月一日，依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國父為海陸軍大元帥，組織軍政府，仍虛總統之位以待黎元洪。七年五月四日，陸榮廷勾結一部份政客又舉行國會非常會議，決議改組軍政府，易元帥制為總裁制。五月二十日選舉國父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為軍政府總裁，嗣又推舉岑為主席。護法運動經此挫折，國父被迫離粵赴滬。民九粵軍回粵，十月廿九日克復廣州，才將陸系軍閥肅

清。 國父嗣即由滬回粵，發表宣言，恢復軍政府，繼續護法。

十年四月，非常國會開會，議決將軍政府廢除，正式組成中華民國政府，並選舉 國父為大總統，於五月五日就職。

國父於十年十一月中旬抵桂林，組織大本營，積極籌備北伐。

可是擊敗了一個野心份子陸榮廷，又產生了另一個野心份子陳炯明，他是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國父回粵組織正式政府的時候，陳炯明就獨特異議，說甚麼「今之所務，惟在保境息民，並窺測四鄰軍閥意旨，聯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據粵，進可合諸利害相同之軍閥，把持國事，可不須用兵而國內自定。」他的這種思想是甚麼思想！他反對成立政府，反對北伐，主張與軍閥勾結。

十一年春間，北伐軍由桂入湘，「陳炯明却暗中與湖南當局相勾結，多方阻遏，使不得前。同時對於北伐軍餉械完全停止接濟。」

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發動軍事叛變，背叛 國父。 國父遂於十一年八月九日離粵赴滬。惟各路大軍仍繼續討逆，至十二年一月十九日克復廣東省城，陳逆敗走惠州。 國父於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由滬返粵，組織大本營，續行大元帥職權，並命 蔣中正為大本營參謀長，才又建立了革命的領導中心。^③

自從張勳復辟醜劇曇花一現而後，北方的政局擾攘不堪，軍閥間爭權奪利，內政外交盡行廢弛。

黎元洪被迫下臺後，馮國璋繼黎元洪為總統。七年十月，徐世昌繼馮國璋為總統。八年春，南北代表議和於上海，復告破裂，而南征之議遂罷。^④

九年六月，曹錕、吳佩孚進兵北京近郊，七月九日，爆發直皖之戰，皖系敗北。「計自民國五年至十年，六年之間，曹錕以師長崛起中原，戰勝功取，擁眾十萬，吳佩孚之力為多。」^⑤

到了十一年，北洋軍閥內部又起了新的變化。由曹錕、吳佩孚、孫傳芳等發出一個恢復舊法統的通電，徐世昌便被迫下野，黎元洪又重登總統的寶座。十二年六月，曹錕自己想做總統，又迫走了黎元洪，而以每票五千元的代價，購買一部份寡廉鮮恥的議員於十月五日選舉曹錕為總統，寫下了民國史上最污穢的一頁。^⑥

孫大元帥於十月九日下令討伐曹錕，通緝賄選議員。^⑦

這是當時大勢；回頭看看湖南的情形，由湖南情形再看看蕭同茲在當時的處境中他做了些甚麼。

民國九年，湘人驅張敬堯成功，六月十二日，收復長沙，湘軍總指揮趙恆惕於十四日到省，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督軍譚延闓於十七日到省。這時的長沙還是一片烽火，長沙街道本來很窄，破衣爛衫的湘軍開進來後，無一家不放爆竹歡迎，市民摩肩接踵歡迎拯救自己的軍隊：「老總啊，辛苦你們了，辛苦你們了，謝謝你們。」^⑧

譚延闓出長劫後的湖南軍政，他能把握的政治原則是不再以兵事困擾湘人，因此於九年九月，湘軍一度整編，除正規軍第一師外，共成立了十二個防區司令。這種改制並不理想，軍區制使湖南變成一個小國家，各縣用人行政均操在各軍區武人之手，武人認為驅張一役是他們打出來的天下，他們當然不肯把省政府放在眼中。因此譚所想的整軍和裁兵都落了空，並且引起了地方軍人的不滿。而況譚是文人出身，雖然這時的湘軍有他的一部份勢力，與程潛、趙恒惕鼎足而三，然如非譚嫡系，對他多表不敬。^⑨ 趙恒惕在其自述中對譚恭維備至，然亦諷示譚不諳軍事，趙的話說得很婉轉：「惟於政治極感興趣。余每謂譚公為極適合之行政長官人才，蓋別無旁鶩，專心一志於政治事業也。」^⑩

譚面對驕兵悍將、財政困難、軍餉無着的局面，號令不出省門，所用的民、財各長，也受武人的干涉，他縱有安湘之志，也絲毫無所展佈。這樣局面維持不滿一個月，十月間，湘西就出了問題，十一月，平江又發生兵變，十二軍區司令蕭熾被殺，調第六軍區司令李仲麟往勦，李為程潛嫡系，趁機與變兵合流，李部團長張振武於十一月廿一日發表馬電促譚下野。廿二日就開到長沙近郊，廿三日譚召開軍政各界聯席會議，發表漾電宣布廢督，推趙恒惕為湘軍總司令，譚暫任省長。廿四日再開聯席會議，有一位將領站出來說話了：「這次的會，我們一方面歡送舊總司令離湘，一方面歡迎新總司令就職。」趙總司令即於廿五日就職，譚亦於廿七日悄然離湘。^⑪

另一種說法是：「程派軍人李仲麟、廖家棟、瞿維臧排譚迎程，趙恒惕利之，陽示不為左右袒，譚乃被排去職。」^⑫ 李仲麟、瞿維臧沒有得到好下場，在長沙被人殺了，有人說是譚之舊部殺的。又有一說，直指：「趙恒惕既殺李、瞿，復擒殺李部補支隊長熊應侯，並盡去反對各部，如江道區守備隊等，客軍之滇贛軍則調之赴湘西。惟鄂軍因與葉開鑫同謀，得仍駐省。」^⑬ 關於李仲麟、瞿維臧之被殺，趙恒惕亦有辯。他說：「余所轄第二旅廖家棟則為程潛舊部，參與擁程密謀。李、廖等既知省城空虛，又得湘西滇軍之外援，乃圖裏應外合，攻取省城。駐防湘潭之第四區守備司令張輝瓚（石侯）軍紀不嚴而聲譽甚劣，李仲麟部較精悍，遂假循地方之請，前往解決張部為藉口而圖進兵長沙。譚公之親信部屬因此嫉李益深，乃趁李入省城之際，矯余之命，遽予正法，而李之被殺，亦有其自取之道也。」^⑭ 「余並未主動下令殺李，以其為郴州患難相共之袍澤，實不忍殺之。」^⑮

譚延闓這次離開湖南還遭遇一件人間悲慘事。譚夫人原住上海，以難產致死，譚曾派人迎柩回湘，迎柩輪和送譚輪相遇於城陵磯（在岳陽附近），不許譚回湘治喪營葬，亦不許譚登輪致祭，只能抬手示意。其後譚寫信給朋友說：「存者歿者背道而馳，世界傷心事無逾於此者。」^⑮

譚走了，李仲麟死了，結束了湖南省內譚、程兩派的明爭暗鬥，湖南局勢從此就由趙恒惕控制。

趙主政以後，做了幾件事：一是倡導聯省自治；一是援鄂；再就是施行省憲。

關於這幾件事，據趙之自述，第一件：「聯省自治之初步展開，則在是年（九年）冬季翦除反側，安定全省之後。首先成立湖南省憲籌備會，分湘中、湘西、及湘南三路，挽彭兆璜、吳景鴻、鍾才宏分任籌備委員。復敦聘名流王政廷、蔣方震、彭允彝、李劍農、湯漪等十一人為省憲起草委員。以後復召集審查委員會，詳細審查修正，審查委員由各縣推舉，人數逾百。惜因種種關係，憲草之審查遲遲不能完成，而援鄂戰事又告發生。」第二件：「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斂，所部軍隊復兵變迭起，當聯省自治運動盛行之際，鄂人乃推李書城、蔣作賓、何成濬、孔庚乞援於湘。……援鄂之役開始於十年七月下旬，湘軍士氣猛銳，連克要隘，羊樓司一役尤激烈，敵軍連敗；王占元終遭免職，北方改派吳佩孚統大軍來援，於是情勢改變。……湘軍潰敗之餘，兵心渙散，軍紀已無法維持。如吳軍追擊，則長沙亦難固守。……余乃決計冒險親訪吳佩孚於其停泊之軍艦上……和議得以達成。正式停戰，為九月一日，余與吳佩孚直接談判之條件，則為北軍暫駐岳州而已。」第三件：「湖南省憲（於十一年一月一日公佈施行）之實施分三步驟：一曰成立省議會……全省共計一百零八人。二曰選舉省長，由省議會選出四人，交全省公民投票決選，以最多票當選。公民投票結果，譚公組庵（延闓）與余兩人得票最多，而余又較譚公多獲數百萬票，因此當選湖南省長。種下余政治失敗之大

原因。假使當時余能堅決辭謝，力挽譚公還省主持，湖南或可免除以後之許多動亂，省治可益臻固。三日改組省長公署，依省憲規定成立省務院，下轄：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司法、外交、軍務七司，以教育司長李劍農兼任省務院長。修憲以後，改為五司，改由省長兼任省務院長。」^{①6}

趙恒惕頒行之省憲，其中第二章規定：「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人民有保護其身體生命之權，有保護其私有財產之權，有保護其居宅之權，有營業自由之權，有受教育之義務……等。」^{①7} 這項省憲甫於十一年元旦公布後的十七天，一項違反省憲，不經法庭審訊，將兩名屬於工人階級的人民砍頭的血案發生了。那就是歷史性的「黃龐事件」。

趙恒惕主政六年，殺的人決不止兩個，而在他的「九十自述」中却只提到殺黃、龐這件事，可見這件血案關係之重大，在趙的印象中亦至為深刻。他用一段文章來敘述經過：

「援鄂戰爭結束後，余即全力撫輯傷亡，整頓軍隊。是年冬，軍心粗定，唯苦於餉源短缺。欠餉原已不少，而年節將屆，如再不發餉，則前線防軍，即難維持。此時主要財源，為銅圓鑄造局。忽有中學生黃愛、龐人銓二人，竟於此時希圖煽動銅圓局工人罷工。銅圓局長屢向余報告，如政府不予處置，則彼等無法維持。於是，不得不下令逮捕黃、龐二人。逮捕以後，工人咸懼兩人之招供工人名單，謠誣

紛起。為安定人心計，乃不得不即予黃、龐兩人就地正法之。當時搜獲其住宅，獲得共黨宣傳品甚多。而時人不明真象，謂余槍殺工人領袖，頗不諒解。其實，任何人處余當日之地位，亦必採取此種斷然之處置，以除此害羣之馬，而安定社會也。」

趙的「九十自述」，「全文近兩萬言」，而「宦海浮沉七十年」^⑱方述「豐功偉績」之不暇，何以要浪費唇舌追述殺了兩個人的區區小事？原來是：「時人不明真相」，「頗不諒解」，趙的解釋是因為黃、龐煽動銅圓局工人罷工，使軍隊無從發餉，這罪名可不輕，於是用兩個「不得不」的理由將他們殺了，第一個是「不得不下令逮捕」，第二個是「不得不……就地正法之」。而況「搜捕其住宅獲得共黨宣傳品甚多」！

趙必須加以解釋是有其「不得已」的理由。

據馬超俊等的「中國勞工運動史」所述民國十一年勞工大事，第一件就是「湖南勞工『一七』慘案」，這段文字相當長，可與趙文相對照。

「本年一月十七日，發生了湖南勞工會的『一七』慘案，舉國為之震悼，茲述其起原與經過如次：

「民國十年，有一羣政客集於長沙，制了一部『省憲』；高唱『聯省自治』，實行民選『省長』。此乃軍閥企圖在『省憲』的幌子

下，造成一個長期割據局面。職是之故，黃愛、龐人銓兩氏在勞工週刊上加以痛詆，致加深當時湘省軍閥對湖南勞工會的憎惡」

「不久，湖南華實紗廠發生了罷工風潮。罷工的原因是華實紗廠，原來為湖南第一紗廠，係湖南的公產，為湖南三千萬人所共有，廠房的設備和機器的裝配，堪稱為內地最合乎新型的一個大規模工廠。可是湘省貪官污吏，利用職權，和一批商人勾結，改為商辦的華實公司。這等於犧牲了全省人的利益，由最少數人來霸佔，分贓自肥。湖南勞工會堅決地反對這種措施，極力主張取消商辦收回公有；而極力支持這主張並願以行動來貫徹這主張的是廠內三、四千工人。近因則是由於華實公司削減工人的工資，並藉以營利關係扣發舊曆年關工人應得的獎金，工人推出代表，提出合理要求，公司方面竟置之不理，於是工人迫不得已，只有採取罷工的行動表示對抗。」

「罷工於十一年一月十四日開始，三、四千男女工人的步調完全一致，顯得是很有組織訓練的一個羣眾力量。湖南勞工會——無形中是工人最有力的後援，華實公司却恃著軍閥為其後盾，不怕工人不就範。在這旗鼓相當情形之下，罷工延長了兩日，形勢顯得非常險惡。到了十六日的夜晚，長沙頒布了緊急戒嚴令，一切交通，全部斷絕。華實紗廠所在地銀盃嶺，成了武裝部隊的佔領區，機關槍對準了工人的宿舍。」

「那晚，黃愛、龐人銓在湖南勞工會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商討

如何援救華實紗廠工人的有效辦法，會議至深夜始散。他們的同伴走後，接踵而來的却是兇惡的死神；黃、龐兩氏突被官兵腳鐐手銬的綁到趙恒惕總部。在那裏僅依照早已安排好了的罪名，經過幾句最簡單的問話，立即就押赴長沙瀏陽門外，處以斷頭死刑。那正是一月十七日清晨四時，由被捕到就義不過兩小時的光景。省方發表的罪狀是：『宣傳無政府主義，勾結土匪。』這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這一事件，立刻震動了全國，輿論為之譁然。在北京的蔡元培，曾有電報至長沙，向趙恒惕提出嚴重抗議，湖南各界對趙恒惕的割據野心和種種倒行逆施非常憤怒。『一七』事件發生後，已忍無可忍，所以組織代表團（黃愛的父親也是團員之一）到廣州去向 國父請願， 國父終於下令討伐，這就是『一七』事件的效果。

「黃愛、龐人銓壯烈犧牲以後，湖南勞工會即被武力解散，勞工週刊亦被封閉。和黃、龐兩氏共同奮鬥的勞工們，有數人逃出長沙，轉到漢口、上海，展開了範圍更大的活動，並由平漢、津浦兩線伸展到了北方。後來的平漢鐵路的『二七』大罷工和全國的『五卅』運動莫不有湖南勞工會的份子參加，可說莫不與『一七』流血事件有直接關係。黃、龐兩氏的血在中國勞工運動史上成了灌溉的泉源。黃、龐兩烈士事略曾於民國十九年由國民黨從事工運人士馬超俊等具呈中央撫卹委員會。」^{①9}

由兩個記載相對照，發現趙之「自述」有幾個重要錯誤：

一、黃愛、龐人銓不是中學生而是華實紗廠的職工。

二、黃龐事件不是發生於「援鄂戰爭」以後，而是在「頒行省憲」之後，時間相差一年。

三、事件的起因不是為銅圓局工人罷工，而是為華實紗廠工人罷工。

四、黃、龐被斬首的罪名是早已擬好了的，為「宣傳無政府主義，勾結土匪」，而不是「工人咸懼兩人之招供工人名單」，亦不是「獲得共黨宣傳品甚多」。

給湖南勞工會帶「紅帽子」，栽誣為共黨，連共匪都不承認。這裏找到直接證據。證據來自共匪搞工運的「先進」鄧中夏，他在「湖南罷工潮」文中說：

「與武漢爭輝並美的，便是湖南罷工潮。湖南本非工業區域，比之武漢相差很遠，此地除一個紗廠外，尚有造幣廠、黑鉛鍊廠數家，其餘則有三個大的礦山：安源之煤礦、水口山之鉛礦和安化之錫礦。」

「如說共產黨在武漢方面沒有遇着競爭者，那麼，在湖南方面就恰恰相反，劈頭就遇着競爭者——而且是非常強固的競爭者。」

「先共產黨湖南黨部還未成立之時，便有無政府黨人在此活動，

其首領為黃愛、龐人銓。一九二〇年他們便組織湖南勞工會，兩年以後約有工會二十，會員七千人。」

「湖南勞工會的基礎便是那個唯一的紗廠（華實紗廠），一九二二年一月發生罷工。」

「罷工的原因在於工人要求獎金和一個月雙薪，參加者二千多人。華實紗廠實際即政府企業，省長趙恒惕派兵鎮壓罷工，開槍擊傷工人數十名。雖然如此，但工人依然堅持，趙恒惕不得已承認酌給獎金。罷工工人雖然勝利了，但他們的首領黃愛、龐人銓却於罷工解決之後，被趙恒惕逮捕，推至瀏陽門外斬首。黃、龐因此便做了為工人階級犧牲的英雄。」

「黃、龐被殺後，湖南勞工會亦遭封閉。但黃、龐被殺却引起社會的不平，因為當時湖南省剛剛宣佈省自治。趙恒惕製定什麼省憲，亦曾冠冕堂皇規定人民得有什麼自由權利的條文，這樣一來，省憲的假面具完全揭開。」^⑳

鄧中夏也是湖南人，在匪黨的地位很高。據「民國大事日誌」所載：「共黨操縱下之中華全國總工會於民國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在廣州成立。二十五名執行委員中，共黨份子佔二十三名，鄧中夏被共黨中央指派為總工會黨團書記。」他曾經於十四年在上海日本紗廠罷工風潮中和國民黨的工運工作者爭取領導權，與蕭同茲正面衝突過。鄧於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被我政府捕獲，翌年予以處決。^㉑

現在再追述湖南勞工會的歷史。

「中國勞工運動史」是這樣記載的：

「湖南勞工會成立於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會所設於長沙肇嘉坪（筆者按後來遷至落星田）。設立之目的，標揭着三大任務：一是維護勞工的利益，二是促進國家的統一，三是維持民族的尊嚴。」

「在短短的半年之內，所有長沙的產業工人全部都組織起來了。其中組織得最稱完備的而具有極大活動力量的是華實紗廠的三千餘紡織工人。此外如光華電燈廠、黑鉛鍊廠、造幣廠、兵工廠，以及小型的機器廠和印刷廠，織布廠工人，一齊納入了組織。至於職業工人，如車工會、成衣工會、木作業工會、鐵業工會、筆業工會、刺繡業工會、碼頭搬運夫工會等，也迅速成立了二十個職業工會的單位。長沙以外的地區，策動水口山的礦工，粵漢鐵路的長岳段、長株段、與株萍路的鐵路工人，也分別進行了公開或秘密的組織。」「該會出版之『勞工週刊』，堪稱為中國勞工界刊物中之權威。」^{②②}

民國十年冬，湖南勞工會領導長沙市罷工遊行示威運動，有一萬人參加，反對十一月在華盛頓召開的太平洋會議，所有長沙各業，一齊罷市響應。示威目的是代表中國人向帝國主義者繼續侵華表示嚴重的抗議，並表示對英日同盟的絕對厭惡，中國人不願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②③}

發起並主持湖南勞工會的，黃愛、龐人銓是骨幹，此外還有：王

光輝、蕭同茲、譔小岑、黃劔白等。^{②④}

民國大事日誌記載：「湖南黃愛、龐人銓、蕭同茲等在長沙組織湖南勞工會。」^{②⑤}

王光輝，號彥夫，一名理宏，與黃、龐、蕭等為甲工同學，是勞工會的活躍份子，曾啣 國父之命馳赴莫斯科出席遠東民族會議，黃、龐遇難，他適在俄。回國後曾赴廣州晉謁 國父請求討趙。民國十四年在上海出版「黃龐二、三週年紀念冊」，王是主持人之一，紀念冊版權頁的通信處為「上海兆豐路十七號彥夫轉」，就是王光輝。前湖南省教育廳長、國立湖南大學教授長沙曹典球（籽穀）為光輝的父親撰墓誌銘有這一段：「先是公次子理宏，一名光輝，受公之教，知過激主義不足以治中國，聯邑人龐人銓、常德黃愛、常寧蕭同茲等創勞工會，采改良社會主義，冀以蘇勞動者疾苦。嫉湘主政某，措施不合於時，頗糾眾相佛正。民國十一年，某主政者竟殺黃愛、龐人銓。時理宏受 總理孫公之命馳赴莫斯科出席遠東民族會議，聞黃、龐之變，悲慟弗勝，益勵理宏以國事為重，徐圖斡旋湘局，勿汲汲於一朝之忿。……由是益自奮勵，首至廣州籲請 總理孫公北伐必取道湘境，就雪黃、龐之冤。逮 孫公逝世，蔣公相繼北伐，用集大勳。理宏乃葬黃、龐於岳麓山，以彰毅烈。」^{②⑥}

王光輝於三十六年十一月八日由湘潭致函蕭同茲，謂清理存篋，尋獲「大總統批示一件（是請兵出湘及籌款事），可惜一件最關重要

批龐人健請通緝趙恒惕者，此文獻早知失了，但至今清檢不得，則真是失了，收藏之難，可痛可痛。」

蕭同茲於民國八年從天津返湘，可能又回過常寧一次。孟能的「蕭同茲先生編年資料」接下來記載他的父親的行踪，是於民國九年三月進湖南兵工廠考工員，職務是「查考產品合格標準」，幹的時間也不長，「次年五月離職」計算只有一年零兩個月。離開兵工廠後，到湖南第一紗廠（即華實紗廠）任技士，管理電機，「至十一年六月離職」。湖南勞工會成立於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那時蕭在兵工廠做事，他是發起人之一；黃龐血案發生於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因華實紗廠罷工事件而起，那時蕭正在華實紗廠管理電機，自然是直接的參加者。十六日晚上，黃、龐在勞工會召開緊急會議，至深夜始散，「他們的同伴走後，接踵而來的却是兇惡的死神。」假如這個緊急會議散得遲一點：「同伴」必被一網打盡，蕭必然是同伴之一，這場面好險！蕭的小同鄉周仲衡那時也在長沙，「突聞龐、黃工潮慘案，先生有被牽連之說，急往其寓所探詢，則安然無恙。蓋先生機警過人，適應有方，且儀表溫順如處子，不似好勇鬪狠之流，瞞過軍閥時代偵緝人耳目，幸免於難。」^{②7} 周仲衡於訪問中述說當時情形，黃、龐事件他事先一點也不清楚，經人轉述才知道發生這件事情，據傳聞被抓去的還不止黃、龐兩個，可能同茲也牽連在內，就急忙趕到戩子橋蕭的住處去探視，見到他安然無恙。又據蕭孟能口述：「父親對於這驚險的一幕曾經和我們講過，他是提及『機智』才講起的。父親跟黃、龐

晚上分手時，約定第二天早晨到勞工書報社見面。黃、龐出事並不知道，一大清早趕往勞工書報社赴約。到那裏，看到有彪形大漢站在門首，曉得情形不妙，可是這時不能拔腿就跑，一跑即露出了馬脚，只有力持鎮靜，裝成視若無睹的樣子，不退反進，緩步往門裏走。果然彪形大漢發話了，問是做什麼的？不經意的答復：『來看報的』。對方粗聲阻止：『今天沒有報看，快走！』就這樣脫離一場險境，僥倖完全靠『機智』。」

黃龐血案發生後，參與湖南勞工會的重要份子，紛紛離湘，一面是逃亡，一面是向全國伸訴，並聯絡各地工人擴大勞工運動。他們大體分四路，一路北上至北京、天津，一路至上海，一路至漢口，一路至廣東向 孫大元帥求援討趙。蕭同茲是到漢口，由江聲日報湘人楊綿仲等撰文揭發黃龐血案真相，^{②⑧} 全國輿論大譁，乃有蔡元培等譴責趙恒惕之通電。勞工會的控訴是發行一本小冊子叫「血鐘」，蕭同茲手持「血鐘」拍過一張照片。這本小冊子現在找不着了，據「黃龐二週年紀念刊」所載：「在『血鐘』上我們也曾很直率的宣布勞工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最後一段是說明現在只是循着血路前進罷了。」

蕭從漢口回湘，他在華實紗廠待不下去，就在湖南省立乙種工業學校謀了一份教職，教數學與英文。十二年暑假期間曾參與譚延闓討趙軍幕府任行政委員。譚趙戰爭對湖南為一重要關鍵，對 國父戡平粵亂與出師北伐亦為一重要關鍵，容待詳述。

蕭在赴衡陽以前，六月一日，長沙曾發生「六一慘案」。是日，長沙市民由於反日，「與日輪搭客衝突，日輪召日艦水兵登陸，槍殺市民三人，傷十餘人。外交後援會決議罷工、罷市、罷學，與日領嚴重交涉。」²⁹ 留在長沙的勞工會份子參與了的，蕭之去衡陽或者與此有關係。

「蕭同茲先生編年資料」記載十二年年初，蕭與王光輝曾再到漢口參加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從事組織工作。二月七日，慘案發生，「漢口軍隊因干涉京漢鐵路工人罷工，與工人衝突，開槍擊斃工人多名，並將工人首領梟首示眾，各路工人羣謀大罷工。」³⁰ 證以冷欣所述：「記得當年報載，軍閥槍殺勞工領袖黃愛、龐人銓等，全國民意沸騰。有蕭異、王光輝二人參加京漢鐵路工人運動，從事組織工作，宣揚本黨主義，因而大受軍閥壓迫，掀起『二七工潮』。」³¹ 則蕭在長沙還是暗中與各方聯絡，從事勞工運動。

蕭參加譚幕，譚軍奉急召回粵靖難，他沒有跟去，曾回常寧一次，不久又到長沙，到湖南銅圓局當課長。據鄧伯粹口述：「民十二我再回湘時，那時同茲正在銅圓局任總務課長，局長是原甲工染織科主任寧鄉周伯楨先生。」蕭在銅圓局幹的時間也不長，到民十三年六月以前就已首途赴滬。前後經過三任局長，周伯楨離任後，常寧縣柏方人廖模（挹羣）繼，廖走後，梅蔚南繼。周仲衡曾於十三年與蕭在長沙見面，那時廖已離任。

- ①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略 第八〇面
- ③鄒魯：同上，第一〇七面
- ④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 第二編第一一面
- ⑤文直公：同上，第一二面
- ⑥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略 第一四五面
- ⑦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 第一冊第二四五面
- ⑧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 第三冊第三二〇面
- ⑨丁中江：同上，七四面
- ⑩趙恒惕：九十自述 湖南文獻第三號第三五面
- ⑪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 第三冊第四七四至四七六面
- ⑫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 上冊第三二三面
- ⑬文直公：同上，第三二四面
- ⑭趙恒惕：九十自述 湖南文獻第三號第二九面
- ⑮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 第三冊第四七六面
- ⑯趙恒惕：九十自述 湖南文獻第三號第二九至三二面
- ⑰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 第三冊第一〇五面
- ⑱香港大成雜誌：第五期第二三面
- ⑲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 第二編第一九六至一九七面
- ⑳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史 第三二至三三面
- ㉑按：鄧中夏：湖南省宜章縣人，一八九七年生，出身於沒落之地主官僚家庭。曾在北京大學讀文學系，為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積極參與者，並參加匪黨，為匪黨所辦之「工人小報」工作，為此遭受家庭反對，因與家庭脫離關係，而成為匪黨利用

之工具。

一九二一年春，在長辛店組織「工人俱樂部」，嗣又至天津、唐山等地從事工運，同年夏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繼續進行策劃和佈置各地職工運動。一九二二年至廣州出席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為匪黨工運之著名領導人之一。曾參加長辛店罷工、開灤五礦罷工、以及京漢鐵路大罷工，聲稱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之鬭爭。

一九二三年在京漢鐵路罷工，被軍閥鎮壓慘敗後，鄧匪至上海，參與創辦上海大學，以教授身份為掩護，秘密進行工人運動。其時匪黨中央鑒於歷次罷工失敗之教訓，對職工運動持有「取消主義觀點」，認為：「中國工人階級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中國大多數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鬭爭之需要與可能。」鄧匪則不以為然，曾在「中國工人」、「中國青年」雜誌及匪黨機關報上發表文章，加以駁斥。一九二四年放棄上海大學教職，專力工人運動。一九二五年二月領導上海日本紗廠四萬多工人展開反日罷工，衝入租界，搗毀工廠，與軍警發生直接衝突，曾一度被捕獲釋。同年五月赴廣州出席全國勞動大會，會後留在廣州，與蘇兆徵等策動省港罷工，響應「五卅」運動，建立省港罷工委員會，其下設武裝部隊、革命法庭、檢查局、審計局、法制局以及罷工工人之公共食堂、宿舍、醫院和宣傳學校，集中力量反對英國，此次罷工計支持二年餘，使香港商業陷於停閉。

一九二六年至武漢出席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鄧匪在歷次勞動大會中，都居於策劃地位，各次大會之宣言及決議，多半有他參加起草。自第二次勞動大會成立中華民國全

國總工會以後，每次膺選為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並負重要職務。一九二八年被選為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並在職工第五次大會上當選為赤色職工國際執行委員，留在莫斯科工作兩年多，曾撰成「中國職工運動史」一書。

鄧匪自一九二三年被選為匪黨第三屆中央委員，嗣後又連選為第四屆和第五屆中央委員。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擔任匪黨江蘇省委員會書記；廣州暴動失敗，接替張太雷遺缺為匪黨廣東省委員會書記。一九三〇年由俄回國，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成為立三路線的健將，一九三〇年九月匪黨六屆三中全會後，改調湘鄂西蘇區任「湘鄂西蘇維埃」省委和「紅二軍團」政治委員。一九三一年紅二軍團被擊潰，鄧犯機會主義錯誤，經鬪爭後撤職。一九三二年調返上海參加基層破壞活動，被政府捕獲，解往南京，至一九三三年始處死刑。

②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 第二編第一五二面

③馬超俊：同上，第一七四面

④馬超俊：同上，第二〇七面

⑤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 第二〇三面

⑥曹典球：湘潭王志吾先生墓志銘

⑦周仲衡：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 在茲集第八二面

⑧唐季涵：蕭三爺與楊綿老 在茲集第一〇一面

⑨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 第一冊第二三七面

⑩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 第二三〇面

⑪冷欣：一位高風亮節的知己 在茲集第四一面

六、長沙、衡陽、上海

黃龐血案發生後，湘人組團赴粵請願，請求 孫大元帥下令討賊，大元帥即於十二年七月十六日任命譚延闓為湖南省長兼北伐討賊軍總司令，任蔡鉅猷為總指揮。趙恒惕出兵相抗，名曰「護憲」，所護之憲即是他的「省憲」。這陣容很明顯，蕭同茲無所選擇，自然是站在討賊這一邊，由長沙到達衡陽。

周仲衡說：「譚組庵（延闓）先生率討賊軍入湘，師次衡陽，凡有志革命者均羅致幕府。先生（同茲）任總司令部行營委員，余任政務委員，舊雨重逢，互道衷曲甚歡。」^①

一面是討賊，一面稱護憲，而在湖南人人視之，則為趙恒惕跟他的老長官譚延闓打起仗來了，稱之為「譚趙戰爭」。這一仗打的時間並不長，只有三個月就結束了。

譚奉命回湘以前在廣東大元帥府當部長，奉命以後還未回湘督師，湖南內部早已打起來了，駐紮湘西的蔡鉅猷六月間即已出兵攻趙，並向廣東乞援， 國父已應允援蔡討趙。蔡既奉 大元帥任命，七月十六日即分三路進攻趙恒惕。二十日，師長宋鶴庚、魯滌平謀倒趙，表示應對湘西調和，反對對蔡用兵。二十五日，擁趙的團長十七人聯名通電，擁護省憲，主張討蔡。這是譚趙戰爭的前哨戰。

七月廿六日，譚回湘與蔡鉅猷聯合討趙。

八月七日，譚在衡陽就任北伐討賊軍總司令，並組織公署，委任軍長多人。

八月八日，趙恒惕組護憲軍抗譚延闓。

八月二十三日，趙對譚軍下總攻擊令，湘戰實行接觸。

八月廿四日，趙軍與譚軍在衡山附近激戰，譚軍不利。宋鶴庚以失軍隊指揮能力，棄職赴漢轉滬。

八月廿九日，趙恒惕以毀憲附逆罪，免衡陽鎮守使謝國光、寶慶鎮守使吳劔學職。

八月卅日，趙軍葉開鑫部攻佔衡陽，譚延闓走常寧。

八月卅一日，湘潭駐軍朱耀華團輸誠譚延闓，襲攻長沙，於九月一日入長沙城，趙恒惕率夏斗寅部退醴陵。

九月六日，譚軍奪回衡陽。

九月十一日，蔡鉅猷部佔益陽，唐榮陽附蔡，攻入常德，趙部唐生智，賀耀組退岳州、湘陰。

九月十四日，譚軍攻克醴陵，向攸縣、茶陵、株州各方面活動。魯滌平通電譚、趙兩方開和平會議。

九月廿二日，譚、趙兩軍在易家灣（湘潭附近）激戰，魯滌平電請雙方停戰一週，在中立軍（魯軍）駐地之湘潭姜畚開會議和。十月五日兩軍派代表與會。

十月十二日，和議不成，魯加入譚軍。

十月十四日，魯滌平殺所部團長袁植，朱耀華入湘潭解散袁部，袁部二營及中立軍葉琪投入趙軍。

十月十六日，趙恒惕引北軍入湘，吳佩孚命馬濟赴岳州，任兩湖警備司令部參謀長。

十月廿三日，趙恒惕迎北軍入長沙，即以馬濟守省垣，趙親赴前線與譚軍展開激戰。

十一月二日，趙恒惕戰退長沙，對河拒蔡鉅猷軍。

十一月三日，趙軍分佔湘潭、寧鄉。

十一月七日，趙軍唐生智部佔衡陽。譚軍各部因桂軍沈鴻英奉吳佩孚命襲柳州，恐後路被截，退集宜章。

這時候，陳炯明叛軍在粵聲勢猖獗，廣州岌岌可危。十一月六日，孫大元帥以討賊軍潰退頻仍，召集緊急會議，商討挽救軍事頹勢。

十一月九日，孫大元帥聞各軍退却，偕李烈鈞至石龍。

十一月十日，孫大元帥命各討賊軍反攻無效。

十一月十一日，孫大元帥駐石灘車站。

十一月十二日，孫大元帥回廣州。陳逆陷石龍，廣州震動。

十一月十四日，譚延闓奉孫大元帥援粵之電，率其改編之五軍，星夜向廣州進發。

十一月十八日，陳逆所部各軍猛攻廣州，激戰市郊。

十一月十九日，陳炯明逆軍分四路攻廣州，深入北郊，被譚延闓、樊鍾秀之湘豫軍擊退。

十一月廿七日，湘贛軍克復石龍。

十二月二日，湘贛軍擊破陳炯明逆軍主力，陳逆仍退守惠州。

十二月三日，蔡鉅猷奉譚延闓令率部入粵，為趙恒惕堵截於武岡。^②

在這短短期間，湖南經過一場戰爭，趙恒惕引北軍入湘，將老長官譚延闓擊敗了。但是譚延闓回師廣州解了廣州之危，並乘勝將陳炯明逆軍擊退至惠州，穩住了革命的根據地。從革命大局着眼，所得還勝於所失。

蕭同茲在短暫的軍旅生活中還替易培基幫了一個大忙。周仲衡說：「先是先生（同茲）與總部文書委員易培基寅村先生有舊，易原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校長，辭職來衡追隨譚公，但交卸後尚有虧空，省方追繳甚急，先生廉得其情，轉商於余，余盡力為籌款滙省了案。」^③ 周於訪問中追述這段故事說：同茲之參加譚幕，是與衡山人劉鳴劔以及劉的未婚妻一共三個人由長沙至衡山，再由衡山乘木船到衡陽來到差。在譚幕中見到易培基，他們原是熟人，易培基顯得很着急的樣子，又遲遲不便啓齒，同茲追問他是什麼事，他才說出交卸校長時還虧空了二千元公款，趙炎午已經知道他已來衡陽，當然啣恨在心，就借題發揮，如果不將虧空迅予彌補，就將對易太太不客氣。可是易在衡陽人地生疏，那裏籌得出錢，因而心急如焚。同茲初到，一時也想不出辦法，才轉商於周，周立即籌了兩千元給易培基解決了這件困難。周說易培基倒很守信，後來周到長沙時，易早已將這筆款子還到長沙南陽街機器廠蕭異茲處。周仲衡也追述吃敗仗時的苦頭。當譚軍退走時，他們這些穿長衫的各種委員自然無法隨軍退走。衡陽撤守，他和蕭同茲是從衡陽江西會館碼頭下小船回常寧。蕭那時就吸紙煙，倉卒間那裏還記得買煙，蕭向船伏索煙吸。因此周在追思的文章中也說：「不幸前方戰事失利，譚公率軍向粵方背進，余與先生僱民舟溯湘江而上返梓，舟次誦譚公離衡時感懷詩，中有『桑麻遍野穀豐登，征將無功吏不能』之句，彼此愴然欲涕。」^④ 是亦寫實之筆。

湖南勞工會份子，在長沙經劇變之後，沒有太積極的開展，然而

散佈在外的勞工會會員仍有多方面的活動，最活躍的據點在上海。蕭同茲不甘蟄伏在長沙，到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他也去了上海，曾轟轟烈烈參加勞工活動，並且和共產黨展開激戰。

蕭抵達上海前後，勞工會份子的活動在「黃龐二週紀念文」與「黃龐三週紀念冊」的合訂本有具體記載。這個合訂本是一九二五年（民十四）在上海印行，並非是一月十七日出版，因為裏面記載了一九二五年上海、天津等地為「一七」舉行紀念會的一些實錄。從「二週紀念文」中推測黃、龐遇難一週年的時候就已經出過紀念冊，可惜無處覓得。二週紀念刊中有緝之女士的文章，裏面有這一段話：「我是一個欽佩黃、龐兩志士的人，二週紀念，我很想作篇文章；但我向來不認識黃、龐，幸得作舟君寄來一本『黃龐紀念冊』，我便向那紀念冊中去找材料了。」^⑤ 可見「一週紀念刊」是的確有，不過現在已成絕響。

「二、三週紀念冊」並非經過精編的書，裏面內容很龐雜，體例既不嚴謹，文字有很多也不夠成熟，看得出來，其中若干篇確是出於工人的手筆。但如今天研究「黃龐事件」，仍然具有最高的史料價值。譬如它刊有湖南勞工會的會徽，刊有黃、龐的照片，刊有蔡元培的文章為賓步程辯誣，刊有譚小岑公開質問陳獨秀的報端啓事，刊有新詩人劉孟葦（本書前文記述袁振宇的談話已經提到他）的長文，詳敘長沙無政府主義者與黃愛認識的經過，說明無政府主義者只是勞工會的朋友而非勞工會的主體。更重要的是從各別零星的紀念文中，由

砂裏淘金，能夠理出黃、龐等人發起勞工會時的艱苦以及在一年零兩個月的短命歷史中湖南勞工會具體的做了些什麼事，並且了解勞工會在奮鬥過程中，資本家如何勾結軍閥對他們進行威脅與利誘，直到最後，黃、龐之被逮捕被斬首還是資本家勾結軍閥實施預定計劃的一個大圈套與大騙局。筆者對這册合訂本曾一讀再讀，總算理出了頭緒，為不使當時這件大新聞的真相被湮沒，覺得有加以翔實記敘的必要。

黃愛與龐人銓均生於民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小於蕭同茲兩歲。

湖南勞工會成立時，當時勞工情形如何，劉夢葦描述得很生動。單單提出勞工最多的湖南第一紗廠來說，劉夢葦和七八個青年學會的男女會員曾去參觀：「到了紡紗廠機器間中，黃愛殷勤地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機械方面的知識，對於工友們的待遇上，管理衛生各方面，尤其說得詳盡而且沉痛。其實，那些工友們底外表和居住的地方，飲食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我們走過身都幾乎要嘔，我們底心已在暗地悲痛了！我們初進紡紗間的時候，機械裏面發出來的氣味和棉花底茸茸的末片闖入口和鼻子裏面委實難過得很。我們不期然而然的把手巾掩住口和鼻子，一刻兒我看見那些男女工友，甚至有未滿十二歲的小孩，都毫不顧忌似的工作着，似不知道有難聞的氣味與棉絮攢入口裏。我們暫時都不能忍受，未免覺得可恥，我底羞愧的心理使我挪巾掩鼻的手垂下來了，我看見他們還繼續地掩着，我開玩笑地說：『可惜那些工友們沒有第三隻手來掩住鼻子』。大家笑了一笑，臉紅紅地

放下手來。黃愛接著我底話說：『就是有三隻手，他們也怕不會用來掩鼻子，要用去作工，多得一隻手的工資，因為他們用兩隻手工作，所得多半不夠養活自己。』」^⑥

勞工會的成立可以用「慘淡經營」四個字來形容，他們全憑一股勇氣。那時黃愛住在甲工學友會，常常斷炊，龐人銓住在一家小旅館裏面，欠了許多債務，湊起來只有二十八個銅板。且不管這些，他們起草章程，發表宣言，都是借別人的油印機印出來的，有很多工人響應他們。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長沙教育會坪開成立大會，在宣言裏，宣布「本互助的精神，解決一切極關重要的問題」，這十七個字成為湖南勞工會的任務，以後確是這樣實行。宣言裏更表明動機的純潔：「我們這個團體裏面的份子，就是本著心思體力的本能，用在技術上面而能生產的勞工，實在不敢以非勞工掠奪份子來裝門面。」^⑦

湖南勞工會成立以後做了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民十、四月為紗廠公有問題勞工會號召工人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運動。到萬餘人，慷慨激昂，使省當局為之戰慄。

省當局要查究，黃愛、王光輝於四月廿八日即前往自首，承認這件事是湖南勞工會主持的，被監禁於陸軍監獄，絕食一星期以示抗議。沒有審、沒有判，查不出什麼罪名，六個星期之後將他們釋放，時間是六月九日，勞工會集合許多人至陸軍監獄門首迎接代表出獄，舉行了英雄式的歡迎。

黃愛他們在獄中，正逢五一勞動節，龐人銓和沒有入獄的人仍然熱熱鬧鬧的舉行了規模龐大的勞動紀念大會。定做紀念麵包，印上「勞工神聖」、「不作工者不得食」字樣，幾千勞工向勞工會會徽行三鞠躬禮。

真正的勞工運動與愛國運動是分不開的。勞工會成立才一週年，會務蓬勃發展，勞工會已成為最有力量的人民團體，又介入了愛國活動。民國十年十一月，勞工會發起了反對華府會議的大示威，他們反對英國與日本勾結出賣中國利益，參加示威的工人達萬餘人，龐人銓擔任總指揮，氣勢懾人。

華實紗廠的老闆這時感到坐立不安。派人來和黃、龐接洽，廠方願以每月三百銀圓的高薪聘他們為高等顧問，被嚴詞拒絕了。不久，華實紗廠又派董事陳友梧持五百銀圓的會金要求加入勞工會為會員，也被嚴詞拒絕了。

黃、龐的被害是中了他人的連環巧計。華實老闆黃藻奇、彭祖植見大罷工僵持不下，以銀圓十六萬元賄買趙恒惕及其部屬李友文、李鳴九、李汝賢等捕殺黃愛、龐人銓。他們事先設好圈套，揚言公司方面決定接受工人條件，將於十六日晚派代表至勞工會簽訂協議。黃、龐等因於當時召集緊急會議，會議甫散，緝捕者即持腳鐐手靠以至，捕去黃、龐，時為一月十七日凌晨。捕至總部後，即剝去衣服，其時正降大雪，雪深四寸，嚴寒侵骨。不久，即由執法官宣判兩人死刑，

佈告都早已寫好，除誣以「宣傳無政府主義，勾結土匪」之外，還有「收買槍支，圖謀不軌」罪名，簡直是當作江洋大盜處決。清晨三時，在森嚴戒備下押赴瀏陽門外識字嶺刑場斬首。黃愛被「連砍三刀，頭未斷；兩點鐘後，目尚能視人，終痛凍而死，慘哉！」

湖南勞工會地址在「落星田」，真是「巨星殞落」。黃、龐殉難時兩人均為二十六歲。

黃、龐行刑後，由「同善堂」棺殮兩人屍體寄厝於「饗堂」。^⑧

黃、龐被難兩週年（民十三年）的前一天，報上出現這麼一條消息：

標題是：「華實紡紗公司分配紅利」

內文是：「湖南華實紡紗公司，發給第二屆紅利。查第二屆決算，紅利以二十六萬四千元分配，提公積一成，餘作二十三成：政府四成，酬勞四成，股東十四成，彌補舊股一成；內優先七厘，普通三厘，官息週年八厘。應得紅利官息，計優先每百元紅息洋三十七元七角，普通每百元紅息洋三十三元八角，新股每百元紅息洋三十一元四角。」

砍掉兩顆人頭，換來財東們皆大歡喜，而工人們的生活狀況，仍舊是「人皆掩鼻而過」。難怪 國父非下令討賊不可，亦非北伐不可！

據湖南勞工會駐滬辦事處同人於「黃龍三週紀念刊」說：「迄乎今日……在湖南之本會會員，從事根本上之羣眾聯絡運動，亦頗切實而有可觀。」當是指蕭同茲他們留在湖南的會員做了些羣眾聯絡活動；而當時勞工運動的重心在上海，勞工會駐滬辦事處一方面聯絡各有關工會進行上海工團的聯合運動；一方面須與共黨的尖銳鬭爭，正需要蕭去上海負擔起一份重要責任。

蕭到上海，是民國十三年。袁振宇口述：「我到上海見到同茲，是民國十三年，他在上海南洋兄弟菸草公司職工同志會任總幹事，住在公司宿舍。宿舍的走廊很寬大，把它隔成三間，蕭和紹賢住其中的一間。兩夫婦見到我這個小弟弟來了，非常高興，紹賢嫂提著菜籃去買菜，留我吃飯。」比袁的記憶更有力量的證據是「中國國民黨黨員登記表」，表中有一段考語：「黨證字號核符，於民國十三年六月在上海三區十三分部入黨。」這裏的考核，是考核他曾於民國三年在湖南長沙入黨，介紹人為覃振、袁海鵬，並考核黨證字號為「寧字第二二五號」相符。考語中所稱在上海三區十三分部入黨，是指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以後，建立各級地方黨部，黨員重新登記，並發給新黨證，以此「中國國民黨員登記表」「新編黨證字號」欄內蕭的黨證字號為「修湘字第零零零零二號」。「蕭同茲先生生平事略」說，「十三年正式加盟中國國民黨」是沒有查明白此中原委。

蕭到了上海以後，湖南勞工會又活躍起來了。先是，因在湖南大

受壓制，「在滬者即派代表出席上海工團聯席會議」，「並與『二七事件』之京漢鐵路總工會及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之流亡各地諸君相與過從甚為密切，不願外國人代庖指導我國工人運動。」「我們在上海聯絡各工團組織一個團體，我們出了一種報，鼓吹我們的主張。……主張要以勞動者自己的力量，解決自己問題。」^⑨

他們反對共產黨假借勞動階級的名義去騙俄國人的錢，他們更覺得「一班長衫先生混進我們勞動者的隊裏來混飯吃，實在是我們所應該反對的。」^⑩ 於是勞工會份子與共黨起了正面衝突，共黨「說我們正式和研究系合作起來增長黑暗勢力不小。」「罵我們也是上海資本家的走狗。」「他們近來在長沙發刊一種苦力旬報，更是純粹的用含沙射影的手段來攻擊我們……竭力製造謠言來中傷湖南勞工會的中堅份子，使我們不能在湖南活動。」衝突最尖銳的是勞工會員譚小岑在報上公開登了一封質問陳獨秀的信：

「獨秀先生鑒：頃因友人寄來七十一期嚮導，得讀寸鐵欄中有先生大作，明言湖南勞工會重要份子仰面事仇，究有何證據？重要份子係指何人？我亦湖南勞工會遭劫後重要份子之一，不甘被誣；特此登報質問，請先生明答。先生如舉不出證據，我雖然無如先生何！恐人將視先生為有意造謠者流，嚮導週報亦為造謠機關矣。」^⑪

陳獨秀於嚮導九十八期，寫了「我們對於造謠中傷者之答辨」，

沒有提出證據，但聲明「沒有騙俄羅斯的巨款和陷害工人的事」。並且賭咒發誓：「這兩個謠言若是真的，我們便應該槍斃。」^⑫

京漢鐵路總工會也揭共產黨的底，他們說：「一句老實話吧！我們受共產黨所給與我們的苦痛，比較軍閥資本家更甚幾倍；軍閥殺死我們的性命，資本家盤剝我們的工錢，我們曉得起來反抗，曉得要爭最後的勝利，他們直接壓制我們，間接就是激起我們的革命。……至共產黨這班東西……他們的惡辣手段用在背後，不用在胸前，他們吃了人，還覺察不出，……他們的嘴上却說得好聽：『我們是為勞動者的利益』，好笑之至！所謂勞動者的利益，我們專供他們犧牲，犧牲的結果，利益歸他們，痛苦歸到勞動者。」湖南勞工會同情於京漢路工人所說的話，共產黨的回報是在漢口發行的「勞動週報」，用頭號字排成「少數流氓盤踞湖南勞工會的空招牌在上海」十八個大字。

這才不是一塊空招牌哩！十四年一月十七日午後一點湖南勞工會駐滬辦事處舉行黃龍逝世三週年紀念會，參加者八十餘團體，共九百餘人。為證明不是空招牌，茲不厭其詳，將參加的團體抄錄如下：

上海煤業職工同志會、船務棧房工會、上海紡織工會、製墨工會、江蘇駐滬勞工總會、上海履業工會、旅滬湖北工會、南洋煙草公司職工會、上海大學、喚羣書報社、勞働文藝社、歌曲研究會、浙江民生協進會、安徽工界協進會、上海絲紗女工會、上海印刷工會、駐滬參戰華工會、浙江旅滬法政學會、浙江駐滬勞工總會、安徽駐滬勞

工總會、中華商業聯合會、海員工會、遠東通信社、茶業公會、中國機器總工會上海部、同濟大學、大同大學、南方大學、清華學校、震旦大學、上海醫院、粵僑工界聯合會、國會議員通信處、上海理髮業工會、縫紉工會、裝訂工人部、旅館業夥友部、中國工會上海總部、湖北羣治勵進社、安徽青年同志會、安徽公學、惠中中學、安徽工界進益會、滬北實業協會、浙江旅滬工會、江西工商聯合會、四川勞工會、寧紹臺工商聯合會、貴州旅滬同鄉會、湖南同鄉會、安徽同鄉會、湖北同鄉會、改造湖南同志會、淞滬機械職工同志會、國民黨第五區黨部第一第二第十三第十四區分部、第三區黨部第四區分部、第二區黨部第二區分部、中華職工儲蓄會、青年勞工會、中國共產黨左黨、青年會、中西女塾、羣治大學、法政大學、美術專門學校、無政府黨上海部、自由人社、京漢鐵路總工會駐滬辦事處、國聞通信社、東南通信社、公平通信社、中韓互助社、大韓獨立黨、旅滬湘人討趙同盟會。^⑬

同時，在天津的湖南勞工會會員於這天下午三點鐘借大經路達仁里女星第一補習學校舉行紀念會。湖南勞工會以「長沙黃龐三週年紀念會」的名義於當天下午六時假長沙青年會開會。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發出通告：「同月十七日又為湖南黃愛、龐人銓殉難三週紀念，中國工人第一次流血紀念日，……定於二十一日午十二時及晚七時在文明路廣東大禮堂開紀念大會。」黃、龐殉難是中國工人第一次流血紀念日，勞工運動由此開展，波瀾壯闊，決不容共產黨加以汗

巖。

湖南勞工會駐滬辦事處「復於十三年組成上海工團聯合會。」

⑭「湖南勞工會是湖南真正工人的總機關，上海工團聯合會，也是上海真正工人的總機關。」「工人有嘴而不能說話，宣傳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黃、龐兩烈士特地編輯一種『勞工週刊』，如今工團聯合會出版這一張小小的『勞動週報』，也是如此。」⑮

上海工團聯合會是蕭同茲到了上海以後才成立的，他是促成這一組合的主要人物。

①周仲衡：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 在茲集第八二面

②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 第一冊第二三八面至二四九面

③周仲衡：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 在茲集第八二面

④同上

⑤緝之女士：讀了「介紹黃龐」以後 黃龐二週紀念刊第一九面

⑥劉夢葦：後死者底悲憶 黃龐三週紀念刊第二九至三〇面

⑦記者：我們的賬 黃龐三週紀念刊第九面。

⑧DS：心灰 黃龐二週紀念冊第二四面

⑨記者：我們的賬 黃龐三週紀念刊第一九面

⑩同上

⑪同上，第一八面

⑫同上，第二〇面

⑬記者：三週年紀念大會誌盛 黃龐三週紀念刊第五八至五九面

⑭同人：三年來的我們 黃龐三週紀念刊第五面

⑮鼎元：告紀念黃龐諸君 黃龐三週紀念刊第四一面

七、上海三年

從十三年到十六年，一共三年，蕭同茲都在上海。

這三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關鍵時刻。曹錕倒臺，北方成為無政府狀態，段祺瑞再出山號稱「臨時執政」。國父應各方之請由粵北上入京，欲謀中國之和平統一，不幸於十四年春間在北京逝世。而在南方的國民政府肅清了廣東和廣西的叛逆，統一了兩粵，蔣總司令誓師北伐，不期年而長江底定。嗣因共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分化與挑撥離間的手段，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幸而不久即行復合，將共黨排除於黨外，國民黨於十六年實現了統一與團結，將中國從列強瓜分的命運中挽救出來。

茲簡述其經過如次：

曹錕賄選成功後，皖系式微，曹、吳心目中的最大敵人是關外的張作霖。十年九月間，又爆發了「奉直戰爭」，吳佩孚自任討逆軍總司令，另任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胡景翼為援軍第二路司令。十月上旬榆關戰事緊急，馮、胡等對吳倒戈，馮部由熱河兼程入京，孫岳部開門迎接，佔領了北京城。吳部為奉軍與馮、胡兩軍夾擊，前後受敵，大潰。

馮部入京後，將偽總統曹錕幽禁，組織攝政內閣，並將滿清廢帝溥儀驅出故宮，溥儀遷往天津。

張作霖的奉軍乘機入關，段祺瑞在天津靜極思動，被推為「臨時執政」，維持局面。

國父循各方之請，於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由廣州首途北上，十七日抵滬，發表談話：「我這次北上是有兩個目的：一、召集國民會議，是對待軍閥的；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對待帝國主義的。」十二月四日抵天津，三十一日抵北京。不幸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肝癌病逝於故都。

國父北上以後，今 總統蔣公率領留粵各軍暨黃埔軍校師生先後救平粵境楊希閔、劉震寰、陳炯明、楊坤如、莫雄、鄧殷等判軍，底定全粵。廣西方面，亦先後戡平陸榮廷、沈鴻英等逆，於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兩廣統一案。軍事方面，成立軍事委員會，任命 蔣中正兼第一軍軍長，譚延闓為第二軍軍長，朱培德為第三軍軍長，李濟琛為第四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五軍軍長，程潛為第六軍軍長，李宗仁為第七軍軍長。

十四年至十五年，北方又起了變化，先後發生幾次戰事。第一次是十四年三月，胡景翼、孫岳與直系劉鎮華戰於河南，第二次是十四年十月，奉系與直系戰於東南，第三次是同年十一月奉系內部發生郭松齡倒戈，第四次是十五年二月，奉直聯軍進攻國民軍。吳佩孚東山

再起，自稱「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直系後起巨頭孫傳芳坐擁東南半壁，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北洋軍閥又成為直系的天下。

十五年六月四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臨時全體會議，一致通過尅期北伐，並發表北伐宣言。五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於七月九日就職，並舉行誓師典禮，即日下動員令。這時，唐生智來歸，任為第八軍軍長，並命兼前敵總指揮，由衡陽率師進攻趙恒惕，第四、第七兩軍亦分由粵桂開入湘境，八月十二日就克復了長沙。八月底進逼武昌，次第克復漢陽、漢口。九月十八日佔領武勝關，十月十日收復武昌。十一月初旬收復南昌，十二月中旬收復福州。國民革命軍由閩入浙，十六年二月底克復杭州。沿長江挺進各軍亦連下安慶、蕪湖，迫近南京，於三月二十三日克復。入浙之軍轉攻淞滬，上海的敵軍已被工團包圍繳械紛紛潰退，上海亦告克復。

蔣總司令率領的北伐軍由粵出發，不到九個月即已規復湘、贛、閩、鄂、皖、豫、浙各省及上海、南京兩市，久苦於軍閥暴政之下的民眾真是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故能勢如破竹。吳佩孚的十四省聯軍與孫傳芳的五省聯軍如摧枯拉朽一般被擊潰了。尤其是上海，還沒有等到國民革命軍開到，敵軍即被上海的工團包圍繳械，工團的力量真不可侮，國民黨的工人運動的確是成功的。蕭同茲參加了這份工作，該是最大的光榮。^①

在上海從事工運，當時的環境非常艱苦，一方面須與壓迫工人的帝國主義鬭爭為工人謀利益；一方面須與假借無產階級名義利用工人為工具的共產黨鬭爭，還要跟盤踞在上海的軍閥勢力鬭爭，這種三面鬭爭表現最突出的是「五卅運動」。

五卅運動是這樣發生的：「上海大中學學生三千餘人，及工人、市民各團體，因十七日日商內外棉紗廠日人慘殺工人事，遊行演講，被公共租界英籍巡捕開槍掃射，死傷三十餘人，被捕五十餘人，造成空前的『五卅慘案』。」^②

史學家黎東方教授是參加者之一，親歷其境，對此有詳盡的描述：

「五卅運動，可說是這空前高潮的巔峯。凌鴻勛先生在一篇文章裏面說，它是中共所領導的。我僥倖曾經參與了五卅運動，敢說實情並非如此。它不是中共所領導，而是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所領導。中共活躍份子如惲代英，只不過是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一個職員而已。他們不僅不能領導學生，也領導不了多數的工人。倒是中國國民黨的非跨黨份子，如蕭異（同茲）、黃炎、謝恒龍等等，在各大工廠內具有隨時可以分別動員的實力。」

黎東方繼述：「進一步說，五卅雖則是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所領導，而它本身正如五四一樣，是民眾基於愛國心，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打死了中國工人顧正洪，引起各界的公憤，於是各校學生們紛

紛到租界內外各馬路作街頭演講，要求懲辦兇手，撫卹死者，進一步制止帝國主義者對華經濟侵略。在五月三十日這一天，星期六，上海各大專學校的學生一齊出動。我們上海南洋大學的大學部與中學部的學生全體集隊出發，總隊長是足球健將駱君，我但任了一個小隊的隊長。駱君與我，都已經是中國國民黨黨員，當天下午在英租界南京路中彈而死的陳君虞欽，也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而且是由我介紹入黨的。」

「與陳君同時被打死打傷的有幾十位。全上海的中國人都一致憤慨。第二天，商店一律罷市，工廠一律罷工，加各校原來已經開始的罷課，成為『三罷』。」

「『三罷』在幾天之內便蔓延到全國各大城市。各較小的城鎮，也皆有罷課與罷市的『二罷』。值得讚美的是『上海總商會』，它與『上海學生會』及『上海總工會』始終一致行動。連一向被洋人稱賞為『高等華人』的『上海納稅華人會』的會員，也都挺身而出，責備英租界當局的措施不當。」

「這一次，我們不僅抵制日貨，而且抵制英貨。我們不僅高呼『取消二十一條』，而且高呼『收回租界』，『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打倒一切帝國主義。』」^③

為明瞭當時情況，六十三年七月二日走訪黎東方教授，冀求了解蕭同茲在「五卅運動」中的活動情形。黎說：他當時是南洋大學中學

部的學生，同茲先生已是三十歲左右的工人運動領袖人物，年齡相差一大截，不過有機會時常見面，都是在黨部開會的時候。蕭隸屬第三區黨部，黎屬第五區黨部。當時上海執行部共轄九個區黨部，第二、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五個區黨部的黨員是堅決反共的，其餘四個區黨部態度頗趨向於廣州的「容共政策」。黎教授不稱為「容共」而稱為「收共」，他的意思是說中國國民黨只是收留共黨份子於黨內。黎跟蕭因為政治觀點處於同一立場，所以有機會接近。黎非常欽佩蕭的沉着與從容不迫的工作態度與永不休止的工作精神。

由於「容共」問題而引起中國國民黨的糾紛，鄒魯是親身的參加者，他在著作中說：「黨內的糾紛是起因於容共問題。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以決定容共，是由於共產黨員宣布願意放棄其主張，服從三民主義，並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可是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之後，却完全違背了這個信約。他們不特不服從三民主義，甚至在他們的刊物上公開詆毀三民主義；他們不特不忠於國民革命，反謂國民革命為『資產階級不澈底的革命』；他們表面上掛著國民黨的招牌，實則借國民黨之名發展共產黨的勢力。」

「共產黨這種伎倆，本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謝持、張繼等認為『實以共產黨黨團在本黨中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於本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礙。』因於十三年六月間，臚列證據，聯名提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從速嚴重處分，俾本黨根本不致動搖。』但本黨當時仍希望共產黨員能翻然覺悟，履行諾

言，共事革命，故結果祇決議重申紀律，以為約束。時 總理尚在，共產黨亦不敢為之過甚。但自 總理逝世後，共產黨便明目張膽，無所顧忌，他們不特從黨外拆散本黨的外圍，而且從黨內分化本黨的內部。本黨一部份中央委員林森、居正、張繼、覃振、謝持、鄒魯等，不忍坐視本黨被共產黨蠶食鯨吞，乃於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 總理靈前，舉行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議決取銷共產黨員在本黨的黨籍及解雇蘇俄顧問鮑羅廷等案。以不得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接納，為貫徹主張，另設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北京，其後移設於上海。十五年一月一日廣州中央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而上海方面亦於三月二十九日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另產生第二屆執行、監察委員會，與廣州中央對立，是為上海中央黨部。」^④

黎東方說：上海中央黨部與上海市黨部均設於環龍路四十四號，即係 孫總理在上海經常辦公的地方。中央黨部的組織係推胡漢民組織部、汪兆銘長宣傳部、葉楚傖長青年部、馬超俊長勞工部，桂崇基為秘書長，還有婦女部長佚其姓名。同茲先生在中央黨部勞工部服務，是馬超俊先生的得力幹部。關於共產黨之破壞中國國民黨工人運動，黎東方說，共黨的機關刊物「嚮導」曾罵馮自由、童理章、鄧禹農等人為「工賊」。鄧號雨湘，為南洋附中舍監，儀表堂堂，五四運動時期即為上海的領導份子。上海中央黨部的工人運動是始終與共黨處於對立地位，兩面作戰，工作非常艱苦。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蕭在上海中央黨部的工作情況，七月四日又走訪當時上海中央黨部秘書長桂崇基教授，這次訪問，曾作成如下的筆記。

桂崇基說：

(一)我跟同茲的關係是在十四年冬在上海至十六年北伐至武漢這一段時期。十四年五卅慘案發生，我由美回國，是以留美學生與加拿大華僑代表身份返國支援五卅慘案。抵滬後，滬案雖已接近尾聲，但我仍前去南京、北京、張家口等地大聲疾呼：五卅慘案之起，乃係由於租界、治外法權，以及其他不平等條約，所以國人應一致奮起，致力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繼乃赴廣州，在國立廣東大學任教。其時本黨尚採取「容共政策」，在廣州，共黨氣燄至為囂張，黨中大部分中央委員於總理逝世後在北京西山召集第一屆四中全會，決清除黨內的共黨份子，是即外界所謂西山會議。以廣州不能自由行使職權，乃決議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並以環龍路四四至四六號為中央黨部辦公地址。我在廣州目擊共黨之囂張情形，至感憤懣，乃偕同十餘位教授離粵赴滬。我參加上海的中央黨部並擔任秘書長，同時在復旦大學教書。同茲這時是中央黨部工人部的幹事，同他在一起當幹事的還有王光輝。

(二)上海的中央黨部經費奇絀，我們在黨部工作的人都沒有待遇，靠另覓工作維持生活。譬如我本人就靠教書維生。同茲是在南洋菸草

公司職工同志會擔任總幹事，及在上海工團聯合會做事。所有的人對黨務都很熱心，黨部最多貼補一點交通費，大家都不計較這些，雖然大家都很窮。同茲在工人部工作，部長是馬星樵先生，對同茲很賞識，因為他和王光輝做工運，的確是能手，工作方面很有成就。當時我們要和帝國主義、共黨份子以及軍閥三面作戰，同茲從不氣餒，在工人羣中為他們爭福利，並且也曾舉行大集會及遊行等活動，在活動當中，我們和左派與共黨份子時常發生衝突，我們沒有失敗過，由於真正的工人與學生都支持我們。

(三)民國十五年，我們去南京參加 總理陵園奠基典禮，同行的有同茲和張厲生等幾位同志，我曾發表演講，題為「孫中山先生功邁華盛頓與列寧」，聽講的學生很多，又發生兩派學生的激烈鬭爭，反共的一派還是獲得勝利。同茲對我那次的講演印象最深刻，在以後我們的交往中他還時常提及這件事。

(四)在上海這段期間，黨務工作偏重於工人與學生，在反共運動中，他們都踴躍參加，例如大夏大學的楊興勤、南洋大學的黎東方等都是積極份子。我們的工運集中於南洋菸草公司，和日本紗廠等等較大的企業。

(五)我們在上海同生死共患難的一羣後來風流雲散，對國、對黨都有些貢獻，但如論事功有所成就，應推同茲為第一。他主持中央社三十餘年，將中國新聞事業改換了顏面，並且使我國通訊事業躋身於世

界大通訊社之林，這種成就太不平凡。同茲之所以有此成就，我的想法是他能以革命精神專心灌注於一個事業，而且雍容大度，知人善任，將領導才能發揮到極致。據我所知，同茲的外文程度並不太好，然而中國近幾十年精通外文的新聞專才盡都羅致到中央社在國內外服務，全是衷心誠悅的服從同茲的領導。單舉這件事例，就可以了解同茲之所以在事功方面有輝煌的成就，決非偶然。

上海中央黨部成立後，曾派黃英為湖南特派員，前往湖南籌辦黨務。黃英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到達常德，即以常德為中心成立湖南臨時省黨部，與設於長沙由共黨分子夏曦等操縱的湖南省黨部對抗。「據蕭異（同茲）向上海中央報告：設於常德之湖南臨時省黨部，下轄九個縣黨部，正在組織中者有十一個縣黨部，並出版『民眾先鋒』、『工人聲』兩種刊物。」^⑤蕭同茲於十五年又曾回過湖南視察黨務。

蕭同茲還參加上海孫文主義學會。這個組織是純粹的三民主義的信徒所組成，於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在上海山東會館舉行成立大會，由大夏大學學生邵華（健工）擔任主席，孫科、馬超俊、楊杏佛等均應邀發表演說。會址設於上海白來尼蒙馬浪路的普慶里，其成員以知識青年為主，一些反共工運幹部也被吸收入會。「參加孫文主義學會的會員其確實數字尚無正確之統計。依據有關文獻及當事人的追憶，有下開二十八人：劉真如、蕭昭新、蕭異（同茲）、謝恒龍、任雷軍、張一寒、張君毅、鄧公玄、蔣希曾、王光輝、黃炎、張近澂、倪文亞、楊幼炯、范爭波、楊興勤、何範伍、張國淦、周湘、費哲民、

趙澍、黎智康（東方）、陳一郎、駱義奐、劉慰凌、呂素蟾、謝仁釗、徐柏園。」^⑥「此時為孫文主義學會作大力宣傳，並為『上海中央』之喉舌者，厥為葉楚傖主持之上海民國日報。職是之故，『廣州中央』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召開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在共產分子的叫囂下，對葉楚傖給予『警告』的處分，並決定『應令其將民國日報交出改組，並停止其職務。』」^⑦

上海光復後，蕭同茲還是留在上海繼續工作。冷欣將軍其時為上海市黨部常委兼組織部長，兼淞滬警察廳政治部主任，並兼第四軍政治部主任，他於此時與蕭常相過從。冷說：「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我在上海市黨部工作，得與蕭先生往還。他曾領導工運，轟轟烈烈，想像這位英雄人物必定粗邁、豪放，交往後才發現文質彬彬迥異所想。」^⑧

蕭在上海的情形，李大超亦有記載：「我們是在民國十六年冬北伐勝利時，到上海、南京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友好，為了反共鬪爭，也為了上海的勞工運動彼此來往，而結合起一股堅強的革命力量的。同茲兄身歷民國十年（按為民國十一年）長沙黃龐勞工運動事件後，獨自來到上海，結識許多有志之士及在勞工陣營中拉到了關係的。記得我們住在法租界陶爾斐斯路的時候，樓下還安放了 總理的銅棺，是外國人奉送的。正是英美煙草廠工人大罷工的時候，這是同茲兄和一般同志出力很多，且影響國際最大的一個運動。那時我們共同幹，且和許多同志一起幹，從此上海的反共勞工運動就慢慢轉到我們這一方

面，這是值得懷念的。」^⑨

李的簡短敘述有很多的曲折文章，對於蕭同茲尤有重大關係。其中涉及英美煙公司大罷工，涉及反共勞工運動，更涉及蕭個人工作環境的改變。英美煙公司大罷工前後有兩次，蕭也是以兩種不同的身份介入這兩次工潮，可以說多采多姿。

上海英美煙公司工潮第一次是該公司主動停工，對我政府進行要挾。國民政府財政部於十六年實行統一捲煙稅，頒布捲煙特稅條例，規定捲煙值百抽五十的稅率。英美煙公司初擬抗不認繳，繼恐影響營業前途，願以海關估值為計算單位（相當於市價四分之一）繳納值百抽二十七點五的稅率，財政部不准。乃藉口稅捐過重及煤源缺乏，於十六年七月二十五、二十七日將第一、二兩老廠及第三新廠宣布停工兩月。這種舉動，十足加一暴露了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孔，致三廠工人立時失業者達八千餘人。宣布停工後，復拒絕履行該公司民國十一年自訂的「華人僱員儲金辦法」發給儲金，更使工人生活立刻發生問題。工人曾向公司據理要求，公司延不置答，乃於八月一日在祥生鐵廠附近曠地舉行全體工友大會，到者數千人，除由英美煙公司代表報告被壓迫經過之外，南洋煙草公司工會、祥生鐵工廠工會、日華紗廠工會、天章紙廠工會等代表發言，一致聲援英美煙公司工友。當經通過議案六條，包括請求全國商人團體抵制該廠出品及各界發起募捐以資援助等等，並列舉英美煙廠抵抗國稅、鯨吞儲金，意圖搗亂革命後方，突使工友失業等情由具呈工統會請予轉交涉署向該廠嚴重交涉。

上海市各工會、法團、機關均予切實援助，社會輿論亦一致對英美煙公司嚴厲斥責。最後由該公司大班馬立斯承認復工條件，於八月十五日復工。該公司以停工要挾我政府減低煙稅的企圖，並未達到目的。

英美煙公司並不甘心，雖然復工，但拒不履行復工條件，工人向廠方屢有交涉，均無圓滿結果。九月三十日，該廠主管英人海拿、哈木蘭兩人竟對該廠「葉子間」工友毆打凌辱，更唆使英海軍登陸到廠彈壓，葉子間工人遂首先罷工。葉子間工作既停，其他部份工人因而無法工作，相繼停工。致十月四日，英美煙廠各廠罷工者達萬餘人。十月六日，發出罷工宣言，要求比照南洋煙草公司勞資條件，合理解決。十月中旬，又將英美煙廠工會所訂章程轉送上海交涉署向廠方提出交涉，廠方的答復是「萬難接受」，於是風潮愈形嚴重。

「英美煙廠工會即電呈中央呼籲。國民政府勞工局馬局長（超俊）據報後，即偕該局統計處長兼中央工人部特派員蕭同茲至滬調查真相並就近指導。旋返京向中央及國府報告罷工詳情，並請國府令外交部嚴重交涉，限令資方接受工人條件，以期工潮早息，免生意外。」^⑩

李大超說的「正是英美煙廠大罷工的時候，這是同茲兄和一般同志出力很多。」當時在上海的事情，可能指的是第一次工潮，那時蕭是站在工人隊伍裏。英美煙廠第二次工潮發生在十月間，蕭却是以國民政府勞工局處長兼中央工人部特派員的身份由南京蒞滬「調查真相

並就近指導」，說明蕭的工作崗位有了改變。

蕭是什麼時候到南京去的？是在中國國民黨寧、漢、滬三方面的中央黨部推誠合作，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改組國民政府以後，時間當在十六年九月底以前。據記載：「武漢本黨同志既於七月底起實行清黨，則過去和南京方面誤會的原因已除，雙方意見自然日趨接近，而滬方中央同志以清共的目的已達，應即共商合作。在三方面互相諒解之下，於九月十一日由三方面各派代表若干人在上海舉行第一次正式談話會，議決由寧、漢、滬三方面共同推定若干人組織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由寧、漢、滬三方中央黨部將其職權委託特別委員會行使。特別委員會除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部職權外，並負責統一地方各黨部，及籌備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又議決合併改組寧、漢兩方政府，其方法及人選由特別委員會決定之。繼於十二、十三日又繼續舉行第二、三次正式談話會，推定特別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正式談話會既圓滿結束，於是九月十五日，寧、漢、滬三方全體中委遂齊集南京舉行聯合會議，正式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並改組國民政府，繼又產生軍事委員會。本黨年來分裂的局面，至是復歸統一。」^⑪

國民政府改組，馬超俊出任勞工局長，蕭在勞工局當處長；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馬超俊為中央工人委員會主任委員，蕭亦兼中央工人委員會委員。蕭赴滬調處英美煙廠工潮，是以黨政雙重上級代表資格去執行任務。證以「中國國民黨黨員登記表」所載，蕭曾任「中央工人委員會委員」及「國民政府勞工局政務處長」，中國勞工運動史稱為

「統計處長」，二者孰是孰非，難求確證，但其曾任勞工局處長則無訛誤。^②

為着要多了解一點蕭在上海的活動情形，筆者亦曾訪問李大超先生，除追述英美煙廠工潮的故事以外，李並談及十五、十六年之間廣東和上海的情形。他說：在北伐以前，廣州中央雖然在容共政策大題目之下，沒有和共黨翻臉，但黨內有識之士眼看共黨之恣睢跋扈，侵奪黨權，操縱工農運動，深感不滿。有的敢怒而不敢言，有的要採取行動以與共黨決裂，吳鐵城先生就是屬於後者。十五年，吳鐵老是國民政府參軍兼廣州市黨部常務委員兼廣州市公安局長，他和幾個朋友密商，開列共黨份子一百八十餘人的一張名單，準備在一天晚上，密令軍警按照名單分頭去逮捕這些跨黨份子，以期一網打盡。詎料事機不密，為共黨份子所悉，向我中央提出嚴重抗議，非嚴辦吳某不可。吳鐵老曾因此被拘禁於虎門要塞司令部，不久即行釋放，悄悄的來到上海，同茲與鐵老結識，鐵老之賞識同茲，同茲之敬佩鐵老，就在這時候。李說：還有很多人也都是在此前後到了上海。反共的人聚集於上海一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茲跟大家志同道合，不但是革命的伙伴，也成為知己的朋友，「結合起一股堅強的力量」，其勢殊不可侮。

①上海敵軍被工團包圍繳械，見鄒魯著「中國國民黨史略」第一五七面

②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 第二九〇面

③黎東方：從五四到五卅、七七 「文藝復興」月刊第五十三期第七至八面 中國文

化學院出版

④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略 第一五八至一五九面

⑤李雲漢：孫文主義學會與早期反共運動 中華學報第一卷第一期第二一五面，六十

三年一月出版

⑥同上，第二〇八面

⑦同上，第二〇九面

⑧冷欣：一位高風亮節的知己 在茲集第四一面

⑨李大超：能人賢者 在茲集第四五面

⑩馬超俊：中國勞工運動史 第七二九面

⑪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略 第一六四面

⑫按：上海英美煙公司工潮，延至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始依財政部長宋子文的調解，由廠方代表工會代表、上海特別市黨部、上海市政府代表、江蘇捲煙局長等簽訂互助條件十二條予以解決，公司承認工會及依章繳納稅款。

八、中宣部秘書與啣命出關

蕭同茲十六年夏由上海到南京，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工作，時間很短，因為特別委員會本身就是一個臨時機構，自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宣告成立，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宣告結束，總共只存在三個月又十二天。在成立之際，已公開表明其職權為「受中央黨部之委託，分別行使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之職務，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為止」。並決定：「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十七年一月一日為開會期。」^① 但這個理想並未實現，由於 蔣總司令早於特別委員會成立一個月之前，即已離京返回奉化原籍，軍政失去重心，並為表明不與人爭，於九月二十八日赴日本，至十一月十日始回上海。這時，黨內糾紛迭起，汪兆銘、唐生智等回漢口後，即進行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成立武漢政治分會；李濟琛等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亦在粵成立廣州政治分會，表示不遵守中央特別委員會之決定。張發奎於十月六日通電反對中央特別委員會，主張速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十日，中央特別委員會派代表孫科、伍朝樞及李濟琛的代表等八人與汪兆銘舉行廬山會議後即同赴漢口，與寧、粵代表協商結果，同意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追認特別委員會，迅速恢復中央執監委員會，並規定其職權。後來還是 蔣委員中正邀集汪兆銘、李濟琛到上海共商團結，於十二月四日至十日連續舉行四次四全

大會預備會議，一致通過敦請 蔣委員中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他們才肯赴南京參加四中全會。四中全會於十七年二月二日在南京開幕，至七日閉幕，通過「制止共產黨陰謀案」，發表宣言，並推選蔣中正、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譚延闓為常務委員，尚有四席留待出國同志，推選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 蔣中正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蔣先生出國期間，軍事上亦先後發生唐生智之叛亂與粵變。唐生智是個野心份子，武漢中央名義上雖以汪兆銘為首，而軍權操在唐的手中。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唐即率軍攻佔蕪湖，威脅南京。特別委員會成立後，唐以武漢政治分會名義宣布與國民政府脫離關係，公開造反。國府於十月二十日下令討伐，令李宗仁、程潛率軍西征，節節勝利，唐因前方戰敗，後方軍隊不聽調遣，於十一月十二日通電下野，乘日輪逃往日本。唐部何鍵、劉興、李品仙各軍向湖南退却。廣州方面，張發奎所部黃琪翔軍於十一月十七日乘李濟琛赴滬之虛自香港回粵，收繳桂系軍隊兵械，盡驅桂軍出境，亦欲另立局面。嗣並迎汪於十月廿九日至廣州。這次粵變，使黨內團結發生裂痕，影響在上海召開的預備會議，汪不得不離滬放洋。

南京於十六年十一月廿二日還發生一樁不幸事件。是日，南京各界開討唐勝利慶祝大會，遊行羣眾出會場時與軍隊衝突，雙方開槍，死傷多人，造成「一一、二二復成橋慘案」。在上海舉行預備會議，亦有人提出要追究責任，這也是特別委員會期間的一個波瀾。

而在北京，張作霖於十六年六月自任「陸海空軍大元帥」，組織軍政府，以與南京對抗。孫傳芳自龍潭一役戰敗，整頓殘部固守蚌埠一帶，何應欽督師攻克蚌埠，孫又退守徐州。河南奉軍退至黃河北岸，靳雲鶚所部尚在豫南，與馮玉祥部交戰，張宗昌聚兵十數萬於徐州一帶，沿隴海路而西，亦與馮軍惡戰於蘭封一帶，迭有進退，犧牲重大。閻錫山乘奉軍激戰於河南之際，出兵石家莊，九月開始接戰，十月奉軍反攻，進至石家莊，沿京綏路西進之奉軍復據察哈爾進至包頭，晉軍退守長城，成相峙之勢。

十七年春，蔣總司令親率第一集團軍北伐，以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各當一面，四月開始作戰。第一集團軍進攻魯南，魯西由孫傳芳部據守，戰事激烈，第二集團軍增援，予以擊敗，迭克要邑。五月一日，克復濟南。五月三日，日兵藉口日商被搶，攻擊華兵，發生濟南慘案。北伐大軍仍繼續北進。第二集團軍與奉軍作戰於彰德、大名一帶，頗有傷亡，奉軍以東路不利，向北撤退。第三集團軍進至石家莊。張作霖知力不敵，利用濟案，通電息爭，一致對外，南方不予理會，白崇禧更率第四集團軍北上。張作霖於六月二日通電出關，四日，專車過皇姑屯遇炸重傷而死，這又是日軍的作祟。閻錫山接收平津，並收編敗兵，張宗昌部退守灤東，復向奉軍攻擊，戰敗遣散。張學良繼作霖統治東北，原欲於七月易幟，服從國民政府，而日本兩次干涉，迫而緩期舉辦。十月，張學良奉命為國府委員，十月二十九日東北易幟，改懸青天白日滿地

紅的國旗，於是統一完成。^②

蕭同茲於十六年冬中央特別委員會結束後，中央黨部籌開二屆四中全會，仍在中央黨部工作。十七年二月，中央黨部改組，葉楚傖出任中宣部長，任蕭為中央宣傳部徵集科長，十八年冬，調任秘書。蕭在中宣部工作，為時數年，正是北伐進行順利，光復舊京，完成統一，使他深切認識中國統一的光明前途，也深切了解宣傳工作在統一進行中所負團結任務的重要性。他獲得機會參與黨的宣傳工作之決策定計，且不時奉派赴上海、北平、天津等地與新聞界聯絡，並隨吳鐵城赴東北，為促進國內統一團結，貢獻了他自己的一分力量。

關於蕭在中央宣傳部擔任秘書職務的工作情形，和他同時任秘書的方治知道得最清楚，雖事隔四五十年，一切恍如昨日。現在擔任中國大陸救災總會副理事長的方希孔說：同茲和他都是十六年到南京的，但蕭到中宣部還比他早一點。方治由福建省黨部常委兼宣傳部長奉調到中宣部工作，蕭已經到部。最初兩人都當科長，蕭主徵集科，後來交給傅啓學，傳來臺後任臺大教授；方主編纂科，繼任者為現任國大代表胡天冊。兩人升任秘書，與已故考試委員張廷休及陷在大陸的朱榮光同任秘書，被稱為「中宣部四秘書」。方說如果不認為誇大的話，稱當時的中宣部為「秘書制」亦不為過。南京中宣部由胡漢民先生出任首任部長，時間不長，即由葉楚傖先生繼任並建立規模，楚傖先生出任中央秘書長以後，仍兼長中宣部一個時期，前後歷時五年。與葉在一間辦公室辦公的就只四位秘書。部長的辦公桌是背著窗

橫擺著，在他前面右手面對面擺的兩張辦公桌，是朱榮光與張廷休對坐，左手前面對坐的是蕭與方。部長辦公桌的右首擺設文具櫃，上面擺檔卷，下層是儲存各色各樣的酒，部長的左首有一張小門通譯電室。四位秘書的工作有劃分，朱主管文書與總務，蕭主管與新聞界的聯繫與指導，方主管指導各級黨部的宣傳工作，張主管宣傳品的編纂與出版。工作儘管劃分，遇有重要事情，大家一起商量，然後請示部長作決定。倡導多年的「分工合作」，方治感覺只有在那個時候是真正做到了的。方還盛稱那個時候第二個特點是「政通人和」。楚儉先生是新聞記者出身，沒有半點長官架子，而況他是長者，文章好，學問好，革命經驗豐富，大家與楚儉先生相處，介乎師友之間的關係，都由衷的敬佩他。但是楚儉先生很少事前作什麼指示，總是關照四位秘書商量商量，他只作最後裁決。那時候，北伐仍在進行，國內猶未完全統一，日本軍人在濟南在東北一直敵視中國的統一運動，多方阻撓破壞。十七年發生皇姑屯事件，二十年發生九一八事件，二十一年初發生上海一二八事件。在國內，唐生智、馮玉祥的反反覆覆，又曾爆發十九年的隴海路戰事。「當年新聞傳播，國內通訊零亂複雜，不易徵信；國外通訊取捨由人，無法運用。而且外人在華所辦之通訊社，往往憑其主觀之好惡，作為發佈消息之依據，以致訛傳臆測，莫衷一是，影響視聽，至為重大。」^③ 方治回憶當時的中宣部工作的確非常忙，遇到困難問題也特別多。幸虧楚儉先生指揮若定，從容應付，每星期舉行部務會報，大家公開提意見，有時爭吵得非常厲害，但各人都遵守公私分明的原則，有意見儘量爭，會後仍然保持君子風

度，無害私交，政通人和，水乳交融，形成當時中宣部的風氣。

中宣部四秘書，各人都有一綽號，恰巧四個人來自四個不同省份，在性格上或多或少代表地方性，於是叫朱榮光為「紹興師爺」，張廷休為「貴州苗子」，方為「安徽駱駝」，蕭為「湖南騾子」，彼此叫慣了，都不以為忤。方說，同茲冷靜沉着，很少發騾子脾氣，他又沉默寡言，在會報中大家爭吵時，他也不輕易發言，尤不喜巧言令色，但有時發言，言必中肯，表現他的深謀遠慮。方說：同茲喜歡穿長衫，舉止瀟灑，所以在「蕭三爺」這個名稱還未叫開之前，朋友戲謔，還稱他「少爺」。

方說：同茲的酒量好，很可能是在中宣部訓練出來的。楚儉先生嗜酒，舉世聞名，在上海辦報的時候，一面寫文章，一面舉杯喝酒，他之以酒代茶，老一輩的人都知道，在中宣部自不例外。他右手邊的櫃子裏藏的好酒，在喝酒時，還誘勸大家喝酒：「來，來，來，那位兄弟喝一杯！」起初大家還存點客氣，葉先生給酒才喝，漸漸習慣了，老實不客氣逕自從櫃裏取酒喝。大家工作忙時，中午很少空閒回家吃飯，就在丁家橋的小麵館裏叫麵來吃，吃麵，自然經常喝酒。有一天中午，蕭、張、朱三個人都喝得有點醉意，伏在辦公桌上竟睡着了，只有方治不喝酒，沒有睡。一會兒，葉先生進辦公室，原是出人意料，因為葉已出任中央秘書長仍兼部務，每天只抽空到部處理公務，這天揀着中午到部，見到他的秘書們這付睡相，非但不生氣，還對方治說，不要驚動他們，也不要說他來過了。葉說：「你不知道，

酒喝到微醺，這時正是心境最愉快的時候，你不喝酒，不知道此中境界，不喝酒的人非吾徒也。」

方說：楚儻先生很賞識同茲，因為「同茲兄冷靜沉着，深謀遠慮，每值國內外情勢錯綜複雜之時，特能高瞻遠矚，發揮其獨到主張，作宣傳之指導，貢獻良多。」「楚儻先生因以建議中央，指定同茲兄專任中央社社長，授以全權，並付與足資擴充之經費，使成為獨立機構，力圖發展。終賴同茲兄之展佈長材，得以衝破難關，奠定基礎，並於短短七八年中，業務蒸蒸日上，贏得中外好評，外人所辦之通訊社相率與我中央社成立合作協定。於是進而在世界各國重要城市設立分社，或派通訊專員，藉收通訊交流之功效；國內各報亦在此重大革新之後，一律採用中央社稿為唯一之正確報導。」「凡此一切，端由同茲兄三十餘年所流之血汗，灌溉培植，有以致之。其殊勳懋績，自當在黨史與國史有其光輝記載之一頁。」^④

方治又說：促成中央社之獨立經營，陳果夫先生之功為不可沒。他說，果老於國府定鼎南京以後，極力鼓吹宣傳工作之重要，有三件事必須迎頭趕上外國人：一是通訊社，一是廣播，再就是電影。蕭之出長中央社並促使獨立經營，果老在中央的會議席上是主張最力之一人。^⑤

蕭在中宣部，首次派赴東北之議，是十八年秋冬之間，任務為調查蘇俄為中東鐵路出兵侵略東北真相，以策定宣傳政策，應付俄國人

的狡獪伎倆。蕭這次遠行，還有隨行人員，包括中宣部指導科長梁乃賢，通曉俄文的徐浩以及上海某通訊社攝影記者葉如音，預定計劃是要到前線視察戰地實況並準備拍攝照片，以便將真相向中外揭露。他們第一站到天津，擬出山海關赴東北。但不久中東路事件解決，而馮玉祥在河南叛變，中央電令蕭等不必前往東北，轉往山西工作。蕭與梁乃賢經娘子關深入太原，旋因北平轉遞消息機構有待部屬，蕭即先行赴平，梁則獨留太原搜集機密消息，傳送至北平，由蕭核轉中央。這時太原很重要，因為馮玉祥反叛中央，亟欲與閻錫山勾搭，閻亦有袒馮趨向，但仍保持中立姿態，中央對閻特加優禮，信使往還，不絕於途，閻陽示服從，而陰與馮通款洽。馮玉祥兵退遁入山西，何應欽將軍偕劉健羣處長及時蒞臨太原與閻商善後，請閻諷勸馮玉祥出國以息戰禍。另一方面，有不滿意於中央的中央委員三人亦秘密抵太原醞釀舉行所謂擴大會議，欲推閻為盟主，華北政局數度激變，太原舉足輕重，所獲資料，均極重要。梁乃賢留太原約兩旬，忽接蕭電召返平，謂吳鐵城先生邀約須即赴東北，囑梁同行。經電京請示，覆電調梁赴天津從事另一臨時任務，蕭同茲獨自隨吳鐵老轉赴東北。^⑥

蕭大概與東北有緣，他原來奉派赴東北為調查俄事，沒有去成，結果還是為了宣慰前方將士，應吳鐵城之邀，中央准其隨吳前往東北。所謂俄事，是外交上一件大事，俄國人之欺侮我國，於此表露無遺。蘇俄因不滿意於我中央之清除共黨份子，暗中與馮玉祥勾結冀圖對抗中央，中央宣傳部於十八年五月廿五日曾發表新聞，宣布馮玉祥

勾結蘇俄證據及破壞交通罪狀，這還只有一面；另一面則是在東北直接挑釁，六月間，俄駐哈爾濱領事館為我特區法院搜查，搜獲指使叛亂大宗文件，並捕獲嫌犯俄人三十五人，其為煽動顛覆，罪證確鑿。俄即增兵滿州里附近，張學良並在瀋陽召開對俄會議，議定：改編陸軍，屯兵吉蒙邊界，對俄態度及接收中東路辦法。七月十日，中東路理事長呂榮寰下令接管中東路，撤換俄籍正副局長。十三日，蘇俄以三日為期之最後通牒，同時在俄境大捕華僑，肆行虐待。七月二十三日，我國外交部宣布與俄絕交。上海與北平市民相繼舉行反俄大會。八月十五日，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發出對俄動員令，出兵六萬，增防國境。十六日，俄軍猛攻滿州里，十七日，俄軍犯扎蘭諾爾。廿五日，俄遠東軍總司令白魯傑抵伯力，此人即係前任中國革命軍軍事顧問之加倫將軍。俄人侵採取三面手法，一面以重兵壓境，採軍事進攻，陷我城池，殺我百姓；一面雖與我斷交，仍在柏林與我進行外交談判，迫我就範；再就是採取宣傳攻勢，否認軍事侵華。軍事方面，我軍英勇抵抗，旅進旅退，柏林交涉，我方拒絕俄方所提條件，至於宣傳方面，亦為事實攻破。八月三十日，俄軍以坦克及砲隊犯扎蘭諾爾，攻勢猛烈，英美記者及哈爾濱德國領事適在滿洲里參觀，親見其事，蘇俄屢次否認其軍隊侵華之虛偽宣傳，於是大白於天下。外交部曾派亞洲司司長周龍光赴當地調查，返京過天津時發表談話，指出中俄交涉因馮玉祥之叛亂，俄方遂拒絕談判。交戰五閱月，我軍終告不支，迄十一月十九日，東北抗俄軍旅長韓光第、團長林選青及重要軍官多人陣亡，團長張季英於札蘭諾爾失守時自殺殉國。張學良於十一

月廿六日接受俄方條件，暫時作為地方事件解決，俄軍旋於廿九日撤退。

至於吳鐵城之赴東北也和蕭一樣是臨時改計。十八年冬，中央為羈縻閻錫山，特派閻為海陸空軍副總司令，派吳鐵城監誓，吳之目的地為太原。吳先到北平聽候閻決定就職日期，遲遲未得確切答復。當時閻一面暗與汪兆銘、馮玉祥籌備組織擴大會議，在北平成立偽政府對抗中央，但尚未宣布發動；一面派交際處長潘蓮如到北平表示歡迎吳鐵城入晉。但吳在北平已獲閻有不穩的情報，確知閻不願就副總司令職務。吳當與蕭同茲及張震西共同草擬報告中央電稿，請北平行營主任何成濬代為發出，吳、蕭即由平赴天津，準備南返。旋又奉中央命令，囑往東北宣慰，於是吳、蕭始有東北之行，時間是在十八年冬殘，這是第一次。^⑦

據張震西所撰「吳鐵城先生生平事略」述稱：「民十八，蘇俄來侵，戰端已啓，……冒零下五十度之嚴寒，秉節出關，馳驅於冰天雪地中，……遍至長春、吉林、哈爾濱、扎蘭諾爾、齊齊哈爾、博克圖各地，目覩強鄰侵略，貫我腹心，大好河山，脈絡盡失，乃於歸途演說，大聲疾呼曰：『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當時中外報紙爭相登載，譽為名言。」

第二次吳鐵城、蕭同茲再赴東北，應為十九年春夏之際。同一「事略」記載：「民十九，馮玉祥勾結汪精衛，將謀作亂於北平。」

……中央素知先生與東北人士，信誼相孚，乃以先生代表中央，率同參佐記室數人入瀋，先聲奪人，形勢立轉。……旋又電請張岳軍先生赴遼，共謀戡亂大計，兩賢合作，相得益彰。」

閻錫山之公開背叛中央始於十九年二月十日，他於是電呈蔣主席，高唱「禮讓為國在野負責」等詞，請共同下野。三月三日閻又電請中央開去其本人本兼各職。十五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即接報告，獲知閻錫山決集所部沿平漢、隴海兩路進軍，並准馮玉祥回陝指揮西北軍，且密佈間諜於南京、漢口等處。同日，西北軍鹿鍾麟等五十七將領通電擁護閻錫山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十八日，北平行營衛隊為晉軍繳械，行營被接收，中央在平各機關亦由晉方派員接管。四月一日，閻、馮、李分別通電就任總司令、副總司令職。翌日，陳公博等携「共同宣言」到太原見閻錫山，擁閻主持政治，汪兆銘主持黨務，馮、李主持軍事。六日，趙丕廉代閻電北平謝持、鄒魯、覃振，勸赴太原，並致電在香港之汪兆銘，勸其北上。延至七月下旬，汪始抵北平。而所謂「擴大會議」早已於七月十三日在平出現，並發表「總宣言」。沒有幾天，擴大會議鬧內鬩，派別紛歧，陳公博倡「民主集權」，梁漱溟倡「村治救國」，覃振主張「擁閻治國」，吵嚷不休。汪抵平後，召集各方代表交換黨務意見，於廿五日參與擴大會議，並招待記者。八月七日，擴大會議開第一次會議，發表宣言，十三日，再舉行聯席會議，發表擴大會議之組織大綱。九月十九日，東北軍于學忠部開抵塘沽，二十

日，汪兆銘即離北平，擴大會議移石家莊，廿三日，汪兆銘由石家莊轉赴鄭州晤馮玉祥，擴大會議移太原。但此時閻錫山因無法對抗中央討逆軍的猛烈攻擊，以通電表示下野，擴大會議遂亦草草收場。綜計從出現到沒落，全程只有兩個月零十天，汪兆銘之在北平為時尚不滿一個月。軍事方面，自四月一日閻、馮、李就任總司令、副總司令之日算起，隴海路激戰為時半年，至十月十三日，政府宣布討伐閻、馮軍事結束。

這段期間，張學良表現很好。三月間，即曾電呈 蔣主席，表白心迹，謂對鹿鍾麟等通電擁其為「副總司令」之用意毫無所知。八月十一日，張學良由葫蘆島邀張羣、方本仁到北戴河。廿三日，再邀吳鐵城赴北戴河，北方代表亦在該地，張周旋各方，研究應付時局方針。九月八日，閻錫山電張學良，願以「北平政府」各部長之半數歸張支配，誘其贊助，否則請發表和平通電出任調停，張未予答覆。至九月十八日，即發表「巧電」，擁護中央，十九日，東北軍決定接收平津，閻錫山軍向山西撤退。

吳鐵城、蕭同茲赴東北斡旋時局，穩住了張學良，使其未受汪、閻、馮的蠱惑，其功不可沒。中央的意思還要進一步使張與中央澈底合作，出師討伐叛逆，以鞏固國家的統一。於是，特派任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囑其在駐地就職，就近由關外移師平津，直搗閻錫山盤踞的舊都和所謂擴大會議的根據地。此時閻、馮部隊已盡行開拔至中原戰區，平、津只是閻的後方，兵力單薄，不堪一擊。隴海、平

漢兩線戰事激烈，中央討逆軍力難進迫幽燕，故矚望張學良由關外出兵；而閻錫山所顧慮者亦在此，乃不惜以半數部長職位畀張以資誘賄。張學良態度的抉擇關係全局。中央乃派上海市長張羣持中央派令馳往瀋陽促學良就任，並為就任之監誓人。張與吳、蕭在瀋陽會齊，對學良進行說服工作，終於使其擁護中央，移師平、津，底定大局。

筆者為明瞭蕭同茲在東北工作情形，特於九月下旬訪謁張岳軍先生，請其詳告東北之行對當時大局發生的影響，藉以確認蕭與吳鐵老此後數十年的密切關係和對於國家的貢獻。

岳軍先生健談，對於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說得非常詳細，是一段珍貴的掌故。他從十九年夏說起：

「十九年夏，北方多故，張學良雄據關外，對北方大局居於舉足輕重地位。他如竭誠擁護中央，即可使大局轉危為安，鞏固國家的統一；如與此相反，則北方大局糜爛，可能釀成不可收拾的劇變，戡亂扶危，將斷喪國家元氣。事實上，張當時舉棋未定，答案可能為正，亦可能為負，這真瀕臨治亂的重要關頭。」

此時，瀋陽匯集了各方的說客。馮玉祥的代表為薛篤弼，閻錫山的代表為楊廷輔，都已早在瀋陽，久居不去，似有非爭取張漢卿倒向他們不可。薛篤弼與馮的關係密切大家都知道，而那個楊廷輔，張岳公說：「他還是我們留日的士官同學。」

中央為了穩住張學良，曾先後派遣方本仁（江西省主席）和吳鐵城前往瀋陽安撫，蕭同茲即為鐵城先生的輔弼。鐵老他們雖說穩住了張學良，但張亦未表明竭誠擁戴中央的堅定意志與具體行動。七月間，張岳軍在上海忽然接到中央的電報，令其即日束裝赴瀋陽，不必去南京請訓，有重要文件由外交部王正廷携來面交，當晚夜半來滬。岳軍先生說：「王儒堂第二天一大早就來找我，當面交給我兩個文件：一件是特派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派令，另一件是派我為張學良宣誓就職的監誓人的派令。」那天是星期六，既然奉指示不必去南京，便不能乘津浦車北上，只有買船票循海程赴津。又因為是週末，銀行下午休業，取不到錢，就找中國銀行的負責人商量如何可以取款，說妥由上海中國銀行電知東北分行，隨時可取款支用。岳公說：「我就這樣匆匆忙忙於七月廿六日啟程赴東北，廿九日到了瀋陽，張漢卿和鐵老他們都到車站接我。並同鐵老在東北逗留了一百多天，總算達成了任務。」

張岳軍到了東北，閻、馮他們很緊張。張儘管是中央特使，函電仍然暗中有人檢查，從中國銀行的電報中知道張岳軍可隨時取款支用，閻、馮方面便製造空氣說，張岳軍他們將以鉅款收攬東北將領。瀋陽的政治空氣既是如此混雜，張岳公與吳鐵老就約張學良到外面去旅行，留蕭同茲在瀋陽跟張漢卿的高級幕僚週旋。旅行的目的地是北戴河。這次旅行在北戴河足足逗留三個星期。張漢卿住在行館，張岳公住在海軍公所，吳鐵老和夫人權寓停在車站一列專車的臥車裏面。

三個人每天要見面，見面不能老是一股正經八百翻來覆去談政治問題，還是張學良提議不如每天玩幾圈「衛生麻將」。岳公、鐵老自欣然接受。局面就這樣湊和：張漢卿、張岳公、鐵老和夫人，四人入席。張漢卿那時還有嗜好，晚間才是白天，衛生麻將總在晚餐後開始，當然決不是專心壹志打麻將，有時歇歇吃喝點什麼，有時張漢卿還要離席去紮針。停停歇歇，打打談談，大家比較無拘束，也在輕鬆談話中彼此表達一些意向。張岳公說：「張漢卿雖然不明確表示什麼，但却將瀋陽方面，閻、馮的代表每天活動情形全盤告訴我們。」這樣打牌，從黑夜打到天明總共只打八圈，其速度之慢，恐怕是破紀錄的。天天如此，沒有間歇，連續三個星期，天天熬夜，八圈打完，天也亮了。岳公回海軍公所，鐵老佻儷回到停在站上的專車。俾晝作夜，白天才得到休息。這那裏是「衛生麻將」，是純粹的「政治麻將」，「陪公子讀書」。岳公說：「這是我生平僅有的經驗，至今回想，印象還非常深刻。」

在東北期間，張岳軍與吳鐵城還去過一次山海關參與公審。山海關是于學忠部的駐地。于部有一位旅長，名陳星樞，是革命黨老黨員，總統蔣公與張岳軍從日本士官學校回國，一行三人，其中就有陳星樞。這時因張岳軍到了東北，于學忠得到情報，說是陳星樞暗中與張有往來，準備在山海關發動叛變，因將陳逮捕，並請張、吳參與公審，審訊結束，查不出證據，這件公案也就結了。

張學良最初是意存觀望，經過百多天，張、吳諄諄曉以大義，再

默察大勢，感覺到馮、閻這種作法，仍無異於軍閥時代的縱橫捭闔，只會造成天下大亂，決非國家之福。仍毅然決然摒棄馮、閻，於九月十八日發表「巧電」，通電全國，擁護中央，十九日即宣布接收平津，閻軍立向山西撤退。十月九日，張學良在瀋陽宣誓就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由張羣監誓。張、吳、蕭等以任務完成，於十月二日離瀋陽南返。

談到蕭同茲在瀋陽工作的情形，張岳軍說：「蕭那時年輕，風流瀟灑，跟張漢卿左右的人混得很熟，處理很好，酒食徵逐，跟他們的生活打成一片，這有助於縮短距離，建立友誼關係，使整體工作進行順利。」^⑧

吳鐵老的長公子幼林也曾提到這一點，他說：「但在和張漢卿先生週旋應付之間，杯酒言笑之頃，這位倜儻朗爽、風情俊逸的蕭三爺，必然也發揮他縱橫的才氣，有助先德達成游說東北歸順中央的艱鉅任務。」^⑨

問到蕭去東北究竟是一次還是兩次，張岳公說：「我所知道的是這一次，在這以前或以後是否去過，我就不清楚了。」

事實上是兩次。一般傳說東北易幟是由吳鐵城與蕭同茲前往游說成功的，與事實不符。東北易幟在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當皇姑屯被炸以後。皇姑屯事件發生於十七年六月四日，日本人雖然矢口不承認，但經事實查證，確是日本的陰謀。張學良於十七日出關回

到奉天，以「少帥」地位接管東北的軍政大權，他深知日人之不可恃，表面上宣告「停止軍事，休養生息」，却派代表邢士廉入關向中央輸誠，歸順國民政府。八月一日，邢士廉達成任務，與王樹翰由津回奉，蔣總司令派方本仁為代表與邢等同行。惟在七月間，日本已獲知張學良之動向，日駐奉天領事十九日即向張學良面遞警告書，反對東三省服從國民政府及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張允考慮後再答復。八月十二日，日本田中內閣派往奉天之代表林權助，以明日即將回國，訪張學良作最後會晤，再對張提出警告，張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之實行可以暫緩。八月二十八日，蔣總司令在滬接見張學良代表邢士廉，邢報告東三省決服從國民政府，惟待外交有辦法即實行易幟。十月十七日，張學良再派代表胡若愚抵南京。十一月十日，邢士廉、王樹翰繼至南京，蔣主席於十二月一日召見邢、王，談東三省易幟及熱河改組等事，二日再度召見，一切均作成具體決定，至是月廿九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聯名通電，宣布奉、吉、黑、熱四省改懸國旗，服從國民政府，遵守三民主義，全國統一，於是告成。這個時候，吳鐵城正奉中央派為迎接總理靈櫬專員由京北上，於二十三日抵達北平，忙於移靈奉安等事，自不及前往奉天。東北易幟的事與吳鐵城、蕭同茲無關。

二十年，張學良移駐北平，「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學良仍在北平。此後東北局面惡化，張即長駐關內，中央自無派遣特使赴東北之必要。以此，吳鐵城與蕭同茲之奉派出關，計為十八年冬一次，十

九年夏又一次，共為兩次。

①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 第三七四面

②以上紀述，根據：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冊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略

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等書，綜合撰寫

③方治：冷靜沉着，深謀遠慮 在茲集第一七面

④同上

⑤六十三年八月十七日訪方希孔先生於中國大陸救災總會

⑥六十三年六月廿九日訪梁乃賢先生於其寓所

⑦關棠：蕭三哥軼事 在茲集第二四五面

⑧筆者訪問張岳軍先生，另撰專稿刊載於傳記文學六十三年十一月號

⑨吳幼林：東北易幟與同茲先生 在茲集第四三面

九、中央社發展的時代背景

蕭同茲於民國二十一年接長中央社以後對中央社有貢獻；中央社的發展對於中國新聞事業有貢獻，這是世界輿論所公認的。綜其貢獻，可以用兩句話予以概括：一是將中國新聞事業從次殖民地的地位挽救出來，完成了中國新聞事業的獨立、自由與自立；一是建立國家通訊社的規模，平等普遍供應國內外新聞，提高了全國各地報紙的新聞水準，促進中國新聞事業的現代化。

從滿清末年到 蔣總統北伐統一以前，中國被列強侵凌，不但政治、軍事、財政、經濟各方面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淪為帝國主義的次殖民地，新聞事業亦長久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

按照現代新聞事業發展的軌迹，新聞通訊事業不甚發達的國家依賴國際大通訊社供給國際新聞是合乎規律的，由一個國家某一通訊社與另一國家某一通訊社訂立合約交換新聞也合乎規律，但各國國內新聞不能由外國通訊社干預。假定外國有這麼一家通訊社在英國重要城市遍設分社，發佈英國各地的新聞供給英國各地報紙採用，英國報紙決不容許，也決不會採用它所供給的英國新聞。這不但不合規律，而且違反常識，被視為滑稽之事。

然而這種事偏偏在中國發生，且維持六十餘年的歷史。從英國路

透社於一八七二年（前清同治十一年）在上海設立分社開其端，法國哈瓦斯社、美國的合眾社暨日本的東方、日聯社等繼其緒，紛紛在華設立分社。初尚僅限於採訪中國新聞發往世界各地，繼之則在我國重要城市逕行發稿，將在我國採訪所得的新聞暨國際新聞供給我國報紙採用。我國報紙由於本身採訪與蒐集新聞的條件並不充分具備，更由於局勢一直動盪不停，本國記者不及外國記者採訪的便利，軍閥可以槍斃中國記者，却任令外國記者出入戰地，自由採訪、自由報導而不敢加以干涉。外國記者都是帶着有色眼鏡甚至以鄙蔑態度報導我國新聞，然而我國報紙仍不能不飲鴆止渴採用外國通訊社的新聞稿件。

這情形早為我國報界所不滿。民國九年五月五日，廣州七十二行商報、新聞民報發起組成的「全國報界聯合會」舉行第二屆年會於廣州，參加報社、通訊社一百二十家，其十四項重要決議案中即有一項痛陳當時的畸形狀態，決議文稱：「吾國報紙，歐美情勢及外交消息，類皆取材外電。彼多以己國之利害計，含有宣傳煽惑作用，故常有顛倒是非變亂真偽之舉。抄載稍一不慎，鮮不墮其術中。而各國通訊社在吾國者，其數又多，多本其主旨，任意散佈，指鹿為馬，出主入奴，混淆龐雜，取信無從。報紙之評論，既難期中鵠，閱者之從違，自旁皇莫定。」因此決議自行創立一通訊社。這是有遠見的呼籲，可惜這個報業團體第二年即宣告解散，決議案遂亦付諸流水。

蕭同茲對此有切身之感，他說：「全國報紙不獨國際消息，須依賴外國通訊社傳達，即國內消息亦多由外國通訊社供給，致發生許多

不合理之現象。」^①

關於外國通訊社壟斷中國新聞，英國的路透社最具代表性：「自一八七二年路透社在上海設立分社後，該社獨霸我國新聞市場，計有六十餘年之久。民國以後，雖亦有其他通訊社誕生，但就規模與影響力而言，均難望其項背。在此期間，國人所得之國際新聞，甚至大部份國內新聞，均係來自路透社；同時其他國家，欲知中國消息，亦非求於路透社不可。因之，路透社對內操縱了我國的輿論與命脈，對外無形成為中國的代言人。」^② 外國通訊社成為中國的代言人多麼可恥，路透社却引以自豪，該社董事長瓊斯（Sir Roderick Jones）說：「上海棉花市場向由路透社供給行情，曾經有一天因海電發生故障，股票商與實業家不能從他處得到消息，竟停市二十四小時。」中國總理顏惠慶也曾對瓊斯說：「最近二、三十年來，路透社消息完全存案，外交部與使館方面是常常引證的。」^③ 這是可悲的現實。路透社壟斷市場，戴傳賢有親身經驗：「昔時賢在上海時，曾訂閱路透社經濟電報，每月六百餘兩，然當時各報訂購普通政治電報（即現在每日報紙所記載之電報通信）其價尚不及百兩也。」^④ 清末民初使用紋銀，六百兩紋銀足夠買一所普通住宅，一個月的稿費即需六百兩，其索價之高殊足駭人聽聞。

路透社獨霸中國新聞市場是有來由的，須從世界性通訊社的發展說起。世界上第一個通訊社成立於一八三五年，就是法國的哈瓦斯社（Agence Havas）。哈瓦斯在法國革命終結之時，從葡萄牙老家前往

法國，十九世紀初，歐洲各國報紙，已有漸漸成為廉價普遍讀物的趨勢，其內容由原先的側重論說，轉變到新聞報導佔更多篇幅和更重要地位，哈瓦斯看清了新聞專業化的可能性，於一八二五年在巴黎組織一個新聞供應社。最初的訂戶都是些私人，各報概予拒絕。但哈瓦斯並不灰心，收買另一家新聞供應社，擴充改組，於一八三五年正式成立哈瓦斯通訊社。報紙漸漸採用它的外國新聞，到一八四〇年時，哈瓦斯社在法國實已成為外國新聞的獨佔者。在哈瓦斯社做過翻譯助手的德國人路透看準了倫敦是歐洲的金融中心，赴英歸化英籍，於一八五一年成立路透社，最初的電訊僅限於商業消息，訂戶也多半是銀行家和證券交易經紀人，嗣後路透社駐在歐陸各地記者逐漸採集政治及外交消息，掙扎了七年，才為倫敦報紙採用。哈瓦斯社的另一位職員也是德國人，名叫華爾夫（Bernard Wolff），於一八四九年在德國創辦了第一個通訊社即名華爾夫社，它的成立比路透社還早兩年。華爾夫社開始時也只發證券交易行情等商業消息，一八五五年始供給一般新聞。嗣後發展，將業務擴展到東歐、北歐各國，與哈瓦斯、路透並駕齊驅成為歐洲通訊事業的三雄。

這位路透先生於一八五六年向哈瓦斯及華爾夫兩人建議三社締結合同交換股票行情，實行後三方面都感滿意，以後又增加了新聞交換的合作。一八七〇年歐洲三社又和美國的紐約聯合社，談判成功四邊協定。協定的重要內容，把整個世界劃成特定的業務區域，在每個區域中，由四家通訊社中的一家獨佔該區域的新聞採訪和發佈。採集的

新聞互相交換，而在它的勢力範圍以外，不得直接徵收訂戶。四社的區域劃分是這樣的：

哈瓦斯社：法國、瑞士、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埃及（與路透分享）、中美及南美各國。

路透社：英帝國及其屬地，土耳其、遠東各國。

華爾夫社：德國、奧國、荷蘭、斯堪的納維亞各國、俄國、巴爾幹半島各國。

紐約聯合社：美國。

這才明瞭路透社之所以獨佔中國新聞市場的原因。分割地盤，控制新聞報導和發佈，不僅違背了自由競爭的原則，而壟斷和獨佔，抑且妨礙了後世各民主國家所崇尚的新聞自由。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無線電在通訊事業普遍採用，而美國新興通訊社的競爭，如芝加哥的美聯社、紐約的合眾社與國際社的興起，紛紛起來打破新聞的壟斷，這個四邊協定遂日漸衰弱，且亦時遭破壞，到一九三四年終於完全廢棄。

打破新聞壟斷需要勇氣。美國史克利浦斯先生為他的報系不受美聯社的壟斷於一九〇七年創立合眾社時曾說：「創辦新的合眾社，史克利浦斯報系的報紙增加了支出，如果它們做了美聯社會員，每年可節省數十萬美元。我以為這種投資，在財政上雖是增加負擔，但在另

一方面是大有益處的，因為保障了史克利浦斯系以及全國報紙，避免了新聞來源被人獨佔和壟斷的企圖。」^⑤

合眾社既已在國內打破了美聯社的獨佔，乃繼續向國際發展，衝破國際的獨佔。一九〇七年，它和英國交換電訊社成立合約，向歐洲報紙發佈合眾社新聞，一九〇九年對日本電報通訊社（簡稱電通社）供應電訊新聞，一九一八年供應了法國報紙的電訊，一九一六年與澳洲聯合社交換新聞，一九二一年開始對德國報紙直接供應新聞，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開始打進了中國新聞市場，北京和天津也有報紙成為合眾社的直接訂戶，後來繼續開展業務，在上海成立分社，擴大供應中國報紙的新聞。

美聯社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商得路透社的同意，准許它在日本及中國推廣業務。哈瓦斯社亦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在我國設立分社。

日本現代通訊事業的發展遠較歐美為遲，一九〇一年光永星郎創辦電通社，是為日本現代通訊社的開始。一九一四年樺山愛輔創辦國際通訊社。^⑥ 該社取得路透社在日本之獨佔發稿權。同年，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日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成立東方通訊社，此為日人在我國設立通訊社之始，該社以搜集中國消息及宣傳東亞主義為目的。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日本名記者田代參加巴黎和會，對英國路透社與美國合眾社在和會中的表現，嘆為觀止。返東京後，即向外

務省提出建議，認為：「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對於日本政府有關生命的重要，如果要在中國表示東京的意見，就必須在中國組織特殊的通訊社，以實現此目的。」^⑦ 這項建議，立即得到認可。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日本派田代前來上海，對東方通訊社十分讚賞，遂協議將東方通訊社改為外務省在華的官方通訊社，並對中國報紙正式發稿，以表示日本政府的對華意見。其時，我國正值軍閥割據時代，全國四分五裂。日本通訊社居中製造謠言，挑撥離間，對我國近代政治、經濟、社會之惡劣影響，實在難以估計。

日本政府對在華組織之東方通訊社成功後，進而擬在國內組織一個強大的國家通訊社，以期在國際間代表日本。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五月一日，日本政府將在國內代表財閥的國際通訊社，併於東方通訊社，易名為日本新聞聯合社（簡稱日聯社），但在中國仍以東方社名義對中文報紙發稿，直至民國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始將在華之東方社改組為日聯分社。這時，日本已擁有兩家全國性通訊社，除了日聯社外，尚有最早成立民營的電通社。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日本發生「二二六」事變後，日本軍閥仍強行將電通社併入日聯社，合組為同盟社。在華之日聯分社亦隨之改為同盟分社。翌年，七七事變發生，同盟社橫行我國淪陷區，並設立三個分社，即北平的華中通訊社，上海的中華聯合新聞社以及在東北的滿州通訊社，直至抗戰勝利為止。

外國通訊社之在我國享有中文發稿權，除日本的東方社一開始就

在上海發中文稿之外，其他通訊社最初仍只發英文稿，逐漸才發中文稿的。路透社雖在上海設立分社最早，但開始只向上海英文字林西報單獨一家發英文稿，至一九〇〇年上海四家英文報始普遍獲得路透電訊的供應。向中文報發稿開始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中文報的國際新聞，始與英文報同日刊出，一開始即獲十八家中文報為訂戶。路透社遠東區分社設於上海，並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漢口、濱江及香港設立七個分社。每日向當地報紙供給新聞。路透社遠東區總經理以張士樂（C.J. Chancellor）任職最久。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華，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赴南美考察，一九四一年出任路透社總經理。張士樂在華旅居二十年，與中國新聞界相處至為友善，曾目覩中央社的發展，與蕭同茲從收回路透社在華發稿權交涉時起過從甚密，漸次成為老友。二次大戰期間，中英成為盟邦，張士樂以路透社總經理的地位與蕭函電往還尤為密切。

哈瓦斯社在中國活動開始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當時該社將駐莫斯科的記者黃德樂（Jean Footenov）調至上海，負責採集中國政治、經濟新聞，但不發稿。民國十八年冬（一九二九年），哈瓦斯在西貢收買越南太平洋通訊社加以擴充，仍以太平洋通訊社在上海、香港、北平、濱江四地設置特派員，除採集新聞外，每天向當地報紙發稿一千二百字。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十月，正式成立上海分社，由包爾德（Henry Barde）主持。自此以後，哈瓦斯社即在我國正式發稿。

美國合眾社於民國十八年三月正式在上海成立分社。除為總社採集新聞外，並向上海各報發稿，其方式：中文稿由國民新聞社代發；英文稿由當地報紙出高價購買，均非普遍發稿。民國十九年，上海英文字林西報為爭取美僑讀者，特以每月規銀一千兩購買合眾社英文電訊，此為合眾社在我國第一次發英文稿。此後，英文大陸報及大美晚報亦相繼訂購。^⑧ 合眾社設有遠東總經理，綜攬該社在中國、日本、菲律賓、香港等地之一切業務。最初，總經理駐東京，後遷上海。大陸淪陷後，再遷東京。

前面提到日本名記者田代參加巴黎和會，對英國路透社與美國合眾社在和會中的表現嘆為觀止，回國後向外務省建議：「如果要在中國表示東京的意見，就必須在中國組織特殊的通訊社。」後來產生了專為日本在中國發言的東方通訊社。同時，中國有位名記者胡霖也參加了巴黎和會，回來也深有所感。胡霖自述：「當一九一八年歐戰將完的時候，我正在天津編大公報。巴黎和會開會之後，我就以代表報館的名義到歐洲參加和會。和會裏路透公司的記者最多，速記差不多五分鐘換一次人，記好後更依次由該公司記者傳出，當時就由自己裝設之海底電報發出，其傳達消息之迅速，實屬驚人。我目睹這種情形，非常感動，回國之後，不久即辭去報館職務，在上海創辦國聞通訊社。」^⑨ 胡霖創辦國聞通訊社的動機雖然也由於參加巴黎和會而起，但其目的則與田代針鋒相對，要為中國的統一與謀求新聞事業之改進而有所貢獻。他在國聞通訊社緣起及簡章中說：「中國因報館組

織不完全之故，報導歧出，真相難明。同在一國，而南北之精神隔絕；同在一地，而甲乙之所傳各別。吾人欲謀新聞事業之改進，舍革新通訊機關殆別無他道。同人創立茲社，志趣在此。將本積年之經驗，訪真確之消息，以社會服務之熱忱，助海內同志之宏業。」^⑩ 國聞通訊社於民國十年在上海創辦，最初僅限郵寄，自十四年增加以電報傳播新聞。十五年六月胡霖與吳鼎昌、張季鸞接辦天津大公報，國聞社總社遷移天津，成為北方通訊社的巨擘，至二十六年五月一日於蕭同茲接辦中央社整整五週年之日宣告停辦。

中央社未改組以前，國人創辦具有規模的通訊社除國聞社外尚有申時電訊社，名為申時，源於十三年上海申報及時事新報兩報編輯部同仁，於兩報報名取其第一字共同組織成立。初不過於工作之暇，就兩報所得各方專電，撮要編譯，拍發給外埠數家有關係的報社應用。外埠報紙，沒有專電，沒有國際電訊，得到申時電訊社的綜合供應，的確可以滿足其如饑似渴的需求，因此試辦數年後，深得各地報業歡迎，隨之紛紛訂稿。^⑪ 後兩館同仁因無暇兼顧，乃於十七年厘訂組織，擴充資本，另聘專任職員，分別編發中英文電訊，業務基礎，始克奠定，與國內外報社簽約供稿者達一百一十餘家。每日收發電訊達六萬餘字。廿三年二月正式成立公司，（蕭同茲曾參加投資，當選為該公司董事。）在京、津、漢、港設立分社，成為民國以來基礎穩固、發展迅速的民營通訊社。^⑫ 廿六年抗戰軍興，申時電訊社始宣告結束。^⑬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外交部亦曾在上海設立國民通訊社，目的為加強國際宣傳，補救外國記者所發消息之錯誤與遺漏。國民通訊社成立於民國十六年，後又易名為國民新聞社。十八年與美國合眾社及德國海通社訂立合約，以我國國內要聞譯稿，交換該兩社的美歐新聞，供國內報社之用。此為我國通訊社與外國通訊社交換新聞之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該社與海通社合組國民海通社在南京發稿。國民新聞社及國民海通社均於抗戰開始時停辦。

中華民國的命運由於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統一，從軍閥混戰中挽救出來，中國的統一阻止了列強帝國主義在華既得利益的發展，並進而作取消列強在華不平等條約的努力，這是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不願意的。他們絕不願意出現一個統一強盛的中國，不但不收斂新聞侵略的瓜牙，反而變本加厲強化造謠滋事的勾當。民國二十三年，上海申時電訊社創立十週年，出版「十年」紀念刊，該社負責人米星如對外國記者的可恥行為，曾作沉痛的描述。他說：「翻雲覆雨、顛倒黑白的帝國主義者新聞宣傳機構，為了他們所代表的股東、政府和民族的利益，怎肯放鬆我們這種懦弱的而又啞口可欺的國家？……他們是不絕的利用了通信事業，不惜翻雲覆雨、顛倒黑白的去誣衊、矇騙、離間、煽動，從新聞消息上實行著縱橫捭闔的手段，完成其侵略的目的。我們不但無以應付，並且無以拒絕其有毒的宣傳，借了我們的報紙，而深入於我國人的腦髓！五卅的濺血，偏指為鎮壓共黨暴動的奇勛；五三的砲聲，偏認做保僑自衛的政策；乃至東

北事變，淞滬戰爭，亦無不具有其『正當』的理由，措其振振之詞，掩蔽其殘暴的野心和行為，想以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平時復以種種挑撥的手法，造成我國國內的分崩與離析，減少我國國民的自信心，乃至驚惶駭怪，不投入其機巧的陷阱不止。」^⑭

國民政府決不似北洋政府之懦弱而可欺，亦決不容許外國通訊社在我國國土以內之橫行無忌。民國二十年四月，政府對日本新聞聯合社（日聯社）之一再造謠，忍無可忍，下令全國各地電報局，一律停止收發該社電報和長途電話，並停止傳遞。該社記者佐佐木，以「日本記者團」名義發表宣言，要求日政府交涉。我外交部情報司幫辦吳天放發表談話，說明政府處理這件事的經過，並且一一列舉該社造謠的事實，中央社且發出一篇該社造謠帳的統計。^⑮ 這時啞口無言的是日聯社。

綜上所述，當可明瞭在中央社未改組以前我國新聞事業的情況：

第一，長久以來，我國新聞事業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任令外國通訊社在我國領土以內，傳播我國新聞，翻雲覆雨，顛倒黑白；而滿清及北洋政府懼外、媚外，對本國記者可橫施壓迫，外國記者別蒙青睞，我各地報紙採用外國通訊社消息反較「安全」，更助長外國記者之橫行無忌。收回外國通訊社在華之發稿權有其迫切需要。

第二，我國報館組織不健全，報導歧出，真相難明。同在一國，而南北之精神隔絕；同在一地，而甲乙之所傳各別。吾人欲謀新聞事

業之改進，舍革新通訊機關殆別無他道。國家需要統一，設立一個強大的國家通訊社有其迫切需要。

第三，我國報館，除大都市少數幾家設置各地通信員拍發專電之外，其餘全賴剪刀漿糊剪貼大都市報紙以填充新聞版面。申時電訊社小試其技，於工作之暇以兩報電訊供應外地報紙，供稿報館訂戶即達一百十餘家，並在南京、天津、漢口、香港等地設立分社。為滿足各地報紙如饑似渴的新聞要求，廉價普遍供應國內外新聞，設立國家通訊社又有其迫切需要。

第四，國家統一了，中國政府對於國際事務有其一定的立場，外交折衝有其一定的態度，這立場和態度須隨時向世界表明，使世界人士對我有正確認識，不致被野心國家顛倒黑白淆亂聽聞，尤其迫切需要一個國家通訊社。

客觀的要求是如此迫切，但主觀的條件並不具備。國聞通訊社的成立是有這個抱負的，但力量畢竟有限，提供的電訊不多，供稿的報紙亦不多。申時電訊社的規模與氣魄比較雄厚，但也不能涵蓋與滿足上述四個要求。國民新聞社在對外宣傳上固已克盡其貢獻，但亦僅限於這一部份，並不能照顧其他方面。這三家通訊社只能稱為中國現代通訊事業的先驅者，都沒有達成國家通訊社的願望與目的。

中央社成立於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地點在廣州，主辦者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雖然在成立的通告中賦予中央社的任

務為：「凡關於中央及各地黨務消息，暨社會、經濟、政治、外交，軍事以及東西各國最新之要聞足供我國建設之參考者，靡不為精確之調查，系統之紀述，以介紹於國人。」但也僅只表示一種願望，並無具體的實施步驟，也並未設置採訪記者，只「規定各地黨部及黨員均有供給新聞資料之義務。」嚴格的說，它還未構成新聞專業的條件，只是由各地黨部與黨員有供給新聞的「義務」而已；由各地黨部義務供給的消息即使非常熱心，亦僅限於黨務消息而已。「中央社在成立之初，規模即是異常狹小，社址設在廣州越秀南路五十三號中央黨部內，工作人員不過數人，新聞報導的業務也很簡單。」^{①⑥}

民國十五年七月 蔣總司令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革命軍每攻克一地，中央社隨軍記者立即以急電報告廣州總社，並用隨身攜帶的油印機，按日印發軍報。從此，中央社一方面在中國新聞史上，開創了隨軍報導戰事新聞的新紀錄；另一方面，它的報導範圍，也由廣東一省而逐漸地推展。」^{①⑦}

十五年十月，一部份國民黨中央委員決定以武漢為首都，中央社的招牌也在武漢的中央黨部內掛起來，武漢的中央宣傳部長為顧孟餘，中央社主任為朱一鶚。當時在中央社工作而現時仍在臺灣的恐怕只剩下英文中國日報的發行人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羅學濂一個人了。羅是北京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在校時即已參加國民黨，從事學生運動著名的領導人之一，成為北京衛戍司令鹿鐘麟計劃逮捕的搗亂份子之一。就在畢業的那天晚上，校長司徒雷登找他去，告訴他：「我

得消息，衛戍部將逮捕你，我已經叫人將你宿舍房門上的名牌拿掉，你趕快逃吧！」羅就這樣繞道出城直奔武漢，到達漢口時，身上只剩兩毛錢。在武漢，他只認識一個孫伏園，孫在武漢中央日報編副刊，介紹他給朱一鶚，朱就安頓他在中央社工作。羅說，中央社設在中央黨部內，工作人員共只四人，他的工作是翻譯外電。每天發稿，仍以中央黨部的文告、宣言、通電及黨務消息居多。^⑱

「可是，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國民黨中央即於五月初決定，將中央社由廣州遷至南京，而於五月六日開始發稿。當時社址設在成賢街沙塘園中央黨部內，工作人員十餘人。同年九月，又隨中央黨部遷至丁家橋，工作人員增加到二十五人。」^⑲ 中央社遷至南京，正是「寧漢分裂」之時，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武漢方面才通過制裁共黨的決議案，逐走蘇俄顧問鮑羅廷，並於同月二十日發表分共宣言，實行寧漢合作，結束武漢的中央黨部。在合作以前，武漢的中央社還在發稿，而南京的中央社又於五月六日起開始發稿，可能有一個短時期是重疊發稿，而是站在兩個不同的立場。中央社在南京發稿，「第一天第一篇社稿為胡漢民先生所撰，標題是『共黨挾持下的武漢政府』，足徵當時的中央社，即以揭發共匪陰謀，展開反共鬪爭作為主要的任務之一。」^⑳

中央社十六年開始在南京發稿以後，蕭同茲即已幕後介入中央社的策劃工作。中央社直屬中央宣傳部，蕭為中宣部主管新聞宣傳的祕書，中央社附設於中央黨部以內，因應客觀需求，促進中央社發展為

全國性的國家通訊社的要求，蕭的感受自然比任何人更為深切，凡所獻替，自必以此為目標。事實上，中央社經過尹述賢、王啓江、余唯一前後幾屆負責人的主持，社務已經逐有開展，除總社採行採訪與編輯的分工，加強採訪戰地新聞，增加發稿次數外，並曾先後設立武漢分社、北平分社及上海電訊處等分支機構，由各地電報局有線電報傳送電訊。更重要的是於民國二十年十月，即開始先後與英國路透社、美國美聯社、法國哈瓦斯社、俄國塔斯社簽訂交換新聞合約，收回各該通訊社在我國發行中文通訊稿的權利。此事記載於「中國通訊社大事紀」，^⑳ 但交換新聞，收回中文稿的發稿權利，中央社並無足夠的設置與配備以傳遞交換得來的新聞，再如翻譯各外國通訊社的外文電訊為中文並供給各地報紙，當時的中央社恐怕力難從心。所謂收回，大概僅是法理上的權益，而未曾進入實際的作業階段。

曾任上海申報駐南京記者的沈九香對中央社有這樣的描述：「由於當時的人手不多和電訊設備的不夠，發出去的電訊，因時間遲緩，很少為上海各報所採用。那時上海各報在南京都設有辦事處一類的機構，普遍訂有中央社的社稿，每天晚上，中央社的稿子一到，我們便把其中沒有採訪到的而比較重要的新聞，改頭換面，利用長途電話報到上海。第二天，我們發出去的登了出來，中央社發的反而隻字沒有。這類情形，在我的記憶中似乎延續很久。後來，蕭同茲先生接長中央社，擴大人事，增加設備，業務蒸蒸日上，電訊的播發也一改舊觀，我們這類改頭換面的辦法，也就從此不能再用。」^㉑

大凡一個事業的發展與成就具有客觀與主觀的各種因素，一個人主持這個事業如能因應客觀環境而不忽略其中任何一個因素，再加上主觀的判斷，決定發展方針，不錯過任何一個努力的機會，不輕視任何一個成員所作的貢獻，匯成集體智慧而為集體創造，必能蔚成事業的成就與個人之得享盛名。在本章中，詳為縷述外國通訊社在我國之橫行霸道以及中國新聞事業之落後狀況，主要為指陳一個國家通訊社對我國是如何迫切需要，而這又不是任何私人企業所可達成，很自然的要將這個責任置於像中央社這樣機構的身上。然而中央社從民國十三年創立以迄二十一年改組的八年時間以內，那樣的規模和那樣的操作方式，如不改絃易轍，不可能達成此一大責重任。蕭同茲乘時崛起，從勞工運動中養成的大眾觀念及在中宣部長期與新聞界接觸獲致的對新聞事業全貌的認識與體驗，接長中央社，他得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一個國家通訊社的形象正在向他招手，只等待他去塑造。為追逐這個形象，使他勇氣百倍，沒有鬆弛任何一分努力，終於被他捉住了。這以後的一切發展都是循乎自然，並不是什麼奇蹟。

①蕭同茲：要完成現代化通訊社我們需要更大的努力 二十週年特刊 上輯第一面

②曾虛白：中國新聞史 下冊第五七一面

③黃天鵬：新聞學名論集 第七七面

④戴傳賢：致蕭同茲函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⑤王家楫：各國通訊事業的演進 第七一至九〇面

⑥李瞻：世界新聞史 第六八章第八八一面

- ⑦胡道靜：新聞史上的新時代 第五六、五七面
- ⑧曾虛白：中國新聞史 下冊第五六九面
- ⑨胡道靜：新聞史上的新時代 第五七面
- ⑩戈公振：中國報學史 第二五六面
- ⑪黃天鵬：中國新聞事業大事記 報學一卷三期第一三七面
- ⑫曾虛白：中國新聞史 下冊第五七五至五七七面
- ⑬沈宗琳：中國通訊事業發展的軌跡 通訊社及其業務下篇第一二九面
- ⑭任白濤：國際通訊的機構及其作用 第七二面
- ⑮朱傳譽：中國民意與新聞自由發展史 第四七面
- ⑯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十一月編印 第二五面
- ⑰同上
- ⑱六十三年九月十二日走訪羅學濂先生筆錄
- ⑲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十一月編印 第二六面
- ⑳同上 第二七面
- ㉑同上 第三四面及第一三〇面
- ㉒沈九香：從申報到中央社 三十週年紀念刊第一六六面

十、壽康里時代

「在（民國十三年）創辦以後的八年期間中，中央社所發表的新聞，注重政治軍事的消息，原為各地報紙所需要，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直接管轄之下，這個業務機構迄未能發揮其最高效能。到了二十一年五月，中央社宣佈改組，由中央黨部秘書蕭同茲任社長。^① 開闢了一個新途徑，奠立了一個新基礎。蕭氏時年三十八歲，是一個富於事業心和毅力的青年。他在接受任命的時候，要求把中央社遷出中央黨部，成為一個獨立的業務機構，在編輯政策方面，亦予以自由的權力，而祇是在組織系統上，仍為黨部的附設單位。這個建議有充分的理由支持，獲得黨部委員會的同意。蕭氏乃實行他的計劃，要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通訊社，為全國報界及民眾服務。這個不為一黨私有的宗旨，符合國民黨總理 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格言，乃中央社後來成功的主要原因。」^②

以上引述袁昶超所著中國報業小史關於中央社的記載中之一小段。袁強調中央社為業務機構，為全國報界及民眾服務，不為一黨所私有，乃中央社後來業務成功的主要原因，立論相當持平，並符合事實。

蕭同茲於接事之初，一開始就是為創立一個規模宏大的國家通訊

社作起步。一個國家通訊社（National News Agency）必須具備的條件，包括：1.在全國各地佈置新聞採訪網，廣泛採集國內各種新聞，供應全國各地報紙、電臺。2.在世界重要國家或地區設置特派員，採訪與本國有關的國際新聞，發回總社，供應國內報紙、電臺。3.與世界性通訊社及其他國家的國家通訊社若干家，訂立新聞供應合約或新聞交換合約，藉以擴大新聞採集的範圍。4.國家通訊社必須使用電報設備傳遞及傳播新聞，所以國家通訊社亦屬於「電報新聞通訊社」的範疇。^④ 既然建立國家通訊社，亦必須使其成為國家對外宣傳，開展國際公共關係的主要工具和媒介，對國外傳播新聞。這些任務，無一不艱鉅，而當時的中央社只有二十來個人，只有少許的經費，沒有一樣足以具備國家通訊社的條件。這些都不能阻止蕭的雄心，亦無礙於他蘊藏於心的發展計劃，但決不自以為是，更不能閉門造車。「他於接受這一任命後，首先前往上海、北平、天津等地，訪問新聞界知名人士，廣泛的徵詢他們對於中央社業務和經營方針的意見。返京以後，即決心以專業化的精神，來辦理一個現代化的通訊社。」^⑤

蕭在中央宣傳部擔任秘書期間，即會經常至上海、北平、天津等地與新聞界有聯繫。滬、平、津是輿論的中心，也是新聞事業最發達、新聞人才最集中的地方，蕭和新聞界領袖人物原來已有交往，這次以新受命的中央社社長身份前往徵詢他們對於中央社業務和經營方針的意見，這種虛心的態度已贏得新聞界的好感，覺得蕭一開始就是站在新聞界的立場，考慮中央社對新聞界的需要和怎樣達成最佳的服

務來進行商討，所以都樂於給予充分的合作，無保留的提供意見。這次旅行，堅定了蕭同茲辦好中央社的信心，並為中央社在新聞界同業中撒下了友誼與合作的種子，對於中央社以後業務的開展有甚大的裨益。

蕭深深了解，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大通訊社，首先要建設現代化的通訊設備。「如果每天總社與分支機構所有的電訊，都送交電信局代為傳遞播發，不但在中央社方面感到許多不便，而且可能影響到電訊傳遞與發播的時效；即在電訊局方面，也將增加業務上的麻煩。因而申請政府授權中央社自設專用無線電新聞電臺，傳遞及廣播新聞電訊，並於獲得政府核准後，立即積極進行。」^⑥

蕭第一步要進行的是建立「全國七大都市電訊網計劃」，七大都市是指：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漢口、香港與西安。他預定於一年之內完成，頗近於不可能之事，却居然給他於預定時間內完成了。其時間表如下：

二十一年七月，設南京總社及上海分社電臺。

同年九月，設武漢分社電臺。

二十二年二月，設北平分社電臺。

同年四月，設天津、香港兩分社，五月建立電臺。

同年六月，設西安分社，建立電臺。

中央社之有無線電新聞專業電臺是藉路透社起家的。路透社當時在南京、上海都設有無線電臺，蕭接事以後，即向路透社交涉，接收該社這兩個電臺，一方面是收回外國通訊社在我國國內之自設電臺的通訊權，一方面是作為建立中央社電訊網的起點。蕭的交涉獲得成功，二十一年六月即將路透社京、滬兩臺設備連同工作人員一併接收，開始兩地之自行收發新聞電訊。「其時有發報機二架，收報機三架，分設於上海、南京兩地，總臺收報機設壽康里，發報機則附設於丁家橋中央黨部短波電臺內。領班為周紹高同志，報務員、練習生僅七、八人而已。」「二十二年四月成立電務組，任高仲芹同志為主任，四月陰陽營發報臺佈置完竣，將中央黨部內發報機遷入，並添置發報機四架，收發報臺間裝置遙控專線五對。五月天津電臺及香港收報臺相繼成立，總臺並舉辦專電廣播供給平、津、漢三臺抄收。」^⑦

中央社的電訊廣播，是「用摩爾斯密碼（Morse Code）發報，稱摩爾斯廣播（Morse Cast）。這種電碼，是一八四四年英國電報事業專家摩爾斯（Samuel F.B. Morse）所發明的一種電報符號，其方法是：將英文字母及數字，用一組點（.）劃（—）代表，作為電報的符號。我國根據其方法，先將中文字編成四個數字一組的號碼（如「長」字的電報號碼為「七〇二二」），再按數字的符號發報。」^⑧

無線電的收發報必須分置於兩個地方，如距離太近，發報機發出的電波會干擾收報機的收訊，一組收報機置於無干擾的地方收錄外地電臺

發來的電訊，同時用「遙控專線」將發出的電訊送往發報臺播送出去，這叫遙控制（Remote Control）。中央社總社和分社的電訊交通就是採取這種制度。

自行擁有電訊交通設備是中央社業務發展的生命線。最早期，中央社何嘗沒有向全國發展的意圖，即因缺乏這一生命線而績效不彰。中央社於十六年五月在南京發稿，同年十月即成立上海分社，只辦了三個月，因經費困難宣布停辦。十七年八月設北平分社，至十九年三月亦停止發稿，同年十一月再恢復發稿。十八年二月設武漢分社。十九年十二月再設上海電訊處，發行中英文稿。這段坎坷，確是一波三折，缺乏經費固為原因之一，沒有通盤計劃亦為重要原因。而最主要的還是總社與分支機構之間沒有掌握有效的通訊工具，不能直接交通，不能迅速供應新聞，遂無從滿足報紙的要求。

蕭同茲接辦中央社，力主自辦無線電專業電臺，是他使中央社發展為國家通訊社的重要關鍵。「通訊社藉無線電大量供應新聞，費用省，時效速，效用之大，不僅在我國為創舉，即在當時世界各國通訊社亦屬僅見。此一劃時代的改進，不獨提高全國報紙之素質，充實其內容，其有助於我國報業之進步發展，其績效無可衡量。」^⑨

高仲芹回憶：「三十七年前的一天，我跟隨蕭先生和現在已經離開我們的兩位老朋友，走進丁家橋中央黨部大門，左手轉灣，到中央通訊社去拜訪余唯一先生，商量接收中央社的公事手續。那一天天氣

很好，陽光爽朗，想起來大概是初夏光景吧。在中央社的會客室裏，蕭先生說，我們的任務，第一件事要把首都所在地的消息在『同一天』傳送到全國各地。現在南京發生的新聞，要一星期後在廣州刊載，兩星期後在重慶刊載。這種情況，必須立刻補救，否則本黨政策就無法推進。」^⑩

蕭是學機械工程出身的，他懂得通訊工具之於通訊社，一如工作機具之於機器製造廠有同等重要，他對於電臺和電臺工作人員與編輯、採訪同等看重，同等愛護。愛護從「小動作」中表現無遺。「尤其令我們這批『榔頭』^⑪ 印象深刻的是，在每天六小時不斷工作『拉黃包車』^⑫ 的當兒，工友們也忙得不可開交時，『三爺』會『飄然下凡』，用鉛筆刨子為我們削鉛筆。然後又『悄然而去』。他是那麼輕鬆，那麼自然，沒有道地的革命敬業精神，深厚的個人修養，那能做得到！」^⑬

蕭的類似「小動作」也出現於編輯部。「二十一年，國際聯盟組織調查團來華，實地調查日本侵略東北的事實，由李頓為團長，調查完畢，發表報告書，就是歷史上的重要文獻『李頓報告書』。文長萬餘字，中央社要在當晚全文發稿。那時中央社規模初具，繕校人員極少，遇到這一大本文件，一夕之間，勢難繕發。於是全社同人參加工作，能寫的就寫，能校的就校，蕭先生親自參加校對，直到全文發出為止。」^⑭

壽康里時代，那時規模小，蕭不時「光臨」各組。採訪組，尤其是他足迹常至的所在。採訪組的地點在進門左首第一間，社長先生隨時「飄然」而臨，跟大家聊聊。這種聊天，對外勤記者最有益處，因為他每天和外面接觸的面最廣，相熟的朋友太多，又經常參加各種會議，消息比誰都靈通，他經常指示大的方向，但休想從他那裏採訪到什麼新聞，新聞靠你自己去採訪；相對的，他也決不干涉你的採訪自由，指示那條新聞該發或不該發。有時，一些「小動作」令人感奮，例如看到某人寫稿最忙而又汗流浹背時，他會輕輕的將電風扇移動對著你，等你發覺，相互的作個會心的微笑。這種無言的鼓勵比千言萬語還有效。

那時沒有今天的這種綿密的人事制度，蕭却遵守了人事制度的基本精神，決不一朝接事便「刷新」人事，「汰舊換新」。中央社沒有什麼財產與設備可接交的，蕭接下了全盤的工作人員。譬如：編輯組長劉正華、採訪組長馮有真都是由原來工作人員提升的。外勤記者周培基、陳熙乾、何樹元都仍守崗位，譯電員汪賡雅，後來升任譯電領班，事務員張慶華照舊當事務員。只有電臺是全新班底，因業務需要，才陸續在各部門羅致新人。原已設置的分支機構亦仍保持原班人馬沒有更動。上海電訊處錢滄碩任上海分社主任，武漢分社主任曹蔭穉、北平分社主任潘仲魯都是仍就原位。這些舊人，為中央社後來的發展盡了最大的努力，並在中央社幹了一輩子。

「老中央社」對於壽康里總有無限的懷念，雖然那只是一條住宅

里弄，不具任何特點，建築也不顯眼，但那裏是中央社發祥之地，光芒四射，成為全國新聞中心，從這裏開始發出中央社第一通無線電新聞電報，從這裏開始吸收中央社的新人，也從這裏開始派出中央社的人四散到國內與海外，這個不出色的里弄曾經寫下了中央社的光輝歷史。曹蔭穉於四十三年在臺北回憶壽康里說：「當時壽康里的老同事還在社服務的，除了電務部幾位同志外，祇有丁履進、丁則怡、周培敬、張明烈、汪賡雅，有限幾人了。此外工作過多年而已離開的，要數梁乃賢、馮志翔、羅寄梅、律鴻起、陳熙乾、潘劭昂、袁振宇諸兄與我。亂離多年，還能夠廁身自由中國，而且留在新聞崗位裏，真是大幸了。」^⑮ 現在距離蔭穉寫此文時又已二十年，情況更不對了。曹兄已於十年前作古，丁履進、丁則怡、周培敬、汪賡雅、周紹高諸兄均已退休，張明烈也已逝世，寄梅遠在美國普林斯敦作客，鴻起亦於不久前謝世。攀攀手指頭，真是年老故人稀了。

筆者願借此機會為壽康里時代的人作個點將錄，以免年久湮沒。

劉正華，四川巴縣人，北大畢業，與余唯一為同鄉且為同學。豐采翩翩，一筆字寫得漂亮，一如其人。夫人曹孟懿，安徽人，與劉由同學而結褵，耳濡既久，說的一口道地四川話。正華身體較羸弱，中央社改組，出任編輯組長，因截稿至深夜，難勝繁劇，只幹了一年即向蕭社長堅請辭職。入川出任重慶市政府秘書長，從此即未離蜀。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時，仍在重慶負責新民報社務。

馮有真，江蘇常熟人，杭州之江大學肄業，曾在蘇北任中學教員，故說普通話帶蘇北口音。政府定都南京，入軍委會接受短期政工訓練，結業後分派中央社任記者。馮身體魁梧，性格爽朗，健筆亦健談，善與人相處。夫人呂亦陶，四川銅梁人，馮於三十七年冬與彭學沛同機由滬飛粵，不幸飛經香港附近時，飛機觸山墜毀，粉身碎骨。馮夫人現寓美國洛杉磯，年近七秩，滿頭白髮，去歲曾回台北小住。有真一生多采多姿，可惜英年殞謝。他在總社採訪組主任期間，採訪外交新聞，與外長羅文幹相處甚為相得，二十二年羅奉派赴新疆處理金樹仁、盛世才，馬仲英之變，馮以隨行記者身份隨羅赴迪化，調處未成，取道蘇俄返國，撰述新疆變亂通訊多篇。二十五年六月，第十一屆世運在柏林舉行，馮又隨同我代表隊前往採訪，他利用會場裝置的廣播設備，用口語向國內播報中國隊參加比賽情況和成績，尤以籃球比賽實況播報最為出色，總社和上海分社都收聽他的廣播，立即撰稿發佈。回國後調任上海分社主任，抗戰時，領導分社同人藉租界掩護繼續工作，冒險犯難，幾度瀕臨危境，幸以機警得免於難。

總社採訪組成立時，除馮之外，記者只有陳熙乾、周培基、何樹元三個老人，筆者是新加入者，整個採訪組總共五個人，新聞界戲稱為「五虎將」。的確那時採訪過許多大新聞，第二天爭著翻閱上海報紙，看是否霸佔了申報、新聞報的一版頭題，相互以此為榮。有一次，獲得一條大新聞，全文約二萬餘字，時間已晚，為爭上海報紙於次日刊出，除在當晚的電訊廣播中，儘量播發外，同時使用與上海通

報的專電、電信局有線電報，以及京滬間的長途電話，分段向上海傳遞，上海分社也出動了全體工作人員，分別從事接聽電話、譯電和繕寫、油印的工作，直到午夜，上海分社始全部收齊，並全部發出。上海報紙與首都報紙終於在同一天刊出。在爭取新聞時效方面，中央社的人真是拼著命幹，這大概就是「中央社精神」最可寶貴的之處。前文引述沈九香兄在申報任駐京記者時，因為時間遲緩，中央社電訊很少為上海各報所採用的情形，到這個時候，當已一掃而空。

錢滄碩，江蘇江都人，比當時其他的人都年長一些，也比其他的人較為嚴肅，不苟言笑，還有些口吃，愈急愈說不出話來，對人誠摯，雖拘謹一點，却非不可親近的人，跟他處得久的，沒有人不喜歡他，沒有人不尊敬他。胡傳厚說他「是上海分社的保姆，分社的業務基礎，工作規範，都是他一手所建立。」錢主持的上海分社，「在抗戰以前，雖沒有正式分組，但就實際工作來分，已有編輯、採訪、編譯、英文編輯、電務、事務等六個部門，工作人員近六十人。」「因此，上海分社不僅是本社最早設立的分支機構，也是在所有分社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單位。」^{①⑥} 胡傳厚又說：「錢先生是一位純樸的書生，治事嚴謹，好學不倦，為分社同仁所共仰，也為蕭先生所器重；可是他秉性沉默寡言，不善交際，尤不重服裝，無論冬夏，總是布袍一襲，參加集會筵席，也不例外，這在上海那樣國際性都市，顯然是不甚適宜。蕭先生希望他『易裝』，自在意中。有一次，蕭先生來上海，蒞臨分社。不知是否事先明告，匆匆地拉著錢先生驅車前往靜安

寺路一家高級西服店，替他定製一件夾大衣，兩套西裝，並立即付款（共值二百餘銀元），以示相贈。盛情難却，從此錢先生『煥然一新』，布袍不再上身了。」^⑰

這是非常風趣非常具有人情味的故事，胡傳厚把蕭和錢兩個人都寫活了。民國二十五年，人事有了調動，總社秘書梁乃賢出主廣州分社，編輯部主任曹蔭穉接替秘書職務，錢滄碩由滬調京主持編輯部，採訪部主任馮有真接上海分社主任。錢在編輯部對同仁工作要求很嚴格，大家都有些怕他，可是沒有恨他。因為他的要求是對的。「錢滄公之於部屬，不獨求其工作有表現，更企望其努力於進修。他自己出身自學苦讀，所以特別鼓勵青年自修。……大夜班等稿時候，他從主任小室裏出來，坐在編輯桌上，檢討一天社稿缺失，指責之餘，輒加勸勉，治學處人，無所不包。有時談得起勁，直達通霄。」^⑱ 錢滄碩律己最嚴，無所嗜好，長宵深談，大概就是他的嗜好。滄碩在抗戰末期，中宣部派赴昆明出任中央日報社長，三十八年未及逃離昆明，為共匪所執，臨死不屈，致在獄中殉難。大義凜然，永遠受人崇敬。

曹蔭穉，湖北武昌人，生於民前十年。父親在清朝迭膺要職，七十歲左右才生蔭穉，是家庭中的「么兒」，後來大家都稱他「么爺」。這人，聰明絕頂，讀書甚勤，腹笥最富而不自炫。好讀書，亦最愛買書，到臺北後曾一次出售其藏書，得款十餘萬元。中學卒業後，北上入京，在舊京遊學有年，後來還是回到故鄉，在國立武昌大學文學系畢業。治明史頗有所得，湯恩伯將軍由滬撤退來臺，曾禮延

蔭穉排日講述明史，惜蔭穉於此無著作。曹好讀唐人以後筆記小說，喜在坊間蒐購善本。亦愛讀武俠小說，於還珠樓主作品最為稱許。又為平劇戲迷，對菊壇掌故堪稱淵博。曹么爺不脫少爺脾氣，談鋒犀利，辯才無礙，與人抬槓，每不待對方辭畢即行反擊，常使人不易還手。惟處理公務最識大體，為蕭三爺記室多年，從不擅自專斷。他勉勵中央社年輕朋友，須謹守「循分努力」四字。曹於二十二年由武漢分社調主總社編輯部，正是「壽康里」發軔期間，於中央社新聞普及化頗多建白。廿五年繼梁乃賢為總社秘書，是為中央社兩大秘書之一。他和梁互為交替，梁卸却秘書交給曹，三十七年曹又交給梁，三十八年梁再交給曹，直到蕭交卸社長時為止。終蕭之任，中央社未設副社長，亦不設主任秘書，中央社的秘書頗似今日執行秘書意味，蕭在外打開局面，秘書在社看家，受命處理日常事務，社務推進了無杆格。曹在中央社還經常充先鋒任務。抗戰發生，蕭派他到長沙部署戰地特派員事務；抗戰勝利，派曹往南京接收；三十七年，派他到上海任分社主任兼辦總社器材遷移臺北任務；三十八年，派他在臺北主持總社遷臺的部署。這是因為曹在總社的工作時間最長，總分社的同仁最熟，處理社務經驗最豐富，尤於蕭的作法與觀念了解最透切，易收車輔之效。曹辭離中央社後，至中央日報擔任主筆，於五十二年以肺癌病逝於榮總醫院。

梁乃實，廣東人，在北方受教育，南開大學畢業。與梁初識者，決不會知道他是廣東人，他說國語非常準確，不夾半點廣東口音。梁

是蕭主持中央社以後羅致入社的。在中央社幹部當中，梁是最早認識蕭的人，民國十六年夏，兩人在南京成賢街中央黨部招待所相識。十六年冬，中央黨部改組，蕭任農工訓練委員會委員，梁在中央社服務，同在黨部大樓內工作，但甚少晤面機會。十七年，中央再度改組，葉楚傖先生任中宣部長，蕭任徵集科長，梁在指導科服務。十八年，梁奉派追隨蕭赴北方工作，先至天津，再至太原，蕭先返北平，梁獨留太原，嗣又再至天津。十八年冬，中宣部再度改組，蕭調任秘書。廿一年五月兼任中央社社長。同年九月梁辭中宣部工作，未一月，蕭延聘梁為中央社秘書。二十五年，吳鐵城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中央社設廣州分社，梁任分社主任，抗戰勝利後再回總社任秘書。中央社同仁都稱他為梁公，梁公待人最謙虛，從不以辭色假人，處理事情思慮最細密，中央社同事遇有公私困擾，經常找梁公去「琢磨、琢磨」，直到滿意而退。中央社在壽康里發展時期，很多展布，都是經梁「琢磨」過的。三十八年中央社遷台，梁離開了中央社，在中華日報南版擔任主筆，兒輩不願其年老仍孜孜於絞腦汁的工作，索興連這個也辭了，現寓臺北新莊過著退隱生活。

高仲芹，江蘇武進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交通處無線電訓練所畢業。無線電訓練所附設在上海南洋大學，等於是南洋大學的一部份。高仲芹與周紹高為同學，周比高還早一屆，十六年畢業，高十七年畢業，兩人都被派在南京總司令部無線電臺擔任通訊工作。這個電臺設在西花園，對當時的軍事通訊發揮了很大作用。後來中央黨部成

立無線電臺，由徐恩曾負責，這個電臺專負中央黨部與各省市黨部通訊之責，仲芹擔任總幹事。蕭同茲接辦中央社，第一件事就是要成立新聞專業電臺，他找到高仲芹這位能幹的總幹事幫忙，策劃這件事。蕭接事後第二個月接收路透社京、滬兩所電臺，路透的電務領班為周紹高，周之入路透社又恰好是仲芹介紹的，故使策劃與接收工作進行很順利。周連人帶電臺於六月廿三日移轉到中央社，仍以領班名義負責京、滬兩地通報任務。二十二年二月中央社開始在陰陽營建發報臺，同年四月成立電務組，仲芹才辭卸中央黨部工作，出任中央社電務組主任。在這以前，名義上他雖不是中央社的職員，事實上却是中央社電臺的保姆。在這以後，中央社電務發展的工作完全由他一肩挑起，電務工作人員第一年由五人發展到五十人，第二年增至二百人，後又增至一千人。二十六年二月，蕭派他到歐洲考察英、德、法、義各國大通訊社的技術設備，並在英國馬可尼工廠實習和研究，於同年十月回國。高出國研究的目的是要發展「中文電報機」，以改革數字代表中文的電碼。三十一年九月，蕭又派高赴美國，一方面向美國洽辦器材，一方面繼續研究，終於獲得成功，發明了「高氏中文電報機」。現在臺北與紐約間經過人造衛星傳遞的中文國際新聞電訊，就是使用他的機器。高現卜居臺北，仍不時前往紐約。

以上提到的六個人是中央社壽康里時代的開國元勳，其中錢滄碩雖然至廿五年才到壽康里上班，但在創業初期他在上海分社的工作與總社密不可分。可以這樣說，蕭接辦中央社，第一個發射點是針對上

海，假如中央社的電訊供應，第一砲對上海各大報打不響，則以後的發展便不能如此迅速。錢之列入開國元勳的英雄榜足可當之無愧。

①筆者按：中央社遷至南京發稿，第一任負責人尹述賢與第二任負責人王啓江均稱主筆。余唯一於十七年八月繼主社務，名義改為主任。迨蕭同茲奉派主持中央社，始定名為社長。就歷史淵源言，蕭不是中央社最初的主持人，但就體制言，蕭為第一任社長。以後數度更迭，直到今天，中央社負責人仍稱社長。

②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 第九一面

④胡傳厚：通訊社的業務 五十三年記者叢書第二種「通訊社及其業務」第四面

⑤中央通訊社特刊 六十年十一月編印 第二八面

⑥同上

⑦電務部成立以來之概況 二十週年紀念刊 上輯

⑧胡傳厚：通訊社的業務 五十三年記者叢書第二種「通訊社及其業務」第四二面

⑨曹蔭穉：三十年十月十八日致蕭社長函

⑩高仲芹：領導、指導 念茲集第七二面

⑪「榔頭」是電臺工作的俏皮名詞，意指報務員敲打發報Key的鍵簧時，發出「的、的、答」的聲音，有似敲「榔頭」；報務員自相戲謔，也說成「敲榔頭的朋友」。

⑫「拉黃包車」同樣是電臺報務員戲謔的名詞，發報和抄報，一張紙接一張紙的拉下去，如同拉黃包車。

⑬劉大觀：榔頭一敲卅六年 念茲集第一〇一面

⑭周培敬：天才的新聞事業家 念茲集第四二面

⑮曹蔭穉：橐筆話當年 三十週年紀念刊第二一面

⑯胡傳厚：與上海共存亡的上海分社 三十週年紀念刊第七〇及七五面

⑰胡傳厚：中央社「精神的磁場」 念茲集第五九—六〇面

⑱周培敬：二十二年老學生 三十週年紀念刊第一七〇面

十一、邁向現代化的規模發展

蕭同茲於完成「七大都市電訊網」計劃以後，中央社的電訊經常「霸佔」上海、北平、天津、漢口、香港各地報紙的一版頭條，使他增加了信心，確認中央社有廣大的發展前途，必須再求進一步的擴張。擴張的目標沿著兩個方向推進：一個是將中央社的服務推廣到全國各地方報紙，當天普遍可以得到各大都市報紙同樣的新聞電訊的供應；一個是收回外國通訊社在中國的發稿權，並進一步供給英文報紙與外國記者有關中國時事的英文電訊。

立於純業務觀點，要將中央社發展為國家通訊社固然要採取如此步驟，為適應當時國家的需要也該採取這樣步驟。無人可以否認新聞傳播可以滿足人民求「知」的慾望，同時這也是人民的一種權利，在「知」的傳播中負有社會教育的責任，正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新聞事業不發達表示「知」的落伍，社會進步亦必遲緩。促使新聞事業進步首先就得充實迅速而確實的新聞，這個責任當然應該落在中央社的頭上。

「九一八」、「一二八」兩次重大事件發生之後，出現了兩種結果：一是暴露了我國的軍事力量的弱點，無從與暴日抗衡；另一方面却激發了全國民眾昂揚的抗日情緒，莫不主張與日本開戰，以雪國

恥。但兩者之間恰恰是衝突的，冷靜的權衡利害，暫時不能打。惟一般輿論，却直覺的認為非打不可。政府當局感到非常為難。共匪於此際一面於豫、鄂、贛、皖、湘各省實行軍事叛亂，騷擾後方，一面利用上海租界作掩護，暗中組織團體，編印書刊，鼓惑民眾，高唱抗日論調，對政府漫罵攻訐，以迎合民意，增加政府的困難。不滿意於政府的軍人與失意政客，亦嘯聚一方，粵變、閩變相繼而起，北方局面既直接承受日方壓力，西南各省又類似割據形勢，中國在形勢上是統一的，而統一的力量非常脆弱。中央政府只有忍辱負重，為抗日爭取時間準備，內而清剿匪患，外而力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並銳意進行各項建設，以厚植國家潛力。這番苦心欲求全國諒解，中央政府的決策欲求民眾的支持頗不容易，然而中央社的電訊却盡到了解說的任務，不斷的報導建設消息，不斷的揭發共匪陰謀，不斷的說明國際和國家形勢，各地報紙於同時刊載，消除了很多隔膜，使民眾增進了對政府的信心。蕭同茲於這段期間加緊擴張國內的分支機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軍民有了心理上的準備，所以能夠展開全面抗戰，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①

收回外國通訊社在中國的發稿權，其重要性已於本書第九章中詳述，我不能長久處於新聞領域的次殖民地的環境為全國新聞界一致的要求，中央社正合擔負這一責任，也正具備這種條件，蕭同茲自不會放鬆對於這方面的努力。其作此努力所持的理由非常簡單，既然收回外國通訊社的發稿權，必須有充分能力將外國通訊社的新聞電訊迅速

譯發供應各地報紙，使報社感到比以前方便，而用費比以前大為低廉，價廉物美，才能滿足報紙的需要。既然與外國通訊社訂立合約交換新聞，是雙程交通線，中央社取得外國通訊社的國際電訊，自須同時供應對方以中國電訊才能叫做交換。供應中國境內英文報紙與駐華外國記者以英文撰寫的中國新聞電訊乃是必然的趨勢。可是這些電訊必須是內容豐富，為外國記者採訪觸角所不及，外國通訊社方能享有交換價值，中央社擴充國內採訪分支機構，適足以達成此項要求；這些電訊必須迅速、確實，英文寫作水準可以符合外國記者的要求，他們才樂於採用，達到新聞交換的目的，更達向國際傳播中國新聞的目的。處此情勢，中央社非求對外發展不可。蕭的作風很明快，於其就任後一年，即籌劃英文發稿工作，二十二年九月一日，「中央通訊社並沒有太動聲色地，就開始了在天津的英文新聞稿的供應。」^②

從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抗戰發生這段期間，雖然仍有內憂外患，但為爭取抗日準備，政府致力於軍事、經濟、財政、教育、交通各項建設都有卓然可觀的成就。由於財政金融之趨於穩定，沒有物價波動，人民在生活方面也過了一段好日子，社會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二十二年實行海關自立，海關直隸於財部，對外國貨物之進口可以自由調整關稅以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新興工廠在各大都市紛紛建立。政府設經濟委員會與以後的資源委員會，統籌各項資源的開拓並直營基本工業，工業水準亦逐步提高。廿四年十一月實行法幣政策，統一幣制，穩定金融，更能放手從事於經濟建設。政府興修水利，拓

建涇渭渠，導淮入海，整理長江與黃河兩大流域，都有進步。尤其是交通建設，不僅各省自行修築公路，二十二年即又趕修內地七省的聯絡公路，政府修建了京杭國道與京滇國道，由南京至昆明汽車可以直達，抗戰發生之前，修築了玉門到迪化的公路。鐵道建設，修通了粵漢鐵路，新築了浙贛鐵路，錢塘江大橋通車，京贛鐵路開始鋪軌，此外如成都至重慶的成渝鐵路、長沙至貴陽的湘黔鐵路都於二十六年開工，湘桂鐵路並已於抗戰時完成。

政府於從事各項建設之外，尤致力於腹地各省匪患之肅清。對鄂、豫、皖三省邊境的共匪叛軍掃蕩肅清之後，繼以對贛匪的五次圍剿，逼使殘匪放棄老巢，向西逃竄。國軍節節追剿，步步堵截，至二十四年各股匪軍會集於陝北延安一隅，只餘四萬餘人。剿匪軍事的勝利達成兩項重要目的：第一，建立了各縣民眾的基層組織，有利於此後的長期抗戰。第二，川、滇、黔西南各省以及西北各省因剿匪軍事的推展而完全聽從中央政府的指揮，對於後來抗戰的鞏固後方基地尤具有決定性的貢獻。

準備與建設，軍事力量大為加強。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爆發了淞滬戰爭，在上海近郊與日軍浴血苦戰了三個月，日軍逐漸增兵三個師團，死亡枕藉，又再陸續增兵三個師團，從淞滬外圍向上海進逼，出動強大的空軍濫肆轟炸，我軍亦犧牲慘重，始行撤退。這種軍事力量的表現，與五年以前的「一二八」淞滬戰事的情況完全不同，大出日人意料之外。「一二八」戰役，我方沒有空軍應戰，而這次淞滬戰

役，我英勇空軍於「八一四」重創敵機，寫下空軍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尤其出乎日人意料之外。勦匪軍事的勝利使國家達成了軍令的統一指揮，西北軍可以調動到江西，東北軍可以調動到西北。全國除匪軍之外，再沒有不聽中央指揮部調度的軍隊。

蔣委員長於「九一八」、「一二八」之後，深思熟慮，審度內外形勢所作的抗戰準備，政略與戰略所作的決定，證明為完全正確。中央社亦幸而在這段準備時間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這是一個打天下的局面，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蕭同茲得心應手，從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他完成了全國通訊網的佈置，對外開始在國外成立分社，而英文部的充實與擴張，使國際新聞在中國交流，讓國人明瞭國際形勢之發展，益發增進全國民眾求新、求進步，鞏固了愛國團結的觀念。

自民國二十一年五月至二十六年六月，中央社在國內外所先後增設的分支機構如下：

一、國內分社：上海、天津、西安、南昌、重慶、成都、貴陽、廣州。

二、國內通訊員辦事處：福州、昆明、張家口、西寧、安慶、蘭州、歸綏、洛陽、榆林、廈門、長沙、清江浦、保定、鄭州、太原、蚌埠、康定、綏德、青島。

三、國外分社：香港。

四、國外特派員辦事處：東京。

五、國外通訊員辦事處：日內瓦、新德里。

連同原有北平、武漢兩分社、杭州、徐州、濟南、開封、鎮江、牯嶺六個通訊員辦事處，國內分支機構計有三十五處，國外四處，共計三十九處。^③

由於組織規模和業務日趨擴展，總社的組織規程也於二十五年修正，改設編輯、採訪、英文編輯、徵集、電務、事務等六部，職員達三百五十人。

國內分社因業務繁簡不同，組織與編制亦有差異。除發行英文稿的分社以外，其他分社在作業方式上大致相同。每天從上午十點半開始，專機抄收總社播發的「甲種廣播電訊」，須至午夜一點左右截止。另設發報機及收報機與總社直接通報，規定通報時間，每一小時或兩小時「會晤」（Meeting Time）一次。這種「會晤」作兩件事：一是將分社採訪的新聞撰寫電訊發往總社；一是總社發出的「甲種廣播」電訊如因天氣影響而有漏抄或有電碼錯誤情事，可藉通報時間要求補發或訂正。這種直接通報頗似今天的公私機構所設置的Telex電訊，在辦公室進行，立即發送，立即收受，遇緊要事情可立等回電，比接轉長途電話還要迅速。

來往電訊都是電碼，概須通過譯電手續。收受總社發出的國際與

國內的新聞電碼，由譯電員譯為文字送交編輯室，通過編輯程序加上標題，交繕寫人員抄繕蠟紙，校對後油印分次發稿送交各報社。報社編輯拿到的是一疊一疊的整齊的中央社社稿，進行編輯處理非常方便。報社編輯為了安排版面，唯恐至最後還有最重要的新聞有待發出，午夜過後常與中央社編輯室通電話，查詢有無最重要的新聞以便預留版面，所以中央社分社的編輯人員與報社的編輯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絡，進而建立良好的友誼關係。

採訪工作亦為分社工作重要之一環。採訪記者每天採訪所得的新聞，如純屬地方性的稿件只在本市發稿供本地報紙採用，如為重要新聞可供全國報紙甚至外國報紙採用的新聞，除在本市發稿之外，則另行撰寫為電訊體裁的電稿發往總社編輯部。分社記者於撰寫新聞後一兩小時之內又見總社甲種廣播將他所寫的新聞播出感到工作的愉快與收穫。分社記者亦經常有至外地採訪的機會，撰寫連載性質的專訪或特寫稿，供本市報紙採用。

分社的工作如涵蓋一個省區，為使省會以外的地方報紙當天獲得省城的新聞，亦得由分社自行舉辦「省區新聞廣播」，貴陽、成都、福州等分社都曾舉辦，勝利以後成立的臺北分社亦同樣舉辦。

報紙與報紙間必然有競爭，兩家或兩家以上的當地報紙，如屬勢均力敵，必然都想爭取領導地位，為了互爭一日之短長，在新聞界中遂難免產生派系觀念。中央社不是報紙，處於超然立場，不發生利害

關係，亦不須介入糾紛。以此，凡遇與新聞界共同有關的事情發生，中央社分社從中協調，每能達成圓滿的結果，所以中央社分社容易得到最佳的人緣。積分社最佳的人緣更增加了總社的聲譽。中央社的人走到那裏，也將人緣帶到那裏，這正是中央社的一種傳統。

沒有設立分社的地方，當地報紙也照樣可以得到中央社的服務。它只須聘僱三至四位報務員以及兩位至三位譯電員，購置一架性能較好的收報機，在屋頂架設一具收報天線，即可按時抄收中央總社播出的「甲種廣播」或「乙種廣播」。「乙種廣播」內容也包括國際電訊與國內要聞，只不過字數較節約一些而已。大約甲種廣播每天可收受一萬二千字至一萬五千字，乙種廣播可收受五千至八千字。地方性報紙如果只出四開兩張或對開一張，收受乙種廣播足敷應用，但却節省一半人力與一半開支。只是報社抄收的電報為受氣候的干擾而致電文脫漏，沒有方法補救，這是一個缺憾。

據統計，全國報紙，十六年共六百三十家，二十六年增至一千零三十家，可見報業發展的一斑。這些報紙，除極少數例外，大概都是中央社的訂戶。曾虛白說：「民國十六年移於南京的中央通訊社，自民國二十一年改組之後，業務推及全國，以豐富的新聞、特稿，廉價供給各地報社，大大減低了編採的成本。」^④ 由於中央社業務的發展，促使報業重心南移，以前以北方為新聞重鎮，漸漸移向南方。

「如民國二十一年上海報紙四十家，到二十四年增至一四三家；民國二十一年南京報紙九十三家，到二十四年增至一二一家。在北方，只

有北平的報業，復甦較快，從民國二十一年的六十八家，增至二十四年的一一七家。北方各省區，則較中部各省相差甚遠。」^⑤「自民國十五、六年到二十五、六年間我國報紙總數增加了百分之七十。」^⑥

「從我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看，中央社自於民國二十一年獲准自設電臺，採用當時尚未普及的無線電訊設備，總社迅速收集國內外各地新聞電訊，再迅速向國內外廣播，使全國各省以至各縣的地方報紙，可與京、滬、平、津等大都市報紙，同時獲得同樣的新聞，而不再如過去在時間上遠落於大都市報紙之後，更不再依賴剪用大都市報紙所載新聞以填充篇幅。這一成效，可以說是中國新聞事業史上一大革命性的發展；也是促成國家進步一大助力。胡適之先生曾說：『有了中央社，才使國內各地報紙改換了新面目；這是中央社最大的成就。』」^⑦

胡適之先生說這番話，是他由北方回到南方，曾在故鄉安徽績溪逗留一段時間。家居之時，閱讀當地報紙，居然也有前一天的國際和國內重要新聞，全是中央社的電訊，使他驚異於中央社的成就，對蕭同茲深為欽佩。胡健中說：「胡適之先生在日，曾與余月旦人物，一次在美國柏克萊，一次在南港，兩度皆言『貴黨之中央社為成功之事業，蕭同茲殊為難得。』適之先生雖樂與人為善、亦喜對人對事為獎掖之辭，然其對吾黨之人物事業稱許至是，洵屬罕見。適之先生之有此種評價，蓋嘗目覩中央社創始時之筮路藍縷及其後之發揚光大，在適之先生，此為公允之論；而在同茲，自亦當之無愧。」^⑧ 陳布雷於

二十六年冬南京撤退，在軍艦上亦曾對蕭同茲說：「以往張季鸞先生曾向我說過：『國民黨辦新聞的人才很多，但我總覺得蕭同茲平易近人，可以談得來。』他的話我有同感。」（語見蕭氏存稿）

中央社的發展，鞏固了國家的團結，這力量是無形的。由於國內沒有一家報紙能夠離開中央社而能謀新聞的自給自足，於是各地報社各自為政的舊習一掃而空，意志得以統一，蕭同茲本人亦引以自慰。他說：「十幾年來，在發稿方面，有幾件事在當時看來，似乎沒有多大關係，而事後證明對於國家有重大影響。第一件事是民國二十四年推行法幣政策，事極機密。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十點鐘，才通知本社，要我們全文廣播全國和世界各友邦。本社已達成這一個任務。第二天全國都知道了政府這一政策。後來回想一下，假如沒有本社這一機構，也許法幣政策推行沒有這樣順利。第二件事是西安事變。我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馬上派記者攜帶電臺西上，不斷將那方面的新聞報導全國，一方面是為了 總裁的安全，一方面是本社業務所在，而因為此種新聞的報導，鎮壓了反動。由這兩事可以證明本社對國家政令的推行有不少幫助。」^⑨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關係國家存亡的命脈，稍有差池，不必等到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日本早已出兵進犯，而國內四分五裂，根本不可能有八年抗戰，日本軍閥即已滅亡中國。西安事變的當天，中央當局作了明智的決定，不但不封鎖新聞，反將張學良、楊虎城勾結共黨、劫持 領袖的全盤事實交給中央社詳告全國乃至全世

界，非僅戢止了謠言，且激動了全國的公憤。中央社廣州分社主任梁乃賢清楚記得，當晚不斷接到總社的預告，說明將有重要消息發出，他就守在編輯室，終於等到了這條震驚世界令人激憤的大新聞，立即電話告知廣東當局余漢謀，余亦為之震驚，立囑秘書處草擬通電，請求中央討逆，於當晚交中央分社發到總社。梁說：「地方當局請求中央討逆的通電，余漢謀為第一人。」接著全國各地都一致聲討張、楊，這些宣言和通電，中央社莫不立即廣播。中央社成都分社獲知張、楊與川、滇當局早有默契，龍雲有代表派至成都與西安，劉湘亦有代表派往西安，十三、十四兩日看到全國民意沸騰，川、滇都不敢輕舉妄動，但對討伐張、楊亦無表示。分社的負責人往見劉湘和他的秘書長鄧漢祥勸他不要走錯一步，須迅速表示態度。劉湘畢竟是聰明人，十五日亦發出通電，擁護中央決策。這時張季鸞在天津大公報連寫三篇社論，譴責張、楊，其中「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一篇，尤為擲地有聲：「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着！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着，焦灼着，祈禱你們悔禍。」^⑩這幾篇社論，中央社也是全文播出。這股民氣，將張、楊和周恩來全都鎮懾住了。西安事變之迅速平復，是民氣與公意的最大勝利，民氣與公意的發揚與傳播，中央社有很大貢獻。

中央社此時已成功的建立起國家通訊社的規模，它也恪守了作為國家通訊社在新聞處理上五項基本原則：

一、迅捷，電臺通報，隨時發稿，做到分秒必爭。

二、確實，新聞發佈，既爭分秒，更須力求確實，在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時，寧捨迅捷而求確實。

三、公正，國家通訊社為國家與全民的喉舌，在不違背國家立場的原則下，儘量求其公正不偏。

四、平衡，中央社新聞供應的對象以報紙為主，為適應報紙的需要，新聞內容力求其平衡，做到「面面俱到」，「應有盡有」。

五、完整，新聞的發生與發展，自始自終，作連續的報導，週密不遺。^⑪

中央社的業務與外國通訊社發生接觸，在蕭同茲接事之前即已開其端，而由蕭竣其功。中央社於民國二十年十月，即開始先後與英國路透社、美國美聯社、法國哈瓦斯社、俄國塔斯社商訂交換新聞合約，收回各該通訊社在我國發行中文通訊稿的權利。二十一年五月，蕭社長接任後，此項工作更積極進行，茲分述與各國通訊社訂約的合作經過如下：

一、二十一年七月，與路透社訂約，接收該社南京、上海兩地電臺設備，並收回該社在北平、天津兩地發行中文稿的權利。

二、二十二年十二月，與哈瓦斯社訂立交換新聞合約。

三、二十三年一月，收回路透社在北平以外各地發行中文稿的權利。

四、二十二年十二月，與路透續訂交換新聞合約。

五、二十六年一月，與美國合眾社訂立交換新聞合約；並與路透社、哈瓦斯社續訂交換新聞合約。

中央社與這幾家世界性通訊社訂立新聞合約，除了取得他們在我國境內的直接發稿權以外，更重要的意義是：獲得大量的國際新聞，以充實中央社新聞稿及新聞廣播的內容，從而加強對國內新聞同業的服務，使全國各地的報紙，不論大小，都可及時獲全世界所發生的重要新聞，向讀者報導。各省市地方報紙對於國際新聞的報導，不再落後；京、滬、平、津等大都市的報紙，也可節省向這些通訊社直接訂稿所需繳付的高昂稿費。中央社這一項業務，對全國新聞事業的裨助和貢獻，顯然非常宏大。^⑫

民國二十年十月與路透社等商訂交換新聞合約，只是收回外國通訊社在我國發行中文發稿權的認定，但並無實質意義。以言交換，中央社當時可以拿些什麼新聞與外國通訊社交換？事實上相當貧乏。更重要的是交換得來的一大堆外國通訊社英文電訊，每天積尺盈丈，中央社如何加以消化，加以翻譯，以實行「中文發稿權」由中央社來取代？當然沒有。既然沒有，合約與實際工作並無關聯，合約只不過認可中央社將來有這種權利而已。

蕭同茲接事以後，自設無線電臺，漸漸擴充，中央社才具有實力可以擔負外國通訊社的中文稿發佈的任務。其次，中央社在國內擴充分支機構，充實新聞來源，才有資格與外國通訊社作新聞的交換。剩下還有一個工作，就是將外國通訊社的英文電訊翻譯為中文向外發出。這項翻譯工作，蕭是交給上海分社去做，由上海分社將路透社英文稿經過選擇翻譯成中文，除在當地發稿之外，並發回總社向全國廣播。以後與哈瓦斯社訂立交換新聞合約，也是採取同樣的作業程序。

將英文電訊譯成中文為中央社建立英文編譯工作的前奏，但如與外國通訊社交換新聞僅只供給中文稿件，外國通訊社仍須通過一層翻譯手續，而駐在中國的外國記者並無閱讀中文的能力，自不如直接供給以英文稿件，較易發生效用。而況在我國境內以及香港還有不少的英文報，^⑬ 我如能供應以正確的中國新聞，免其道聽途說，造謠生事，亦為新聞供應另一重要發展領域。基於這種種需要，蕭同茲乃決心設置英文編輯部，使中央社的新聞傳播業務取中英文平行的政策。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天津分社首先編發英文稿，經一年之試辦，成績斐然。當時社長有鑒於國際宣傳工作之重要，乃於南京總社增設英文編輯部，推廣報導，俾國際人士對我國國情獲得深切之了解。故本社之有英文部，實以天津分社之試辦英文稿為嚆矢。」

「總社英文編輯部於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正式成立。數月之間，上海、北平、香港三分社英文部亦相繼成立。當時除香港分社英

文部因限於當地政令單獨發稿外，其他滬、平、津三分社均與總社英文部保持密切聯繫。各分社英文部之工作，除發通稿外，並負責將當地新聞譯成英文，由電台發至總社；總社則負責將首都及其他未設英文部各地要訊譯成英文，發稿並廣播各地，以便各分社抄收。此外總社及各分社英文部，分別選擇當地報章及雜誌所載有利於對外宣傳之專著譯成英文通訊稿，以廣宣傳。」

「以上所述，乃抗戰前英文部工作之大概。當英文部開辦之初，各地外人主辦之英文報紙，狃於成見，採用甚尠。嗣因本部同人努力改進，外報態度遂漸漸更改。至二十六年抗戰開始以前，各地英文報紙均採用本社英文稿，即未發稿各地英文報，亦有抄收英文廣播者。」^⑭

千里行程，起自一步。為中央社建立英文部的第一位功臣是任玲遜。當蕭第一次與任玲遜在北平見面時對他說：「我們必須現在開始，我們必須為將來作準備，我們必須在中國國內邁進第一步。」所謂第一步，就是設置英文部或國際新聞部。蕭的理由是：外國通訊社，諸如路透社、合眾社、美聯社、同盟社等，不僅對中國的外文報紙，並且對中文報，都掌握了太大的影響力。要糾正這一趨向就是中央社設英文部，並立即作了決定，請任玲遜擔任籌組英文部的工作，由中央社發英文稿，以中央社的消息「打進」外文報紙，打破外國通訊社對外文報新聞市場的壟斷。如果此舉成功，下一步驟就是擴展為全國性英文新聞稿的供應。

中央社於二十二年九月一日開始在天津發英文稿。由任玲遜唱獨腳戲，唯一的助手是一位打字小姐，打油印新聞稿的臘紙。這種油印新聞稿，一天出三次，派專差送到天津的兩家英文報社，以及若干外國領事館。所有的新聞來源都得自南京總社的中文新聞電報。新聞的種類，包羅萬象，有政府的公告、外交聲明、政治新聞、體育新聞、人情味的新聞，以及外國通訊社所沒有的許多城市的最新消息。

試稿期間，任玲遜充滿對於工作的信心，「因為我們的消息要比外國通訊社的迅速。」果然開始發稿的第二週，華北明星報（North China Star）率先在第一版採用了一則中央社的新聞稿，接著的幾週內逐漸增加。死硬派英國人辦的平津泰晤士報（Peiping and Tientsin Times）採用的稿件比較少。試稿期滿，華北明星報首先訂稿，應允每月付四十元美金的稿費。平津泰晤士報不肯付稿費，還說，中央社是一個政府機構，所發的新聞，只不過是宣傳而已。平津泰晤士報採用了幾則中央社的「宣傳」，中央社應該表示感激才是。任玲遜不服這口氣，第二天就對這家報終止供稿，不到一個月後，泰晤士報終於讓步了，願意付稿費，請恢復供稿，此後它所採用的中央社消息比華北明星報還多。

這第一砲打響，證明蕭同茲的想法是正確的，於是照預定計劃進行，調任玲遜赴南京籌設英文部。兩個星期之中就組成了班底，包括王家松，當時是燕京大學新聞系助教，後來任中央社駐倫敦特派員。徐兆鏞，當時任隴海鐵路局翻譯組組長，後任中央社駐澳洲特派員，

嗣又任駐巴黎特派員。余捷元，甫自美國深造歸來的清華學生，後任中央社駐柏林特派員。郭則虬，南開大學畢業。張民熙，與任玲遜是北平英文時事日報的同事。一個月籌備就緒，英文部即開始發稿。在南京撰寫編輯英文新聞稿，經由中央社開闢一個廣播網，廣播到設有英文組的各個分社抄收，與當地的英文稿發給當地的英文報社。^⑮ 中央社英文部有個特色，就是從創立到以後的發展，蕭同茲沒有聘用一個外國人。

這種發展很迅速，蕭同茲還有更進一步的計劃，他曾向任玲遜說：「中央社還要在世界每個重要都市派駐特派員。」^⑯ 這一工作是於二十二年十一月派新聞界名流戈公振^⑰ 以中央社特派記者名義出席日內瓦國際新聞會議肇其端，而以二十五年一月聘陳博生為駐東京特派員籌設東京分社建立起規模。

陳博生在「五四」運動時期，即已為北方新聞界的健者，他是北京晨報的總編輯。晨報是一份文化氣息特別濃厚的報紙，它的星期畫報很出色，尤其是它的副刊，由徐志摩主編，在學生羣中擁有廣大讀者。陳博生於民國七年從東京帝大畢業回國，就進晨報撰寫有關時事分析的文章，極享盛譽，曾由晨報派往倫敦，回國後即出任總編輯。在北伐以前，晨報不但是輿論界的權威，且為北京最出色的一份報紙。十七年，北伐軍入北京，閻錫山派李慶芳接收，易名為新晨報，陳博生離開晨報，「遊學歐洲，入倫敦政經學院研究，歸國後，赴東北，張漢卿待以客卿之禮。」^⑱ 十九年，奉張入關驅閻，陳博生再入

晨報，復改名為北京晨報，陳任社長，兼總主筆、總編輯。「每星期，博老幾乎要自撰社論三、四篇，他寫作極為敏捷輕鬆，在嘈雜的編輯部裏，脫下近視眼鏡，從容下筆，遇到我們和他聊天，他即放下筆來，和我們『天南地北』一番，談畢再續。寫一張，發一張，很少過目二遍。」^{①9} 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接辦北平晨報，實行全部改組，陳博生從此脫離晨報。

陳博生早年是研究系，是進步黨黨員，後來又與奉系有密切關係。他之傾向國民黨是在民國二十年開始。陳的舊部趙效沂說：「國民會議開會時，我隨他赴南京採訪新聞，彼時陳布雷先生對他極器重，引為文友，並介紹博老三度與 領袖晤談，他從此服膺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事業而畢生努力。」^{②0}

陳博生之所以入中央社，據他的外甥，現任中央社副社長林徵祁說：「博生舅在北京主持的北平晨報，給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派兵強迫接收，原因是報紙立場露骨抗日，對政委會常有批評。以後博生舅在家韜光養晦幾個月，才應蕭老伯之聘，擔任中央社駐東京特派員。他是中央社第一個派到國外的特派員，可以說是蕭老伯替中央社建立海外通訊網的第一着棋。當時博生舅之名已滿國內，陳布雷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過：『南有顧熹微，北有陳博生。』蕭老伯把博生舅從北平請出來，送至東京，在中央社是一件大事。」^{②1} 林徵祁又說：蕭和他舅父的訂交，大約是民國十九年，蕭與吳鐵城赴關外說服張學良擁護中央，鞏固統一，他的舅父或許是幕後英雄。蕭、陳的契

合大概是意氣相投，對時局的看法很接近，對於促進中國新聞事業化的抱負相一致。當陳博生主持北平晨報時，張學良駐軍西北。林徵祁記得他舅父每年都到西安與張聚晤一段期間，返回北平即寫一系列社論鼓吹統一抗日。當其被迫離開北平晨報後，張季鸞曾擬敦聘陳博生為總主筆，但大公報已有張季鸞這支筆，因而婉辭不就。這時中日關係已瀕臨和戰重要關頭，陳為東京帝大出身，日本政壇人物多為其同學，蕭挽陳出駐東京，並約定可帶助理劉尊棋一同前往，陳遂欣然接受。陳到東京所發回來的通訊確傳誦一時。^{②②} 林並回憶：「四十四年，我來美前夕，曾到蕭老伯處辭行。他和我談了很多話，特別提到博生舅在日工作往事。他說：『你舅舅當時從東京發回的報導，對政府有教育的作用。』他要我到美國後多看多寫，學博生舅的榜樣。」^{②③}

陳博生之派赴東京，中央社的記載中也有簡明的敘述：「蕭社長有鑒於增進對日本瞭解的迫切需要，即於二十五年六月，敦聘對日本國情有深邃研究的名報人陳博生先生，以『中央社駐東京特派員』的名義前往東京，一方面觀察日本各方動態，一方面與日本朝野從事廣泛的接觸。以他的銳利觀察和深刻瞭解，以及訪問日本朝野人士所作的坦率談話，撰成極具深度的新聞報導發回後，每篇都是異常精采，獲得政府當局與全國各方人士的一致重視。因此，當時中央社的每一則東京專電，全國各地的報紙都以第一版的顯著地位，有時以『頭題』地位刊載，真可說是風靡一時，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佳話。陳先生在東京工作歷時年餘，到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後，才於同年

十一月被迫回國，出任中央社第一任總編輯，到三十九年八月辭職，歷時十二年又十個月，對於中央社業務的發展，貢獻極為宏大。」^{②4}

①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 第四七面

②任玲遜：千里行程起自一步 念茲集第一一六面

③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編印 第三四面

④曾虛白：中國新聞史 上冊第三六三面

⑤同上 第三五三面

⑥趙君豪：中國近代之報業 第九八面

⑦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編印 第三二面

⑧胡健中：前塵對景難排 在茲集第九七面

⑨蕭同茲：中央社二十週年紀念開會辭 二十週年紀念刊下輯

⑩張季鸞：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 載於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集於「季鸞文存」上冊第二二五面

⑪胡傳厚：通訊社的業務 第一七至第二二面

⑫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編印 第三四至三五面

⑬在我國境內及香港發行之英文報紙，較著名的如上海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上海泰晤士報（Shanghai Times），大陸報（China Press），密勒氏評論報（Weekly Review of Far East，後易名為The China Weekly Review）。天津的京津泰晤士報（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華北明星報（North China Star）。北平的北京時報（Peking Gazette），北平導報（Peking Leader）與北平時事日報（Peiping Chronicle）。香港的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德臣西報 (China Mail)。德臣西報是香港最老的英文報紙之一，創刊於一八四五年，也是維持壽命最長的報紙之一。該報於最近——一九七四年九月終於停刊，維持了一百三十年的歷史。香港還有英文虎報，為星系報業公司旗下的一份報紙。士蔑西報 (Hongkong Telegraph)。漢口則有自由西報 (Hankow Herald)。

⑭徐兆鏞、王家松：英文編輯部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上輯

⑮任玲遜：千里行程起於一步 念茲集第一一五至一一八面

⑯同上 第一一五面

⑰戈公振生於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即陰曆十月十六日，江蘇省東臺縣人。原名紹發，自春霖，後來採用公振的別號。五歲時入私塾就學，及長在高等學堂讀書。民國元年，當他二十二歲時，便開始在東臺日報工作，並往神州法政學堂攻讀法律與歷史。民國二年，赴上海任職有正書局，後來進上海時報做編輯，繼升任總編輯，服務達十五年之久，對於時報有很大的貢獻。戈氏對於報學深有研究，民國十三年出版一本「新聞學撮要」，次年在上海民國大學講授新聞學，並組織上海報學社，開始著作「中國報學史」。十六年十一月，「中國報學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第一步巨著。戈氏曾於十六年赴國外考察報業，遍歷英、法、德、義、瑞士、美、日諸國。十八年返國，由上海申報總管理處聘為設計主任，並主編申報畫刊，同時任教於復旦大學新聞系。二十一年，戈氏隨國聯調查團前往東北。二十二年，奉政府派為出席日內瓦國際新聞會議代表，並擔任中央社特派記者，旋又至德、法、義、奧、捷、蘇俄等國考察，在國外居留三載。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返抵上海，因盲腸炎轉變為腹膜炎，於十月二十二日逝世，享年四十五歲。

⑱趙效沂：報壇浮沉 四十五年第三〇面

①⑨同上 第三一面

②⑩同上 第三〇面

③⑪林徵祁：參謀長制度，大家庭氣氛 念茲集第四七面

④⑫六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訪林徵祁先生於中央社

⑤⑬林徵祁：參謀長制度，大眾庭氣氛 念茲集第五〇面

⑥⑭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編印 第二七面

十二、烈火裏生長的鳳凰

蘆溝橋一聲砲響，爆發了全面抗戰。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到三十四年八月歷時八年多的抗日戰爭，對我中華民族固然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對中央社更是一個嚴酷的考驗。主要的考驗是，中央社能否承擔起國家所賦予的兩大任務：第一是隨著戰爭範圍的不斷擴大，能克盡普遍與深入地採訪、報導戰事演變的職責。第二是在總社一再播遷，與敵機濫施轟炸的情況下，使中央社最重要的業務——各種新聞廣播，仍能維持每日播發，不稍間斷。」^①

這兩大任務壓在肩頭，對蕭同茲個人尤其是一項重大考驗。中日戰爭遲早會爆發，他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二十五年夏間即已派高仲芹赴重慶裝妥二百瓦發報機六架，收報機八架，在當時並非實際需要，中央各機關乃至東南各省的公私營機構還沒有任何西遷的意念時，中央社即已預作戰時部署，蕭同茲比較看得深，看得遠。戰爭終於爆發了，似乎較他所預期的來得更快一點，使他有了考慮。他一手建立起中央社的全國性規模還沒有具體完備，如能再多給他一點時間，中央社的戰時準備就將更充實些，他甚至認為國家的戰時準備也還不夠，戰爭就發生了，必然要付出加倍犧牲的代價，全國軍民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進入戰爭狀態，實行總動員，一切機構都當納入戰時編組，

而他是一個書生，並不熟悉這驟然發生的新事物，他估量自己未必能適應這新情況，於是不能不鄭重考慮。考慮的結果認定為了國家、為了中央社，最好換一個熟悉軍事的人來領導，他想謙退讓賢。在臺北曾向筆者談及這件往事，話頭是提到一個朋友，蕭從人貴有自知之明談起，一個人總不免做些錯事，知道做錯還不打緊，誤事最要不得。他說人家都以為他在中央社做了十八年半的社長，從來沒有辭過職。事實上他於南京撤退乘坐一條小兵艦溯江西上時，想到自己的責任，深恐誤事，夜不成寐，曾在艦上向陳布雷先生吐訴辭意，布雷先生多方喻解，勸其千萬不能萌退意，仍難釋然。到達漢口，又曾面謁張岳軍先生請辭，岳軍先生亦堅決不許，所以才繼續做下去。蕭說他有責任感，他的請辭不是消極而是積極，他怕誤事，他說誤事的人才是消極份子。

這是一段很好的掌故，是中央社歷史中一頁珍聞，也是做人做事一番大道理，不能不記。筆者唯恐記憶不真，曾晉謁張岳軍先生求證實。岳軍先生承認確有這件事。他說，中央社社長向他辭職，因為他是軍委會秘書長；軍委會之有權節制中央社，是因為抗戰發生，實施戰時體制。張說：「七七」事變發生，「八一三」淞滬戰爭又跟着爆發，政府決定全面抗戰，且準備長期抗戰，很多人向最高統帥建議組織大本營，將中央黨政軍機構統行納入大本營編組以內，實行戰時體制，統一指揮。^② 最高統帥沒有採納這個建議，惟鑒於日閥對我發動全面戰爭，為動員全民力量從事抵抗，確有擴大軍事委員會編制之必

要。^③ 政府播遷至武漢，始實行改組軍委會，下設六部，任張為秘書長，以幕僚長地位輔助最高統帥處理軍委會千頭萬緒的工作。中央社隸屬中央宣傳部，但戰時宣傳工作亦歸軍委會節制。蕭到漢口不久，即趨謁張秘書長表示辭意。張對蕭說，現在是什麼時候，團結禦侮，有進無退，豈可言辭！有困難總會替你想辦法解決，於此緊要關頭，決不可遽萌謙退。岳公說：「好在我與同茲相識已久，他一直以長者之禮待我，事實上我們是非常談得來的朋友。他知道我決不會任其引退，也就打銷辭意，進而商討中央社如何開展戰時工作，後來中央社在蕭領導之下，果然發揮了最大的戰時宣傳的功能。」軍委會這次改組沒有延續多久，乃另行成立國防最高會議^④，職權較為擴大，仍由張任秘書長，羅致了很多人參加工作，例如第一處處長為胡家鳳，後來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黃少谷為第二處處長，吳國楨為第三處處長，都屬一時之選。張到重慶出任行政院副院長，才將秘書長職務移交給王亮疇（寵惠）先生。

對於蕭同茲，張岳軍以「器度恢宏」四字加以讚許。岳公說：

「我認為同茲最大的長處在能容忍，與人無爭。與人無爭只是說他個人的事，對工作却非常認真，絲毫不放鬆，而且公私分明，否則不會在他手裏創造出這大的一個事業。同茲善於處人，大家都對他好。中央社的人我認識很多，同事對他的口碑都很好。我與同茲長期的交往中，知道他有很多次都能對人忍讓。以喝酒為例，就足以表現出他的風度。同茲逝世後，朋友們對他的讚揚很多，不待我細說。同茲很重

感情，過於重感情，有時很吃虧。為了他的事，我還得罪了一些朋友。這些朋友是與我共事多年的同事，他們說我不幫着老同事而幫着同茲，很不服氣。以至於後來在雜誌上給我栽上「知日派」的頭銜，當然我不計較這些。其實，我決不是幫誰，而是講公道。國家這樣處境，大家要團結，要一團和氣，不要內部鬧意氣。同茲深切了解這個道理，他能容忍，表現出他有很高的修養。」

蕭於南京撤退時在軍艦上深長考慮，曾虛白亦有記述。曾說：

「南京總撤退的時候，我們同坐着一艘侍從室專備的小兵艦由南京到漢口，才有機會跟同茲兄暢談心曲。那時候，除留守部隊外，南京的所有政府機關都已撤盡，祇有侍從室的陳布雷先生和陳方先生，中央社的同茲兄，和當時任第五部副部長的董顯光兄和任國際宣傳處處長的筆者，奉命搭留在江邊的一艘小兵艦最後撤退。撤退那夜，我們深夜分別登艦，彼此見面時心情的沉重可以想見。此後溯江而上，雖遇到敵機警報的幾次虛驚，在艦上的三天却有定下心來檢往知來交換對國是前途的意見。這幾天的晤談，使我對同茲兄有了正確而深刻的認識。他那一腔磅礴的愛國熱忱和堅定的奮鬥決心，在自然流露的激昂慷慨言辭中充份表現了出來，使我開始認識這一位外表風流瀟灑的湖南才子，實際是一位拼頭顱、噴熱血的革命鬥士。從那時候起，我保持着對同茲兄的心儀直到今天。」^⑤

南京是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淪陷的。蔣委員長七日離京飛贛，陳布雷與蕭同茲他們從南京撤退大約是在十二月九日或十日，其

時日寇已向我提最後通牒，下令總攻南京，秣陵關、淳化鎮、湯山均已相繼陷落，敵我兩軍在雨花臺、紫金山一帶激戰，城垣被燬多處。他們的撤離情況的確十分冒險。其時距離七七事變已五個月，距離上海淪陷洽為時一個月。

爭取五個月時間對中央社也大有裨益。八月即派秘書曹蔭穉率員工一批由南京轉赴長沙籌設長沙辦事處。派蕭弘宇為駐衡陽通訊員。派員分赴石家莊、太原、大同、蘇州、蕭山各地隨軍通訊。九月即在長沙設立第二準備電臺，並設立長沙分社。同月二十五日南京總社被炸，新聞廣播即日移上海播發，新聞供應未致中斷。十一月十二日國軍退出淞滬，上海分社名義上宣布結束，仍在租界秘密從事工作。東京特派員陳博生亦於十一月被迫歸國，日方新聞電訊仍委託東京外國記者發電至香港轉達總社。十二月南京撤退前夕，仍接收國際新聞社籌設攝影部，授辦其業務。派戰地記者赴第八戰區甘、寧、青、綏各地隨軍通訊。辦完這些事，總社始正式遷移漢口。

帶領先頭部隊到長沙部署的秘書曹蔭穉說：「我雖離開編輯任務，到抗戰發生，採訪部同人多派往各戰地隨軍。我也和唐際清兄偕社中半數同事，乘坐專輪隨帶大批通訊器材去長沙成立總社辦事處，佈置準備電臺。四個月後，總社移漢，我往歸隊。長沙分社，便由際清兄主持。」^⑥

抗戰一起，蕭同茲就已意味到這是一場全面戰爭，立即採取總社

的分散政策，不能把所有雞蛋擱在一個籃子裏。八月間開始這項工作，九月間，長沙第二準備電臺成立，分散的部署遂告大體完成，並立即發揮效用。上海淪陷，總社的電訊廣播移長沙播發，二十七年一月，總社由京遷漢，電訊廣播又移漢口播發。二十七年三月，重慶、長沙、漢口組成聯合電臺，合併使用，加強戰訊報導，電訊工作益趨靈活，無論敵機如何轟炸與破壞，中央社的電訊始終保持暢通。

政府以武漢為抗戰指揮中心，時間共十個月，中央社總社亦在漢口停留十個月。這時的武漢，不僅為軍事、政治、黨務的中心，且為新聞中心，大公報遷到漢口，申報亦一度在漢復刊，共匪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也在漢口創刊，外國記者雲集漢口採訪戰事消息，漢口也有英文自由西報。中央社的戰訊一枝獨秀，為各報爭相採用，例如臺兒莊大戰，中央社就有五路戰地特派員滙集於這個戰役焦點，發揮了最大的工作效能。同時對外宣傳工作日形重要，六月間，先後派遣駐歐與駐美特派員，採訪歐美朝野對我抗戰的反應發回總社。設置攝影部，並於九月在漢口舉行新聞圖片展覽會，將戰地實況圖片傳供後方民眾參觀，激勵民心士氣。電訊交通方面還有一項新的構想，租用輪船，設置水上游動電臺，以備通報。中央社發參考消息，也是二十七年八月在漢口開始的。發參考消息供軍政當局參閱是蕭同茲的一項理想，因為他「兢兢業業以從事者，厥為如何使本社發揮為民耳目之使命。」^⑦ 國家處於戰時，新聞的發布須受若干限制是必要的，但民眾對政府的批評與反應不能不讓政府知道，既不便在通訊社稿中全盤

披露，只有改為參考消息分送當局參考，仍然可以發揮為民耳目之使命。最高當局經常重視中央社「參訊」，於閱悉後，常有條論追查究竟。例如在重慶編發的某次「參訊」，有「介紹界首」一文，內容曾揭露該地煙、賭、娼之不良現象，委員長立即電飭四省邊區總部努力整飭。中央社這項傳統作法，到今天依舊維持，政府當局也一直重視中央社的「參訊」，蕭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戰爭激烈進行，極易影響工作情緒，蕭同茲在漢口曾為此發過騾子脾氣。「抗戰開始後不久，中央社主要編採人員隨蕭社長撤至漢口，參加大武漢保衛戰。其時大家意志不免有點消沉。蕭先生遂在太平洋飯店召集『訓話』，他異常沉痛的說：『值茲全國上下一致努力抗敵之際，想不到我們同人工作精神竟如此懈怠，實令人痛心。自即日起，有志工作者留，無志工作者去。』蕭先生當時的嚴厲態度，在場者無不驚恐慚悚，並咸認這是向所未有的嚴重局面。從此同仁工作大為振作。」^⑧

但也有很富人情味的鏡頭，這是當時任記者的方國希的故事。

「廿六年冬總社遷漢，我被派駐武昌。武漢一水之隔，原多有面領教益機會，但我疏於謁候；這並非蕭先生高不可攀，而是我很少有必須面陳的事情。在武漢一年，我只有一次討教的機會。那是廿七年初春，蕭先生因在武昌出席中全會，一天，突過舍間午餐；急切張羅，菜僅土產數樣，然被視為家鄉風味，堪以佐飲，而頻頻乾杯。酒酣之餘，得聆教言。所談似係以如何做一個理想的記者為主。他談吐明

快，諄諄教我以立身處世之道，可惜事隔三十多年，內容多已不復記憶。迄猶謹記在心的只有兩句話：『能言而不多言，善飲而不貪飲。』」^⑨ 這兩句富有哲理的話，固為蕭對方國希的贈言，却正是蕭本人的自身寫照。

大武漢保衛戰到十月下旬才結束，國軍於廿五日撤退，中央社總社工作同仁分向重慶及長沙轉進，總社正式宣布遷移重慶。重慶早於七月間即已成立總社辦事處，新聞廣播亦已由漢口移重慶播發，錢滄碩主其事，一切都已有規模，所謂遷移，僅是遷來一部份人手而已。社長蕭同茲又是於國軍撤退前三天始離漢口轉赴湖南衡山的南嶽設置南嶽辦事處。是因為最高統帥離開武漢即駐節南嶽，直到十一月始往桂林，這時南嶽冠蓋雲集，蕭就在這段期間遊遍南嶽七十二峯。

在南嶽，蕭曾喝到陳年白蘭地。王家楫說：「記得當年南嶽有一家規模不小的南貨舖，開設已十餘年，它最初開張的時候，為了裝門面，進了四瓶白蘭地，目的原不在出售，當地也無人對此發生興趣，放在玻璃櫥上最上格，塵封十餘年，給倪源卿先生發現，如獲至寶，當晚同席，有蕭先生在座。他的愛酒，從不過量，溫柔敦厚，也不勉強勸人，說話不多。如果開口，談言微中，悠然意遠，他風度和風趣中的人情味，即使沒有陳年白蘭地，也足令人陶然心醉。」^⑩

我國新聞機構在戰區派遣隨軍記者，也許並非由中央社開始，但攜帶收發報電臺隨軍，則無疑是中央社的創舉。總社大規模的派遣

「隨軍組」，分赴各戰區採訪和報導戰訊，是從二十七年十月，總社由漢口遷重慶前，在長沙設立總社臨時辦事處時即已開始。（時間為二十六年八月）所謂「隨軍組」，是由採訪記者一人，以「戰地特派員」名義偕同電務人員一至三人，攜帶小型無線電收發報機所組成，派駐各戰區國軍重要的指揮中心採訪戰訊，每天按時發電向總社報導。分社所派的隨軍組，則與分社聯繫。綜計在抗戰期間，總社與分社所派遣的「隨軍組」，總數當在三十個以上。^⑪

曹蔭穉曾盛讚隨軍組的優異表現：「中央社當時在各戰場的特派員有過不少好的作品，只因漢、渝各報自有通信，因此不能盡數刊載出來。至於其他各地報紙則都已採用，且有被選入當時的各種刊物和選集及學校的教材。至於戰訊，因普遍供給之故而至平凡化，然即此平凡化的實踐，已確實地在新聞採訪史上載入最輝煌的紀錄了。我記得：(1)臺兒莊大捷之役，事先中央社有五個隨軍組分佈於徐州和皖、豫邊環繞徐州相近的各據點，逐日報導戰事消息，事後五個組都在徐州會合。徐州棄守，他們又分途隨軍自行四向安全地撤出戰線以外。(2)長沙第一次會線，沿著湘江和湘桂線上各據點中央社的電臺，都由沅陵準備臺接轉，各自不斷的向總社報告戰訊。其他各戰役，亦莫不如此。當年參加南寧大捷的劉竹舟兄，留守漢口最後撤出的律鴻起兄現都在臺灣（可惜曹及劉、律均已作古）我想大家必定對於值得興奮的故事，還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吧！」^⑫

戰地特派員最活躍份子之一的胡定芬寫「戰地七年」：「我開始

參加戰團工作的時候，社長曾向我作臨別贈言，他說祇要同事不毀滅自己的光榮歷史，社中決不會摧殘任何人的偉大前程。社長的意思就是要我們自強、自覺、自愛。我在戰地七年，始終懸為做人做事的南鍼。我的行動有時近乎浪漫、頹廢，偶然想到社長的臨別贈言，不覺又增加服務的勇氣，提高工作的情緒。回憶我的七年戰地生活，失敗多於成功，這是實話，不是客氣。臺兒莊之捷，我雖然創造了戰訊特殊風格，可是當徐州突圍，祇顧逃命，沒有把握工作的最後時機，這是我的第一次過失。武漢南翼之戰，我攜帶電臺在距火線五華里內採發戰訊，勇氣確是有餘，然而沒有顧到員工的健康，累得大家患惡性瘧疾，工作不能隨會戰結束而結束，這是我的第二次過失。第二次長沙會戰初期報告尚覺滿意，中期因收報機損壞，竟中止通報五天，我不能於平時督促檢查收發報機零件好壞，迨會戰發展到最高潮，祇好望機自嘆，這是我第三次過失。我常想我們隨軍記者七年已算飽嘗退却之苦，今後應該否極泰來，換換新口味，大家知道今年我和我的伙伴沈允釗、周禮忻兩位都抱着今年隨軍首先攻到武漢的雄志。」^⑬

「廿七年十一月武漢失利，湘北吃緊。十二月夜晚張治中一把火，將長沙燒成了彷彿古羅馬的邦貝城。大火前夕我是被指派少數留守工作人員之一。」彭河清追憶他的戰地記者生涯是這樣開始的。他懷疑：「敵騎果真到了撈刀河嗎？真的迫近長沙了嗎？我找到駐軍第二百師司令部打聽究竟後，（證明完全是張治中張皇失措）立刻掛長途電話給在南嶽的蕭社長，報告日軍雖已侵據岳陽，但為我軍阻於新

牆河所設防線，前方安謐，並自請趕回長沙去看看。……他認為我勇氣可嘉，……從此開始渡着戰地記者生涯。」「邇後數年我奔馳於洞庭、鄱陽兩湖之間及幕阜山區採發湘北、贛北、鄂南前線戰訊，中經三次長沙會戰，旅進旅退，艱苦備嘗，總期不辱使命。老實說，蕭先生電話的潛在力量發生了作用。」^⑭

這僅是中央社戰地記者生活的片斷。

大公報張季鸞曾撰「贈戰地記者」一文，對中央社的戰地記者大加讚佩。他說：「我首先要感謝中央社的同人。以武漢為中心的報界，規模都不夠，戰地特派記者，一般不多，而且是間斷的。所以戰訊的供給，主要靠中央社，其他各地更不待論。各報特派員的通訊，雖然常有情義並茂的傑作，但一般的報告責任，却靠中央社同人平凡的實踐。而各報特派員容易得名，中央社却因普遍供給之故而平凡化，關於此點，我是對中央社同人同情的。」^⑮

若說中央社戰地記者的工作應予讚揚，則潛伏在敵後繼續報導敵偽消息的中央社記者與電臺工作者更當深致敬佩。當日軍侵陷我國的城市時，中央社記者無不維持報導工作到最後一分鐘才隨着國軍殿後部隊撤退。而北平、天津、上海三個分社，即使在國軍退出，分社停閉以後，編、採與電務同仁仍然潛伏敵後，秘密工作，裝置地下電臺和總社連絡，不斷報導敵偽消息；雖然屢被日軍發覺搜捕，工作人員且有瘐死獄中者，可是，由於同仁前仆後繼，不屈不撓，通訊工作仍

繼續進行。如天津分社，此項秘密工作持續達五年之久，直至三十一年八月，秘密電臺被日方查抄沒收才告停止。上海分社則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始終未斷。

上海分社和日本人捉迷藏尤富傳奇性。「上海分社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國軍撤退後的第二天，經當時的公共租界當局通知，停止業務。電務組和譯電同仁大部份分別介紹至路透社、哈瓦斯及各忠貞報社工作；無法介紹的都以『留職停薪』的名義遣散；僅留用極少數編、採、電務及譯電人員，繼續從事採訪新聞並與總社秘密通訊的工作。最後是採用『散兵戰』、『游擊戰』的方式，每天租賃旅館房間，作為同仁集會與撰稿、譯電的場所，秘密電臺則設在外籍人士的寓所；同時，透過介紹到路透、哈瓦斯兩社的同仁，利用兩臺的電臺通報。這種工作方式維持到二十七年一月，由於日軍開入租界遊行，並藉口有人『投擲炸彈』，會同租界警察搜查旅館，才予改變；此後工作人員除以電話連絡外，很少集會。後來由於幾家忠貞報紙，以美商或英商名義，先後出版或復刊，不僅中央社的電訊大量見報，而且使中央社的工作獲得更多便利。」^{①⑥} 這項地下工作，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以迄三十一年春間尚能維持。三十一年七月，分社遷皖南屯溪仍繼續與潛伏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同仁聯繫，並從各方面蒐集上海敵後消息向總社報導。

戰地分社不斷後移，除上海分社遷屯溪外，漢口分社遷恩施，廣州分社先後遷連縣、龍川，南昌分社先後遷贛縣、寧都。後方原有各

分社較前增加工作，為避免敵機轟炸，紛紛在郊區建立新址。抗戰期中，又新設八個分社，計為：長沙分社（後移沅陵）、蘭州分社、桂林分社、昆明分社、洛陽分社、福州分社、廸化分社、寧夏分社。

至於國外分支機構，戰前僅有香港分社，及在日內瓦、新德里兩地派駐通訊員，東京特派員辦事處已於中日開戰後裁撤。戰時大量擴充駐外單位，先後增設：新嘉坡分社、紐約分社、倫敦分社，並在緬甸仰光、葡萄牙里斯本、美京華盛頓、俄京莫斯科、法京巴黎、德京柏林等地設特派員或特約通訊員。國外單位由三個增加到十二個。盟軍單位，如史迪威將軍總部、蒙巴頓將軍總部、麥克阿瑟元帥總部、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總部、義大利戰場、西南太平洋戰場、中太平洋戰場、西歐盟軍總部，也都有中央社記者活躍的踪跡，和國內各戰場記者同樣辛苦。

與外國通訊社的關係，戰時除與路透社的合約仍繼續維持外，並於二十八年九月，接收哈瓦斯在重慶的英文發稿權。同年十一月，與美國合眾社續訂新聞合約，並接收海通社的電臺，由中央社抄收該社柏林總社所播發的新聞電訊，選譯編發。與海通社的合約關係，至三十年十二月九日，我國正式對日本及德、義兩國宣戰後始告終止。

在前線，在國外，在各個戰場，中央社記者非常活躍，非常辛苦，甚至冒生命危險；在後方，在重慶，在各地分社，也是一樣，既辛苦，又危險。

先說辛苦。總社發稿，維持每日六次：第一次，上午八時，第六次，次晨二時。三十二年八月，為增發國際電訊，截稿時間延長至次晨四時，遇有重大新聞，有遲至翌晨七時始行截稿者。每日將發佈後之原稿，彙總分類，送由蕭社長核閱，批判其處理之得失。編輯部緊張，電務部跟着緊張，其他有關部門也隨之緊張。英文部發英文新聞稿，每日三次，內容分為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二次，並代發合眾社的英文電訊，平均每日約二千字。英文稿銷數二百份，駐渝各外國使領館新聞機構及外籍記者均訂閱英文稿作為對外發佈消息的主要來源。中央廣播電臺的英文新聞口語廣播大部份取材於此。重慶自由西報每日採用中央社英文稿竟佔百分之九十。中央社英文部還主辦英文電訊的國際廣播，作為直接對國際宣傳重要工作之一，用兩種不同的週波，分向歐美播發，這項廣播，規定每日兩次，共約一千五百字。各國情報機關以及主要通訊社、報紙，均抄收以資參考，英文部曾於二十八年一月在渝刊行英文半月刊，嗣因承印的印刷所被炸燬，改移香港復刊，至三十年香港淪陷，遂告停刊。中央社抄收外電以及國外單位發回來的專電均需譯成中文發稿，這份工作，如再擱在英文編輯部身上，實在擔負不起，乃於三十二年四月一日又成立了編譯部，工作時間自上午八時開始到翌晨四時為止，每日約譯一萬至一萬五千字，筆下要快，又要少錯誤，經過這番磨練，中央社出了不少最優秀的編譯人才。

次說危險。二十八年重慶「五四」敵機大轟炸，中央社總社中彈

全毀，武漢分社主任李堯卿、工友甘文元暨何樹元夫人當場罹難。

「蕭先生當時於斷垣殘瓦中掙扎奔出辦公室，塵土被面，衣履污垢，立即指揮員工處理善後，恢復編、採與電訊工作，沉着鎮靜，若無其事。」^{①⑦} 工作同仁收拾殘餘工具，立即趕往上清寺緯成里發報臺繼續發稿，工作未嘗間斷。次日即商得戰時新聞檢查局同意，暫時借用發報臺隔鄰「和居」該局局址，食斯、寢斯、工作於斯，雖情形稍形凌亂，然精神則無或稍懈。

敵機空襲重慶，幾為家常便飯，中央社掘防空洞，將發報機安置於洞內，但二十九年夏，王家坡發報臺被炸，三十年八月十三日晨，羅家灣發報臺又被炸，幸所有重要器材均已移裝洞內，損失甚微。人員亦均無恙。空襲時間，編輯工作亦在防空洞內進行，警報時間短，還不打緊，但如三十年八月所謂「疲勞轟炸」，從八日起至十五日止，一連八天，敵機日夜不斷更番轟炸，所有員工不僅睡眠成問題，即吃飯飲水也發生困難。幸而廚房工友勇敢，冒險做好飯、備好飲水，按時送進防空洞。「而每次緊急警報響過，蕭公才不慌不忙，每於同人之最後進入防空洞……幸有可敬可愛之廚房同志，均能冒生命危險，自動自發，冒險犯難，遞膳送食，全體同仁，得免饑餒之虞。就此目覩經歷事實而言，足徵蕭公領導有方，縱令廚房同志，亦因受其大德感召，奮不顧身，達成任務。」^{①⑧}

戰時實施新聞檢查，中央社亦不例外。於是，編輯部「感麻煩者，則為應付檢查。依照規定，凡非軍事消息送新聞檢查所，軍事消

息送戰訊發佈組。如當戰事緊張時，我社報導有時較軍令部為早，一經送檢，往往因該組未接情報而被『緩登』二十四小時。又如在華盟機消息必須向史迪威總部證實後方能發表。我國空軍新聞則須向航委會請教始可發稿。以致各單位辛苦發來的電訊多不能即日刊播，不僅深為不安，且為我社之損失。今後當繼續與各該機構多方據理交涉，以期有所補救。」^{①9}

編輯部同人，「除經常之工作外，每兩週舉行小組會議一次，檢討業務，砥礪品行，進修學術。會中除工作報告外，有讀書報告、專題討論等。由參加同志輪流主席，輪流紀錄。實行迄今，已開會三十三次。小組會議外，每週舉行學術演講會一次，邀請國內知名學者專家出席主講，已舉行七次。此外並刊行編輯通訊一種，每週一期，由編輯部同人輪流主編，人各兩期，週而復始，現已發行九十五期。他如編採手冊之編纂、地圖之繪製，參考資料之蒐集，人名地名之紀錄與整理，亦均為本部業務中之不可或缺者也。」^{②0}

徐詠平曾說：「中午起床，洗刷後就到中央社喝茶看報，像是我的老家。戰時物價波動，生活艱困，大家過苦日子，從無怨言。中央社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佈告牌上的福利品名，新書目錄最多，很少人事命令，更不見用社長簽章的什麼獎懲令的皇皇佈告。他們似乎不分大小，大家一般高。」^{②1} 徐描寫得很平實，但能烘托出：不怕艱難，不怕生活苦，大家一團和氣，肯進修肯研究，力求上進而安於現狀，大概這就是中央社的重慶精神。

民國三十二年來華訪問的美國共和黨領袖威爾基，在他完成環球旅行的行程返國後所撰的「天下一家」一書中曾說：「中央通訊社以職業的方式，收集並分發新聞稿件，頗堪和我們自己的通訊社及英國的路透社相媲美。」這證明中央社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國際性的通訊社，在抗戰期間，即已奠定了深厚堅實的基礎。

①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編印 第三九面

②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常會決議授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組織大本營，行使海陸空軍之最高統帥權，並對黨政統一指揮。

③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蔣委員長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敵最高統帥部，不另設大本營。

④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常會決議國防最高會議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權。

⑤曾虛白：介紹這一本口碑紀錄 念茲集第二面

⑥曹蔭穉：橐筆話當年 三十週年紀念刊第一九面

⑦蕭同茲：遠大的目標、平凡的實踐 三十週年紀念刊第三面

⑧律鴻起：請聽我道來 念茲集第五四面

⑨方國希：長者、能者、賢者 念茲集第八面

⑩王家楫：南嶽陳年白蘭地 念茲集第一三面

⑪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編印 第四一面

⑫曹蔭穉：橐筆話當年 三十週年紀念刊第二二面

⑬胡定芬：戰地七年 二十週年紀念刊上輯

⑭彭河清：三爺之風，山高水長 念茲集第一一〇面

- ⑮張季鸞：贈戰地記者 二十七年五月作，收集於季鸞文存附錄第一八面
- ⑯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編印 第四二至四三面
- ⑰蕭同茲先生生平事略 治喪委員會
- ⑱童誠：廚房工友同感德化 念茲集第九三面
- ⑲唐際清、劉竹舟、周培敬：編輯部的三時期 二十週年紀念刊上輯
- ⑳同上
- ㉑徐詠平：永遠抹不去的影子 在茲集第一一一面

十三、金色年代與褪色年代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長期抗戰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鞭炮聲響澈雲霄，山城重慶的軍民都擁向街頭，歡呼狂叫，叫出心中的喜悅，迎接未來的光明，企待已久的日子終於到來。為了這一天，付出了好大好多的血與淚的代價，犧牲是值得的，中國軍民終於揚眉吐氣。敵後的民眾也喜極而泣，忍苦受難，在敵人槍尖下受盡了折磨，渡過黑暗漫長的冬夜，終於重覩光明，過去了的只當是一場惡夢，往後將過好日子，心裏充滿說不出的歡愉。只有這一天，大家親切的摸觸到「舉國狂歡」的真實場景，喜在心頭，喜在眉梢。

狂歡只是暫時的。等狂歡冷卻，面臨一大堆現實問題却另是一番滋味。

正確的說，中國對日本的長期抗戰應自二十年「九一八」東北淪陷之日起算，這不止八年而是十四年。歐戰才打幾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只打幾年？連前帶後，最多只有五年，但已經把這個世界擾得百孔千瘡，而我國遭受十四年的長期破壞，元氣大傷，劫後重建，比任何一國都艱辛。世界眼光，傳統的「重歐輕亞」，對於亞洲人民的利益總是置於次要的地位，美、英不惜遷就蘇俄而犧牲中國的利益，蘇

俄乃得長驅直入摘取了亞洲的勝利果實。我國才擊倒東面的強盜，立即面對北面的惡魔。外而環境險惡，內而滿目瘡痍，這時我國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重建河山，國際共黨會給我們這個機會嗎？

抗戰末期，美將史迪威敢於向蔣主席齟齬，就已呈現不祥的徵兆，接近中樞參與密勿的人早已感到憂慮，這時身負一肩責任的人都有此憂慮。要為迎接勝利做好一切準備，例如接收臺灣的工作就早已做好準備，財經教育各方面也已做好準備，全部着眼於戰後重建，然而也知道「勝利」並不等於「順利」，同時準備接受一切困難。

蕭同茲於三十三年四月就已說道：「我們深知今後所經歷的艱苦，勢必十倍百倍於過去，必須秉承國父大無畏的精神勇往邁進，才能突破橫在前面的重重難關，這是我們全社同志應有的信心。我們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完成我們現代化通訊社的艱鉅工作。」^① 蕭的「野心」不但要使中央社成為世界第一流的通訊社，而且要為世界報導機構開闢一個新的園地。這個園地有幅美麗的遠景，等待他去栽植，當然這只能期待於戰後才能實現，蕭充滿意念也充滿憧憬；惟戰後的情況能否讓他實現「野心」並無絕對的把握，所以才說出要秉承大無畏的精神勇往邁進。

後來事實的發展確是如此。戰後的中央社勇往邁進，締造了最輝煌的黃金時代，不久却又遭遇逆境，使蕭經之營之的新園地為共匪踐踏殆盡。短短金色年代只有四年，與國家同休戚，共命運，就撤退到

臺灣再打天下。所幸當勝利來臨時，有的人為勝利沖昏了腦袋，而蕭的頭腦始終清明；當大陸變色，有的人驚惶失措，而蕭始終保持鎮靜，完成了有計劃的撤退。

這四年，須先從勝利接收說起。接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步驟不能亂，蕭同茲坐鎮重慶，指揮若定，從容部署，迨國府還都到南京以後他才回到南京。

接收期間可紀的大事約如下述：

三十四年八月，總編輯陳博生應魏德邁將軍之請，偕英文部編輯關宗軾由渝飛東京，參加九月二日在東京灣內密蘇里軍艦日本投降典禮，派駐太平洋美軍隨軍記者宋德和與曾恩波亦趕往參加。

派彭河清、陳叔同參加芷江受降典禮。

派秘書曹蔭釋由渝飛京，設立辦事處，沈九香、黃灼南同行。周培敬、黃印文、沈宗琳、方國希先後奉派抵京。律鴻起、彭河清亦隨陸軍總部抵京。

派葉明勳為臺灣特派員，籌備臺灣分社。

派劉竹舟赴東北。

派翁平赴香港。

武漢、廣州、洛陽、長沙、南昌等分社業務恢復。

九月，派員接收南京、上海、廣州、北平、天津、濟南、徐州、揚州、杭州、保定等處日本同盟社及敵偽通訊社。

成立太原分社。

十月，派員接收青島、開封及河內日本同盟社。

結束沅陵分社。

派律鴻起等赴洛陽、大連。律奉派為瀋陽分社主任。

十一月，成立杭州分社，派張明烈代理主任。

十二月，成立青島辦事處，陳熙乾旋奉派為青島分社主任。

三十五年一月，派劉竹舟任長春分社主任。

二月，派李宜培籌設馬尼拉分社。

以上期間，在國外設置東京、西貢、阿根廷京城、舊金山、雪梨等處分社或特派員辦事處，三十五年八月又派王公達赴土耳其京城安哥拉，連同馬尼拉，共增設了七個單位。



至民國三十六年，當中央社全盛時期，由總社直轄的分支機構共四十三個單位（如附圖），加上長春分社所屬之哈爾濱、吉林兩個辦事處，瀋陽分社之承德、大連兩個辦事處暨臺北分社所屬之高雄、臺南、台中、花蓮、基隆的五個辦事處，總計為五十二個單位，而總社所在地南京猶未計算在內。國外分支機構除前述七個單位外，三十五年十二月，派關宗軾駐加拿大渥太華，三十六年八月派李星可駐西貢，派陳先澤駐曼谷，派王家松駐南美，調王家松赴倫敦，派任玲遜駐舊金山，連同在二次大戰時期原已派駐國外的分支機構如紐約、華盛頓、柏林、巴黎等，總數共為二十五單位，「海內外員工共二千六百五十三人。比諸勝利前夕的數目增加一倍。」袁昶超說：「在中國報業史上，恐怕沒有一個報業機構，其組織、規模與貢獻，能夠勝過中央社的。如果繼續有安定的環境，中央社將不難發展為一個國際通訊社，與英美各通訊社並駕齊驅。」^②

戰後中央社分支機構的急遽增加，一方面是規復戰前原已設置的分社，一方面是接收日本同盟社與偽組織的通訊機構。這種接收工作並未必盡如想象中的順利。以北平為例，中央社在戰前擁有的分社社址被別的機關佔據，收回自用就大費周章。丁履進說：「勝利後接收北平的時期，搶房子的事情鬧得烏烟瘴氣。抗戰以前，北平分社有兩處房子，一處在崇文門裏喜雀胡同，一處在西長安街石碑胡同。喜雀胡同的房子原來是租的，勝利後為電信局佔用，沒有收回的必要。胡同的一座大樓是中央社的產業，敵偽時期被偽建設總署佔用，並加以擴建，勝利後被交通部公路局接收了。我幾次找交通部特派員石志仁交涉，他說那是行政院命令，他無能為力。為這件事傷透了腦筋。最後我在北平行轅的會報裏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懇切陳詞，據理力爭，這件事倒多虧李宗仁幫忙，在會報席上命令石志仁將該房屋交還中央社，石志仁還是以行政院的命令推諉，李宗仁當時火了，說道：『行政院的公事我負責打電報，你通知公路局立刻遷出。』這才把房子收回來。北平分社是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東堂子胡同同盟社的舊址恢復發稿，直到三十五年七月才搬到石碑胡同那座大樓裏辦公。」^③

臺北分社是戰後新成立的，亦可作為一例。葉明勳說：「臺灣光復典禮舉行於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而我來臺灣則是三十四年十月五日。當時我以中央社臺灣特派員的名義，參加了臺灣前進指揮所，由重慶搭美機過上海而來臺灣。這也許是我一生的記憶中最難忘的一

頁。臺灣經歷了日本人半世紀的統治，臺灣的人民，父傳子，子傳孫，他們日夕的懷念着祖國，期望着祖國，而當一旦臺灣重歸祖國的消息來臨時，他們初則以歡騰鼓舞，繼則以感激零涕。這種情緒，羈絆了數十年的悠悠歲月，驀地脫羈而出，決不是言語所可以說出的，也決不是文字可以寫出的。明朝復國，高澈有句：『四塞山河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當時臺灣的情形，在我們一個經歷八年抗戰備嘗艱辛的人看來，這兩句詩正是最好的寫照。」可是當中央社成立分社時却找不到房子。葉說：「說房子嗎，別的機關屋檐比櫛，同盟社京町的舊址，却是留下被炸燬的一片廢垣頽壁，所謂接收的物資，那不過是些破舊的收發報機、桌椅、紙張與零亂不全的照相材料而已。至此乃不得不借用日商木材統整會社的舊址，誰知道這座房子歷經滄桑之變，便是後來中央社的樞紐所在地了。」^④

中央社在海外的工作人員不僅為中央社開展業務，也為國家爭取光榮。中央社在美工作的開路先鋒是前香港分社主任盧祺新，他在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是第一個駐華盛頓的記者，他在美國為中央社打下了天下。兩年後，總社為擴展在美業務，決定設立紐約分社，派湯德臣主其事，一九四三年（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立，第一個消息的發出正是珍珠港事件二週年的前夕。一九四八年（三十七年）又在舊金山開辦分社，從倫敦把任玲遜調來當主任，並從總社派李緘三作他的助手。那時候是中央社在美工作的最高峯，人數最多的時候，華盛頓分社有五人，紐約分社八人，舊金山分社三人。一天發

幾次新聞，差不多整天整夜都有人在工作。在聯合國大會開會時，還指派專人去幫助駐聯合國記者。當美國發生大事時，各分社的人力都動員擔任指派的工作。紐約分社又分兩處辦公，分社在新聞大廈，不出租費的聯合辦事處設在聯合國祕書處大樓的三樓，李強光就常川駐在那裏。^⑤

倫敦分社也不含糊。洪珊對此有簡要敘述：「戰後倫敦業務擴充，成立分社，由任玲遜同志主持。民國三十七年初，任同志調任舊金山，倫敦分社即由王家松同志接替，本人亦於是年奉派來英工作。」「我們以一個小小的辦事處，先插足於倫敦新聞事業的中心區，後來逐漸擴充，不數年居然發展成為一個規模粗具的分社。在艦隊街（Fleet Street）附近的薩利斯堡大廈（Salisbury House）內佔有六間辦公室，和英國各大通訊社及電報局都有Teleprinter直接聯絡，而且使英國新聞出版事業年鑑中也登載了中央社的名字，駐英各國新聞同業承認了我們的地位，這可以說是倫敦分社一段非常光榮的歷史。」^⑥

東京分社又何嘗沒有光榮歷史。東京分社的成立，雖是在一九四六年（三十五年）初，可是中央社的人帶著勝利的光輝早已到達日本，中央社在日本的報導活動是隨麥克阿瑟元帥佔領日本的那一天開始的。現任東京分社主任李嘉述說經過：「宋德和先生是東京分社的第一任主任，在他的任內，可以說是分社的全盛時期，當時除了宋先生自己，國內派來的特派員尚有曾恩波同志、沈承怡同志和自己。我們那時每天發稿的時間，早晚共七次，前後計五小時，陣容的強大完

整，可以駕凌於合眾社、美聯社之上；而我們在日本的聲名與信譽，亦就是在那時候樹立起來的。」李嘉在分社成立七年之後說：「七年來東京分社每天的報導，假如編纂起來，將可能是充滿了血與淚的一部遠東的戰爭與苦難的歷史。」^⑦

以上只是幾個選樣，說明中央社在戰後一段時期在國內與在海外的擴張與發展，每個角落都有中央社記者的踪跡，大家在工作上的努力是一致的。這個團體是以蕭同茲為中心，蕭佈下了每一着棋子都發揮了作用，誠不愧為雄才大略的統帥。蕭本人也承認：「我是下棋的人，分支機構的人事，有如一盤棋，你們是一顆顆棋子。」^⑧

現在回頭來看看作為新聞總匯和發號施令樞紐的中央社總社戰後的工作情形，先從編輯部說起。唐際清說：「從勝利復員到南京撤退的四年中間，總編部同人度過不少的歡愉的日子，同時也飽嘗了許多辛酸。」^⑨

當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南京同盟社華籍職員及電務人員即自動抄收中央社的C A P新聞發稿，中央社的人還沒有到南京，中央社的新聞廣播即已在南京傳播。

九月九日上午九時，何總司令應欽在南京接受日軍最高統帥岡村寧次的投降，為中國現代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也是中央社社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個日子。那一天第一個把這條消息向全世界播出時，電報報頭上一串冗長的字就像一串珍珠似的閃閃發光，鐫刻着光榮，也鐫刻

着記憶。報頭寫著：「中央社駐陸軍總部記者自前黃埔軍校九日上午十一時電」，這是參加觀禮的中央社記者律鴻起、彭河清、黃印文的集體創作，共同撰擬的一條新聞長電，情文並茂，是報導文學中一段珍貴文獻。

岡村寧次為日本投降主將。他的感想和談話在投降後的當時，是會引起讀者興趣的。南京採訪同人即向陸總要求約期會見。適有兩位外籍記者亦作同樣請求，經陸總安排於某日上午會見中央社記者，下午會見外籍記者，以示優異。中央社由彭河清、沈宗琳兩人前往，所詢的問題亦經陸總同意，事後的「會見記」亦取得何總司令的首肯。但是總編輯陳博生閱及此稿之後，認為岡村仍係一戰俘，中央社記者不應該去訪問，岡村說的話雖沒有毛病，也不宜據以發表。陳博生這種嚴正立場不能不令人折服。

中央社總社於三十五年三月正式還都。這時海內外單位遞增，新聞來源日增，編輯工作隨之繁鉅。

一、充實社稿與電訊內容：復員後，每日收到的電訊及總社訪稿，平均自四萬字至五萬字，由總社發稿的平均約三萬字。「甲種廣播」每日播發平均約一萬五千字至二萬字，足夠對開報紙要聞版及國際版之用。

二、增加對海外廣播C N P：為增進對海外僑報服務，三十六年增加C N P廣播一種，內容以國內新聞及有關華僑消息為主，字數每

日不超過六千字。

三、提高新聞報導速度：為達成此項要求，編輯部加強和採訪、編譯、電務三部的聯繫，力求做到分秒必爭。例如三十七年四月，國民大會選舉第一任總統、副總統時，在投票期間，每隔五分鐘即將開票結果播發一次。

中央社業務迅速開展，但國內的政治環境並不順利。勝利前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共黨的野心完全暴露，埋下了以後擴大叛亂的禍根。在「政治民生化、軍隊國家化」要求之下產生了反作用。關於前者，是輿論界造成一片混亂；關於後者，國軍實行裁軍並實行整編，匪軍則實行坐大。國軍整編的結果，引起編餘軍官極大的憤懣，而匪軍並不遵行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任何一項約束，乘機攻城掠地，乘機擴編隊伍。蘇俄將在東北接收日軍的裝備與軍火，全部轉送給匪軍，並掩護匪軍攻掠東北。毛匪澤東以宣傳與統戰齊施，軍事與政治併進，使政府無法進行建設，亦無從安定後方，其處境之困難可知。而美方在共諜鼓惑之下，馬歇爾八上廬山，專施壓力，要強迫組織所謂聯合政府，更見其存心左袒共匪。於是，人心惶惶，物價狂漲，貨幣加速貶值，金融趨於紊亂。嚴格的說，用血淚換來的勝利並沒有過幾天安靜日子。

共匪此時更加緊宣傳攻勢，又獲「民盟」盲從附和，如演雙簧，對政府肆行誣衊。中央社為政府辯誣，剖析國際與國內形勢，說明政

府嚴正立場，勸導民眾保持鎮靜，雖然盡到最大的努力，但很難達成預期的效果。唐際清說：當時「新聞檢查業已取消，各地民營報紙尤其是親匪報紙和雜誌享有新聞自由，任意刊載，不受限制。本社為代表國家的通訊社，受黨的指導，在新聞報導方面，無形中受到許多不必要的拘束。就此一端而論，本社所發的消息，落人之後，往往為各地報界所詬病。所謂啞子吃黃蓮，有說不出的苦。至於軍事新聞之發佈，處境尤感困擾。回憶自共匪公然叛亂以後，在戰略上採取攻勢，由東北會戰至徐蚌撤退止，國軍着着失利，國防部透過本社所發佈的戰訊，已失去讀者信心，使本社在此一方面黯然無光，至今引為遺憾。」^⑩

大勢如此，採訪工作自極困難。彭清說：「民國三十五年，勝利還都，所謂『國共和談』又在南京恢復舉行，共匪及其同路人遂藉此機會作肆意詆毀政府的宣傳，當時京滬各報所載有關『和談』新聞，多係直接間接由共匪及民主同盟供給，因此，各報在有意無意之間，亦就成了一面倒的現象。這是新聞自由的濫用，也足資我們警惕。在南京四年間，政治上是一個打爛仗的局面，新聞界是一片混亂，黑白混淆，是非不分。而政治環境愈惡劣，則本社發佈新聞所受的困難愈多，南京時代採訪工作的麻煩可想而知。」^⑪

提到採訪，蕭同茲本人也非常有興趣。律鴻起說：「在重慶期間，採訪部舉行會報時，蕭先生經常來參加。他對於每位記者的報告，極為注意，並分別予以詳盡指示。在工作研討中，蕭先生從未以

社長身份指示外勤要為某人捧場或者要對某人作不利之報導，始終保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場。遇有重要新聞，蕭先生則協助採訪，並時時爭取新聞之放行。尤其他一再叮囑，他個人縱令出現在某一新聞場合，也不要寫在新聞稿裏去見報。採訪部一位同事常說：『新聞工作不啻是蕭先生最得意的嗜好，也是他老人家最珍視的生命。』」^⑫

蕭同茲也曾親自採訪過大新聞。抗戰發生第二年，汪兆銘由重慶出走，於廿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在河內發表「艷電」，主張中止抗戰，對日求和。旋派高宗武秘密赴東京向日人談判，與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擬定秘密協定。汪即於廿八年五月五日在日人保護下由河內潛往上海，而於六月一日飛抵東京，十月一日再度赴日勾結，十一月一日舉行所謂「日華國交調整」會議。十二月三十日，汪與日寇簽訂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即世人所稱的「日汪密約」，這是一份賣國密約，汪欲袍笏登場，從事所謂「局部和平」，就非簽訂這項賣國契約不可。但是汪左右不乏理智清明人士，認為這種賣國勾當絕對幹不得，規諫不從，就只有出之一走。其中兩位著名人物就是陶希聖和高宗武。他們知道汪已不足與為，於廿九年一月三日携「日汪密約」相偕離滬逃往香港。這消息原是很秘密的，蕭同茲立由重慶趕往香港與高、陶會晤，採訪到「日汪密約」的全文，帶回重慶，於一月廿一日交香港大公報，揭露「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全文及其附件，將原件攝影刊出，然後由中央社香港分社據以發回重慶，在全國各報披露。這是轟動世界的大新聞。廿四日，蔣委員長為「日汪密約」發

表「告全國軍民書」及「告友邦人士書」，聲明決加倍努力驅除日寇，並盼友邦速予制裁。汪偽組織從登場至落幕，一直為全國民眾所唾棄，這份「密約」的公布有重大影響。

關於這件事，當時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盧祺新有詳細敘述，是很好的一段掌故。盧說：「蕭先生從未像許多其他官員一樣從重慶到香港來渡過一次假。他總是在重慶和他的工作人員在一起，以備應付緊急情況。可是，在二十八年底，他突然飛到香港來了。他是負有採訪任務的，但我們不知道。我僅僅以為那祇不過是由於重慶長時間的緊張而到香港來輕鬆一下罷了。他僅有一次和我一同外出，那是在和一個集團約定的一次午餐時間。那個集團每週集會一次，以交換有關中日戰爭的情報。我記得該集團的人員包括杜月笙、俞鴻鈞、孔令萊（孔祥熙的公子）、吳鐵城將軍的弟弟吳子祥、大公報的胡政之以及另外幾個人。由於蕭先生的聲望以及他與華北許多人士結識，這些人對我和中央社都很友善和肯幫忙。有一天，蕭先生失蹤了，據解釋，他拜訪『朋友』去了。結果證明他是去看從上海逃出脫離日本扶植下的汪精衛傀儡偽政權的投誠來歸人士去了。這兩個人是陶希聖和高宗武。他們於兩天前從上海抵達香港。據杜月笙先生告訴我，他們這次帶了一些重要文件，也就是「日汪密約」的全文。他們抵達的消息沒有公開宣佈，但我在他們抵達時曾會見他們。蕭先生得到那些文件之後，便立即飛回重慶，沒有告訴分社中的任何一個人。」^⑬

前文已簡述勝利後中央社編輯與採訪情形，而蕭在電訊擴充方面

更是作了很大的投資。中央社曾先後向美國訂購中型軍用三百瓦發報機三十架、交流電收報機七十餘架、二十呎巨型短波發報機兩架、自備發電設備三套、二點五呎短波發報機十架，以及其他電訊設備，於三十五年四月總社遷南京後陸續運到使用。三十五年冬，原由人工發報的各種無線電新聞廣播，一律改用自動發報機播發，由於發訊速度平均，全國各地分社及訂戶，都感抄收便利。三十六年五月，總社在南京和平門外燕子磯附近的吉祥村，購置土地一百二十畝興建國際發報臺，同年冬，臺址落成。機房寬敞堂皇，裝設二十呎發報機兩架、二點五呎發報機十架，配以對歐美、南洋及南美等處定向天線七付，不定向天線十付；並備有五十呎柴油引擎發電機兩架，以備停電時自行發電。從新街口總社至新發報臺間的遙控電纜十三公里，也裝設完成。新發報臺落成後，於三十七年一月開始對歐美廣播，收效頗佳。這套設備，實已具備世界通訊社的規模，全球各地，都可收到中央社新聞電訊。三十七年六月，尚擬在光華門外購地建國際收報臺，由於共匪擴大叛亂，勢燄日益猖獗，這一計劃即予打消。

事實上，自三十七年下半年，共匪擴大叛亂行動後，中央社開封、濟南、長春、瀋陽等地分社即已因城市陷落而相繼停閉。十二月初，徐州失陷，蚌埠、滁州相繼告急，南京風聲鶴唳的時候，中央社已開始將重要電訊器材，包括巨型發報機和收報設備，分別拆運臺北、廣州與重慶三處，而以臺北為中心。三十八年二月，總社雖遷至廣州，但電務部工作人員除少數留守南京外，大部份分別派遣至廣

州、臺北兩處。至三月間，C A P 電訊即移至廣州播發，臺北接替聯絡各單位的任務，南京已不再是電訊收發的樞紐，以便隨時應變。因此，南京於四月二十三日淪陷，辦事處撤銷時，電訊器材損失不多。至於運往廣州的電訊器材，也於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淪陷後，大部份運至臺北。這些措施，證明中央社在這次播遷中，自始即以臺北為主要目標，嗣後的一切部署，都是本着這一基本決策進行。^⑭

基本決策是蕭同茲策定的，每一重要關鍵他都把握住原則。朋友們認為他：「志趣堅定，不慕榮利，切實做事」，這種評語並非諛辭。以「不慕榮利」而言，勝利後在南京有一實例。行憲準備階段，全國舉辦立監委員與國大代表選舉的政黨提名，蕭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參加黨提名的審查會議，他如欲爭取新聞界立法委員或國大代表的提名競選，自為名至實歸，然而他無意於此。全國新聞界產生的五位立法委員，中央社總編輯陳博生是其中之一位，國大代表當中，中央社編輯部主任唐際清、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蘭州分社主任唐雄、西安分社王文德都分別膺選。蕭的一位好友為爭取提名遭受挫折，當時非常憤慨，曾向蕭發牢騷。他勸這位朋友，力言榮利之事不可爭，一切聽其自然，黨紀必須服從，爭的人已經夠多，何必再往裏面擠，增加黨的困難。這朋友仔細一想，這話出諸蕭之口，而蕭本人不爭，已經以身作則，如再執意的爭，非但有違蕭的好意，且亦有失風度，想通這番道理，遂亦泰然置之。

行憲是民國史上一件大事，從此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還政於

民，造成全民政治，為建設現代國家的必要步驟，但共匪蓄意倡亂，毫不理會這些，反而砌詞攻擊政府。蔣總統為謀求和平，於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暫行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李的第一件事即為與共匪進行和談，致使全國人心瓦解，和議無成，敵騎已渡江而至，共匪實戲弄李宗仁於股掌之上。他在南京只維持三個月，即將首都拋棄，宣布遷都廣州，在廣州又僅維持六個月，再宣布遷重慶。李於十月到達重慶，十一月初即飛往昆明，轉赴南寧，拒絕返渝，後來索興托病赴港轉美，從此一去不返，棄國事於不顧。受盡國人唾罵，甘心做國家民族的罪人。

大陸河山由此淪入紅色的魔掌，中央社勝利後的金色時代亦從而宣告結束。

政府遷至重慶，正值九月二日大火之後，繁華地區盡成灰燼，當時的軍事逆勢已無法挽救。十一月下旬，侵入貴州的匪軍，沿川黔公路進犯重慶，二十七日迫近南溫泉，政府決定遷成都。中央社所派隨同政府行動的五位工作同仁，由唐際清率領飛成都，重慶分社同仁則仍留守到最後，二十九日晚，重慶即被共匪侵踞。政府遷到成都後，整個大陸情勢已萬分惡劣，政府計劃再遷西昌。中央社追隨政府的三人小組，經與政府有關當局商討後，決定不再前往西昌。這時，中央社重慶、西安、貴陽等分社同仁，隨軍退到成都的共約四十餘人，情況都極艱困；但成都分社同仁却仍沉着工作，始終維持發稿。

十二月初，戰火又已迫近成都，有關當局供給中央社二十二個飛機座位，並通知儘早撤退。十二月九日，一行二十二人，包括總社所派隨政府行動的三人小組，和重慶、貴陽、西安分社的部份同仁，由成都到達新津機場附乘空軍運輸機，十日下午起飛，直飛臺北，不料當天晚間飛經海南島上空時，因氣候惡劣與燃油不繼，在海口失事墜毀。中央社貴陽分社主任李良侗、西安分社主任丁繼昶當場殉難；總社編輯部主任唐際清、記者康繼宏等均受重傷。受傷的人在海口休養了半個月才回到臺灣。

三十八年從春天到冬天，中央社始終追隨政府，輾轉播遷。中央社的新聞廣播也和抗日戰爭期間一樣，絕未因共匪勢燄的猖獗而有一天間斷。大陸上每一個城市的棄守，中央社當地的分社和辦事處，都是履險若夷，沉着工作，維持新聞報導和發稿業務到最後一刻，為全國忠貞的報紙與電臺服務。因而每當一個城市被匪軍侵入時，這天當地的報紙，仍然刊載了很多中央社的新聞和電訊。

大陸全部淪陷，中央社的國內單位，除臺北分社外，都相繼撤銷。二千多工作人員能撤退到臺灣的只佔極小的比例。但如長春、瀋陽淪陷後，中央社記者曾穿過匪軍鐵絲網徒步入關，奔回自由地區。蘭州分社同仁且取道新疆，翻越帕米爾高原，經巴基斯坦、印度、緬甸、新加坡、香港、歷時半年，終於到達臺北，所爭者唯自由而已。他們還是幸運的一羣，羈留在大陸的中央社員工却不得不接受悲慘的命運。

當廣州準備撤退以前，蕭同茲的痛苦相信比任何人為深，「雖然他愛國心長，而意念却是非常積極。」^⑮ 除了安排工作人員隨同政府行動外，又電召臺北分社主任葉明勳、紐約分社主任湯德臣同時到達廣州。關於前者，指示葉鞏固在臺北的基地，對於總社遷臺的同事與公物器材須妥為安置；關於後者，指示湯要在海外繼續奮鬥下去。蕭並約集總編輯陳博生、英文部主任馮國楨、會計室主任丁則怡舉行會議，針對當時情勢，改組海外單位及人事調整。並把歷年積存下來的外匯美金二十餘萬元，授權湯德臣在紐約大通銀行開立戶頭，由湯開支票支應各單位經費，俾中央社海外工作仍能照常維持。^⑯ 印證曾虛白的追思往事：「三十九年我從同茲兄手裏接管播遷來臺的中央通訊社。……經費方面，外匯已經三年沒有領到，臺幣收入不足十萬元……」但當他聽到蕭對湯德臣這番安排之後，「欽佩他處危若定設想周密之餘，更對他這樣忠貞黨國偉大人格的表現倍增崇敬。」

曾虛白說：「記得那時候故副總統辭修陳公曾把臺灣比做在驚濤駭浪裏打滾的救生船。同茲兄不獨奮勇跳上這條救生船，並且還做了覆舟後中央通訊社繼續奮鬥的準備。其用心之苦，動人肺腑。」^⑰

①蕭同茲：要完成現代化通訊社我們需要更大的努力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上輯

②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 第九三面

③丁履進：雜憶 三十週年社慶特輯第一六五面

④葉明勳：臺北分社五年 三十週年社慶特輯第九一面

⑤湯德臣：在美工作話滄桑 三十週年社慶特輯第九六至九七面

- ⑥洪珊：倫敦分社的前前後後 三十週年社慶特輯號九九面
- ⑦李嘉：戰後創立的東京分社 三十週年社慶特輯第一〇七至一〇九頁
- ⑧王文德：「我是下棋的人」 念茲集第九面
- ⑨唐際清：從勝利還都到南京撤退 三十週年社慶特輯第四二面
- ⑩同上 第四三至四四面
- ⑪彭清：最近十年來的採訪部 三十週年社慶特輯第五二至五三面
- ⑫律鴻起：請聽我道來 念茲集第五五面
- ⑬盧祺新：蕭同茲精神與我同在 在茲集第二三五面
- ⑭中央通訊社特刊 民國六十年編印第六三面
- ⑮黃雪邨：事理洞明、人情鍊達 在茲集第一八四面
- ⑯湯德臣：廣州之行 在茲集第一七五面
- ⑰曾虛白：拜墓書懷以誌永念 在茲集第一七四

十四、活到八十歲

大陸形勢逆轉，無可挽回，蕭同茲與黨內有識之士早已料到，但沒有想到會變得這樣快；一如日軍侵華，料定必會發生，決沒有想到會發生那般急迫一樣。三十八年七、八月間在廣州時，蕭知道如廣州守不住，政府會遷重慶，他決定追隨政府舉家遷往重慶，曾託在渝老友彭革陳替他找房子，彭很快就代他找好。據重慶分社主任潘劭昂來信說：「革陳兄來社談及神仙洞之房屋，渠謂確係佳構，且與主人相識。弟亦信其佳，但恐租價太貴耳。渠謂房主人非孳孳為利者，應有商量之餘地。昨日彭太太與房主相晤，告以租房人（指蕭同茲）之性格及做人之道，入居後必能保持整齊清潔，房主即慨然答應，作為送與朋友住，故收費甚廉。」^① 只是時局之急遽惡化超乎想象之外，蕭只好將遷渝的計劃取消。

政府於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正式宣布以臺北為戰時首都，中央社總社亦於同月在臺北正式成立，即以西寧南路二十號原臺北分社社址為社址。事實上，七月間總社已在臺北成立辦事處，行政與業務中心早已逐漸移臺。同年八月，總社編輯、採訪兩部同仁陸續由廣州來臺，與臺北分社同仁共同工作。總編輯陳博生也隨即來臺，主持編輯業務。社長蕭同茲則於總社正式遷臺以前，兩次往返臺北、廣州之間，從事有關總社遷臺的一切必要部署。

十月初，匪軍攻至廣州市外圍，政府人員奉命疏散。蕭同茲與吳鐵城暨廣州市長歐陽駒、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孝炎聯袂於十月九日自廣州白雲機場飛往香港，兩天以後，廣州即告淪陷。這與抗戰初起南京撤退時一樣，蕭又是最後的撤離者。

許孝炎說：「同茲先生寄寓香港約半年有餘。寓所在香港英皇道一公寓中，房舍湫隘，設備亦極簡陋，且臨港島東西幹路，交通繁盛，電車、巴士絡繹不絕，市聲嘈雜，非至深夜不能入睡，此實同茲先生一生最困窘之時期。說者謂，同茲先生耽戀逸樂，流連香島，不願回臺，實為耳食之言。」^②

蕭在香港，據許孝炎說：「大陸淪陷，中央通訊社之業務自不免受影響，幸同茲先生有遠見，事先佈置，海外業務得以維持不墜。當時中央政府及本黨已遷往重慶，但由於李宗仁之潛逃，不久即告瓦解，政治重心實際上已移至臺北。惟 總統蔣公尚未復職，一切措施尚無正軌可循，反共事業陷入人自為戰之局。就中央社之情況而言，編輯及發佈重心已遷至臺北，由當時總編輯陳博生先生主持；但對海外各地分社之指導及支援，則以香港為基地，由同茲先生自行負責。同茲先生在大陸瀕於危急時，已將社中歷年積蓄調至香港及紐約兩地，在黨政工作尚未恢復常軌以前，賴有此款，使海外各分社之工作得以照常進行，而社中同仁立場堅定，毫不動搖。同茲先生在港之一段時期之努力，豈容抹煞！」^③

當總社遷臺前後，由於大陸情勢惡化，失去鬪志，形成大逃亡的悲劇，抵臺工作人員生活雖較安定，然心情仍極苦悶；加之社中經費困難，一切業務只能勉力維持，難言開展。可是，儘管當時的客觀環境異常艱困，並未影響中央社繼續求進步的努力。總編輯陳博生由廣州來臺後，接受採訪部記者張任飛等人的建議，決定改進新聞報導的文體，中央社所發一切新聞稿件，包括：本市新聞稿、電訊稿、國外專電及外電譯稿，以及航訊、特稿，一律改用語體文撰寫，並嚴格採用新的新聞寫作體裁，澈底摒棄過去新聞稿中所常見的一切陳腔濫調，倡導新聞寫作的革新。這一改進措施，無需經費，也無任何困難，却在新聞界產生了宏大的效果。

陳博生是個勇於創新與求改革的新聞鬪士。「遠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按即五四時期），北京晨報總編輯陳博生曾參酌日本報紙編排法，把欄數改短，並且依照新聞的重要性，分別標題。這種改革，後來漸為全國報紙所採用。」^④

蕭同茲在香港的部署告一段落之後，來到臺灣，這也和勝利還都一樣，他又是後至者。蕭到臺不久，蔣總統應全國各方的一致請求，於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繼續領導軍民效力於反共復國大業，人心趨於安定，復興的基礎由此建立。誠如陳辭修先生所說，這是一條救生船。在救生船上，有蔣總統掌舵，軍事、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力求另創新局。但只有在臺灣的人知道，外間的人並不知道，即或知道一些，也不能了解內盤情況。因此，「同年五月，蕭社

長特邀請美國新聞界人士組織記者團來臺訪問，藉使瞭解當時自由中國反共奮鬥的實際情況。」^⑤ 應邀來臺的美國男女記者共二十五人，安排五天日程，由北至南，任由他們自由採訪。那時的參謀總長是周至柔將軍，還特地請美國記者參觀了我空軍、海軍及陸軍訓練，空軍總司令王叔銘、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分別負責接待，並由何世禮、徐煥昇、黃仁霖等予以協助，美國記者獲有深刻印象。

蕭於歡迎晚宴上致詞，曾有下面兩段話：

「臺灣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反共根據地，同時又是我們的指揮作戰大本營，我邀請各位先生來臺參觀，就是這原因。各位只要將整個臺灣看了之後，就可以知道或且更深切了解我們民眾反共情緒是怎樣，我們士兵的戰鬥意志是怎樣，我們官民合作的程度是怎樣，我們戰鬥的準備實況是怎樣。進一步也可以明瞭我們政府財政狀況是怎樣，我們經濟狀況是怎樣，我們物資供求情況是怎樣，我們大陸上人民反共鬥爭是怎樣。這些情形，我切望各位先生用銳利的眼光，明敏的判斷，來做一個公平的觀察。我們政府和人民都熱烈歡迎，願意盡量給予便利，只要各位有時間，都可以參觀。我們所預排的日程，不過是推測各位所需要的，如果此外需要更多的參觀，無論是集體的，或是個別的，我們願意盡嚮導的任務。」

「現在我們的大陸幾乎全被關閉在鐵幕裏去了，只剩下臺灣、舟

山和金門還是愛好自由和平的人類可以生存的一片乾淨土，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事實，我們今天能夠在這裏與美國同業共聚一堂，美國同業又可以在這裏自由參觀，自由採訪，這一個事實是何等重要。請各位先生試假想整個中國全被關在鐵幕裏，甚至於整個東南亞都被赤色帝國主義者所吞併，整個亞洲要成了什麼局面！假如整個亞洲如此，那末，西歐，巴爾幹，乃至太平洋的國家還能不受影響麼？」^⑥

這批美國記者回去才一個月，六月二十五日，韓國戰爭爆發，聯合國宣布出兵援助大韓民國政府抵抗北韓的侵略，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派遣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阻止共匪覬覦臺灣，這是亞洲局勢一大重要發展。中央社記者是第一個到達韓國戰地的中國記者，於戰爭爆發後的第四天即到達戰地，展開戰訊的報導與採訪。這項報導工作，一直系統地持續到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戰俘獲釋的「自由日」才告一段落。

政府遷到臺灣以後，黨的組織亦從事革新，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重新奠立新的基礎。黨營事業實行企業化，中央社組織亦因而改變，成立相當於企業機構董事會的管理委員會，中央聘請新聞界人士九人為委員，而以蕭同茲為主任委員。管理委員會的首次會議，通過聘請曾虛白繼任社長，魏景蒙為副社長，陳訓愈為總編輯，於三十九年十月二日正式就職。

要求中央社企業化，由新聞界組織管理委員會共同加以管理，是

蕭同茲一貫的構想，也是他接辦中央社時揭櫫的三大方針之一，以「經營企業化」懸為最終鵠的。政府在南京時，他就擬定計劃就商於陳布雷先生，惜未能付諸實施。

蕭同茲說：「我個人因為長久工作的經驗和站在黨的立場所體認，以為中央社是一個以新聞為社會公眾服務的機構，其性質同於一種廣大民眾的公用事業。因此，經過長期考慮，並由社內主幹同事多次的研討，結果認為最要緊的必須成立一個管理機構，在通訊社的發展未達到一定的階段以前，其主權應屬於國家，而以管理經營之責付託於全國的報業。當時對於管理機構的人選以及產生方法，都擬有具體辦法，預定到全國報業確能共同負擔本社經費，和全國報業聯合會組織成立以後，再依法進行公司組織，使中央社能夠過渡到和世界各國大通訊社一樣，實現報業聯營的方式，而且我們真是全國性的，較他們更為理想。」

蕭又說：「中央社之決定離開黨部獨立對外經營，布雷先生是有參與助成的關係的。雖然他感時憂國，心緒紛如，但在三十六年冬天的時候，我仍帶着改組的全部擬議，往湖南路訪候布雷先生。他翻閱計畫和聆聽了我的解釋之後，即表示：計畫很對，依照中央社事業發展的前途和本黨扶持新聞事業的政策說，不祇合乎理想，而且是很進步的。原則上他個人同意，但辦法嫌其轉折，但當時的情勢下，已無心情和時間來仔細研究，囑我與中宣部從長商酌。果然部中未經詳細研討，僅僅臨時改擬了兩個不同的方案，後來也不及請示決定。直到

來臺以後，更擺脫了原有的方案，另起爐灶，成立了今天的管理委員會。」^⑦

中央社管理委員會成立以後，蕭認為管理委員會只能管政策，整個業務的推動，其權應屬於社長，不能遇事過問，致使社長掣肘。他做了十四年的主任委員，到五十三年十二月退休時為止，始終保持這個風格。蕭退休時，恰好年滿七十歲。他離開中央社社長職務，總統聘蕭為國策顧問。他原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黨部改組，又一直擔任中央評議委員。

蕭同茲雖然不負中央社的實際責任，但與新聞界仍保持密切關係，並為中國新聞事業之向上發展及加強新聞從業人員的社會責任方面仍不斷貢獻其智慧，最顯著的事例是被推主持在中國首創的第一屆臺北市報業評議委員會。

臺北市報業公會於五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在第十二屆第九次理監事全體會議中遵照「推行報業自律運動」的宗旨，通過「臺北市報業評議委員會組織章程」，於同年九月二日成立這個委員會。聘請了七位國內新聞界先進、新聞學者和法律專家擔任第一屆委員。

七位委員的姓名和職業如左：

蕭同茲（中央通訊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少谷（前掃蕩報及和平日報社長）

成舍我（前北平世界日報社長、現任立法委員及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校長）

陶百川（曾任中央日報社長，現任監察委員）

程滄波（曾任中央日報及上海新聞報社長，現任立法委員）

阮毅成（曾任中央日報社長）

端木愷（法學專家、大學教授、律師）

評議會第一屆主任委員，經評議委員互推，由蕭同茲擔任，並聘中央通訊社總編輯沈宗琳為秘書長。

評議會成立後，因無成規可循，初期為探索階段。主任委員蕭同茲，曾與報業公會負責人，多次非正式交換意見，對有關新聞評議及專題研究各事的進行，獲得更進一步的了解，因而漸次推展工作。

新聞自律是現代大眾傳播媒介實踐「社會責任」、增進人類福祉、創造美好世界的必要途徑。臺北市報業公會自動的組織新聞評議會，更足以表現我國新聞從業人員責任感的自我覺醒。這種自律的需求雖然早已醞釀，但正式見諸組織的却由這個評議會開始。蕭同茲擔任主任委員為期四年，以後由黃少谷、成舍我、程滄波繼續擔任，蕭仍留在會中為委員之一，亦盡力之所及有所獻替。

蕭在主任委員任期中，評議會接得陳訴案三件，其中裁決兩件，

原陳訴人自動撤回一件。

第一件陳訴案發生於評議會成立不久。當年九月，臺北發生吳家元命案，兇嫌李裁法於案發後偷渡赴港，但在港被捕押解回臺，依法究治。由於案情複雜，且其發展曲折有致，臺北各報競相刊載，競爭情況不在兩年前瑠公圳分屍案以下，新聞紀事涉及吳家元的私生活之處尤為不貲。吳妻馮璧池於十一月底由香港致函評議會提出申訴，來函說：「先夫吳公季玉，於本年九月在臺北慘遭兇殺。兇嫌李裁法被捕後押解還臺，在法院開庭前後，報紙登載各種文字，於兇案辯護之外，對先夫肆意污辱，作人身攻擊。如此淆亂聽聞，顛倒是非，不獨對本案之進行有關，亦於新聞道德有不良之影響。璧池在港閱讀臺北各報對先夫各種記載，傷痛萬狀。數月前在港得悉貴會成立宗旨，並接受新聞登載被害人之申訴，謹特向貴會提出申訴，使先夫含冤得以早雪，奸人兇惡無法肆其鼓簧。迫切陳詞，不勝愴痛待命。」

這是一個熱山芋拋到評議會的手裏。評議會是應臺北市報業公會之請而成立的，成立伊始，就遇到指控「臺北各報」的申訴案件，對象又為概括而非特指，處理十分棘手。但評議會的態度非常嚴肅亦非常認真。秘書處首先將本案申訴書原文印件分送各委員研閱，並將各報所載有關吳家元命案的新聞和資料各剪貼兩份，以供參考。評議會於五十三年二月三日舉行會議，作成兩項決議：(一)本案應予受理。(二)本案無需再循調查、聽證程序，逕由秘書處草擬裁定書，提出本會全體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印發臺北市報業公會各會員報社。秘書處擬

定決定文初稿後，送經兩位委員核閱，提出修正意見。五月十一日，召開全體會議，各委員亦紛紛提出修正意見，經推請委員一人當場整理文字，一致通過決定文。文中說：「本會認為，前述臺北少數報紙有關吳家元之渲染記載，其動機，不僅毫無『本諸公眾權利』之『正當理由』，抑且明顯出諸迎合『公眾好奇心理』，其為『侵害私人的權利與感情』，實為報業應守之道德規範所不許。」又說：「出版自由之權利，無可避免的含有出版自制之義務。報紙對於是否刊載某一新聞之決定，自不能否認其所應負之道德責任。」六月一日，評議會對臺港各報發表決定文，臺北市報業公會十四家會員報中，除公論報因故停刊外，其餘十三家報紙，七家刊登全文，兩家摘要刊出，四家沒有刊登。發交香港四家報紙，兩家刊登全文，兩家摘要刊出。

評議會並非法院，沒有制裁權力，只有訴諸新聞學理與社會責任的影響力。一般而言，報界對評議會首次議決陳訴案件的結果，賦予了相當的尊敬和重視。蕭同茲和其他委員這種嚴正態度對於中國新聞事業趨向健康的發展大有貢獻。^⑧

民國四十四年秋，成舍我與蕭同茲、林柏壽、程滄波、張明、葉明勳等創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於四十五年十月正式開學。四十九年，教育部核准改為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推蕭為董事長，成舍我為校長。世界新專是國內唯一專門訓練新聞專業人才的學校，歷年所造就的人才，除部份繼續升學或出國深造外，大部入社會服務，全省各大報社及各廣播電臺、電視臺多有「世新」的畢業學生，都能堅守

崗位，樂業盡職。

蕭同茲是新聞教育的鼓吹者，也是新聞教育的扶植者。他主持中央社期間，每年都吸收各大學新聞系的畢業生。他認為從事新聞工作和從事教育工作一樣，都必須具有對這項工作的興趣與志願，否則便不能將「終身」付託給這個事業。新聞系畢業生不獨受過專業訓練，而且具有以新聞工作為終身事業的志願。可是他又認為單單接受四年大學教育就在新聞機構中擔負工作還是不夠的，所以進中央社的新聞系畢業生首先須作幾個月的校對，從校對工作中去接觸新聞實務，增進經驗，然後才能「發現」與「被發現」究竟適宜於怎樣的工作。蕭還認為大學新聞教育只有四年是不夠的，最好能如醫學院一樣延長為七年或六年才能造就真正的專業人才。可見他對新聞教育的期待至為殷切。

蕭認為人才是支持事業的骨幹，離開人才，不能辦事業，離開人才，尤其不能辦新聞事業。他於四十八年在政大新聞系演講時曾說：「才識兼優，學德並茂，這就是人才。今天做新聞記者比往昔所要求的條件更多、更複雜，由於傳訊工具與交通工具的發達，把這世界縮小了。往昔面對一隅，現須面對全世界，視野擴大，所要求的知識領域亦隨之擴大。近半個世紀科學與文明的進步，超邁過去兩個世紀或三個世紀，我們何幸而生於今日五彩繽紛的世界，耳所聞，目所接，全是新事物、新思潮、新觀念、波譎雲詭，瞬息萬變。做為新聞記者，是新時代的尖兵，決不能失落在時代的後面，需要有淵博的知識

以適應職業的時代要求，不但要求廣度，而且需要深度，從事這一職業，做一個出色的記者真是太不簡單。」

蕭又說：「提到知識，包括多方面：第一是工具知識，第二是專業知識，第三是有關寫作的專業訓練，第四是相關的科學知識，第五是藝術的陶冶。」

最後他告訴政大新聞系學生：「諸位同學既然選擇新聞事業為將來的職業，我願重複我已經講過並複述若干前輩先生對於新聞記者的期望。打定主意做記者，就一輩子做記者，不為外物所誘，決不中途改計，否則還不如趁早放棄，因為這條漫長的道路是艱苦的也是清苦的。」^⑨

蕭同茲除出任「世界新專」的董事長外，同時還擔任私校復興戲劇學校董事長。復興劇校於四十六年三月由王振祖創辦，宗旨為「培養國劇人材並配合政府關懷難胞清寒子弟失學之救濟政策，急切開學，既未及籌措基金，亦未遑計及固定經費之來源，平日僅賴黨政各方之獎助與本校董事之捐助以及學生劇藝初步培成後舉行公演籌款所得，維持校務。而對學生則屬救濟性質，不但免收學費，且供應學生生活所需與教育費用，是以開支浩繁，負荷甚重。每當經費竭蹶之際，則舉債應付，年積月累，迄五十三年九月，終於力難為繼，陷於極度艱困之境。幸賴中央俯賜關垂，予以扶植，獲由政府主管機關撥款補助，俾克維繫不墜。」^⑩

復興劇校常務董事馬壽華說：「民國五十一年，私立復興劇校董事會改組，大家推同茲先生為董事長。他以年高而堅辭，經周宏濤、王永濤兩位先生力勸，我比他長一歲，也以老當益壯、為校出力相勸，他始允出任。從此，他為董事長，我為常務董事，經常一起開會。與同茲先生接觸愈多，我也獲益愈深。對國劇，同茲先生與我有相同看法，都以國劇為我國傳統文化之一環，具有至高的藝術價值，實不亞於書法、繪畫；且其表彰的均為忠孝節義，確是值得倡導的一項事業。

「復興劇校由王振祖校長創設，錢大鈞兄、皮以書委員、馬慶瑞校長等，都曾致力維護。但因經費困難重重，維持不易。同茲先生任董事長後，曾各方奔走，希望政府能予經常補助，但因私立學校過多，無法開例。

「復興劇校能由私立改為國立，成為今天全國唯一培養國劇專才的搖籃，實為同茲先生的功勞。事後，據友人告知，同茲先生有一次晉見 總裁時，曾說明復興劇校與文化復興的關係，及過去對國家培育國劇人才的貢獻，確有存續的必要。 總裁乃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指示教育部，將私立復興劇校改為國立，於五十七年一月正式改組成立，繼續招生。同茲先生對這件事毫不居功，從未與人提及。

「近年來，同茲先生時常到學校，與學生談戲、練唱，鼓勵大家努力進修，求更高造詣。復興劇校歷年人才輩出，同茲先生潛移默

化、諄諄善誘之功，是不可磨滅的。」^⑪

蕭喜愛國劇，酒酣耳熱之際還哼幾句，頗具神韻，原來他有根底。關棠說：「三哥回到北平，寒舍頓增熱鬧。三哥驟以無事一身輕，故除有對外不得不參加的，及其他友好約會外，常到我家，或暢飲，或清唱平劇。他喜歡唱打漁殺家的蕭恩，我曾經介紹他與馬連良研究該劇的詞句和板眼。」關又說：「蕭十九年由東北回到北平這段期間，幾乎每晚都去聽戲，並與男女名伶時相讌飲，更有機會遵照鐵老面囑好好地安慰三哥，故晚餐時，男四大名旦梅蘭芳、尚小雲、荀慧生、程豔秋，女四大名旦雪艷琴、華慧麟、章遏雲、新艷秋，及小翠花、馬連良、楊忠寶、寶森常為座上客，或與三哥碰杯，或與三哥說戲，使他高興到幾乎飲過量，乃他平生少見的事。」有一次，蕭與程豔秋對杯，每人各飲了十杯。「席終，三哥對我說：『你請我吃這一頓飯，我認為最高興的就是程老板與我對飲十杯及馬老板與我拍板共唱打漁殺家。』」^⑫ 對國劇有深刻研究的趙班斧「發現他對藝術的智慧極高。對於真、善、美的欣賞，意境高超。均能心領究竟，抓到癢處。他的悟性是天生的。」^⑬

蕭同茲曾於七十二歲那年，東渡日本。蕭在國內，可稱足跡遍全國，但在此以前，沒有踏出國境一步。他有兒子、女兒、女婿、孫兒、孫女、外孫一大堆人在美國，屢請他去美，沒有去，有機會只叫他們回來。他的交遊遍天下，部屬故舊散處世界各地，也都有意請他去旅行，他也婉謝好意，因為他在大陸變色時曾私許心願：國破未

復，不出國門。五十五年，為了避壽，赴日本小遊，才破了例。

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寫「三爺東遊記」，寫得很傳神。

「一九六六年秋天，日本紅葉開滿山谷的季節，沒想到三爺由葉明勳、辜偉甫兩兄陪同，突然由臺北飛來東京，目的是避壽。

「那是三爺第一次離國放洋，看到戰後二十年來東京的繁華與太平景象，隨時隨地都流露出無限的感慨。其後在京都與奈良的旅行中看到正倉院中，所保存的中國盛唐遺物，和京都各地的廟宇古跡，文物風光，處處使人追念到當年故都的容貌情調。我侍奉左右，往往覺察到老人家一杯在手，默默無言，於避壽的閑雅心境中，徒添了一脈無可名狀的感觸。」

「三爺既來避壽，當然避見人客，因此在遊日三星期中，除了參加過一次當時駐日大使魏道明先生的晚宴以外，別無其他應酬。

「三爺既不願見客，當然更不願見戰前在上海、南京有過來往的日本朋友。唯一的例外，要算是戰前日本同盟社上海總局長松本重治。

「松本在戰前初到上海時，曾數度求見當時中央社社長的三爺，三爺都避而不見。最後由當時任上海大陸報總編輯的董顯光先生的斡旋，三人在上海見了面。在那次會面中，三爺發現松本並非代表日本軍方利益，而是很誠意地求解決已日益嚴重的中日危機，再進而建立

兩國攜手合作，永遠和平的基礎。從此以後，三爺和松本便時常見面，並且認為他是當時不多見的一位有良知良識的日本朋友。

「戰後松本曾一度被盟總當局所整肅，但因為他在戰時是故近衛首相的側近，所以在和約訂立後，甚為故吉田首相所器重，吉田一度想起用他為駐英、美大使，松本都辭退了。今天他主持以美國洛克斐勒財團的基金所建的宏麗壯大的東京國際文化會館，並且已儼然是日本文化界的棟樑，國際政、學界的聞人。

「三爺與松本一別三十多年，那次再會於東京國際文化會館，二老都已鬢髮灰白，三十年來兩國的變遷，可以說是滄海桑田，而個人的遭遇，又各有其辛酸艱苦。我看二人緊緊地握手不放，久別重逢的欣慰與感慨，盡在不語之中。

「松本那晚在一家叫做『半田』的高級日本料理屋中招待三爺，那是三爺在東遊期間最愉快而難忘的一頓晚餐。

「『半田』尋常是不接外客的，女主人是戰前就名聞全國的日本舞蹈家，現在已年過七十。可是那晚為了歡迎三爺，粉墨盛裝，親自登臺獻舞。七十老婦，在臺上進退迴旋，步伐輕捷，清歌妙舞，宛如少女。至於菜餚之精美，更使主客驚嘆。女主人在當天清早從日本北陸福井海濱用飛機運來剛上市不久的長腳蟹下酒，而酒則是新聞甕的關西聞名的「灘酒」。女主人本身在戰時也去過上海，舞罷更衣見客，跪着為貴賓斟酒，與松本先生談往事和舊時上海風光，言下掩不

住鄉愁似的感傷。最後女主人還捧出筆墨，請三爺揮毫題字，預備繡在她一件價值十餘萬日幣的新製的胸帶上。」^⑭

國民大會秘書長陳建中在「在茲集」中也說到蕭避壽遊日：「在行前同茲先生特地找我談日本的情況，因而涉及當時在日少數與政府有距離的青年，所謂『臺獨』問題，同茲先生深為注意。」「後來知道同茲先生的確在這一次日本之行中，不僅默默的作了不少的國民外交；同時，也接觸到好幾位當時在日本相當活躍的唱反調人士，曉以民族大義。」^⑮

葉明勳也說：「三爺那一次在東京的努力，終使和大使館多年失去聯絡的一些人，成為魏伯聰大使官邸席上嘉賓。這件事，三爺從不對人提及。」^⑯

蕭同茲在臺北住了二十五個年頭。四分之一的一個世紀他都住在這裏，定在這裏，有所為也有所守。在臺北市安東街寓所安度其晚年生活，看似優閒，但仍投身於社會，作參加者而非旁觀者。縱或他自己不主動做什麼，如能幫助朋友有所成就，決不吝惜他的幫助，他的人生態度始終是積極的，活着一天，就要活得有意義。蕭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從反面說，就是不要「活得無聊，死得痛苦」。抱定這個宗旨，蕭做到了，也完成了。

「蕭先生生活極有規律。清晨起床甚早，運動後沐浴，然後乘車赴保齡球館打球。午餐後小憩，晚間常外出應酬。午餐在家吃，向例

是玻璃杯五分之一的威士忌，夏天加冰水，冬天加溫開水，沖成一滿杯，平常就此一杯，星期天有親友來，也可能喝上雙份。民國五十二年，開始不吃米飯，只以菜下酒，這樣血糖成份降低了，體重也不會增加。」^⑰

這是章楚業說的。章在蕭家四年，由章的觀察，知道「他對於身外之物看得很淡。凡是來求助的人，他總是盡力接濟，而且從不對任何人提起。蕭家曾經遭過三次小偷光顧，把蕭先生的西裝、大衣，甚至所藏陳年威士忌也順手牽羊而去，蕭先生每次都淡然置之，反而笑着說：這位『慣偷』（三次可能都是同一小偷所為）很『雅』，居然也是『同好』。」

「蕭先生是很講究儀表的。他認為一個人如果連自己也弄不乾淨，弄不整潔，怎能做事？他很注意細微的地方，因為很多事壞就壞在地小方疏忽，而成功也是靠小處做得好而積累起來的。」

「從請客這件事，可以看出他處事的慎重。例如請帖一定用毛筆端楷正書，因為這張帖子代表主人的誠意。主客和陪客要配合得宜，少不得有兩三位會說笑話的陪客，增加席間融洽氣氛。菜式烹飪的適味和適量，要能使滿席稱讚而不奢侈浪費。甚至設席地點的環境應具幽雅情調等，都是費過一番心思的。所以他認為請客也是一種藝術，不能隨便。請客如此，其他的事情也可推而廣之了。」^⑱

蕭在晚年，常於晚餐之後與三數友好會聚於藍天餐廳。「三爺在

那裏儲備有美酒、名茶供大家享用，酒醇、茶香、意更濃。」「聚會時，三爺往往在首席靜坐，聽我們這些人天南地北的瞎聊。偶爾三爺也講一兩段掌故，都是我們平常不輕易聽到的雋聞逸事。有時我們偶爾犯上跟他開小玩笑，三爺亦僅微微一笑，不以為忤。所以和三爺在一起，每分鐘的時間都在愉快中度過，至今思之，一切歷歷如在目前。」^{①9}

蕭同茲曾和病魔纏鬥，兩次他都是勝利者。

第一次發現他患心臟病是在四十三年十一月，那是在偶然情況之下發現的。其時，蕭夫人因檢查身體，住在臺大醫院，蕭去探視，醫生正為蕭夫人量血壓，順便他也量了，却把醫生吃了一驚，發現蕭血壓太高，為他聽聽心臟，也發現不妙，再經檢查，確定為心肌梗塞症，立刻住院。蕭在醫院住了兩個月，然後回家靜養，直到醫生對他說可以恢復社交活動，蕭又回到他的「規律生活」。

第二次與心臟病搏鬥在三年以後。四十六年八月，心肌梗塞症復發，但對他已無太大的威脅，因為再也沒有突如其來的情況會發生。主治醫生陳芳武教授說：「像蕭先生所患的血壓高、心臟病，只能防止其嚴重，不能根除，特別以年齡過了花甲的患者尤然。談到防治，病人的遵照醫生囑咐，每天按時服藥，隨時多作休息，這一份耐心，最為重要。就這點說，蕭先生廿年如一日的長期耐心表現，實非常人可比。我現在還深信，如無此種長期耐心，蕭先生可能渡不過兩次劇

烈發作的難關。」陳醫師又說：「蕭先生每週日上午必然來我診所一次，二十個年頭，總計起來，大約有一千多次。」^{②①}

六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忽患感冒，即延醫診治，血壓偏高，高血壓一百九十度，低血壓一百零六度。四日，感冒已愈，血壓亦降低，高血壓一百五十六度，低血壓九十六度。八日感冒復發，經醫慎重診治，並開始服用抗生素，高血壓一百五十六度，低血壓一百度整。十日晚，感覺特別不舒適，即延醫至寓診治，服藥後，血壓降低，醫囑安睡無礙。十一日晨起，除喉頭稍感不適外，其他無異狀。上午至陳醫師診所詳驗結果，醫生說，一切情況正常。但至當晚九時五十分突感不適，急延醫師至寓所，已回生乏術，於十時十五分逝世，前後只有二十五分鐘。蕭說：「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一切如其預計。逝世之夕，距離他渡過七十九歲生辰一個月，享壽八十歲。

蕭逝世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治喪，飾終大典，備極隆重。總統並頒褒揚令，令云：

總統府國策顧問蕭同茲，性行果毅，器識宏深。早歲參加革命工作，歷試多能。主持中央通訊社逾三十載，規劃日新，於民智之啓發，國策之宣揚，竭智殫精，功隨年積。抗戰時間，揭發敵偽暴行，加強國際宣傳，領導有方，助勞尤著。膺聘為國策顧問以來，二十年中，不忘獻替。遽聞溘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

忠盡之至意。

總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蔣經國

- ①潘劭昂至蕭同茲函 三十八年七月廿九日
- ②許孝炎：憶香港的一段時期 在茲集第一六〇面
- ③同上 第一六二面
- ④曾虛白：中國新聞史 上冊第三八五面
- ⑤中國通訊社特刊 六十年十一月編印第六九面
- ⑥蕭同茲：為歡迎美國同業致辭 蕭氏遺稿
- ⑦蕭同茲：追念陳布雷先生 蕭氏遺稿
- ⑧盧治楚：我國新聞自律之檢討與展望 第一至第十面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五十八年六月編印
- ⑨蕭同茲：新聞事業、新聞記者與新聞教育 民國四十八年在政大新聞系演講，刊載於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大眾傳播學術論文集」，收入「在茲集」附錄第二八八面
- ⑩蕭同茲：私立復興戲劇學校報告 五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 ⑪馬壽華：同茲先生致力振興國劇 在茲集第一三六面
- ⑫關棠：蕭三哥軼事 在茲集第二五〇面
- ⑬趙班斧：襟懷若薰風朗月 在茲集第二一四面
- ⑭李嘉：三爺東遊記 念茲集第二四至二六面
- ⑮陳建中：不伎不求不慍不怒 在茲集第一六四及一六五面
- ⑯葉明勳：哭三爺 在茲集第一九五面

- ⑰章楚業：安東街二三一號四年 念茲集第八二面
- ⑱同上 第八三面
- ⑲張佈天、閔道宏：記藍天之會 在茲集第一四八面
- ⑳陳芳武：最合作的病人 在茲集第一六三面

十五、大家都說蕭三爺

美國文豪海明威的夫人最近說：這許多為海明威寫書的人都不曾描繪出他的神髓。海明威夫人也許求之太苛，但以海明威性格的複雜，要用文字全部烘托出來確實很困難。狀敘蕭同茲是怎樣的一種性格同樣的非常困難。

耿修業曾經在中央社工作過，「近一、二十年來緊緊的追隨三爺，有些時候，幾乎一個星期有七天與三爺相聚會。」他寫蕭同茲，竟不知怎樣寫是好。他說：

「孔子論吳泰伯是這樣講的：『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論堯，則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所謂『民無得而稱焉』，『民無能名焉』，便是『無話可說』，『不知說什麼是好。』」

耿又說：「把不偉大的三爺，寫成偉大的三爺，容易做得到。以一知半解，寫出三爺的偉大，也可勉強成篇。如要寫得恰如其份，讓三爺看了不說太過，讓三爺的朋友、同事、徒弟看了不說不及，這不是一件易事。」

但耿還是說出：「三爺之偉大，便是人家忿慨的，他不忿慨；人家怨尤的，他不怨尤；應該潦倒的，他生活得瀟灑自在。而這些都是很自然的，如行雲流水，沒有一點勉強，沒有一點做作，是百分之百真實的。」「儘管人間世千變萬化，而蕭三爺始終是蕭三爺，不曾富貴，也未貧窮，從前臺到後臺，始終是一副扮相。」^①

呂光說：「大家說『三爺偉大』，我也說『三爺偉大』，但是，如要我在教室裏對學生講述為什麼他是偉大，我想我無法用恰當的字句說得出來。他的偉大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一般人雖能看得到，但不一定也能領悟得到的。

「三爺，您真是『山高水長』！」^②

卜少夫也說：「有一位年青的外交官常常聽到有人讚頌三爺，樂於和他交往的故事。三爺逝世後，他再看到各方哀悼的盛況（這位年青人從未接觸過他），很奇怪，也很不解，問我：為什麼他贏得如此的廣大人緣與深厚友誼，在當前這個極度現實的環境中？

「老實說，我也很難具體的答覆這個問題。以我個人所親身感受的，祇覺得屬於一種氣氛，一種精神上的，而且是在自然流露中的一種聚合，從未想到為什麼，有什麼作用，可以獲致怎樣的結果。」^③

另一位在中央社工作很久的黃慶豐對於蕭之為人發出一連串「為什麼」的問號：

「為什麼永遠看不到他發脾氣？

「為什麼那次我這個助理編譯在酒席間和一位同事猜日本拳（呢！公！拍！），他以社長之尊，笑嘻嘻的叫我再來一次看看？

「為什麼喏大一把年紀，跳起舞來，那樣瀟灑、飄逸？

「為什麼他常常飲酒，連連飲酒，却永遠不醉？

「為什麼七十二、三歲的時候，他還會有興緻找我一同深夜去酒店同唱『打漁殺家』？

「為什麼他的生命力那樣強？

「為什麼我那次看小大鵬星期天早場平劇，他也赫然在座？

「為什麼？他為什麼能夠這樣？」

黃慶豐終於得到答案，由於「常常想到上面那些疑問，想呀想的，便出現這樣一個綜合印象：

「王道、隨和、樂生、達觀、太極、正直、無憂無懼、自由自在。

「絕對不錯，人們從來不曾看見三爺有過感覺得不自在的時候。」

由於蕭，黃慶豐提到他的老師，我國英語語音學權威張式一教授，張說「自由」二字原自佛教文獻中借來，佛說自由，是主觀上心無憂慮，不患得失，昂立於天地之間的意思。張有一付對聯可以體會到這種哲學境界。聯語是：

「不悲觀，不樂觀，是為達觀。 不消極，不積極，是為太極。」

④

毛樹清對於蕭也有說不出的一種感覺，他說：「回國七年，在幾所大學教書。晚間閒暇，陪蕭三爺在藍天樓上品茗聊天，幾乎是每天最大的樂事。那種情趣，那種感受，是無法用言語筆墨來描寫的。記得有一天我在授課時，一位大眾傳播系的學生突然發問：什麼叫男人的風格？什麼叫女人的氣質？這一問竟然把我考倒，我瞠目不知該如何用通俗的字彙描摹出來。突然間，我想起了藍天樓上的三爺，我告訴那位學生說：關於氣質，你最好詢問高貴的女性；關於風格，我邀請你明天晚間到藍天來，你無須講一句話，祇是坐在一旁細細觀察就夠了。」^⑤

還有一位中央社「舊人」李宜培，「見了蕭先生還是怕」，他說：「不知怎的，除了民國廿五年七月底，第一次傻楞楞拿著老師博老的介紹信，從北平坐兩天兩夜三等火車，到南京土街口『面謁社長』的時候，心裏怕得還勉強有點道理外，這許多年來，每見三爺，仍是『怕』，時時提醒自己，在蕭先生面前，別太放肆了，否則……否則什麼？自己不知道，想想更覺好笑。而且『怕』儘管『怕』，却

時時想見他。」李又說：「三爺不斷學，幾乎樣樣懂，件件精，但大家最羨慕的，是他的風度。這風度實反映他做人的道理，是他內在的美，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明白的。」^⑥

蕭同茲在世，過七十五歲生辰時，五十八年，中央社的人出版了一本「念茲集」，集入四十四篇文章；蕭逝世後，中央社與非中央社的人又寫了九十二篇文章，連同附錄十一篇，顏曰「在茲集」，於六十三年四月出版。此外散見於國內與海外的紀念文章還不少。作家張佛千用集納體編寫了一本書，題名曰：「大家都說蕭三爺」，這書名很俊俏，筆者借來作本書最後一章的標題，覺得非常貼切。

這些書，這些文章，大家都在說蕭三爺，須先由正名說起。蕭在昆仲雁序中，行三，大約還不到四十歲的時候，朋輩即以蕭三爺相稱，以示尊敬，到臺灣後，乾脆連姓氏都省略，人前人後，如稱「三爺」，大家都知道是稱蕭同茲。呂光於此有解釋，他說：「國人習俗嘗有為表示對某人之愛慕與敬仰，不稱其本名而輒呼暱名者，其淵源實已久遠。宋時，謂「大蘇」必指蘇東坡；謂「大謝」必指謝靈運。此種稱謂尚冠其本姓於前，更有不冠本姓而逕呼之者，如晉人稱「大手筆」必指王珣，唐人稱「三郎」者則必知係指唐明皇也。冠其本姓而稱之者，愛慕之心有之，崇敬之心有之；至於略其本姓逕呼暱名而不知所指者，則不特有愛慕崇敬之心，更見親暱之情矣。此親暱之情，非勢所能迫成，非財所能強取，實乃自然之流露，至情之表現也。今人稱『三爺』者，當不須問此『三爺』係『張三爺』抑或『劉三

爺』，實未有不知係指蕭三爺同茲先生者也。余嘗語親朋好友，今『三爺』一詞，似已成為同茲先生之專有權利，他人斷無取代之可能，親友聞之莫不頷然為是。三爺古道熱腸，急公好義。斷事明細，見解超然，故朋友間，甚或素未謀面者之間有糾纏難解之事，莫不爭相請示，以候明決。事無巨細，一經排解，無不心悅誠服，鬨歇煙消。是故『三爺』二字似已成為『解決問題』之代名詞。」^⑦

三爺究竟是何等樣人，很難用概意的辭彙加以界定，已如前文所引，但張明以莊子之說擬蕭，稱「三爺一生行誼，可以說有『至人之心』。莊子南華經天地篇有云：『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這幾句話正可為三爺寫照。」^⑧也有以魏晉六朝人風格讚美蕭者，如黃雪邨，他說：「正如從前劉伶嗜酒，携壺荷鍤而行，人問荷鍤何意，他說：『死便埋我』。三爺之具有魏晉六朝的風格，也可以從這些地方看得出來。一個人能將生死之際看得透，個人的得失榮辱當更可無縈於心了。」^⑨邢光祖却範以儒家丰度，他說：「在茫茫人海裏面，不論是在國內或是海外，我從來沒有瞧見過真正配得上孔子所說的『溫柔敦厚』的人，像蕭三爺一樣。」「『石韞玉而山以輝，川懷珠而川以媚』，這是我們蕭社長的寫照。」^⑩王兆荃則稱蕭為詩人，他說：「僕知公必不自承此號，以為己未嘗詩。然詩人有作詩與行詩之別，作者詩發於腦，而形於華；行者詩萃於身，而顯於行。夫著之於身外之楮墨，何若著之於己身之行為！公雖未嘗為詩，而言笑謦欬，乃至舉手投足之

間皆詩也，尚何取於楮墨乎？」^⑪ 此似詩品所云：「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蓋指精神韻味，不可以迹象求者。

以上所說，都有道理。有的從這個角度看三爺的行誼，有的從那一角度觀他的丰采，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難就難在說他這個人：

說是隨和，有時却非常執拗。

說是固執，有時又放棄他的意見，只要你說得有道理。

說是勤快，有時顯得很疏懶。

說是疏懶，却動定有恆，起居有節，從不懈怠。

說是和藹可親，但又無威而畏，見了蕭先生還是「怕」。

說是「怕」，却時時想見他。

說他脾氣好，有時又發怒。

說他脾氣壞，凡是同他有過接觸的人都會舉手反對。

說他無爭，却爭正義、爭公道、爭原則。

說他有爭，老子云：「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蕭就是這樣的人。

老子道德經說得好：「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

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王弼注云：自然已足，為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蕭同茲不是哲學家，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學者、專家，但憑他的智慧、領悟力、觀察力、閱歷與經驗，洞察人情物理，習焉漸焉，遂形成「三爺」型的人格與風骨，非他人所可假借。黃慶豐所得的綜合印象，如：王道、隨和、樂生、達觀、太極、正直、無憂無懼、自由自在，都是中國哲人齊物、養生、處世的大道理，蕭涵濡於這些大道理，而鎔鑄於行為模式之中，表現於日常生活，乃至於言語、神態，一舉手一投足之間，一切都循乎自然，沒有半點矯揉造作，沒有半點虛偽，其思想根源還是出於對儒家的仁與恕與忍的基本認識與體驗，似極平凡而極高明。袁守謙為蕭寫墓表，有云：「方先生之肩負大任也，志氣堅定，才情橫溢，若不知天下有難致之事者；及其倏然退息，則又襟度冲夷，欲然若定不自足者，此非學養德量之厚蓄積，其克至是耶？」^⑫ 袁的話並非諛辭。

蕭篤信科學而不信神鬼與一切迷信，以及星相卜巫與堪輿之學，甚而不肯信仰任何宗教。四十三年他第一次與心臟病搏鬥，從醫院回家靜養，很多朋友去看他。信仰宗教的朋友無不出於善意，勸他接受宗教信仰，對養病有幫助。因此在他床頭的書几上，陳列了各種宗教書籍，包括佛家的、道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朋友向他傳道，他

悉心諦聽，留置的書籍，也曾涉獵，最後，他風趣的說：「我還是將自己賣給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蕭夫人陳再君女士晚年多病，信奉了基督教，每個星期天都去靈糧堂做禮拜，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四十九年十月七日辭世，喪禮按照宗教儀式舉行，在追思禮拜中，牧師講道，力勸蕭也「歸主」。蕭聽道之後，沒有作任何表示，只是緘默。「雖然三爺畢生只信仰科學，未曾信奉任何宗教，但在情操上却潛存宗教意識。大家都說和三爺接近，如對清風霽月，這就說個正著！清風何曾為自己安排？霽月又何曾為自己打算過？春夢了無痕，凡事着痕迹，在三爺看來都覺太俗氣，他那裏還會縈懷已成雲煙的往事。」^⑬ 任玲遜說：「我當時並不知道蕭先生不是基督徒，但是在我看來，更重要的一個事實是，憑他的行為、言論和他一生的典範，他的精神實在是基督精神。」^⑭

李世傑解釋禪的意義說：「經常提示在我們面前而無可提取的『平常心』，即是『禪』的本來面目，這是要用『直下承當』，如實的生命體會，全體的、直接的智慧直觀，才可經驗到的最根源的生命創造本身，或最日常性的生命活動本身的境界，如此的究竟『實在』，才是禪的本來面目，所以『一切皆是禪』，山河大地，春夏秋冬，都是『禪』的表現。」又說：「禪生活的第一步，從悟而開始。」^⑮ 李嘉說：「我陪同三位去京都觀光，在龍安寺的石庭前欣賞了半天那以矮塀、白砂、綠岩所組成的天下名庭，走出廟門時，三爺談及禪和哲理，突然着重語氣提到『頓悟』兩個字，特意回頭向我笑

一笑，拉我一手。」^{①⑥} 蕭的人生格調是具有禪的意味在內。

張壽賢曾書龔定盦的詩以贈三爺，那是：

不是逢人苦譽君
亦狂亦俠亦溫文
照人膽似秦時月
送我情如嶺上雲

張說：「三爺逝世以後，靈堂上所懸掛的，報章雜誌所刊載的，以及各種場合所聽到的，有一種共同的、說不盡道不出的，與蕭三爺在一起，有如坐春風，如飲醇醪，令人回味無窮的感覺。」^{①⑦}

從許多篇文章中幾乎都一致讚美蕭飄逸的風格和高雅的風度，這些只是直觀的、感覺的，抽象的，却是存在的，如同看一幅畫或是聽一首曲子，感受如何，只有看畫與聽曲的可以意會，未可言傳。風度，指威儀態度，晉書：安平獻王孚論傳：「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也只是說安平具有這樣的風度，但風度究竟具有些什麼形象還是畫不出道不出的。大家都說：「你看三爺那種風度！」朋友間有似此風度者，即說「類似三爺」，或曰「得自三爺」，這也只有和三爺有接觸的人才有此感受。

黃杰將軍與三爺有四十年的交往，他說：「在臺灣的這二十年，他對我的關懷和愛護，可說無微不至。無論在陸軍總司令任內，警備

總司令任內，或是臺灣省政府主席任內，只要他發現有任何問題，絕不保留的加以批評和指點，而他那種對朋友相規為善的風誼，真使我畢生難忘。」「我更感到三爺有一種服人的力量，你有任何委屈和積悶，只要盡情地向他傾訴，便會領受到無限的慰藉。在我來說，真有『三日不見，鄙吝復生』之感。」^⑱

蕭的晚輩陸乾原寫他個人的感受。

「從認得蕭伯伯起，算來也快有三十年。其間，從當兵退役、經商、賦閑，也曾會見過不少位長者前輩，可是沒有一位具備他老人家那份慈祥和藹、灑脫飄逸的神韻，和無以名之的『穩』勁。我總覺得他像山水畫中的隱士，衣帶飄飄，無憂患，無寵辱之驚。在他溫暖關切的注視裏或輕輕的交談中，使每一個見到他的人或和他交談過的人，感到對所談的事，他老人家和談話人自己產生無比的希望和信心，似乎世上沒有困難是不能解決的，沒有任何人的前途是暗淡的。」

「在蕭家，只要沒有他老人家的同輩朋友在場，我一定是安排在他右手第一個位子，一面喝着酒，一面聽我天南地北的胡吹。我是個讀書不成，學劍又不成的材料，生平失意多於得意，眼高手低，知道不多，騷牢不少的人兒。我也深知在他老人家心目中，我所聊的一些是主觀的、淺薄的、片面的，話匣子一開，無休無止。同桌已在吃水菓，我們——我敢寫我們，我知道蕭伯伯是不會介意的——還沒有添

飯。雖然如此嚙嚙，從未被打斷過話頭，每次聊完之後，心裏感到無限的滿足和安慰。」

「慢慢的，我從他的眼神態度中可以了解他所未表示出來的意見：若是『尚無不合』，他老人家就會咪著眼睛品酒；若是『似是而非』，就把着酒杯望著我，似乎在說『真的嗎？不過份嗎？』即使『荒腔走板』，也一定等我說完之後再說：『Lu Lu，這臘肉味道不錯，吃一點。』他是惟一叫我綽號的長輩，正因如此更增進了親切的情份。」

「十年前一個晚上，我們發現拿出來喝的是假酒，換一瓶還是假的。蕭伯伯非但不生氣，反而說：『Lu Lu，我們來研究研究這真瓶假酒是如何的被偷天換日的。』一個尷尬場面，變成了有趣的研討會。」^{①9}

蕭對於年輕人從來不板起面孔說教，只在一些細膩的動作中或是簡單的話語中，使你去領悟，甚至豁然頓悟，產生了「服人的力量」。因而胡傳厚稱他為「精神的磁場」，李緘三稱之為「磁性的吸引力」，丁履進更粗獷，竟指為「魔力」，這「魔力」是三爺所獨有的，才能吸引這許多人圍繞在他的週遭。

蕭喜歡發掘問題，研究問題，和朋友們討論問題，問題多半從雜誌報章和書籍中得來。因而他有讀書的習慣，並鼓勵大家多讀書。蕭在日常生活裏，午睡以後是讀書的時候。讀的書很博很雜，他不專門

治某種學問，想讀什麼便讀什麼，既不做卡片，也不做笱記，旨在吸收新觀念、新思想與新事物。因此，李宜培說他：「三爺不斷學，幾乎樣樣懂，件件精。」然而他在重慶、在南京那段時間，沒有像在臺北一樣可以有固定的讀書時間，以此引為遺憾。他曾在家書中告知蕭夫人：「近三個月來，平均每天讀四小時以上的書，這是廿年來少有的事。環境幽靜，精神集中，對於讀書大有關係。我希望從此養成讀書的好習慣。」^⑳

蕭在離開塵世的前一刻，還在勸人讀書。葉明勳說：「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到水晶大廈去探望他，由五時談到六時許，他送我到電梯門口，說聲再見，四小時後就此人天永隔。第二天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也是執政黨十屆四中全會開幕，三爺是中央評議委員，在談話時我提醒他是否已經請了病假，他立刻到臥房取了一封年輕同志寫給他的信交我看，這位同志提出了若干對本黨應興應革的意見。接著，三爺就談起讀書的重要，尤其從事黨政工作的人，更要多讀書，特別是有關歷史的書。此外，他又強調誤事比敗事可怕，敗事可以看見，也可以補救，誤事常常不容易發現，稍為疏忽，貽患無窮。三爺靜悄悄地走了，沒留下一句遺言，這幾句話，豈非他老人家最後的吩咐？」^㉑

對於看報與閱覽雜誌，三爺是一位細心的讀者，連他自己也說：「我自問讀報讀得相當仔細，遇到一件重要的新聞，也喜歡就各報的報導作比較，這是個人的習慣和興趣，讀到一篇精彩的報導，必再次

欣賞。我所謂精彩報導，必然要文章優美，一氣呵成；必然經過策劃與設計，多角度的採訪，是一條完整的報導；必然尊重讀者而不教訓讀者，不代替讀者作判斷，不隨意用形容詞，而只敷陳事實，言之有物，句句結實。」^{②②}

蕭讀報仔細，在報社當總編輯的潘霽是個受益者。「民國四十四年三月，那時我服務中央日報，於 國父逝世紀念日，訪問當時尚健在的許靜老（世英），談他當年膺北洋政府之命南下廣州，迎 國父北上的經過。那篇短文，敘述靜老南下至 國父病逝北平。

「刊出後，當時主持香港時報臺灣地區業務的馮志翔先生給我一個電話。他說：同老對那篇文章很欣賞，但是同老也有一些意見。志翔先生在電話裏很客氣，他用意見二字代替批評一詞，當然也沒有直接說出那篇文章的缺失所在。

「人生最難得是良師，是益友。文字刊佈後，能夠獲得坦誠的批評，在現社會形態中，確是很難得的事。何況，這又是我心儀已久的一位長者、一位新聞界的前輩。因此，未經介紹，我就冒昧的去安東街蕭府求見。

「記得同老初見我時，頗感愕然。經我說明來意，他才拉著我的手坐下來。這次晉見雖然很短暫，但他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他顯得和藹可親，那種指導獎掖後進的長者之風，我至今不忘。」^{②③}

陳嘉驥，現任中央社編輯部副主任，他也有同樣經驗。「蕭先生對筆者在各雜誌上，連續不斷寫東北問題頗表嘉慰。他說：『這是作歷史工作，寫東北問題的人很少，並且時有錯誤；如你認為別人錯誤的應該予以指正，你自己寫錯時，也應接受他人的指正。』」^{②4}

在報社當總主筆的李廉也受到三爺的教誨。李說：「三爺知人亦識其文，報端言論，多半讀後即知其作者為誰。然而對於後進，雖獎飾多於責備，但却從不輕於讚美。我每為一文，自認用力頗勤，必蒙三爺賞識，殊不知與三爺晤見時，僅『此文為爾所寫乎』一語而已，毫無一語之褒。但若偶有詳析事理，發為有價值的建議之作，三爺必對之讚不絕口，往往以電話表示祝賀。久之，乃能悟見此中道理，即文章不必期其傳世，只求能有裨乎時艱，使一般讀者獲得思想與認識上的啓發，而對當前實際事務有所批評與建議時，亦理當出之於謙抑的心懷，溫和的態度，令當道者樂於接受，即此已足。此所以文章載道，道而必期其能行。否則徒尚纖巧刻薄，大非君子。今者，不但我自己寫文章，且已職司立意選題，日日看他人之文章，而自問能無大隕越，勉盡其文章報國之職責者，實得自三爺無言的教誨。」^{②5} 趙班斧說蕭：「人有一技之長，他會到處譽揚，不惜屈己以求。一切都是那末純真，那末親切。」這話很恰當。

蕭在謝世不久之前，曾很嚴肅的講出他的為人處世的經驗，以往像這樣嚴肅的談話還不多見。中央社記者黃肇珩於此有特寫：「那個祝壽的夜晚，蕭爺爺似乎有點異樣，他改變了話題，他重重覆覆地對

我說：『你年輕，記憶力好，我要告訴你一些我的為人處世的經驗，你好好記下來。』他有新話題，也重重覆覆強調的這些話，在今天——我提筆追憶他的時刻，似乎還迴響在我的耳旁。

「他說，一個成功的人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健康、知識、道德和智慧。

「他特別強調健康的重要：『沒有好身體，縱使有再多再好的理想和再大的抱負，最後都將成為空談。』他比喻：健康是一棵樹的根。

「知識，猶如樹的葉。一棵長滿繁茂、青綠的樹，永遠是欣欣向榮的。

「講到道德，蕭爺爺變得好嚴肅。他說，一個沒有道德的人，註定最後是失敗。一顆挺拔大樹的枝幹，必定是長短合度，曲直有序。

「智慧，是花朵。」

黃肇珩說：「我進中央社的時候，蕭先生已離開中央社，但是中央社仍瀰漫着蕭三爺的精神。我最先感受到的，是蕭先生留下的『平凡的實踐』。接着是每一位老同事談話中的『三爺』，我默察到他們對這位老社長的崇敬、悅服和懷念；更驚奇大家對這位老家長沒有半句微詞，這是何等的不易！慢慢地，蕭爺爺在我的心裏塑起一個形象：有魄力，有遠見，胸襟廣濶，知人善任，肯關照人又能體諒

人。」「似乎，有蕭爺爺的地方，就擁有一分定力，一片祥和與一團溫暖。」^{②6}

名滿天下、譽滿天下的人當面受人恭維，沒啥稀奇；而相隔多少年，在背後「沒有半句微詞」，確是不太容易。相見甚歡，但如遠隔千山萬水而仍心存敬畏，更不容易，這大概就是所謂「精神的磁場」作用吧！陳惠夫曾舉出實例：「二十七年秋天，我從重慶去成都，繼續我的大學學業。在這段時間裏，我認識了中央通訊社成都分社主任馮志翔和編輯組長宋崇實兩位先生，課餘常去春熙路中央社聊天。在成都，可以說除了學校以外，中央社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在中央社時，常常聽他們提到蕭社長的種種，言談的口氣，並不像一般僚屬關係，而是一個子弟對家長，或學生對老師的神態，包括崇拜、敬畏、和真誠的愛。大家好像有一種默契，一切的作為決不能讓蕭社長失望，也不能為蕭社長增添任何麻煩。當時我很以為異，暗想這位蕭社長不知究竟是怎樣一位人物，能把他的精神真正貫徹到分社的每一位工作人員，激發起他們的自動作風，由衷的接受他的領導，很想有見到他的機會。」^{②7}

「新聞事業主持人，有所謂樣樣精通，人『不敢欺』者，那是刻薄自大，有如破落大家庭，冷冰冰的毫無生氣。又有所謂『不能欺』者，自以為察察為明，耳目周到，騙不了他，那是小人行徑，自卑感濃，以人人為敵，多疑怯決，陷錯不悟，事業有形無形的損失，挽救不及，害了後人。一流的新聞文化事業主持人，要能做到人『不忍

欺』，上下協和，左右親密。人自為戰，發揮所長；聯合作戰，集體創進。決不是無為而治的老好人，必定把握原則；也不是垂拱而治的太平官，必須一貫不移。遇大事而不亂，遭小挫而不餒。功則歸人，過則自負。共同創造業績，榮譽公眾分享。蕭先生就是這一典型的掌舵者，他的成功，就是中央社的輝煌貢獻。」^⑳ 這是徐詠平對蕭同茲下的結論，徐從反面說起，也很有道理。

遠在華盛頓的朱仲育於在茲集中撰文說：「古往今來，將兵的人撫拾皆是，將將的帥才幾乎百世難求。新聞部隊這支兵，其難以駕馭的程度，唯有身為新聞從業的人最清楚。」「通常，配備精良的正規軍，兵驕將悍，不易跟散兵游勇的雜牌部隊結為伙伴，可是中央社不然，我這名充員戰士，在國內，在國外，跟不少『中央社人』併肩作過戰，自五星上將以至士兵，不僅合得來，且有時發現，滿臉驕悍之氣的，反倒是我這名充員，真使我汗顏不已。我奇怪，蕭大帥推愛及人、謙恭禮賢的仁德風儀，怎能對中央社人潛移默化到如此地步？

「站在新聞事業的立場，中央社本身今天還不能算是十全十美，然則，中央社若非經過蕭同茲先生數十年親身及精神上的指揮領導，能否得有今天這般的成就，便很值得懷疑。我曾聽蕭先生麾下的不少五星上將談起，蕭先生一直有心要中央社在各方面都迎頭趕上世界上第一流的合眾社、路透社以及一切的國際通訊社。他有此雄心，也確有完成此一事功的能力，讓我不解的是，何以他在五十六歲的壯年，就把這付擔子辭卸了，這實在是中國新聞事業史上的一大憾事。」^㉑

張佛千在「大家都說蕭三爺」一書中特別提到一點：「在許多文章中，都說到蕭三爺揚善而隱惡。但他絕非鄉愿。」張引述阮毅成、李廉、陳建中、葉明勳、黃雪邨、張冰子一些人的文章作例證，這些例證都係言之有物。

例如阮毅成說：「有一次，他和我談到我們共同的一位友人為忌者所陷的事，他要我問清楚內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乃將我所知道的實在情形，告訴了他。我並且說，『那一位忌人者，未免太小氣了些。』他竟立即正色的說：『此人不是小氣，乃是小人。』我很少看見他說話這樣認真，於是他乃為我說，某也賢，某也不肖。可見他於是非之辨，是並不含糊的。」

又如李廉說：「三爺之方正，亦常見於三五友好閒談之中。許多場合，朋儕酒酣耳熱，未免放言高論，而三爺多半一旁靜聽，不輕於置評。但若對某種主張或某種態度——儘管那是出於玩笑——如認為不當時，却往往予以呵斥，語驚四座。此當然出自極強烈的正義感，但也蘊含有望之殷而責之切的無限的愛心。」

李廉追憶「民國六十年，訪美歸來，深知聯合國席位已難於保持……曾與三爺談及此事。他當時熱血沸騰，謂吾輩今日無一而非孤臣孽子。」

張冰子自吉隆坡返國，在一次宴會中：「話達高峯，情轉激越。我身處臺北另一個花花世界，不覺百感交集，要作新亭之哭。此時忽

見三爺正容說道：『憂時拯世，大有人在！』我起立雙手舉杯，『我再敬三爺一杯！』」

張佛千因而作結語：「於此可見蕭三爺的『憂時拯世』之心，隨時流露。他對有『憂時拯世』之志者，也是隨時加以鼓勵的。」^{③①}

蕭平素待人非常隨和，但於重要關節處絕不苟且。趙班斧對蕭的這一點非常敬佩，說蕭「對忠奸是非之分，絕不苟且。知人之明，知事之明，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確是無有出其右的。」^{③②}

蕭在花甲以後，晚一輩的人未敢直呼「三爺」，或稱為「同老」，或稱「蕭伯伯」，黃肇珩且稱「蕭爺爺」。但這位「爺爺」，對比他更老一些的長者却份外尊敬，此不但於其日常談話中所現露的嚴肅神態，溢於言表；而且在行為中亦復如此。且舉一例。參加辛亥以前庚戌之役的革命老人莫紀彭先生與蕭交往最密，檢視蕭氏書翰存篋，從民國四十二年至四十九年，莫老致蕭之函多達百餘件。此老非但文辭優美，行草尤為遒勁，英文造詣亦深。蕭曾送他新版韋氏大辭典一冊，來信說：「一直由昨日下午翻來翻去到今朝，不肯罷手的，濃情未曾冷下去。因為我藏有過二千本精本英文書，共產了！」蕭六秩壽辰，莫老壽以文，並附長函，茲錄其中一段云：「得中央社來牋，敬奉悉先生榮壽，不勝欣喜！即遵書短文一則，限於紙幅，只能向壽字寫幾行洋八股，未稱先生勳德於百一也。先生在這個甲子中度過佳晨，適為中國國運大起落之世，其感慨又當如何？稚老以八十九

大齡，自認九十多歲矣，得天獨厚。」莫老藏有吳稚暉遺墨，內多梯突滑稽之件，嘗出示與蕭共賞。莫對革命軼事所知甚詳，蕭曾敦促追記，並願「經紀」，分別介紹於臺港各報揭載。莫有先烈林時埭詩鈔，其中「秋聲」三首，第一首起聯原句為：「落葉聞歸雁，江聲起暮鴉」，後經不匱室集主人胡展堂（漢民）推敲，將「江聲」易為「江帆」，一字之師，具見高明。莫老稱廣州市長歐陽駒為「惜白老侄」，於書翰中多有趣語。蕭對於前輩先生之持別敬仰，是因為：「從他們的典範中可以認知黨魂和黨德。」

蕭對於年輕一輩的愛護與關懷，使人不感覺他是老一輩。耿修業說：「他注重儀容，考究衣着，像年青人一樣充滿活力；凡年青人能做的，三爺未嘗警懼過「老之將至」，而且他的想法、看法，又無一不是『青年人的』。」^{③2} 律鴻起說他剛從南開畢業進中央社的情形，也說：「蕭社長像我們學校教授那樣懇切，並且對於青年大學生非常禮遇，我決定留下工作。後來社中大學生越來越多，就像一個研究院，上下內外活潑有朝氣，像學校又像家庭。在那遠昔的年代，蕭先生早已開始起用了年青人。時至今日，報章上還在討論如何用年青人問題，由此可知，蕭先生的思想久已是站在時代的前面了。」^{③3}

蕭之愛護年青人，也舉兩例。張佛千說：「我在『傳記文學』中，又發現于衡先生『採訪二十五年』連載的長文中，說到他與蕭三爺的一件故事：時在民國四十三年九月金門砲戰發生，國防部通知各報可以派記者前往採訪。他是香港時報記者，先在軍事發言人辦公室

填了一張表：『茲鄭重聲明，此次訪問金門，純屬自願，並甘冒一切危險，如於途中或目的地居留期間，遭受任何身體或財產上的損失，概與政府無涉。』本人簽字，並有見證人簽字。文中接著說：『那一晚我在館前街香港時報辦事處寫完新聞稿後，情緒很壞，右眼在跳，腿上的肉也在跳，心裏在想，這次赴金門採訪，可能凶多吉少，特別想到當晚填的那張表格，心裏的滋味更不好受。』正在這時，蕭三爺來看他，邀他到圓環夜市小飲，鼓勵他：『新聞記者百無禁忌，年輕人要勇敢些。』」

「最使他驚奇的，是他自金門回來，蕭三爺是唯一在飛機場接他的人。又邀他到圓環小飲，他問：『何以知道我搭這一班軍機回來？』蕭三爺說：『自你飛往金門後，我的心一直不安，因而每天一個電話給國防部，打聽你們在金門採訪的消息。』」³⁴

高育仁，臺南縣籍青年，臺大畢業，競選省議員獲雋，是省議會中年輕議員之一，現任臺南縣長。監察委員沈宗琳赴臺南巡視，這位青年縣長見到沈，不談別的，先談蕭先生。高說：在臺北時，很多人咸稱蕭先生之盛德，於是踵門求見，蕭老先生給他很多鼓勵，從此一到臺北，即往請益，蕭老先生的風範實在令他敬佩。蕭勉勵這位年青人，為社會服務，想做事，必定會遭遇許多艱難頓挫，首先要把握住一個「忍」字。高說，他現在每遇困擾事，就馬上想到蕭老先生。從蕭氏書翰存篋中果然發現高育仁寫給蕭的一封信，內云：「蕭伯父同茲鈞鑒：嚴暑將逝，秋風瞬屆，比維公私迪吉康泰，是所至禱。謹寄

上敝地土產麻豆文旦一籠，敬請笑納。」寫信的日期是五十八年九月廿一日，所用信紙是「臺灣省議會議員用箋」。

從各種口碑中，證明蕭同茲做人是成功的，做事也成功，但事業的成就還是得力於他做人的成功。李宜培說：「他有一套別人學不來的用人之道、容人之量。他相信屬下，尊重屬下，還喜聽屬下的意見。工作上誰有差錯，他從不當面申斥，甚至還暗地裏替你力頂，事後有必要，頂多只是對你笑笑，這一笑，小老弟們自己也就心裏明白了。一個官方機構在他主持下，在那段極艱苦的日子裏，能夠不出一個亂子，而且人才輩出，名聞中外，豈是偶然？豈是偶然！他先有做人的成功，才有事業的成功。」李宜培認為：「夫子忠恕之道，勞不辭，怨不避，輕利重義，慈祥謙抑，寬厚待人，都是他的本色，而且全是本能的自然流露，絕非矯情鎮物。看儀表，他像西方紳士，骨子裏是中國道地君子。」³⁵

潘煥昆直指這些為「蕭同茲精神」。

「『蕭同茲精神』是什麼？民國五十八年為紀念同茲先生七五誕辰出版的念茲集中，大家已經說了很多，綜合起來，可說包括下列各項：

「(一)氣度恢闊，稟大氣魄。

「(二)重視名器，堅持原則。

「(三)寬厚待人，不拘小節。

「(四)知人善任，兼容並蓄。

「(五)得志不驕，失意不餒。

「(六)不降低標準，不與惡勢力妥協。

「當然，一個人的稟賦是生就的，不易有所改變。不過如果我們在做人做事時，時刻想到上述各點，作為尺度，必可使『蕭同茲精神』得到適當的發揚。

「我在念茲集中已經說過：『中國人的一般缺點是勤勞有餘，眼光與氣魄不足；擅長做小生意，却鮮能經營大事業。甚至許多在國外喝過洋水，研究過先進國家方法的人，仍無法擺脫這一先天心理上的限制。同茲先生却是一個顯著的例外。』他早年獻身於黨國，未為一己圖謀。如果他在盛年時趕上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潮流，一定可以成為中國的福特、卡乃基或洛克斐勒。」³⁶

黃少谷是蕭同茲的老友，他在「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講詞中說：「我有千言萬語要說，却又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現在祇簡單報告對於同茲先生的一點了解：

「第一，同茲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創業家。

「第二，同茲先生是一位令人心悅誠服的領導者。

「第三，同茲先生是我們的畏友與益友。」^{③7}

任玲遜說：「世界上最著名的傳記作家布魯脫克曾經一度說明他寫作名人生活的秘訣，只要：『一個短而有趣的故事，一個脫口而出的辭句，甚至一句打趣的話語，往往較最大的戰役或者最精彩的演說，更能顯露出一個人的性格。』」任的看法——蕭先生乃一巍然屹立的偉人，一個具有古道熱腸而富於同情心的好人。」^{③8}

「我是同茲」，是蕭先生拿起電話筒慣說的開場白，這四個字代表他的一切。筆者愚魯，隨侍他四十餘年，始終無法捉住一個印象，寫出來，讓人一看，說：「這就是蕭三爺」。

漢書，霍光傳：「天下想聞其風采。」對蕭先生，由於天下想聞其風采，謹撰蕭同茲傳。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同茲先生八秩冥誕之日脫稿。

①耿修業：無能名焉 念茲集第六七至七〇面

②呂光：「活得好。死得快」 在茲集第四四面

③卜少夫：與三爺交遊 在茲集第六至七面

④黃慶豐：為甚麼？為甚麼？…… 念茲集第九八至一〇〇面

⑤毛樹清：談風格 在茲集第二九面

⑥李宜培：見了蕭先生還是「怕」！ 念茲集第二一至二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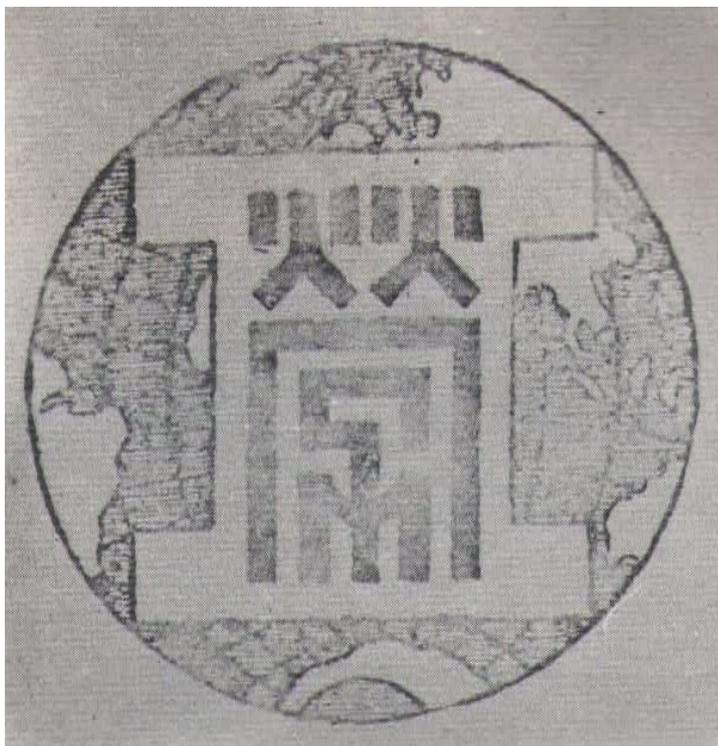
⑦呂光：「三爺」 念茲集第二〇面

⑧張明燁：有至人之心的蕭三爺 在茲集第一五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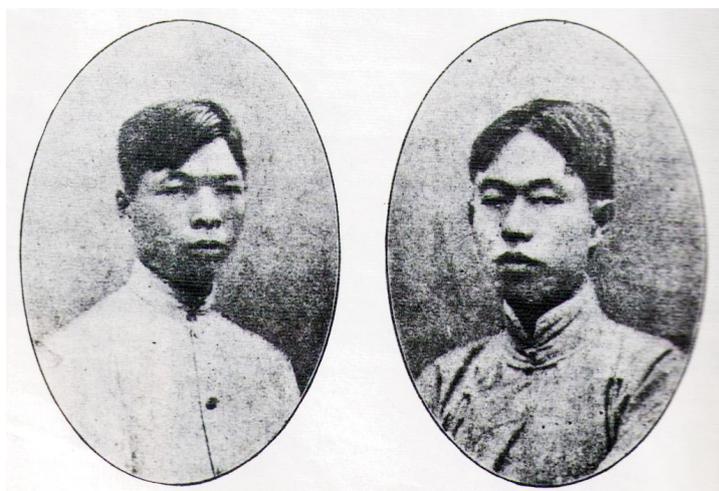
- ⑨黃雪邨：事理洞明、人情鍊達 在茲集第一八七面
- ⑩邢光祖：韞玉山輝、懷珠川媚 念茲集第三六至三八面
- ⑪王兆荃：壽愈高而美愈甚 在茲集第一九面
- ⑫袁守謙：蕭同茲先生墓表 在茲集第二九八面
- ⑬馮志翔：為三爺寫傳，我能嗎？ 在茲集第一七八面
- ⑭任玲遜：模範上司 在茲集第三二面
- ⑮李世傑：「禪佛教入門」譯者序文 第二、第三面
- ⑯李嘉：最初與最後 在茲集第六四面
- ⑰張壽賢：不是逢人苦譽君 在茲集第一五九面
- ⑱黃杰：照人顏色我難忘 在茲集第一八三面
- ⑲陸乾原：天泉西湧、空留回憶 在茲集一七〇至一七一面
- ⑳蕭同茲致蕭夫人家書 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
- ㉑葉明勳：哭三爺 在茲集第一九五至一九六面
- ㉒蕭同茲：新聞事業、新聞記者與新聞教育 在茲集第二八四面
- ㉓潘靄：首次晉見同茲先生 在茲集第二二四面
- ㉔陳嘉驥：蕭先生的風範 在茲集第一六八至一六九面
- ㉕李廉：永恆的懷念 在茲集第五八至五九面
- ㉖黃肇珩：灶披間的成就 在茲集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面
- ㉗陳惠夫：以德服人的蕭三爺 在茲集第一六六面
- ㉘徐詠平：永遠抹不去的影子 在茲集第一一三面
- ㉙朱仲育：新聞界的主帥 在茲集第三九至四〇面
- ㉚張佛千：大家都說蕭三郎 第四七至四八面

- ③①趙班斧：襟懷若薰風朗月 在茲集第二四面
- ③②耿修業：無能名焉 念茲集第六九面
- ③③律鴻起：請聽我道來 念茲集第五四面
- ③④張佛干：大家都說蕭三郎 第四六面
- ③⑤李宜培：見了蕭先生還是「怕」 念茲集第二二面
- ③⑥潘煥昆：發揚蕭同茲精神 在茲集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面
- ③⑦黃少谷：永遠不會忘記他 本書第一至第三面（代序）
- ③⑧任玲遜：模範上司 在茲集第三二面

圖輯



湖南勞工會會徽



黃愛與龐人銓



藍江童子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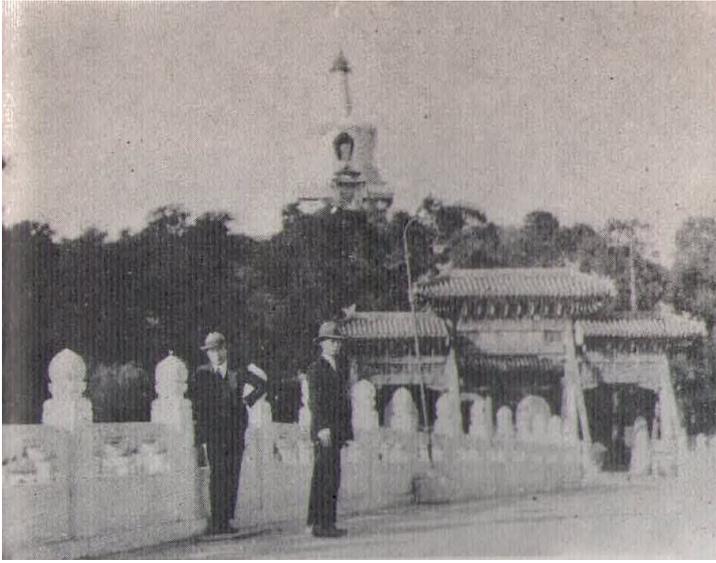
民國十一年一月十七日，黃、龐遇害後，湖南勞工會刊印「血鐘」小冊，控訴軍閥暴行。蕭同茲持此小冊，在長沙散發，後又携往漢口，交江聲日報刊載。



十一年攝於長沙，自左至右：坐者劉紹泉、傅素、李彤、蕭同茲、鄧伯粹；立者李承式、符狄梁、郭宗汾、（最左者姓名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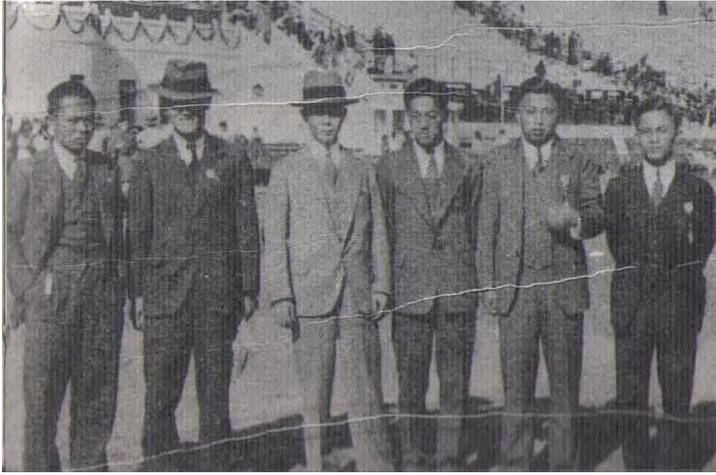
三十一歲時攝於上海。



十八年蕭同茲與梁乃賢奉派赴華北工作，遊北平北海，攝於白塔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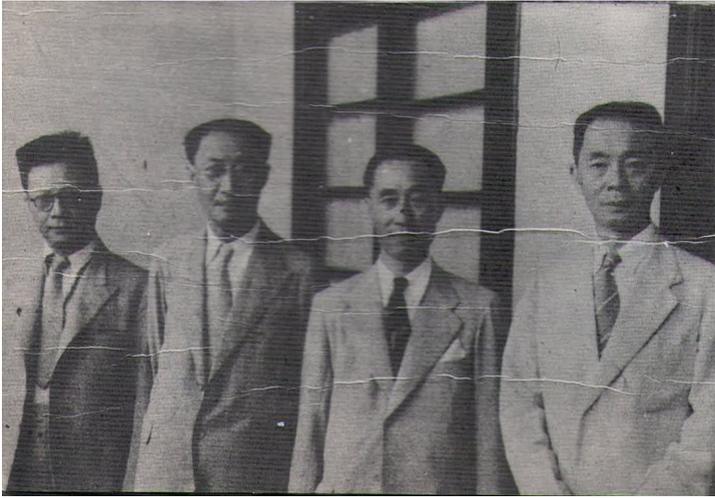
十九年六月，蕭同茲隨吳鐵城訪東北，在哈爾濱水上俱樂部留影。自右至左：前排蕭同茲、（不知名）、李鳳、吳鐵城，後排李芳、王紹季、簡孝純、張震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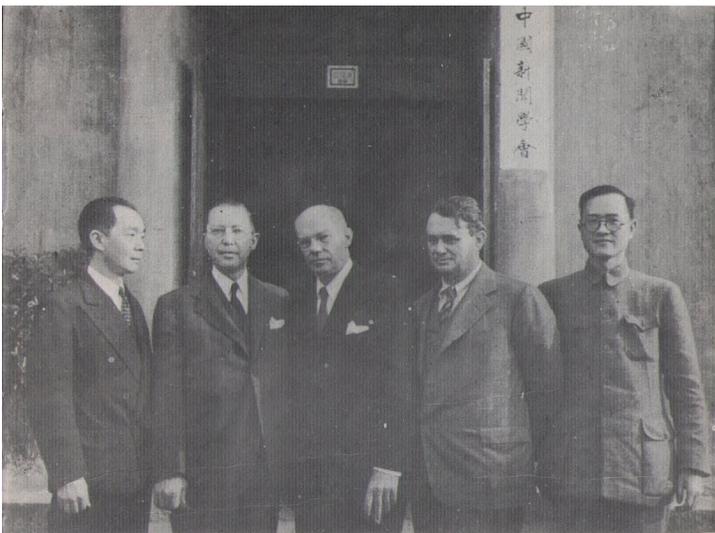
二十五年在上海舉行全國運動會，中央社組採訪團在會場工作，蕭同茲特往慰勞。自右至左：郭則虬、律鴻起、丁繼昶、蕭同茲、馮有真、李丕祖。



三十年五月，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以榮譽獎章贈予重慶大公報，蕭同茲前往大公報社道賀，與張季鸞合影。



中宣部長張道藩（右第二人）訪問中央社，與社長蕭同茲（右）、總編輯陳博生（左二）、秘書曹蔭禪（左）合影。



民國三十三年，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成立，蕭當選為理事長，外賓前往祝賀，右立者為馬星野。



三十三年四月一日，中央社在重慶總社紀念成立二十週年，中宣部長梁寒操致詞，左為吳鐵城。



三十五年春蕭同茲勝利還都，攝於南京明故宮機場。



三十七年一月九日，蕭同茲為中央社南京總社七層辦公大樓工程破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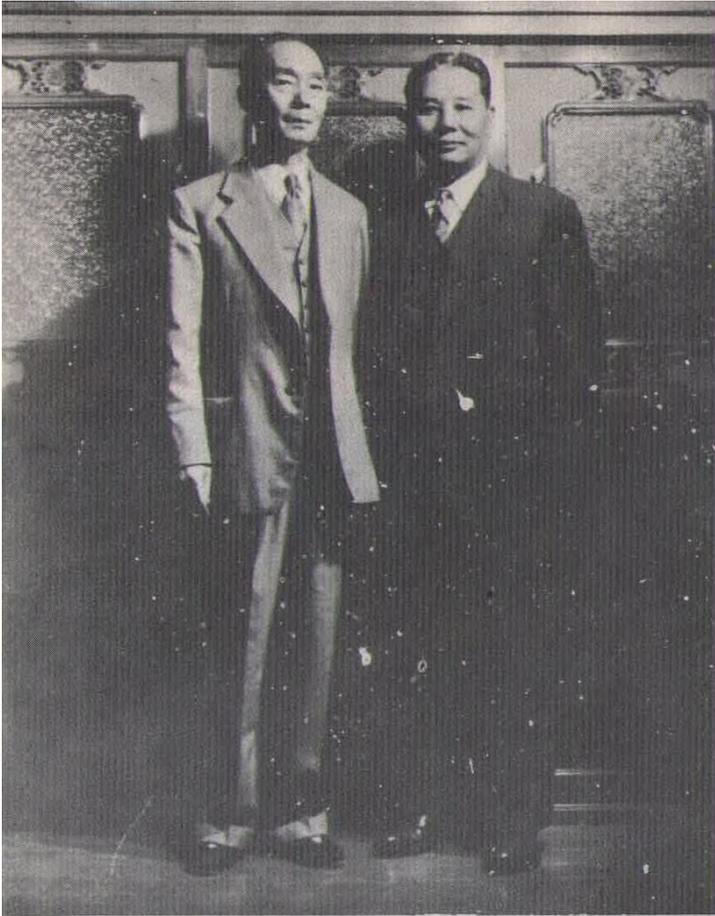
建築中的中央社南京上乘庵大廈。



三十八年秋攝於廣州東山，左起：吳鐵城、蕭同茲、許孝炎、蕭同茲夫人、張岳軍夫人、顧祝同、吳子祥、張岳軍、吳幼林、吳鐵城夫人。



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蕭同茲將中央社社長職務移交給曾虛白，中為監交的羅家倫。



蕭同茲與張岳軍攝於安東街蕭宅，時在四十二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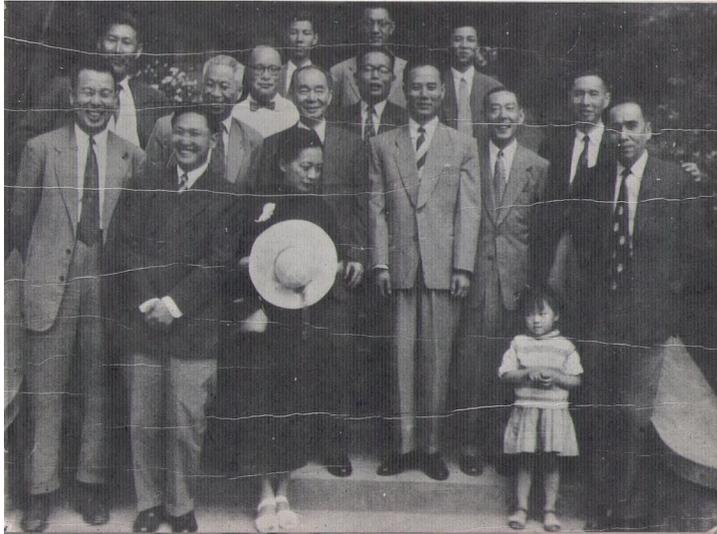
四十三年四月一日是中央社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蕭同茲主持紀念會後和同人合影。圖中八十一人，已有九人作古，四十五人退休或辭職。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董事會成立時合影，時在四十五年五月。自右至左：（前排）成舍我、王雲五、于右任、蕭同茲、林柏壽，（中排）閻奉璋、游瀾堅、李中襄、辜振甫、端木愷、辜偉甫、程滄波、黃少谷，（後排）郭驥、陳訓念、張明煒、阮毅成、葉明勳、謝然之。



蕭同茲熱心國劇，提倡和鼓勵不遺餘力，曾擔任復興戲劇學校董事長六年。這是他和香港調景嶺來臺學藝的學生合影。



蕭同茲與劇評家陳定山（立於蕭後着襯衫者）及名票趙培鑫（右起第三人）等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攝於陽明山。



蕭同茲和他的重要伙伴曹蔭禪經常在一起吃飯，談論社務的處理。



五十八年十月「念茲集」出版，中央社同仁向蕭同茲獻書，為他的七五誕辰祝壽。左起：周培敬、馮志翔、沈宗琳、周紹高、壽星、丁則怡、律鴻起、張潤生、蕭孟能。



七十五歲生辰，中央社總編輯沈宗琳，把紐約湯德臣寄來的美金十元面呈蕭同茲。湯德臣指定這是給他買酒喝的。



祝賀六十一年二月中央日報社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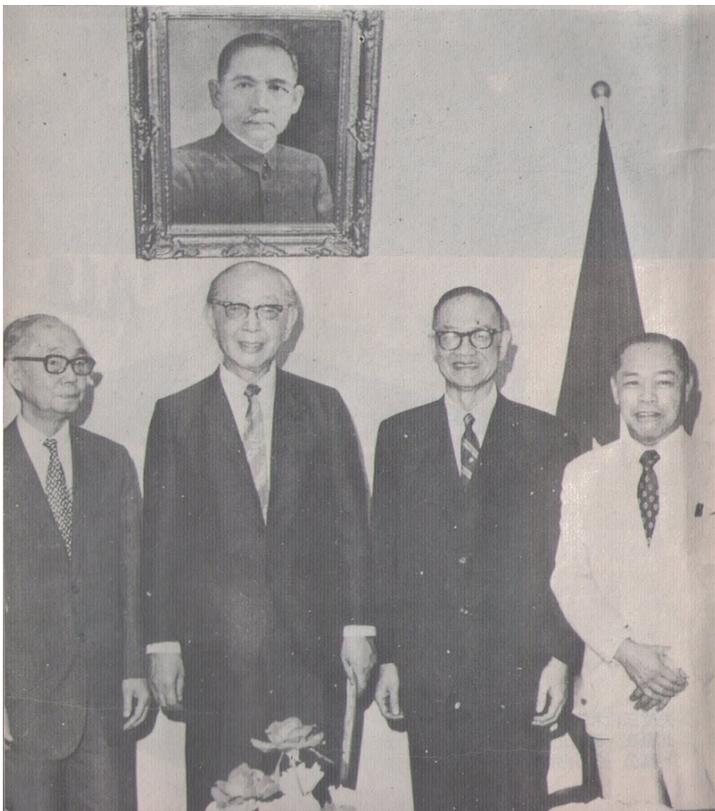


為日月杯保齡球比賽頒獎。



。 粹伯鄧、茲同蕭、烈陳：起右、學同班同位三茲在工甲兩湖

湖南甲工在臺三位同班同學，右起：陳烈、蕭同茲、鄧伯粹。



中央社先後四任社長，自左至右：蕭同茲、曾虛白、馬星野、魏景蒙。



蕭同茲於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十一月二十五日大殮公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公祭，由中常委兼行政院長蔣經國主祭。



蕭同茲和他三位夫人的墓園，在臺北陽明山第一公墓。

作者介紹



本書作者馮志翔先生，原籍湖南衡陽，民國前三年（一九〇九）生於湘潭。民國二十一年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四十六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亞洲新聞事業研究會研究員。

歷任中央通訊社總社記者、南昌、成都分社主任；四川省臨時省參議會第一、二兩屆參議員；北平華北日報主筆、北平日報總編輯、臺北中華日報北版主任兼總編輯；香港時報駐臺特派員，曼谷世界日

報、臺北徵信新聞報副社長及政大、師大新聞學兼任教授。

現任行政院新聞局顧問。